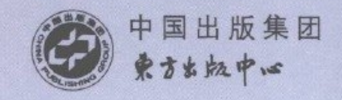


希腊史

尼古拉斯·杜马尼斯 著　屈闻明 杨林秀 译

A History of Gree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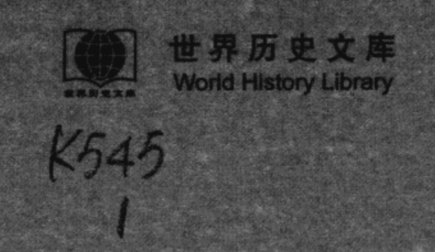


A History of Greece



ISBN 978-7-5473-044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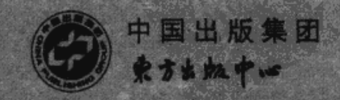
定价：30.00元



希腊史

尼古拉斯·杜马尼斯 著　屈闻明 杨林秀 译

A History of Greece



上海市版权局合同登记：图字:09－2010－61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史/(英)杜马尼斯著;屈闻明、杨林秀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4
ISBN 978－7－5473－0445－7

Ⅰ. ①希… Ⅱ. ①杜…②屈…③杨… Ⅲ. ①希腊—历史 Ⅳ. ①K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8918号

责任编辑：章　悬
责任印制：尚小平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　　话：021－62417400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毫米　1/16
印　　张：18.5
字　　数：245千
版　　次：201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0445－7
定　　价：3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前　　言

ix

《希腊史》(*A History of Greece*)一书讲述了从青铜器时代(约前3300—前1200)希腊语最初在爱琴海地区使用,直至今日的希腊社会历史。许多人常常深感困惑,究竟荷马、亚历山大大帝、拜占庭皇帝、佐巴(Zorba)以及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诸位名人可能拥有哪些相同之处?使得上述人士成为"希腊人"的本质属性又为何物?在这样一个世界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地区舞台上,希腊文化如何得以幸存?希腊语又如何得以跻身世界上最古老的活语言之列?

长久以来,上述问题一直得到错误解读。现代的评论者们总是对希腊主义这一概念抱有一成不变的定论:希腊文化是早在古典时期便已确立成型的特定体系。自18世纪以来,现代希腊人竭力建立自己与古典之间的联系,已然打造出一套现代希腊语(katharevousa),并将其树立成全民用语;同时摒弃通行的地理名称,代之以古典时期最初的地名。而另一方面,西方人则常常对此加以反驳,认为在古代希腊人和现代希腊人之间并无相似之处,因此得出结论:两者之间无联系。

令人惊愕的一点是,在希腊延续性的问题上,很少有人认识到文化以及族群的演变发展通常会变得相当难以辨认。此书的叙述脉络追寻希腊历史本身的发展和前行轨迹,虽然希腊历史发展过程有一大重要特征,即为了遵循和符合古典模式,希腊精神一直在各个历史阶段不断

加以重新塑造：在罗马时代、拜占庭时期以及近代各个阶段，通过用心模仿古典希腊传统，希腊身份的属性一直在重新塑造。另外，此书还秉持一个理念，即任何文化都无法在真空中发展。希腊文化的确立和重新确立，都是在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得以完成。古典时期的希腊虽身处一个独特而狭小的世界之中，但埃及社会以及东地中海地区更加完善的社会都对古典希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若要理解这一漫长历史的每个阶段，超越国家界限这一大背景至关重要。如若没有西方以及西方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如若不是西方人对希腊遗产的特殊兴趣，希腊今天可能就不会存在。

虽然希腊民族在希腊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希腊史》这本书并非局限于希腊民族之历史。本书并未将时间耗费在血统之类的话题上，即使这类话题在今日许多希腊人中甚为流行。《希腊史》一书追寻的是一个文化群体的历史命运，这一文化群体自身可视为一个族群，抑或可视为一个更广义的文化体系，或谓之普世(oikoumene)，后者通常用来指称“希腊世界”。在本书所涵盖的绝大部分历史时空中，“希腊世界”包括那些虽居住分散，但经由希腊语言、希腊教育或希腊宗教而维系联结的诸多人群。从希罗多德时代直至君士坦丁时代，这些人群将自身称为“希腊人”(Ellines)，从 19 世纪至今也是如此；但是在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历史中，他们称呼自己所用的名称却是“罗马人”(Romanoi, Rhomoi)，其中传达的含意是，他们将自己视为罗马帝国及其余绪中希腊化的那部分。

普通读者是本书的首要读者群。出于简短之需，难免牺牲掉许多重要话题。如此一来，涉及希腊东正教会、现代思想潮流部分太过简略，而古代晚期基督学辩论、卡瓦菲(Cavafy)和卡赞扎基斯(Kazantzakis)则毫无涉及。书中糅合了大量新近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我也在叙述上力求流畅连贯和严密细致。

* * *

首先，我必须感谢 Chrissie Verevis 为我通读了全稿，并提出了诸多有益评论。另一个 Cazzie——Nick Pappas 和 Milan Voykovic 也都

通读了文稿并提出了鼓励之词。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厚颜讨教诸多研究希腊历史各领域的友人。有关古代时期的内容，我频频请教了 Ben Brown、Geoff Nathan 和 Shawn Ross。而更多时候，我通过与以下诸位现代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博学之士探讨而获益匪浅：Petro Alexiou, Philip Carabott, David Close, Richard Clogg, Vicky Doulaveras, Effi Gazi, George Hatzikosmidis, Antonis Liokos, Margaret Poulos, Neni Panourgia, David Sutton, Yanis Varoukafis 以及 Alfred Vincent。同时，我也想感谢无缘谋面的许多学者，他们的著作使我在希腊历史领域颇受启迪，我都在参考文献中一一列举。本书得以付梓，也得益于为我提供玛奇朵咖啡(machiatto)和蕊丝翠朵咖啡(ristretto)的诸位友人：黑 Jimmy、Anthony、Albert，以及位于我居所之外的咖啡车里的年轻人。非常感谢新南威尔士大学艺术和社会科学学院为我提供各项基金资助，以及 2004 年、2008 年期间的休假。同时感谢 Terka Acton、Jenni Burrell、Kate Haines 和 Keith Povey 在编辑方面付出的努力。最后，感谢我的家庭，伟大的父母亲 Jack 和 Connie，亲爱的妻子 Helen，和我完美的女儿 Daphne——同我取得的其他任何成就一样，这本书也献给她。

xi

关于翻译的一点注释

在涉及希腊语的转写法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不完全遵循今天许多研究古代史的学者们所采用的常规，而使用了更加忠实于希腊原文的转写法。因此本书中使用的是“Kos”而非“Cos”，“Palaiologos”而非“Palaeologus”。但是，业已流行的希腊人名和地名的转写法，例如 Corinth 或 Constantine Karamanlis，则并未改变（例如未写成“Korinth”和“Konstantinos”）。

尼古拉斯·杜马尼斯

致　谢

对下列机构和个人在复印版权材料方面提供的许可，作者和出版者表示感谢：

悉尼大学尼科尔森博物馆(Nicholson Museum)：刻画希腊人和亚马孙女战士作战场景(公元前 6 世纪晚期)的黑色人物花瓶。

纽约艺术资源(Art Resource)，下列图片：宙斯或波塞冬，来自约公元前 460 年阿忒米西翁(Artemesium)的青铜人像；约公元前 200 年的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1028 至 1055 年，佐伊画板(Zoe Panel)，刻画了位于皇帝君士坦丁九世和佐伊皇后之间的耶稣；宣传海报，“希腊人的爱国主义：二战中的希腊抵抗，1940－1941”。

雅典贝纳基博物馆(Benaki Museum)：Theodoros Vryzakis 的洞窟教堂宣誓场景；Edward Dodwell(约 1805)刻画雅典集市的图景；Dimitris A. Harissiadis 拍摄于 1947 年雅典奥菲士影院的照片。

悉尼大学 Kathryn Welch 博士提供的雅典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照片。

虽然竭力联系所有版权持有者，但如若造成任何疏漏，出版者非常愿意在第一时间就有关事项做出必要安排。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史前至公元前500年：起源

历史上的雅典位于一个三角形平原的腹地。平原逐渐开阔，沿着缓坡向萨罗尼克湾延伸。现代雅典城向外迅速发展扩延，几乎覆盖整个平原。近陆的四座山（帕尔尼斯山[Parnes]1 413 米，彭特利孔山[Pentelikon]1 106 米，伊米托斯山[Hymettos]1 037 米，艾加莱奥斯山[Aegaleos]470 米）高耸矗立，以致空气污染无法吹散，形成的烟雾久久滞留——雅典人由此称之为烟云（nefos）。围绕平原的中心，有一片小山丘，包括呈圆锥状的利卡维托斯（Likavitos），此处海拔高度 227 米，一座白色小教堂位于小山顶之上。古城距此不远，位于一座 70 米高的高台之下。高台的大小与这个小城相配。它就是古时雅典的城堡，今天世人所熟知的卫城（Acropolis）。游客初至，多为一睹那巍峨挺拔的帕特农神庙。然而，正是这块突兀而立的高地，成了雅典娜和波塞冬争夺该城的战场，它增添了神庙的威严，使其能够俯瞰全城景色。

整个爱琴海域，诸岛错落，海岸崎岖，给人印象恰似鬼斧神工之作：现代地质学家们关于此地形由来的解释可能与荷马时代希腊人的说法遥相呼应。大约 7 000 万年前，非洲大陆板块开始朝欧亚大陆移动，形成一处洼地，此即地中海；随之也出现了一系列半岛（例如意大利、巴尔干、安纳托利亚）以及山脉（从比利牛斯山脉到阿尔卑斯山脉），沿着东

南方向的轴线穿过巴尔干，直至土耳其和伊朗。品都斯山脉，与伯罗奔尼撒半岛、伊奥尼亚岛屿、南基克拉迪群岛、克里特岛、卡尔帕索斯岛，还有罗得岛一起构成了同一山脉带。后来形成的平行山脉向西继续延伸，包括奥林匹斯山、东色萨利、埃维亚、东阿提卡以及北基克拉迪群岛。在不稳定的地壳结合部位有一火山带（例如尼斯诺斯、桑托林[锡拉]、米洛斯岛、埃特纳火山、维苏威火山），希腊、安纳托利亚和意大利南部就分别位于其两侧。在极罕见情况下，甚至可以用肉眼观察到新地势形成的过程。

地理知识对了解希腊历史至关重要。例如，几乎覆盖整个内陆的山脉阻隔了与山外的交流往来，为靠山为寇的人以及那些希望远离国家政权的村镇——即所谓的不登记在册的居民（agrafa）——提供了理想的地理条件。希腊除了很小部分适宜集约耕作以外，当地人一直以来都主要依靠海上贸易获取日常食品，也依赖海洋获得经济收益。土地对人口承载能力低也意味着希腊人有向外迁移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可以追溯至远古时代。

从生态意义上讲，希腊从未具备成为主要人口集聚中心的先天条件。希腊与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经济更加富裕、人口更加稠密的文明正好相反。上述两个地区适宜农业集约耕作，因其享有来自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以及尼罗河的可靠水资源。而希腊农民则不得不与天斗争，以应对每年都变化莫测的降雨分布和降水量。来自北欧的气流带来了雨水，但由于巴尔干山脉的阻碍，降雨变得难以预测。一年里的八成降雨都发生在冬天，而相距不远的临近地区降雨量都不相同；某年降雨量较平常年份减半或翻倍都不足为奇。自荷马时代起，农民们就已经学会了面对这些挑战，他们首选那些所需水分相对较少的作物，特别是橄榄、葡萄和谷物；同时也会做好每 4 至 5 年就有一种作物歉收的准备。在《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一书中，与荷马差不多同时代的赫西俄德曾经怒斥其懒惰的兄弟，使其认识到唯有辛勤劳作才能衣食充足的道理："尊贵的佩尔塞斯(Perseus)啊，将我的话牢记在心，辛勤耕作直至不再与饥饿为伴。"[1] 自从赫西俄德时代以来，

农民们通过混合作物耕种(在同一地块种植不同作物),同时将地块分散(这样可以分散作物歉收的风险),已经将风险降至最低。对群体间相互合作扶持的依赖,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希腊人自古以来就优先选择村庄群居的生活方式。

从原始人类到最早期农耕者

原始人最早在80万年前就经由安纳托利亚抵达欧洲,希腊境内能提供大量此类证据的遗迹只有一个山洞——位于距离塞萨洛尼基以南30公里的佩特拉洛纳(Petralona)。山洞中所留原始人遗迹可以追溯到30万年甚至40万年以前。距今3万至5.5万年间的考古资料有所增加,在色萨利、伊庇鲁斯和伯罗奔尼撒北部都出现了尼安德特人生存过的明确证据,以及一些早期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证据(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智人大约于25万年前出现在非洲,然后从非洲迁移至其他各洲,淘汰并取代了所有其他的原始人)。我们能够更明确地了解从末次冰盛期(约2万年前)起在希腊的人类活动图景。在此时期,北欧地区冰川覆盖,南部欧洲则是寒风呼啸的大草原。大约在1.8万年前,海平面要比今天低大约120米。这就意味着许多爱琴海地区的岛屿当时都与大陆相连,基克拉迪群岛中部从安德罗斯到伊奥斯,是一座岛屿。有一些动物,比如矮象和其他矮巨型动物就在此栖息生存。

智人区别于其他原始人之处,在于其独特的获取、储存和积累知识的能力。现在看来,出现在末次冰盛期之后的气候条件的改变,形成了对人类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则促使人类获取更先进的技能和认知能力。关于希腊在旧石器时代末期的情况,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好资料来自今天纳夫普利翁(Nafplion)附近的弗兰克西洞穴(Franchthi Cave)。史前学家们已经辨别出伴随着环境改变而出现的饮食和技术方面的相应变化。在末次冰盛期之初,那些选择在山洞栖息的狩猎者猎杀野马以及在附近平原上吃草的野牛。距今1.4万年前,证据显示气候变暖,森林茂密,使得小型猎物,如鹿,能够绝好地生存。至此,居住在弗兰克西洞穴的猎人已经提高了获取食物的能力,食物变得多样化,包括水

果、蔬菜、谷物、坚果、鱼和贝类。到了距今1.1万至1.2万年前,山洞里的居民已经明显成为熟练的水手,因为他们能够远至米洛斯岛去获取黑曜石,并用这种天然玻璃制作非常尖锐的珍贵工具。然而,除了弗兰克西和其余几处遗址外,几乎再无人类活动的宝贵证据。这意味着希腊未能吸引规模庞大的捕猎者,抑或说明希腊难以养活数量众多的采集者。

4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变革大约发生于距今1.1万年或1万年前的新石器革命时期,通过对农作物繁殖过程的直接干预而生产出更可靠的农业主食品。农业生产要求居有定所,人口便会随之增加,最后就会出现更复杂的社会形态。来自安纳托利亚和近东地区(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移民早在距今9000年前即公元前7000年时,就将农业耕作技术和知识引至希腊。这些新移民也会放牧,包括猪、牛和羊,他们的财产里已经出现了耐火黏土小雕塑、陶器以及特制的农具。从公元前7000至前5500年,几乎所有的农耕人口都聚居在面积辽阔、灌溉便利的色萨利平原地区。但在随后的阶段(前5500—前4000),我们发现人口分布已经遍及整个大陆和群岛。至新石器时代末期(前4500或前3200),越来越多的农业村庄遍布巴尔干地区。所住房屋一般都由泥砖和木头建成,屋内有居家必需品(炉灶、厨具等),且有储存工具和食物的储藏间。每栋房屋都与其他几座房屋相邻,更多这样的居住群落又构成了更大的地区性社交网络。考古学家们偶尔会挖掘出土一些奢侈品,它们明显来自近东地区,甚至可能更加遥远的地方。

最终,在这种活跃而平常的农村散居社会基础上,将会形成更复杂的社会形态。在最初一批农耕者抵达后4000年,我们开始观察到城市化形成的早期迹象,财富开始聚集,上流社会开始出现,形成了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网络。公元前第4个千年的结束标志着爱琴青铜器时代的开始。称之为青铜器时代是因为青铜器的使用在那时开始变得普及。

青铜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约前3300—前1500)

5 当农民群体开始能够生产出足够的财富,养活那些并不直接参与

农作物耕作的人士，比如工匠、祭司、抄写员以及武士时，就会出现复杂的社会形态。在整个青铜器时代早期(前3300—前2200)，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密集都市中心一直都以农业为主，而在埃及——世界上第一个地区性政权，已经发展出专业的技术和管理，能够建造出像吉萨的金字塔这样的宏伟建筑。就在同一时期，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爱琴海地区当时的复杂社会形态的迹象。在公元前2700至前2200年的某个时期，在位于伯罗奔尼撒西北地区的勒纳(Lerna)和梯林斯，以及特洛伊(具体是指特洛伊Ⅱ)和利姆诺斯的波利奥科尼，都涌现出一些大型建筑。每一处此类建筑都要求很丰富的专业技能。例如，在位于勒纳的所谓“瓦建的房屋”，长25米，宽12米，结构设计非常考究，包括走廊和形式各样的房间。建筑特征还包括屋顶所采用的陶瓦片，木片包裹的门侧柱以及涂抹灰泥的墙壁。考古学家赋予这些遗迹以重大意义，因为这些建筑的存在证明了当时先进的建造工艺、社会等级分工，以及地区间的交流网络，而这些只有在复杂的社会形态中才能出现。

尽管学者们推断希腊语在早期青铜器时代的某个阶段开始形成，但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中，无一能够货真价实地被贴上“希腊”标签。同波斯语、北印度语和绝大多数欧洲语言一样，希腊语属于印欧语系。在公元前2700至前2000年期间，希腊语的早期形式，或者说原始希腊语，开始被引进使用。今天的专家们倾向于相信，当初希腊语在引进并形成雏形时，曾与本土的爱琴海地区语言和安纳托利亚西部诸多语言融合，融入了一些非印欧语系语言的特征，例如后缀“inth”(例如Korinthos)。今天的学者们仍然在做复杂的语言学、考古学，甚至DNA分析，试图推测出“希腊语形成”的更早日期，然而唯一有结论的证据来自青铜器时代末期书面希腊语的出现。因此学者们更愿意理直气壮地谈论“爱琴”青铜器时代，而非“希腊”青铜器时代。

在早期青铜器时代，基克拉迪群岛为孕育最独特的文化提供了舞台。海上贸易繁荣发展，原因在于诸多岛屿形成了一个岛链，希腊大陆位于一端，克里特岛和近东地区在另一端，而且有些岛屿矿产资源丰富。像卡斯特里和锡罗斯岛上的卡兰德里亚尼这些中心地区，拥有独



青铜器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爱琴海地区

特的工艺和技能，对它们的需求旺盛，并被爱琴海地区和其他地方的人争相模仿。基克拉迪群岛的艺术中，最著名的当属高度抽象的大理石小雕像，其主题大多数都是双臂交叉的站立女人。这些雕像只在鼻子、胸部和四肢部位做雕饰，有时也会包括耳朵和耻骨部位。这些极简抽象派雕像作品引起现代抽象派艺术家和雕塑家的极大兴趣，尽管最近的科学研究业已证明雕像看似光滑的表面上，曾经一度刻画有精细的面部表情、刺青和首饰。

及至公元前 2200 年，爱琴海地区，乃至整个东地中海世界，都经历了一场经济下滑和人口锐减。有一个重大例外，就是相对富足的克里

特岛，能够养活比所有基克拉迪群岛的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人群。而且据考古学家考证，克里特岛上的物质财富在逐渐增加。到了公元前1900年，在与贸易对手东地中海地区的竞争中，克里特岛已经占据领先。而到了公元前1600年，克里特人已经建造出可在精细水平和规模上与任何近东地区对手媲美的城市和宫殿。

7

它后来被称作“米诺斯文明”，因一系列独立而密切关联的城市而闻名于世。其中最大的城市，克诺索斯，最辉煌时期可容纳多达1.5万人口。其他城市像卡托、扎克罗斯、费斯托斯、马利亚、古尔尼亚也可居住5千到1万多人，并且都修建有街道排污系统、下水道和精心规划的其他生活便利设施。每一座城市都是一个地区行政实体的中心，都有一套官僚体系，以及书写系统：克里特文字，线形文字A(Linear A)。虽然至今仍未破译，但这些文字无疑是用作记账之需。政府行政机构位于雄伟的多功能建筑物或“宫殿”之内，除了行政管理，同时还兼作贸易、拜神和娱乐中心。事实上，即便不是全部，至少绝大多数重大公共活动都在此宫殿内举行。在克诺索斯出土的迷宫式建筑就由1 300个房间构成，可以满足各种市政功能之需。

如同较早期的青铜器时代文化一样，米诺斯人未必就是“希腊人”，但他们毫无疑问对于最早在大陆上讲希腊语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最重要的遗产就是提供和传播了来自近东(尤其是埃及)的文化和思想。克里特本身很大程度上是近东辐射区的一部分：它的行政运作、经济组织和建筑风格都深受东方模式的影响。米诺斯人同时也给更广阔的爱琴海世界留下了他们独特的印记，此影响最明确不过的衡量标尺便是米诺斯艺术的流行程度。在桑托林岛上的阿克罗蒂里，能够看到米诺斯社会最突出的实例，比如刻画典型米诺斯主题的湿壁画，画上有奇异的动物，以及从事各种日常和礼仪活动的妇女。在大陆，艺术家们习惯模仿独特的米诺斯图案，包括进行公牛跳跃的男孩；妇女则经常被描绘为从着衣、发型、首饰到化妆都完全模仿克里特妇女的样式。公元前1400年之后某个时期，米诺斯文明开始衰落，其中原因我们现在不明，只能猜测。权力开始从克里特转移至大陆，而后者出

现的以宫殿为中心的新城邦也移植了米诺斯式的官僚体制和建筑风格。

迈锡尼人(约前 1500 — 前 1200)

米诺斯人与大陆人还有诸多方面的不同。考古学家们在迈锡尼(迈锡尼文明就由此地命名)出土了艺术品,发现这些艺术品刻画武士、战争和其他一些类似主题,仿佛热衷于歌颂尚武精神。迈锡尼人不惜耗费巨资和人力修建大型圆顶墓(tholoi),安葬那些武士精英和他们的武器装备。米诺斯人无需修建防务堡垒,而“迈锡尼人”则花费巨额财富来兴建要塞和城堡。当初发掘迈锡尼和其他晚期青铜器时代中心遗址的考古学家们曾经认为,他们发现的是在荷马的史诗里所描述的武士国王们的都城和宫殿。但是很快他们就得知这种相似仅仅是肤浅的表象。迈锡尼社会的结构非常复杂,更接近于类似埃及的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Ⅱ,前 1279 — 前 1212)和亚述的萨尔玛那萨尔(Shalmaneser Ⅰ,前 1263 — 前 1234)王朝,而不太像奥德修斯(Odysseus)的伊萨卡那样的小型武士酋邦。

迈锡尼人与东地中海国家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他们在这方面要强于米诺斯人。迈锡尼人像埃及、亚述和赫梯王国一样,建立了国王统治的中央政权体制,国王住在城堡式的宫殿里,周围有许多文职官员处理繁琐的行政事务。迈锡尼的统治者们同时构成了跨地中海地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彼此通过外交途径和互赠礼物来巩固关系,并遵守一套相同的贵族生活方式。考古学家们还注意到了在这个晚期青铜器时代所发展起来并得以强化的地中海地区内部的贸易往来。我们现在的大部分考古资料都来自宫廷记载,但也有许多见解由海洋考古学家们通过考察沉船遗迹而获得。在土耳其南部的乌鲁布伦(Ulu Burun)发现了一处公元前 1325 年的腓尼基沉船遗迹,内有准备运往希腊大陆、重达 12 吨的货物。其中许多都是来自叙利亚、迦南和埃及的原材料以及加工制品,包括乐器、象牙、河马牙齿、捕鱼设备,以及属于埃及王后涅菲尔提提(Nefertiti)的金制圣甲虫首饰。

但是迈锡尼人对于希腊历史尤其重要的原因，却是其语言。在迈锡尼、皮洛斯、梯林斯以及底比斯都发掘出数量众多的泥版文书，上面刻有线形文字。这就是所称的线形文字B(Linear B)，其有规律的组合形成了音节，这些音节进一步构成了词语，在形式上很像最早期所知的希腊语。例如，线形文字B中的单词kunaja和pamako就很像希腊语中的gune(女人)和pharmako(医药)。在已破译的单词中，有些很容易在现代希腊语中识别出来：antropos（男人），ipos(马)，还有tranion(桌子)。

20世纪50年代线形文字B的破译证实了希腊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活语言之一，同时也有助于对迈锡尼社会进行更深入的了解。例如，皮洛斯是涅斯托尔国王传说中的都城，文字记载也确实提到了国王(wanax)、可能曾经指挥战争的辅助领袖(lawagetus)、宫廷(hequetai)、地区领导人(korete)及其副职(prokorete)，以及可能是年长者组成的议事会(gerosija)。所以这些名词在古典希腊语中都保存了下来(laos-agein，heretai，prokoitos，gerousia)，wanax是个例外，因为"w"音后来从希腊语中统统消失了。土地所有制度揭示出社会等级高度分化，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口都属于自由民，称作damon。泥版上刻的线形文字B中的大部分记载的是行政官僚事务，但我们也能从中了解一些宗教方面的事实，包括后来希腊神话中的一些神的名字。因此"Diwonusojo"演变成了"Dionysus"(狄俄尼索斯)，"Era"演变成"Hera"(赫拉)；"Posedaone"后来成了"Poseidon"(波塞冬)。宙斯、雅典娜、赫尔墨斯以及阿波罗在迈锡尼神庙中也很常见。

然而，关于迈锡尼文明没落的原因，从历史记载中并不能得出明确的解释。实物资料显示，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迈锡尼文明曾遭遇衰落，随后虽短暂恢复，但最终仍在公元前1125年全面崩溃。宫殿遭到废弃，人口都迁移至其他岛屿和海外：因此来自伯罗奔尼撒中部阿卡迪亚的移民定居在了塞浦路斯。爱琴海地区的居住地规模开始缩小，居住地也更分散，开始变得自给自足。基于文字的文化消失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为有限。从此迈入了许多学者所称的"黑暗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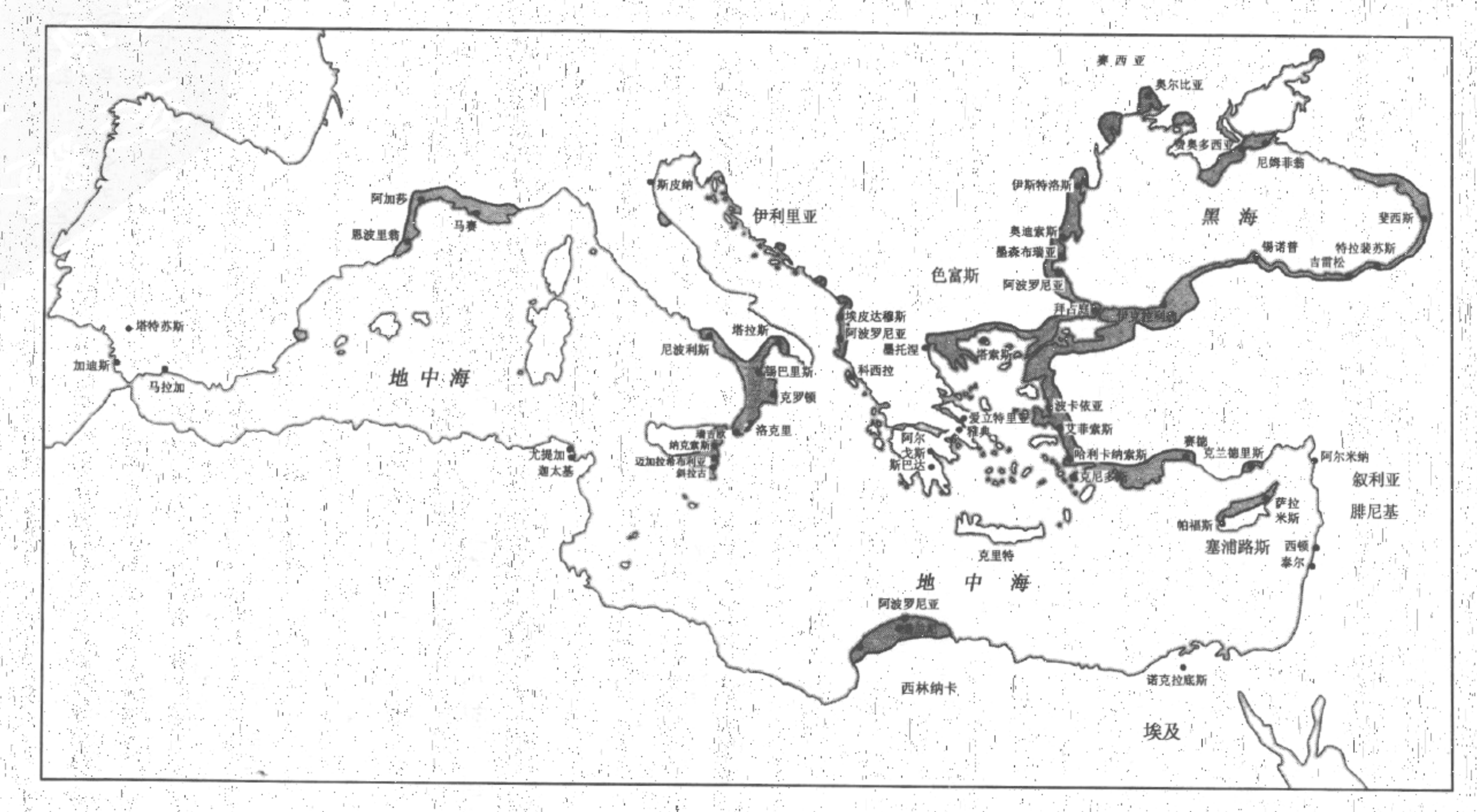
早期铁器时代(约前 1200 — 前 800)

灾难不止降临到迈锡尼一个地区,衰败几乎影响到东地中海地区的每个角落。近东地区的资料曾经记载数次混乱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浪潮、地区间贸易体系的解体以及叙利亚海岸所有城市的崩溃。但是造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却身份不明;很可能存在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包括气候变化。此后,一些国家体系恢复起来比其他国家更快,但这场浩劫给迈锡尼文明带来的破坏却难以修复。大约在公元前 1130 至前 1125 年间,宫廷经济的功能陷于停滞。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国际间在政治、文化和礼物交换方面的网络尚未恢复,而东地中海地区的统治阶层却依赖这种联系得以生存,因而严重依赖这些联系来维系的迈锡尼秩序,再也未能重新构建。失去了东地中海地区的这种网络联系,统治阶层就失去了重要的财富来源,那些宫殿、官僚和工匠就无用武之地,成了累赘。

12

随后的阶段称为"黑暗时代",在一定意义上是因为这个时期没有给我们留下书面记载。我们对其了解都来自考古研究的推断。实物资料显示,在公元前 1200 至前 1000 年间,爱琴海世界的人口减少,居住地规模变小,几乎没有留下能够说明其社会复杂程度的纪念碑式标志性建筑(像宫殿、城堡以及坟墓)。相反,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业已回归到相当简单的社会结构模式;但是也存在着新型世界正在形成的早期迹象。

地区间的贸易联系可以通过追踪一种陶器风格(简单的几何图案)以及地区方言的分布来确定。某些人群,尤其是位于埃维亚岛的居民,还在与近东的中心地区进行着贸易往来。因此,埃维亚岛的中心勒夫坎迪作为这一时期在考古研究上最具启发价值的遗址,可以看出它保留了复杂社会的基本结构。有一座大宅,大约 45 米长、10 米宽,在其内部和外围都建造了柱廊。完成这栋建筑肯定需要专业的工匠,大约耗时 500 多到 2 000 个工作日才能建好。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特征是与塞浦路斯的铁器制造者之间来往密切,从而把铁器引进到爱琴海世界。



古风时代希腊人定居地的扩张

最好把“黑暗时代”看作是一个过渡时期，一个近东模式的社会结构消亡了，同时另一种相当不同的社会开始兴起。其中发展的关键是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爱琴海统治阶层。这一时期最强大的个人是那些首领或地区强人，他们热衷于给自己和随身的武器及盔甲煞费苦心地去建造坟墓。这种墓葬的重新发掘已经证实了当时在希腊大陆和各岛屿普遍存在的一套生活模式，同时也说明其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识别不同阶层的标准是各个阶层都遵守各自的一套共同生活模式和价值体系。同迈锡尼武士的墓葬相比，这些墓葬显示这些统治阶层都比较朴素低调，很像荷马史诗里所描述的那些国王，尽管身处高位，但未必占有太多财富。那些认为是荷马所作的史诗，正是在这个黑暗时代所著。

我们也能从实物资料中挖掘出其他一些发展轨迹，包括地区性的希腊语方言的一些规范，尽管这些方言的传播途径难以解释。当然，传统的观点把这一过程归咎于多利安人、爱奥尼亚人以及伊奥利亚人的入侵，现在这一观点已经被强有力地证明是不足信的。总之我们知道，公元前 800 年，一个独特的社会正在形成。在这个社会中，仍然延续了一些可以追溯到晚期青铜器时代的特性，诸如神、语言和自由民等概念（自由民也指行政管理人员）。否则，这个崭新的爱琴海世界就会与那个迈锡尼人所建立的社会完全不同，也会与在近东地区所创立的任何一个社会截然不同。

13

希腊的诞生（约前 800 — 前 600）

至公元前 8 世纪时，爱琴社会已经人口众多、经济繁荣。出土墓葬显示出越来越富足的社会财富、越来越高的制造水平和与近东地区日渐紧密的贸易往来。物质丰富的另一标志是当时建造的神庙或宗教场所，以及拜神者所供奉的祭祀品。

而繁荣发展最具体的表现则是土地的开垦和城市化。事实上，这个时期的特征即是小规模的农村公社通过城市化合并（塞诺西辛）而融合成更大更强的共同集体，也就是所称的城邦。塞诺西辛具有很多优势，作为更强大的个体，城邦在地区间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具有更

强的军事和经济竞争实力。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指出，在忒修斯的领导下，阿提卡分散的村落同意放弃他们的地方治理机构，接受一个共同的政治体系，这时雅典就成为一个城邦。从经济角度来讲，城市中心是货物制造和交换的枢纽；而从安全角度来看，城邦能够动员更多的武士，财力上也能够负担起昂贵的防务开支。不久，城邦就成为政治活动、立法、经济活动以及宗教膜拜的中心。这时就出现了"城市国家"。

需要着重注意的是，希腊语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仍然保持着旧的政治形式，或者发展成不同的制度体系，而这些政治制度开始在希腊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在希腊的许多地方，例如埃托利亚(Aetolia)和阿卡迪亚，原先分散的公社选择构成基于种族或宗族的联盟。而在马其顿和伊庇鲁斯(Epiros)，荷马史诗式的国王们仍然在行使着权力。然而正是城邦，创造出了独特的"希腊"文明。城邦成为国家认同和政治主权的中心，融入了其他所有的归属感，包括种族和宗族纽带以及血缘关系。城邦开始代表所有的成员，而不只是其中的统治阶层。这就提供了一个环境，为反思体系的建立和文化的创新提供了可能。

14

在希腊形成城邦的同时，爱琴海地区以外也在建立新的人口聚居体系。来自埃维亚岛的移民在那不勒斯海湾的库迈(Kyme，Cume)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农业居住地。沿着那不勒斯海湾和西西里岛东部沿海，形成了其他定居者聚居区，包括由科林斯人建立的那不勒斯(意即"新城"——译者注)和叙拉古。在意大利南部由希腊人建立的城市数量变得如此之多，后来被称作"大希腊"(Megali Ellas，拉丁语为 Magna Graecia)。其他一些建有大的希腊人聚居区的地区还包括整个黑海沿岸地区、利比亚沿岸以及普罗旺斯。在这些新建的城市中，就有马萨利亚(马赛)和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些聚居区并非殖民地，因为尽管它们与旧希腊的母邦保持家族的纽带和联系，但它们都属于独立的实体。

原住民和定居者之间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希腊"殖民化"过程中最有趣的一个特征当属原住民族可能对于海外的城邦所施加影响的程度，尤其是我们不能推断"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就比希腊人更落后或缺

少教养。尽管有这些影响,沿着这些边界地区,希腊定居者仍保留着更加清晰意义上的对自己故国的认同感,而且可能这些海外的定居者成为了培育希腊身份认同的先驱。他们保持与祖先联系的决心反映在他们所建造的宏大庙堂上,像在阿格里根托(Agrigento)就建有这样的庙;同时也反映在他们敬献给"旧希腊"的一些宗教中心(特别是德尔菲)的大量贡奉上。但是也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海外的希腊人确实受到了当地人及其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文化融合反映在艺术创作上,并通过互相通婚得以延续。例如著名的历史学之父,哈利卡纳索斯的希罗多德(Herodotus of Halikarnassos),他最早指出希腊人是一个独特民族,他就有希腊人以及卡里亚人(Karian)的混合血统。

在希腊文化形成的这个时期,对其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外来因素来自近东地区。有的历史学家称之为"东方化"时期(大约在公元前 8 至前 7 世纪间),当时希腊的艺术家们通过改造和革新东方的传统技艺,创造了一套有高度独创性的艺术创作方法。例如,早期希腊人在人体雕塑方面的兴趣,就受到源远流长的埃及传统的直接启发。希腊的上流社会也向更加富有的埃及、波斯和腓尼基的同道们看齐,学习如何在举止方面表现得更像贵族。他们学会了摆阔炫耀的消费方式,以及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习惯,像倚靠在长沙发上或举办晚宴聚会。他们也重新学会了读书识字的基本技能。希腊字母表的许多变化就直接来自现有的腓尼基文字,但是,跟其他任何事物一样,这种借鉴都经过了创造和整体上的革新。因此,希腊人在字母表中加入了元音字母,而且到了希罗多德时代,希腊人已经创立了散文文学。

权力的问题

公元前 900 年以后的趋势显示出每一个新兴复杂社会的共同模式:人口增长、城市化、手工业兴起,艺术和文化水平提升。然而希腊人的独特之处在于没有形成君主体制。在大多数古代文明社会,富足的财富、权力和军事资源都集中掌控在少数社会精英手中。当权的国王体现和代表了最高的权力,在来自统治阶层的官员和宫廷人士的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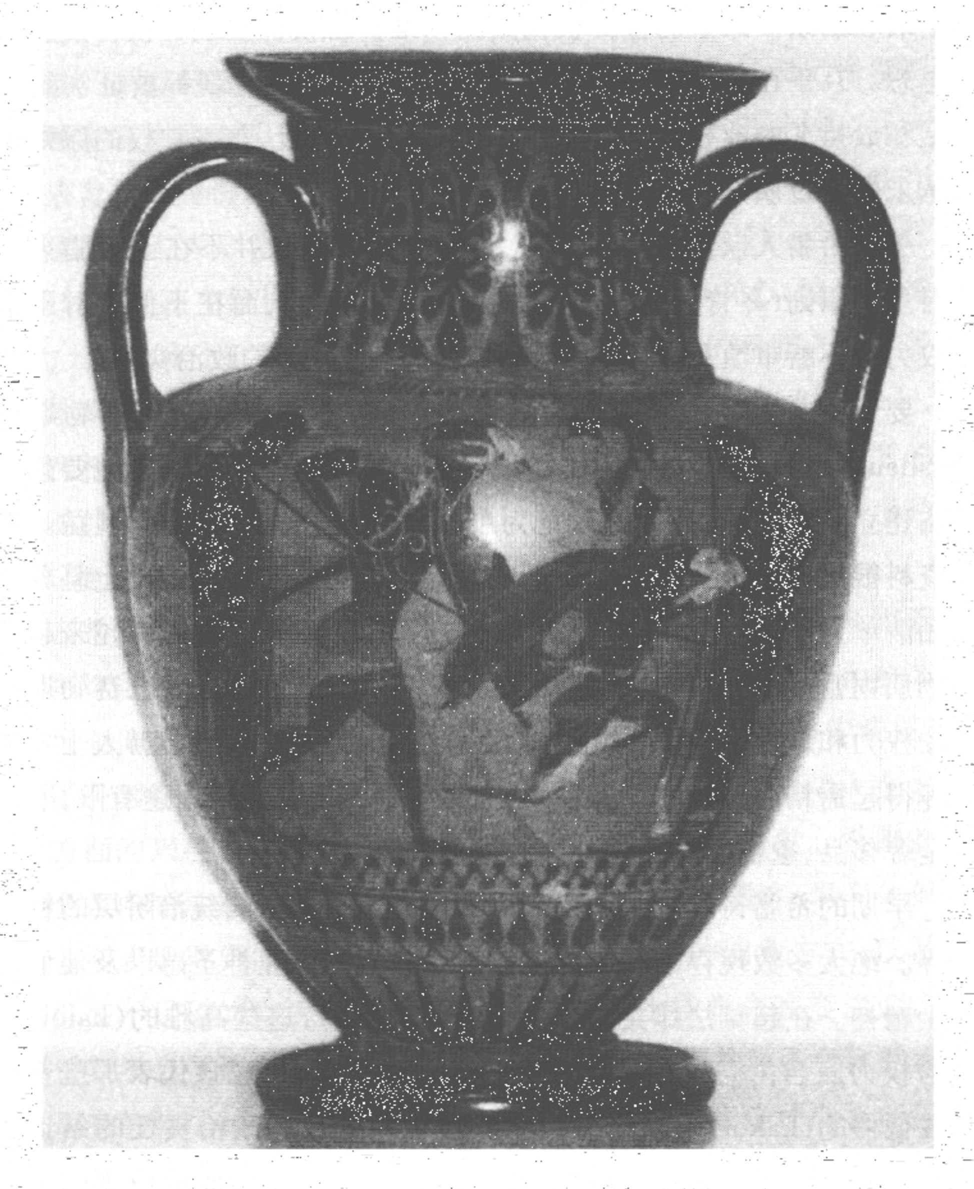
佐下治理国家。国家的宣传机构宣扬和维护君权神圣或君权神授这样的思想。几乎在每个实现现代化之前的社会里，君主制都被证实是最稳定和最持久的政权形式，而且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君主掌权的原则几乎从未受到过质疑。

了解希腊人以及他们的独特之处的关键所在，并不在于希腊人拒绝君主制原则（尽管他们在此方面确实不遗余力），而在于他们对于最高权力的不断审慎思考，这种探索转而产生了崭新的政治实验。

要讨论在爱琴海地区重新出现的国家，必须首先从巴赛勒斯们（basileus，社会精英）谈起。正是这个社会精英群体不可避免地要想方设法建立国家机构，其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和进一步获取特殊利益。考古资料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个日渐庞大的精英阶层的存在。出土墓葬的物品清单显示，公元前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武士阶层占有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同时从神庙遗址中发现的物品也似乎象征着巴赛勒斯阶层的权力和地位，尤其是其中马的小塑像（因为只有富贵显赫人士才能够养得起需精心看护的驯养动物，而这些动物在农业中用途有限，所以马是奢侈品，象征着精英们独特的地位）。 16

早期的希腊诗歌能帮助我们深刻了解这一新兴的统治阶层的精神世界。绝大多数现存的诗歌都讴歌了贵族们的职业神圣感以及他们的武士精神。在起草法律文件和设计政治体制时，这些高雅的（kaloi）人坚信权力应当由同样高雅的人来共享，同时他们也应该代表那些普通人或低俗的（kakoi）人来治理国家。涉及领导权和政治责任的结论也很明确。在荷马的史诗中（这是我们了解这一时期贵族价值观的最主要来源），巴赛勒斯通过宣扬他们像神一样的天性来获取特权和高位，而平民百姓则理应向他们进贡，尊敬和优待他们。 17

巴赛勒斯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例如，典型的希腊贵族会在体育馆（gymnasion）里与贵族朋友聚会；他会在此锻炼，然后裸体参加一些运动项目的比赛（例如：拳击、摔跤和赛跑）。只有富人才有闲情花时间和精力参加训练，去参加有组织的比赛，如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些比赛的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庞大，吸引了四



希腊主义和性别：公元前六世纪末期的瓶饰，刻画了希腊人和“未开化的(非希腊的)”亚马孙人之间的战争(承蒙 Nicholson Museum Sydney 提供(*NM 98.25*))

面八方的贵族不远千里来参与。另一个独具希腊特色的活动是交际酒会。这种交际酒会在男子的房间(andron)举办，中间包含许多活动，饮酒、娱乐、性爱和有才智的高谈阔论。公元前 6 世纪的诗人塞奥格尼斯(Theognis)曾指出，熟谙交际酒会的准确“形式”，是教养良好的贵族的一个标志：

> 要同这些人饮酒，同他们吃饭、闲坐，追捧他们，因为他们拥有至高权力。从他们身上你能学会美德。而那些卑微的人则会毁掉你天生的品质。[2]

通常，那些所谓"美好的"、"高雅的"人，比起本城邦的普通民众，更认同敌对城邦与其社会地位相同的阶层。他们彼此之间会建立强有力的纽带，一方面通过彼此通婚，另一方面通过款待，会产生持久的跨地区纽带，这种关系同任何血缘关系一样强大。因此在《伊利亚特》中，同为巴赛勒斯，狄奥墨得斯(Diomedes)和格劳库斯(Glaucus)在战场上相遇时，因为双方父辈通过"款待"而结交，双方无法交战。最后双方通过互换盔甲，确认了彼此的纽带关系(6. 119f)。违背"款待"的规则可能会招致神的惩罚。帕里斯(Paris)破坏了墨涅拉俄斯(Menelaus)的款待，与墨涅拉俄斯的妻子私奔了，这一鲁莽之举促成了特洛伊战争的爆发。

无论何时审视早期希腊贵族阶层，可能核心的问题都是为什么贵族们没有与近东地区的君王们一样，获取至高的威望和权力；而且为何希腊的城邦未能发展成君主制？首先，相比较而言，希腊的贵族们贫穷得多。一般巴赛勒斯所拥有的房产与埃及封疆大吏或波斯贵族相比，都微小寒酸。没有一个希腊贵族能够建造得起宏大宫殿，也不可能以自己名义去建一所庙。一个贵族不认为自身高人一等，从而去统治其他贵族。相反，如同在《伊利亚特》中明确讲述的那样，"高雅的"人不得不分享权力。"大王"们在特洛伊城墙外扎营露宿了十年。他们必须团结如一体，所有决定都得商议后才能定夺。等级制度在巴赛勒斯中确实也存在。阿伽门农是大王中最"尊贵"者(basileutatos)，而阿喀琉斯的地位太低以至于配不上阿伽门农的女儿。但是当阿伽门农的领导能力不能令人满意时，阿喀琉斯就可以寻求获得统治权力了。

18

希腊统治阶层不同于那些更富有的东方同时代贵族的另一个因素，是世袭权力这一观念在希腊人头脑中毫无市场。一个贵族的价值是以其成就来衡量的，并非其出身。因此绝大多数贵族的所作所为都

重在竞争(agon)。在战场上获得的功勋是名望的终极来源,但也存在其他获得名望的渠道,包括体育竞赛。最杰出的运动员的名望,像奥林匹克六次冠军——克罗托那的米罗(Milo of Kroton),就一直扬名至罗马时代。诗人以及后来的剧作家,都能通过竞争赢取声望。尊严必须去争取;一个巴赛勒斯一生都在竞争中稳固自己的名望和地位。

这种竞争模式对于希腊政治体制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一开始,贵族们形成寡头政治体制,而在贵族之间则实行妥协互让。古希腊(前 800—前 480)政治史的特征是,贵族阶层通过宪法手段坚决维护他们的权力,同时也竭力包容兼顾平民阶层的愿望。例如科林斯贵族世家(他们被统称为巴克基亚德斯家族[Bacchiads]),他们尽心尽力地维护着所有国家职责。在雅典,权力由"世袭贵族"(Eupatrids)或"名门之后"所垄断。当雅典在公元前 6 世纪 90 年代遭遇政治动荡的威胁时,一个名叫梭伦(Solon)的贵族受邀起草一部宪法,在捍卫贵族阶层权力的同时还要安抚那些心存不满的平民。梭伦被许多人赞为民主之父。他创立了"财权政治"(timocracy,time 意为"荣誉"),主张政治权利是以严格的财产资格为基础的。

19

城邦与社会

正因为权力总是通过竞争才能获取,希腊人不得不发明了政治学。谋求公共威望和权力的贵族必须通过竞争来获取国家公职,必须善用演说来打动其他人以得到授权,也必须在其他贵族的严格监督之下来承担政治责任。与此同时,彼此竞争的贵族们还要面对来自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压力,他们也寻求在政治秩序中掌握自己的利害得失。本质上讲,早期希腊城邦的政治史就是为贵族和非贵族阶层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探索体制性解决模式的过程。

为何贵族们容易受到"来自底层"压力的影响?政治争斗如何才能催生出诸如民主这种奇特而精巧的政治体制?有一个论证严密的观点认为,作战模式的改变会导致权力向较低的社会阶层延伸。在古希腊时期,希腊的作战从驾着战车的武士率领诸多随从的相当原始战斗模

式,逐渐转变至重装步兵群之间精心布局的战争模式,而后者要求作战人员数量众多以及纪律严明。拥有财产的中间阶层(mesoi),就是那些并非贵族但总归能自己装备得起盔甲和武器的平民,就被组织起来形成严密而非常有纪律的一个群体,称作方阵(phalanx)。每个方阵要求每一个重装步兵(hoplite)从自己右翼掩护整个方阵的安全,借此形成铜墙铁壁。整个方阵由若干排组成,以全部力量行动一致地冲向敌方方阵。这种作战形式一直是希腊和罗马时期最基本的战争特征,集体纪律是这种作战方式的根本要素。因此可以预见,形成这个崭新重装步兵阶层的平民会谋求在国家决策中扮演更大角色,或会被卷入不同贵族派别之间的纠纷之中。

无论如何,军事变革促成了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社会更多参与政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观的另一个原因,是"共同体"(koinos)这一概念。如果希腊的所有社会阶层能就一点达成共识的话,这一点就是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共同体",掌权阶层必须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在荷马时期,部落普通成员(hoi polloi)在巴赛勒斯开会议事时是无发言权的,但他们能够在场旁听、观察。在赫西俄德看来,只有称职且高尚地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巴赛勒斯才能被任命担任社会公职。"共同体"这一意识形态也反映在重装步兵战争的特性之中,这种作战形式要求每个重装步兵必须与"共同体"中的同伴团结一致,整个集体才能形成有效战斗力。

20

法律的进步在这一时期同样令人鼓舞。随着古风时代希腊的"共同体"日益扩大、更加复杂,司法的运作变得不再随意无序,不再轻易受个人冲动的左右。及至公元前6世纪,法律变得更加透明。巴赛勒斯制定法律时按照统一的、非个人的标准,使之对整个"共同体"都适用。因此,法律条文铭刻在墙上以供民众知晓,从而使得法律变成公共财产。一些最早的法律铭文来自公元前7世纪晚期的梯林斯,详细规定了地方行政官的权责,阐明了如何制约公职人员手中权力的运作机制。据说雅典的德拉古(Drakon of Athens,前621)的法律非常严厉,以至于被认为是用鲜血写就。当时最负盛名的立法者之一是斯巴达的来库

古(Lykourgos),他制定的“瑞特拉”神谕(Great Rhetra)规定了斯巴达宪法的运作机制。另一著名立法者是雅典的梭伦,他开启了雅典政治体系向社会底层开放的先河。所有这些法典拟定者都面临艰难的抉择,一方面他们要维护统治阶层的权势,另一方面又要确保制定的机构和法律最终服务于“共同体”的利益。

政治生活由“共同体”占据主导而不是由贵族独断专权,其根源我们可以从每个城邦的外部环境加以审视。希腊人在这方面的创造也与众不同。在古代社会,大多数城市的主要特征都是国王的宫殿,以及其他一些象征国王权威的纪念碑式建筑和神祠。所有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大型纪念碑式的建筑,如宏大的神庙、层级式神塔、金字塔以及墓葬建筑群,在一定程度上都起着这种作用。而希腊没有任何一个“共同体”能够整合聚集必备的资源来建造与上述规模相媲美的建筑。相反,每一个城邦都竖立起小得多的建筑,包括典型希腊风格的神庙,来反映整个“共同体”的利益。最早的石制神庙建造在科林斯,其风格就是所称的多利亚柱式(Doric),有凹槽的石柱、精美的三槽板间平面以及赤陶土制的花砖。“多利亚柱式”风格很快就被科林斯的伯罗奔尼撒邻居们所模仿。位于爱奥尼亚(小亚细亚的爱琴海岸地区中部)的城邦也仿照了这种风格的建筑。而且在爱奥尼亚也很快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爱奥尼亚式(Ionic),其主要特点是每根柱子顶端的螺旋装饰。在古风时代,贵族们已经不再建造那些豪华奢侈的私人墓葬,而通过捐助兴建神庙获得更大的成就感和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神庙从未与某个捐助人联系在一起。

21

事实上,城邦及其外部环境处处都体现了与“共同体”相关的概念。例如,市场(agora)就不仅仅是一处集市。它也作为专门选定的公共场所,是“共同体”管理、公众交流和节庆聚会的中心。所有的社会机构和公共集会都集中在此。意大利南部的新兴城市,例如迈加拉希布利亚(Megara Hyblaia),就是围绕市场而规划兴建的,而其他较古老的城市,像雅典,就不得不在城区里腾出空间,还要设置分界标志来划定界限。较新城市的规划反映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公共利益,比如公平合理

的住房分配，以及划拨出空地来建造诸如神庙、法庭和议事堂(bouleuterion)等公共建筑。其他公共设施则包括供水和废物处理系统。一些较古老的城市，像小亚细亚的士麦那(Smyrna)，精心实施了城市改造，拆除了未经规划的违章建筑，创造出更加有序合理的城市格局。

充分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充分协作在每一个城邦的生活中成为必需。在战争中，我们看到社会公众利益和贵族利益相互融合，密不可分。半真实半虚构的利兰丁(Lelantine)战争(约前733/前720—前648)，可能是旧式作战方式的最后一役。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提到，爱立特里亚人(Eritreans)曾号称拥有600名骑兵和60名战车御者[3]；而普鲁塔克(Plutarch)则宣称，直到作为同盟者的色萨利国王克列奥马库斯(Kleomachos)率领自己的骑兵打乱了敌方的行军路线时，卡尔西斯人(Chalcidians)才赢得了战争的胜利[4]。当重装步兵作战成为常规战争模式以后，战场上的较量就变成了"共同体"之间的较量。旧式的作战是个体之间的，是杂乱无序的，而方阵作战要求必须行动协调一致，每个重装步兵必须遵守纪律，这样方阵才能发挥整体效能。因此方阵就类似于"共同体"。贵族要维持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他们就别无选择，只有找到自己在"共同体"的位置。就像具传奇色彩的李奥尼达(Leonidas)国王于公元前479年在温泉关(Thermopylae)作战一样，在重装步兵这种作战形式中，贵族们都位居方阵的前排。

早期希腊思想

早期的政治思想的形成，取决于公众秩序和贵族竞争这样彼此矛盾冲突的价值观，或者受到如何在竞争精神和渴望达致社会和谐之间取得平衡的影响。早期的希腊哲学非常推崇自我约束和温和节制，有一句德尔菲神谕曾经指出："万事要适度。"一个贵族不得不使自己的个人荣耀的要求适应服从于共同价值，保持一种节制感(sophrosyne)。 22
从小就受训练成为精英武士的过程中，斯巴达的年轻人要恪守一套严

格的礼仪规范,来克制自己的激情和本能。贵族们也坚信竞争能够通过遵守程序规则而变得温和有序。所有城邦的政治体制都创造出一套精细并严格遵守的投票、决策和审查机制。

事实上,程序和方法,而非神的干预,承载了希腊思想的方方面面。希腊人形成的框架体系,给予了思想者就所有现象提出所有问题的完全自由,例如宇宙的构造以及宇宙运行的规律。如果统治权威都是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那么任何事情都可以公开探讨了。如果自然被认为是区别于超自然的话,那么自然本身肯定是可以解释的。自然的结构是什么?自然如何运作?自然的起源是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有些希腊最早期的思想家给出的回答可能看上去很荒诞。公元前6世纪的思想家泰勒斯(Thales)就认为地球在一个水面上漂浮,地震是水面以下凶猛的激流涌动在水面上的反映。但是泰勒斯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并没有提到任何超自然的干预和影响。非宗教的理论化成为泰勒斯的家乡米利都(Miletos)拥有经久不衰的思想交流文化的一个标志,同时也为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思想革命提供了舞台。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思想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也同样来自米利都,他撰写了第一部关于生命的自然历史,还绘出了第一幅区分出海洋和大陆的地图。他研究天文学的著作,大胆提出了宇宙围绕地球运转的理论,这部著作同时也是第一部已知的散文体作品。而另外一名来自米利都的思想家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se,写作时期在公元前6世纪20年代),继续探讨物质的构成以及物质如何转变成新的物质,即物质变化的方式和起因。在早期科学历史上更重要的时期是萨摩斯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of Samos)生活的时期。毕达哥拉斯用数学方法来探讨天体规律,并揭示出宇宙是由一些可以进行数学论证的规律所支配的体系。他提出的著名定理,确定三角形弦的长度,帮助他建构了宇宙(kosmos)或"有序整体"的分析框架。

希腊人对自然(physis)的研究探索并不意味着对理性主义或世俗主义的认可。希腊人的科学思维中体现出宗教的观念,即使这种关系

是严格限制在单向渠道上的。泰勒斯认为各种神是一个终极神灵的表现，而毕达哥拉斯则主张宇宙的运作原理是神的意志的体现。科洛丰的色诺芬尼(Xenophanes of Kolophon)更进一步把他对自然的理解应用到玄学领域，认为只有一个唯一的神。理性的探究绝没有被认为是对神的亵渎，在整个古代一直到拜占庭时代，这种认识一直是希腊教育的一个典型特征。

为什么一个地区能达到如此多的思想成就？为什么是爱奥尼亚(Ionia)？简要回答就是，爱奥尼亚的城邦与更广泛的地中海社会网络保持着更紧密的联系，因此接触到更多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另外，小亚细亚爱奥尼亚的城邦与吕底亚(Lydia)接壤，通过与这个复杂的非希腊语王国的交往，爱奥尼亚的思想家们学习吸收了大量来自近东地区关于数学和天文学的思想。正是通过爱奥尼亚人的传播，希腊世界的其他地区才学会了吕底亚人发明的造币术。同时这些东方的希腊人还发明了重装步兵战术和三列桨战舰(典型的希腊战船)。

爱奥尼亚人发明创新的精神也表现在艺术领域，特别是诗歌的创作方面。爱奥尼亚诞生了荷马，其史诗一直是研究价值观和道德教育的首要参考来源。莱斯沃斯岛的萨福(Sappho of Lesbos)也来自爱奥尼亚[①]，她可能是古代最伟大的女诗人了。总之，爱奥尼亚人确立了思想和文化发展的基调。但在政治领域，最具创造力的摸索都发生在希腊本土。

僭主及其替代品(约前650—前500)

及至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希腊城邦迎来了第一次重大挑战。贫富差距非常严重，穷人负债日渐成为社会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在这个困难重重的时期，社会非常容易受新出现的“强人”影响和左右。

最初的一人统治或“僭主”出现在富裕的城市科林斯(Corinth)。科林斯临近连接伯罗奔尼撒和大陆的地峡，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

① 原文有误，萨福属伊奥利亚，不是爱奥尼亚。

科林斯人能够很便利地到达爱奥尼亚和爱琴海地区，他们在意大利建立了一些大规模的定居点。统治科林斯的贵族家族——巴克基亚斯家族，借助“无节制地利用港口贸易”[5] 来聚积财富，以类似国王的样子统治着科林斯人。公元前 657 年，巴克基亚斯家族中一个名叫库普塞罗斯(Kypselos)的“不肖之子”掌权上台，据说获得了广泛支持。事实上，他的支持率如此之高以致他的统治长达 30 年，身边连保镖也不需要。公元前 625 年，他的儿子伯里安得(Periander)继位，在位时间更长(直至公元前 585 年)，但其专断的治理方式使其逐渐失去人心。在伯里安得死后仅三年，他的侄子普萨墨提科斯(Psammetichos)的统治就被民众起义推翻，这个统治王朝便结束了。随之而来便恢复了寡头政治。

其他值得一提的僭主还包括萨摩斯的波吕克拉特(Polykrates of Samos)，正是他使得毕达哥拉斯逃到意大利南部；阿尔戈斯的斐登(Pheidon of Argos)，被认为既是僭主也是国王，可能是因为他需要得到重装步兵的支持；以及西息温的奥塔格拉斯(Orthagoras of Sikyon)，后来由他的儿子麦伦(Myron)继任，但随后被另一僭主克利斯提尼(Kleisthenes)推翻(约前 600)。这些僭主试图通过获得民众认可来巩固自己的个人权威。因此，伯里安得借助大兴土木和花钱搞庆祝活动来博得赞誉。公元前 6 世纪后半叶大部分时间里，统治雅典的僭主们都惯用这一手法。虽然可以说专制制度是早期君主制度的表现形式，但事实上没有哪个僭主能够建立起一个可以延续传承的王朝。关键在于这些僭主未能获得贵族阶层的支持，也未能压制一切反抗力量。反过来，贵族们发现专制统治是一种极其丢脸的经历，从此以后都痛恨并诅咒任何形式的专制权力。事实上，仅仅是可能出现僭主政体的这种威胁，就使得一些城邦设法建立起非常新颖的政治制度。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斯巴达和雅典的政治体系。

希腊人中，罗马人最敬佩的就是斯巴达人。因为斯巴达人在内部实现了社会公平，而对外又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出现。罗马人欣赏斯巴达人宪法体系中所达致的国王、贵族和民众利益之间的平衡。内部实现了安定以后，斯巴达人可以对外自由地实现其军事统治。在斯巴

达政治体系的古典形式中存在两个国王，或称巴赛勒斯，来自两个分立的家族——亚基斯(Agiads)和攸里彭王族(Eurypontids)。国王对外率领所属斯巴达人征战，对内则发挥司法和宗教之职能。国王与长老会(gerousia)实现共同治理。确切来说，长老会是由“长者”(成员都在60岁以上)组成，行使法律裁决的职能。国王和长老会的职权受到五名每年选出的监察官(Ephors)监督，长老会所作决定须经公民大会通过，公民大会则由年满30岁的所有斯巴达男子组成。严格的制约与平衡旨在将变动降至最低程度。例如，被认为表现其宪法民主特征的斯巴达公民大会，就不允许审议或修正长老会所作决定。

25

获得了内部的稳定，斯巴达人又谋取一统希腊世界。为达此目标，斯巴达人建立了一支常备职业军队。所有的斯巴达男童在年少时就离家来到军营，接受军事训练。极具纪律的斯巴达方阵坚不可摧。借助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斯巴达人迫使邻国结成由斯巴达人主导的军事同盟。为了供养职业化的军队，斯巴达社会实施了相当残酷的社会实验。在公元前9世纪某个时期，他们逼迫边区居民(periokoi)扮演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大多数角色(例如商人、工匠和建筑工匠)，而在公元前8世纪后半叶的一个时期里，相邻的美塞尼亚(Messenia)地区的居民都沦为了奴隶。斯巴达社会开始变得完全依赖广大的希洛人(helot，奴隶，身份尚有争议——译者注)来完成基本生产和制造，同时对于可能发生的奴隶起义又心怀疑虑。具讽刺意味的是，遏制奴隶的反抗成了这支职业化军队的主要职责。随着奴隶人口越来越多，斯巴达人数量逐渐减少，这种疑虑与日俱增。

雅典人探索稳定的政治秩序的道路与上不同。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这种探索就受到终结贵族间争斗和缩小日渐扩大的社会差距的需要的推动。公元前594年，梭伦被委以重任来起草一部新宪法，一场社会暴乱被成功避免。梭伦的出发点在于给“劣等人”(kakoi)和“优等人”(agathoi)提供平等的正义，因此他实行一些变革来保证每个男性土地拥有者都能分享政治权力：“我给予人民恰如其分的特权，既无损他们的尊严，也不使之刻意去获得尊严。”[6]

梭伦的改革并未能保持社会稳定，在公元前 546 年，经过两次失败后，一个叫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的贵族开始了其僭主统治。庇西特拉图及其儿子在随后的 36 年里统治着雅典，在此期间通过扩大节日庆祝以及推行新的社会习俗来巩固其统治地位。但是到了公元前 510 年，僭主统治土崩瓦解，雅典又一次回归至贵族争斗之中。在公元前 508 年的夏天，一个老练的政治人物——克利斯提尼(雅典民主政治的改革家，与那位科林斯僭主同名——译者注)提议说，无论阶级地位和财产资格，权力应该在所有雅典人中分享。虽然他的动机可能并非出自道德立场，而是受个人政治利益的驱动，但他所提议改革的结果却形成了一种"全民权力"或民主的政治体系。为了将各种改革措施和必需的体制框架落至实处，克利斯提尼将阿提卡的结构改造成一些规模相等的选区，也就是所称的"德莫"(demes)。其目的是要打破血亲或宗族纽带的影响，从而使得人们在身份归属上认同自己所处的选区。国家同时要求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商议和行使权力。

因此，在斯巴达和雅典，"谁拥有权力?"和"谁治理国家?"这两个问题导致了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法。虽然社会成员的资格，或"公民资格"仅限于成年男性，但国家治理权力得以有效地转交至"共同体"本身予以行使。这种宪法实验在实际效果上强化了"共同体"作为主权实体的概念，居住在城邦里的希腊人开始为这一概念赋予具有希腊特征的独特认识。

希腊

但希腊究竟意味着什么？从何时起希腊人开始认同自己的"希腊人"身份？他们从何时起形成群体的自我意识？至此我们已经描述了一个基于希腊的前后连续的文化形成，而且该文化也超越本土延伸至大部分地中海世界。然而很难说该文化的成员何时成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族群。我们能够将"希腊"文化一直追溯至青铜器时代，但仅仅凭这些特征并不能推测出希腊民族意识的形成。

今天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希腊特征"或"希腊主义"是历史上逐渐

形成的。公元前 5 世纪时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此有完美的认识。他在其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的第一章中强调，在荷马史诗中几乎没有出现“希腊”(Hellas)一词，据此他得出结论，希腊意识的形成在此之后。今天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种族是无时间性的天然存在，修昔底德的观点与此相反，他认为集体身份认同是在希腊各“共同体”之间持续不断的交流接触中形成的。

可以肯定的是，后来的希腊人创造出诸多神话来解释其自身起源，但是这些神话纯属创造，因此作为历史材料所具有的价值非常有限。从词源学追溯希腊(Hellas)这个词语的来源，我们也所获不多。在《伊利亚特》中，这个词指色萨利(Thessaly)的某一部分，《奥德赛》中也指大陆地区。对于公元前 7 世纪末的诗人阿尔克曼(Alkman)而言，这个词似乎包括了所有的希腊人：他认为帕里斯绑架海伦这件事是对希腊的蔑视。总之，在古风时代文献中很少出现“希腊”和“希腊人”这样的表述，这说明了当时的人很少有兴趣或需要来使用一个集体性的族群称谓；但这个称谓的存在也确实显示了对此概念的些许兴趣。

27

对于促成希腊种族形成的客观条件的追溯要相对容易。前文我们已经讲述过，希腊世界的所有统治阶层在“黑暗时代”都共享同一种文化；对古风时代我们也曾详细介绍过跨地区的共同的贵族生活方式，其中包括参与诸如奥运会之类的“泛希腊”(Panhellenic)的节日活动。确实，参加者都必须是“希腊人”，且要接受严格的种族关系的考察，但是尽管传统上奥运会兴办是始于公元前 776 年，我们仅了解到这种种族关系的考察是古典时代的做法。虽然所有这些进展都不能断言种族身份的确立和形成，但我们确实注意到一套贯穿古典时代的共同文化特征的积累过程。该文化体系在地中海讲希腊语者(尤其是城邦)中共享。城邦作为一种城市形态，以及与之关联的作为城邦中一员所遵循的“生活方式”，在后来演变成确定某人是不是希腊人的一种衡量标准。

然而，要确定何时以及为何希腊最终在希腊人思想中扮演重要角色则相当不易。一种标准的观点认为希腊精神在“德尔菲”这个希腊世界最重要的朝圣中心得到提升，而较新的论点则主张扮演这一角色的

当属奥林匹娅(Olympia)及其逐渐推广的运动会。当一种文化面临挑战时,种族意识通常会高涨。可能"希腊特征"最早得以表达是在意大利或黑海等海外殖民地,这些地方的定居者更加直接地面对不太友善的当地原住民,例如在西西里岛的锡凯尔人(Sicels)。在这些地区,定义"自我"身份的迫切性要大于希腊本土。在希腊本土,虽然也生活着少数非希腊的当地人,像皮拉斯基人(Pelasgians)和德律奥珀斯人(Dryopes,希腊大陆原住民勒勒吉人[Leleges]的一个部落,非希腊人种——译者注),但毕竟为数不多。在其他地区,希腊定居者可能一直居少数地位。反而是像迈加拉希布利亚这样的海外聚居区(这些地区在创建城市方面更加努力),看上去更像典型的希腊社会。

通常情况下,战争能够促使民族性以最高效率形成。在希腊世界对抗波斯这个有占领企图的外来强权的艰难历程中,希腊主义得到前所未有的共鸣。在公元前 5 世纪初始,希腊城邦发起了抵抗波斯的英勇战争,可能正是在这一时期,希腊主义得以诞生。

第二章　古典时代的希腊(前 500—前 359):城邦的黄金时期

28

公元前 480 年,波斯大王薛西斯(Xerxes,前 519—前 465)率领由多民族组成的庞大军队进入希腊。希罗多德认为这支波斯远征军是当时希腊世界所见识过的最庞大军队:"哪个亚洲民族的人未曾被薛西斯率领进入希腊? 除了最大的河流,哪条河的水没有被他的军队饮用至干涸?"[1] 薛西斯的队伍大约有 10 万名陆军士兵(可能更多),他们缓慢行进穿过马其顿和色萨利。薛西斯有意行军缓慢是因为他希望许多城邦能够不战而降,事实也确实如此。但仍然有 31 个城邦拒绝投降。这些城邦在斯巴达人率领下开始在德摩比利(Thermopylae,字面意思为"火焰之门",一般译为温泉关)与敌交战,此处是通往希腊南部的狭窄地带,数量庞大的波斯军队在此未必能占据优势。然而,经过两天激战,敌军发现了一条可以绕过并包抄希腊守军的路线,希腊军队放弃了坚守。国王李奥尼达率领一支由 300 多斯巴达人组成的军队,还有一些色萨利和底比斯士兵,继续以死战拒敌。希罗多德评价国王李奥尼达时,说他"认识到自己弃守阵地是可耻的,如果自己能留下坚守,则会青史留英名并确保斯巴达后继有人,不被消灭"(7.220.2)[2]。温泉关战役之后,希腊人召集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并最终打败波斯人,将其逐出了欧洲。

国王李奥尼达和他手下的300勇士宁可选择以玉石俱焚的方式完成使命,也不愿暂且求生择日再战,这种做法看起来可能不太理性,却多少揭示了希腊人的独特之处。波斯士兵是为国王和将来的物质利益而战,希腊人牺牲生命则是为了理想。

29

传统上讲,历史学家们将希波战争看作是希腊从古风时代进入古典时代的标志:一个处于萌芽阶段的世界终于开始成长壮大了。在随后而来的数十年间,其创造力大爆炸,从而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础。这个时期涌现出一批伟大的剧作家,包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和阿里斯托芬;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帕特农神庙——希腊建筑和雕塑艺术的典型体现;公元前5世纪中叶出现的激进民主制;雅典的思想家苏格拉底——他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起创立了西方哲学。正是这个时期希腊的革命——典型的"古典"时代,鼓舞了其他一些伟大的文化和思想革命:奥古斯都的罗马、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我们所提及的"现代"。对此,古典主义者西蒙·戈德希尔(Simon Goldhill)曾指出:"要谈及现代西方的文化,则言必称希腊。"[3]

何以促成希腊具有古典时代?从根本上讲至少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在知识和艺术领域,从政治改革到城市规划这样不同的方面,任何形式的创新努力都突出强调希腊式的探索知识的独特方法。"言必称希腊"就是要应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其次,希波战争提供了一个历史时机,使得希腊精神对每个城邦及其公民都具重大意义。希腊精神成为衡量道德价值的重要标准。雅典作为希腊文化活动公认的枢纽,非常渴望成为希腊世界的领导者。

长远而言,古典时代在希腊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其提供了"希腊精神"或"希腊主义"的最高范式。古典希腊在随后的时期里一直被认为是"纯正"希腊主义的标准,而古典时代文学的语言,尤其是阿提卡方言,后来也一直毫无争议地作为纯正希腊语的标准。所有后来讲希腊语的社会在试图恢复文化的正统性时,都尊敬这一传统,这也为希腊语何以作为活语言流传至今提供了一个基本解释。

希波战争(前 490—前 479)

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时期波斯帝国的崛起出人意料。其创立者居鲁士(Cyrus,前 557—前 530 年在位)从伊朗南部的王国帕尔萨(Parsa,现在的法尔斯)开始掌权,接着征服了整个近东。到了那个世纪末,其继位者业已开拓出一个帝国,从小亚细亚延伸至印度河流域,包括埃及和部分中亚地区。这是第一个“世界”意义上的帝国,但促使今天的历史学家思索的问题并非这些世界帝国如何创立崛起,而是这些帝国何以存在维持。前现代的社会如何做到可以掌控如此大规模的帝国？波斯人开创了一种治理帝国的模式,后来的帝国都效仿了这种体系。这套治理模式的典型特征是包括手握实权的总督(satraps)在内的复杂的行省体制、可以确保快捷通信的庞大道路交通系统,以及一支充分动员诸多民族军事人才的强大军队。关键一点,波斯人学会了将被征服民族的那些精英人才纳入自己的帝国治理体系,并信奉文化宽容的理念。居鲁士及其继承者将其帝国视为可以兼容并蓄各种思想的一个体系。

30

公元前 547 年,居鲁士占据了吕底亚及其都城撒尔迪斯(Sardis),并控制了小亚细亚的诸多希腊城邦。这种兼并引起的主要负担在于缴纳贡品,在此情形下,希腊的僭主和寡头统治者们被迫去讨好巴结设在撒尔迪斯由波斯任命的地方总督。此外,这些东部的希腊城邦同以前没有多少改变。从一开始,波斯人的影响力出现在小亚细亚就给爱琴海地区投下阴影。例如,在公元前 506 年,雅典表面上屈从于波斯帝国的威权,以此来换取协助对抗斯巴达的克琉墨涅斯(Kleomenes of Sparta)。后来,爱琴那城邦(polis of Aegina) 更试图游说波斯人来一同抗衡对手雅典。

然而,在雅典和厄立特里亚(Eritrea)密谋对付波斯大王后,直接干预真的来了。公元前 499 年,在雅典和厄立特里亚的军事支持下,众多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开始挑战波斯的统治权威。在起义失败后(前 494),波斯派遣两支海上大军远征爱琴海。第一支舰队于公元前 492

年在阿托斯山(Mt Athos,圣山)附近失事,但公元前 490 年第二支舰队在围攻厄立特里亚六天之后,将其洗劫一空,接着继续起航,直接威胁雅典。波斯人将舰船停靠在阿提卡北岸的一个小海湾里,徒步行进至马拉松平原,在此遭遇雅典和普拉提亚(Plataea)的重装步兵。据希罗多德记载,人数上处于劣势的重装步兵重创敌军,将其逼退至岸边舰船停靠的地方。接着双方争先前往雅典,结果重装步兵先于波斯军队到达,迫使波斯人撤回远征军,经爱琴海驶回波斯。而雅典和大部分希腊世界从此时刻提防着难以避免的来自波斯人的报复。

公元前 481 年,波斯使节来到希腊大陆,要求希腊对大王俯首称臣。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立场很明确,直接杀死了使节。斯巴达人联合其他不愿臣服的希腊人一起,在科林斯地峡(Isthmus of Corinth)召开了大会,成立了希腊联盟(Hellenic League)。作为公认的重装步兵作战的行家高手,斯巴达人担当了联盟的领导。尽管在温泉关的第一次陆地战役中战败,但李奥尼达和其率领的 300 斯巴达勇士的英雄气概仍激励了其他希腊人英勇作战。

31

波斯人挺进到雅典后,发现当地居民已经弃城远走,去了相邻的萨拉米斯岛(Salamis)。自从公元前 490 年在马拉松获胜以来,在政治家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的率领下,雅典人已经做好了一旦波斯人再来进犯就转移的计划,同时还集中最大力量建设了一支强大海军,因为他们坚信在海上御敌会更为有效。后来发生的事也确实如此。雅典人率领的希腊海军将波斯舰队引诱至萨拉米斯岛和大陆之间的狭小海峡,使得波斯舰队由于拥堵而无法机动,然后给波斯人以重创。波斯舰队折损大半,薛西斯大怒之下处决了一批腓尼基人船长,自己则放弃征伐,留由手下将军玛尔多纽斯(Mardonius)继续作战。波斯人留在色萨利过冬,斯巴达人和伯罗奔尼撒盟军则忙于在科林斯地峡构筑防御工事。次年春天,希腊联盟整合起一支庞大军队,包括 4 万名重装步兵和 7 万轻甲士兵,穿过地峡北部,奔赴普拉提亚,在此与数量更多的波斯大军遭遇。后经数日布阵调遣,双方军队最终在一片开阔地展开激战,结果希腊重装军团取得决定性胜利,玛尔多纽斯战死。

希腊人团结一心击败了波斯大王，但他们似乎依然认为财力无穷的波斯帝国会卷土重来。波斯人来复仇的威胁一直挥之不去，希腊人也持续生活在此阴云之下，直至公元前4世纪。

希腊民族的形成

研究古代史的历史学家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希波战争对于"希腊精神"的形成起了特殊而有益的推动作用。这些"希腊人"开始视自身为血脉相连的一个民族，并把希腊主义看作是一种高于一切的生活方式。正是希罗多德提出了关于希腊人自我意识的明确证据。在双方互相交恶的时候，雅典人曾拒绝了波斯人提出的投降提议。主要原因是波斯对于宗教圣所的毁坏，但也因为他们已自认为是希腊人：

> 最重要、最伟大的是宗教……其次就是成为希腊人这一事实——我们一脉相传，语言统一，信奉和祭祀相同的神灵，遵守相同的习俗。对雅典人而言，违背所有这一切是大逆不道的。(8.144.2)[4]

32

同特洛伊战争一样，希波战争见证了希腊人团结一心英勇抗敌，只是这次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保持独立。李奥尼达和手下300勇士决心牺牲自己塑造英雄传奇，旨在像特洛伊那样传承永恒的价值。我们至今仍铭记300勇士，这一简单事实就证明李奥尼达舍生取义的壮举已经达致目的。从此，我们注意到那些讲希腊语的族群都希望自己被视为希腊民族的一员，那些能够证明种族纽带的族谱关系受到了更多重视。另一个证明是，那些未能在对抗波斯的战争中出力的城邦被迫低头生活，或者想办法掩盖其羞耻。

希腊人对于"野蛮人"或非希腊人抱有成见，从这个角度还可以审视人们赋予希腊主义的重要意义。在悲剧作品中，野蛮人成了一个常见人物。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在公元前472年于酒神大节(Great Dionysia)创作《波斯人》时，对战争的记忆仍然很清晰。作品集中描写

了萨拉米斯岛战役中，薛西斯在所率舰队被毁之后的诸多悲痛和不幸。在指出大王的傲慢自负和波斯人的爱慕奢华的同时，对希腊人的举止适度和荣誉感则极尽赞美之词。《波斯人》还可以视为对人性道德的深入思考，但观众显然更热衷于通过这部作品研究经希腊精神所折射出来的价值观体系。在戏剧和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中，希腊人表现出了一种偏好，热衷于通过二分法将事物分成截然相对的两极(男性/女性，希腊人/波斯人)。在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在戏剧和其他文艺作品中对野蛮人的浓厚兴趣其实是为了对“希腊”自身进行界定。

在随后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对分为两极的希腊人/非希腊人或希腊人/野蛮人更加粗糙的刻画。野蛮人被赋予了一些卑贱的特征，比如懦弱和愚蠢，而这些在以往一度被用来描述平民；另一方面则赋予了贵族一些希腊精神中高贵的美德，例如勇气。希腊主义意味着积极治理、聪明才智和健康茁壮，而野蛮则对应专制暴政、奴性屈从和臃肿懒散。在一篇据认为是科斯岛的希波克拉底所著的医学文献里，这位西方医学之父写道：

33

> 亚洲人所经受的气候较少变化……这也解释了为何他们思想懒散和懦弱……他们未曾经历那些磨砺性情并激发出无畏勇猛个性的自然变化和精神激励……在我看来，这些造就了亚洲人性格的软弱，但是促成此结果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的传统习俗；因为大部分亚洲人都生活在君主统治之下。[5]

人体被认为是最能代表希腊人性格的表现特征。及至公元前 5 世纪时，男子拥有肌肉发达、健康匀称的身材，不仅反映了其个人关于比例和美的品味，同时也深得希腊主义之精髓。

许多现代的评论家都曾把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那场冲突比作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间的冲突，一方价值观是民主和自由，另一方则是专制和顺从。尽管古代的资料文献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观点，但仍然需要强调的是，希腊人还是能够从野蛮人身上看到一些美德和可

取之处的。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都没有妖魔化波斯人。同希腊悲剧中其他人物一样，埃斯库罗斯笔下的薛西斯也并非漫画中讽刺性的反面人物，而是一个复杂的个人，他的所作所为和人生经历足以引发人们关于道德伦理的深入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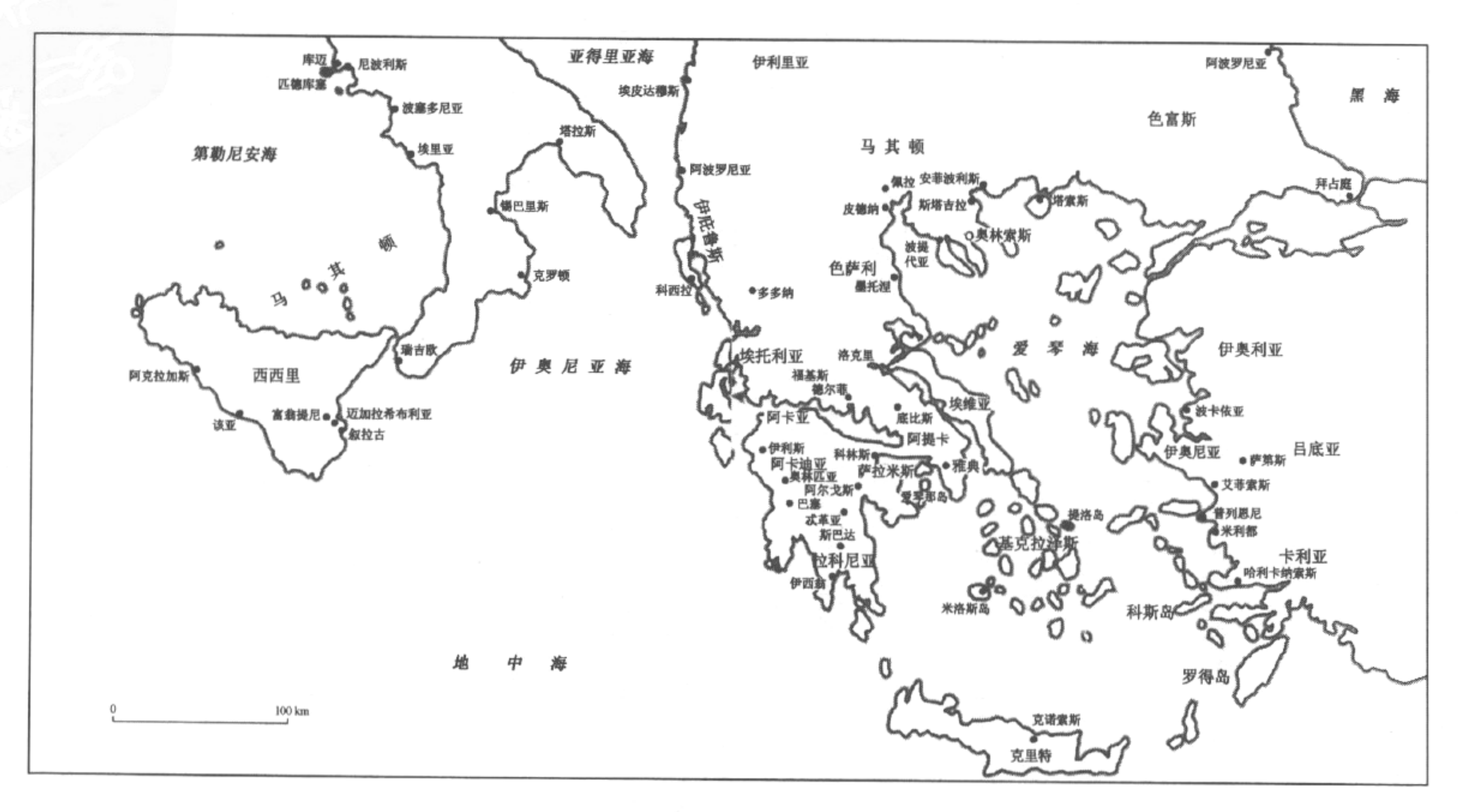
城邦间的纷争(前478－前445)

虽然在大约一千个希腊城邦中只有31个参加了对波斯作战，这场战争仍被视为"希腊"的胜利：同当时攻打特洛伊的参加者所获得的荣耀一样，这31个城邦此时也声名显赫。关于希波战争的集体记忆成为希腊人价值观的参照标准，然而这对正在进行中的民族融合却促进有限。

事实上，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时，希腊人一直在内斗。首先起争斗的双方是两大城邦——斯巴达和雅典，紧接着底比斯(Thebes)和马其顿也加入其中，发生了一系列纷争。各方争夺的永远是领导权(hegemonia)。全体希腊人的领导权意味着莫大的荣耀，是过于热衷竞争的希腊人总是想去争夺的一种责任。在希波战争中，斯巴达人作为"盟主"德高望重，而雅典人在萨拉米斯岛战役中赢得了赞誉，也迫切希望获得自己应得的地位。而从波斯人身上，希腊人也看到帝国能够带来权力、财富和影响力。波斯人造成的威胁刚要消退，在希腊内部就为争夺霸主地位而产生了激烈的内斗。

然而最初在希腊联盟内部并未出现很大的分歧和争斗。在普拉提亚战役结束后，最紧迫的担忧是波斯人的进犯会卷土重来。国王列奥第基达斯(Leotychidas)统帅一支大军征讨色萨利人，因为他们曾串通波斯人，而另一个斯巴达王波桑尼阿斯(Pausanias)，则带领盟国海上远征军将波斯人逐出了塞浦路斯。接下来波桑尼阿斯率军解放了拜占庭，而他的斯巴达同胞们在本土正举棋不定，谋划争夺新的霸主地位。对外征战被视为转移矛盾，缓和了来自内部的紧迫压力，尤其是奴隶们所带来的持久威胁。由于被指怠慢蔑视盟友的军队以及在金钱方面中饱私囊，波桑尼阿斯被召回本土，此时斯巴达社会被迫面对霸主的问

36



黑海
阿波罗尼亚
色雷斯
拜占庭
马其顿
伊利里亚
亚得里亚海
埃皮达穆斯
阿波罗尼亚
伊庇鲁斯
科西拉
多多纳
佩拉
安菲波利斯
皮德纳
斯塔吉拉
塔索斯
奥林索斯
波提代亚
色萨利
墨托涅
爱琴海
伊奥利亚
波卡依亚
伊奥尼亚
吕底亚
萨第斯
艾菲索斯
普列恩尼
米利都
卡利亚
哈利卡纳索斯
科斯岛
罗得岛
埃托利亚
洛克里
福基斯
德尔菲
埃维亚
底比斯
阿提卡
雅典
阿卡亚
伊利斯
科林斯
阿卡迪亚
奥林匹亚
萨拉米斯
阿尔戈斯
爱吉那岛
巴塞
忒革亚
斯巴达
拉科尼亚
伊西翁
提洛岛
基克拉泽斯
米洛斯岛
克诺索斯
克里特
第勒尼安海
库迈
尼波利斯
匹德库塞
波塞多尼亚
埃里亚
塔拉斯
锡巴里斯
克罗顿
瑞吉欧
马其顿
伊奥尼亚海
西西里
阿克拉加斯
该亚
富翁提尼
迈加拉希布利亚
叙拉古
地中海
0
100 km

古典时代的希腊

题。经过些许犹豫,希腊联盟的领导权被转交给了图谋已久的雅典人。此外,对抗波斯人也需要更强大的海军力量。

雅典人最有理由坚持对抗波斯人的斗争,因为雅典是海岸城邦,首当其冲地面对波斯人的报复——来自腓尼基海军的威胁也要考虑在内。因此在公元前477年,成立了主要由海上城邦组成的新联盟,其中包括爱琴海的大部分地区。少数未加入的城邦中就包括米洛斯岛,这个岛繁荣发达并与斯巴达关系紧密。这就是所谓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它主张保留一支常备海军舰队,像雅典这样较大的城邦提供舰船和人员,小一点的城邦每年将费用缴纳给设在提洛岛上的金库。此外,在该岛上还有重要的宗教圣所。

不久之后雅典人就将联盟视为保证自己特殊利益的工具,特别是设在提洛岛的金库每年都能得到数目不菲的经济收益。联盟成立以后最大的一笔业绩,就是在公元前467年于安纳托利亚南部海岸附近摧毁了一支波斯海军,即欧律墨顿河(Eurymedon)战役。除此之外,联盟的大多数活动都限于阻止联盟成员从中退出。联盟成立后不到两年,雅典将军客蒙(Kimon)攻下了位于厄昂(Eion)的波斯要塞(在爱琴海北岸),然后将这座有利可图的贸易要地变成了雅典属地。当纳克索斯(Naxos)威胁要从联盟中退出时,城市随即被围,最后被迫留在联盟之中。公元前465年,另一成员塔索斯(Thasos)反叛,就是因为雅典人侵占掠夺了他们位于大陆的贸易和矿产收益。

根据希腊人的标准,雅典已然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其海军实力肯定是最强大的。其他可能的竞争对手包括仍然占据陆上霸权的斯巴达,和西西里岛上强大的叙拉古。后者距离雅典过于遥远,对雅典的利益构不成直接威胁。但斯巴达目睹雅典实力的崛起,内心又羡慕又焦虑。自公元前478年始,斯巴达和雅典一直维持着互为盟友的假象,但公元前462年双方关系事实上产生裂痕,起因在于大规模的希洛人起义(在前465—前455年最盛)中间发生的一次奇异事件。客蒙与斯巴达之间私人关系很好,他率领一支雅典小分队去增援昔日的盟友。但在围攻叛军占据的要塞失败后,雅典人被悉数遣散回家。这种奚落在

37

雅典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暴,双方联盟就此瓦解。亲斯巴达的客蒙名声扫地,其政敌伯里克利(Pericles)此时率领雅典推行孤立斯巴达的政策,手段是通过与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的主要对手阿尔戈斯结盟,以及联合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最强大的盟友科林斯的传统对手麦加拉(Megara)。雅典做好了与斯巴达交恶的准备,最明显的就是兴建了连接雅典城和主要港口庇里优斯(Piraeus)之间的长墙。一旦陆地遭到进犯,只要能够保持雅典城和主要港口之间的畅通,雅典就可坚持抵抗。

但是,雅典人此刻面临多线作战的风险。与波斯人之间的斗争仍在持续。为了从埃及人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中获利,联盟陷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中,结果消耗了资源,士兵士气也受到重挫。这场冒险在公元前 454 年以代价惨痛的败局收场,一支海军分队全军覆没。虽然雅典人以此次战败为借口,将联盟的金库从提洛岛迁往雅典,撕去了持续已久的“联盟”的伪装。与此同时,在希腊中部,另一场军事冒险迫使雅典“帝国”弯腰屈服。从公元前 457 年起,雅典人就一直企图将影响力扩大至希腊中部的玻俄提亚(Boeotia),但到了公元前 447 年时,玻俄提亚人将雅典人打得溃败。雅典这次蒙羞在时间上恰逢埃维亚发生叛乱,以及麦加拉决定重新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当斯巴达人率领的军队突袭阿提卡时,雅典人别无选择,只有求和。公元前 446 至前 445 年间,斯巴达人和雅典人达成了“三十年和平协议”(Thirty Year Peace)。协议条款规定联盟每一方都必须停止干涉对方事务;联盟每一方所属成员不得转变所效忠的联盟;双方分歧必须交由仲裁解决。随后经过了一段纷纷扰扰的短暂和平时期,而雅典人则利用这段时间,将极其宝贵的精力集中到更具创造性的事务之上。

38

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政治与剧场

至少从雅典人的角度来看,其同斯巴达的纷争同时也是一场关于希腊主义的不同理念之间的冲突。斯巴达人很骄傲地奉行其简朴的生活方式以及精练或简约的言语使用风格。他们积极屯军备战的同时却忽略了文化的发展。表面上看,斯巴达人身处一个“人人平等”的生活

环境,但其宪政设计却极度保守。斯巴达人心存疑虑地观望着雅典人所发展起来的激进的社会体系,同时反对雅典人进一步向外推广其民主制度的企图。而雅典人则慢慢视自己为希腊主义的化身。据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记载,在公元前 430 年著名的“葬礼演说”(Funeral Oration)中,伯里克利勉励雅典堪为“希腊其他城邦的学校”(2.41)。

雅典能够繁荣富强证明了其公民的卓越特质。评论家们提出雅典人所具备的“异乎寻常的进取开拓品质”(polygragmosyne),这一点正好与斯巴达人身上的想象力匮乏以及循规蹈矩形成对比。到公元前 5 世纪中叶时,绝大多数雅典人都相信彻底的民主必然导致成功,因其保证了公民智慧和活力的充分发挥。公元前 5 世纪时,到处都是关于雅典的传闻,不仅因为它成为推动爱琴海世界变革的动力,也因为我们大部分资料的来源都出自雅典。更主要的是,雅典人尽其所能创立了“古典”形式的希腊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美学本质特征。我们今天认为的“古典希腊遗产”,就大多出自雅典人。

从克里斯提尼实施改革以来,雅典政治体系已然进入全面民主阶段。从公元前 487 年开始,执政官(城邦的最高领导职务)的候选人就由抽签选定。在理论上,执政官的职位也可由不占有土地的公民担任,包括那些替城邦划动战舰并借此获得一定政治地位的水手。雅典在公元前 461 年实现了完全民主化,这时所有的公职人员,除了将军(strategos)的职位之外,都由抽签选定。阿雷奥帕古斯议事会(或译“战神山议事会”)战神山(Areopagos),其职能类似于元老院,其权力受到严格制约。所有政治和法律方面的事务从此都须经由公开讨论,只有得到普遍的支持认可才能通过。

因为全体雅典公民拥有最高统治权,所以每个公民都理所应当发表意见,参与公开辩论,投票表达个人主张。伯里克利指责那些不关心政治和对公共事务冷漠的人,以及那些在公众会议上保持沉默的人,认为他们不配拥有公民的资格。达成政治有序的关键在于热情地参与公共事务。军事领导需要特殊才能,而根据公元前 5 世纪中叶的主流意

39

识形态,军事以外的所有公共事务都只有通过全体雅典公民的集体智慧才能得到最佳解决。经由众多受过生活历练的有头脑的人开会讨论,公民们完全能够寻找到解决手头问题的最佳方案。埃斯库罗斯的作品《欧墨尼德斯》(*Eumenides*)首次上演是在公元前 458 年,讲述的是在一个家族内几代人之间发生的杀戮循环,当奥瑞斯特斯(Orestes)杀害了自己的母亲之后,一直受到厄里倪斯(Erinyes,复仇女神)的折磨。后来奥瑞斯特斯的案子通过一个雅典法庭得以解决,这样就解除了那个互相残杀的恶性循环。在法庭上,控辩双方律师就案件进行了法庭辩论,陪审团经过讨论审议,最后进行投票表决。这个故事的寓意在于,那种人与人之间相互指责的悲剧性循环,连神都任其变质恶化,却由普通人的智慧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戏剧被认为是公民教育的一个工具,原因在于如果公民受到信任从而被委以权力,那么使每个公民都能理性思考就变得很重要。公民必须独立思考,而没有哪种艺术形式能够比戏剧表演更有力地激发思想和道德方面的反思。希腊戏剧发源于公元前 6 世纪,但直到希波战争之后,"古典"戏剧才开始创作和演出。最初是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56)在公元前 5 世纪上叶的后期进行创作,接着索福克勒斯(约前 495—前 406)和欧里庇德斯(约前 480—前 406)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创作戏剧。没有其他的艺术形式能够像戏剧这样造成强大的心灵震撼。像《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恳求者》(*The Supplicants*)和《特洛伊妇女》(*the Trojan Women*)这样的戏剧作品都探讨了最复杂的人类话题,并启发观众去思考这些重大主题:正义、道德责任、虔诚、社会公众和家庭。

戏剧由雅典民众来资助和组织,表演则在酒神大节展开,持续数日,从二月末演到三月初。每天上演之前,观众受邀参加隆重的政治仪式,颂扬雅典社会、将军、帝国以及阵亡将士。在这些被认为是官样文章的仪式进行之后,紧接着开始上演戏剧作品。这些剧作通常质问各种形式的权力,毫不留情地讽刺挖苦当权者。在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中(这是公元前 5 世纪流传至今仅有的喜剧作品),将军们受到攻击,政治

人物被挖苦嘲弄，战争受到质疑，甚至当时正在发生的冲突也不能幸免。《吕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于公元前411年上演，当时雅典正陷入抗击斯巴达的战争中。在这部戏剧中，雅典、斯巴达和底比斯的妇女们一致同意通过拒绝与丈夫同房的方式，来迫使其同意终结彼此间的敌对。别说在战争期间，即使和平年代也没有其他社会允许其道德和体制根基接受如此彻底深刻的质疑。民主的雅典有意赋予剧作家们完全自由创作的权利，唯有如此公民才能够就任何主题展开深入思考。

40

民主的城邦为公民营造了一个开放的社会，但有一点需要时刻铭记，即生活在雅典的多数人并不具有公民身份。还有，妇女只能享受到城邦所提供给公民的自由权利中的很小一部分，雅典没有给妇女们划定在公共领域中的空间。亚里士多德对这样的排斥提供了科学论据：由于缺乏至关重要的温度保障，胚胎会发育不完全，妇女即由此类胚胎发育而来。因此，女性就是发育不完全的男性，这也是女性缺乏自控能力以及拥有其他弱点的原因。同现代阶段的首次民主试验一样，男性政治自由也将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偏见发挥至极致。

神庙和人体

根据希腊的标准，雅典当属大城市，拥有10万左右的雅典人，可能还有20万外地居民和奴隶。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时，雅典人窃取了提洛同盟的资金，建造了一系列富丽堂皇的公共工程，其中就包括位于卫城的崭新的神庙建筑群。主体建筑就是帕特农神庙。建筑师伊克提诺斯(Iktinos)和卡利克拉特斯(Kallikrates)使用了帕罗斯岛白大理石材料，采用了多利亚式建筑结构，规划的面积长69.5米，宽30.8米，建筑特征是其外围的46根石柱。在公元前438年完工时，沿着内外的石柱顶部有一系列连贯的精细雕刻，神庙内部安放着一座12米高的雅典娜女神像，由黄金和象牙塑成。根据各方观点，比例精确适当的帕特农神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希腊神庙。它是当时希腊世界规模最大、装饰最华丽的建筑，超过了略显老旧的位于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

帕特农神庙以及卫城建筑群里其他神庙的建造，验证了雅典作为

希腊世界文化枢纽的地位。同建造者的初衷一样,游客们到此都会发现这座城市的风景令人叹为观止。诗人品达曾在家乡底比斯被处罚金,因为他歌颂赞美雅典是“神圣之城;流光溢彩,激发艺术灵感的希腊之魂”。后来雅典人给了他经济方面的回馈以及贵宾礼遇。

41

在观读诸如帕特农神庙檐壁这样的作品时,必须记得雅典人渴望成为“教化希腊人的典范”这一事实。檐壁浮雕刻画了一组行进中的队伍,由人、英雄和神组成,长约 150 米,花数年得以建成(前 442—前 438)。参观者沿着柱廊两侧边走边仰望,但是对于什么才是他们需要从中解读的含义,一直以来存在争议。浮雕确实在作讲述,但关于其含义并没有提供给我们显见的线索,而且看似是有意而为之。难道帕特农神庙檐壁仅仅是对泛雅典娜大节(Panathenania)巡游做了简单的描述?或者它的主题是关于战争,还是身为雅典人的意义?既然浮雕勾勒出一幅社会团结共处的景象,难道浮雕的设计主旨是为了化解社会的矛盾?现在,有一半浮雕收藏于大英博物馆,还有一半保存于新卫城博物馆,所以今天的参观者已经无法再按照原来的顺序解读整个浮雕上的巡游画面了。然而,即便整个浮雕能重新合为一体,完全可能仍然无法从中得出明确的启示。因为就像希腊戏剧,希腊艺术也是旨在启迪心智和引起人们的开放式讨论。

通过神庙里的浮雕,我们还能注意到希腊人对于美学(即美的本性和意义)的喜好与执著。浮雕上的雕像堪称是刻画人体美的典范,著名雕塑家菲迪亚斯(Pheidias)以及后来的波吕克里托斯(Polykleitos)结合人体结构形状,明确了美的定义。其后对此更是达成共识,形成的传统在罗马统治时期得以保留,又在文艺复兴时由意大利大师们重现生机,直至今日,仍然在把人体作为审美目标的领域启迪着现代美学。对于古典雕像的共鸣,更接近我们当代人的,则是几乎以任何一种媒体形式展现出来的人体崇拜,从电影院到美容业皆可目睹其影响所在。无论如何,正是希腊社会形成了对人体外形的崇拜:适度的强健和协调的比例。饮食学和体育馆对城邦公民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城邦需要男子们身体健壮,才利于上战场作战;此外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个

人所认同的价值观,都受到人体完美体格的启迪,例如平衡、匀称和适度这样的一些特征。令人可憎的生殖之神普利阿波斯(Priapus),长有一巨大阳具,准确地说其令人厌恶的原因就在于身体构造不成比例。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对人体外形美的迷恋也会强化社会歧视与不公。因此,在希腊社会,身体残障的人群比智力残障的人群生活更加艰辛。泰尔西特斯(Thersites)——《伊利亚特》中最有名也最无礼的那个平民,身体也就相应是畸形的。

综合来看,研究古典希腊的人会发现,高贵和低俗在当时并非完全水火不容。事实上我们发现,内部冲突和剧院,帝国统治和帕特农神庙,哲学和对女性的憎恶,以及奴隶制度和民主都是有关联的,而且有时这种关联还很密切。雅典把全部统治权交由公民实施,结果变成了一个更加尚武好斗的城邦,如果算不上鲁莽的话。单是雅典在"奴役"其他希腊人这一事实,就令一些公民倍感困惑,而且公民中长期存在一种显著的质疑,他们不相信完全民主等同于完善的治理。修昔底德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研究就反复阐述了这一点,例如雅典公民在公元前416年下令屠杀了米洛斯岛上的所有男性。彻底民主的捍卫者中有一群巡游思想家或教育家,即"智者派",像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前481—前411),就曾主张"人是一切事物之标准"。还有一些则认为,如果法律、道德和传统为人所创立,则要想废除这些也很容易。在其批评者眼中,这些智者派人士所提出的明显是道德相对主义。

42

反对激进民主的人开始自己探寻一条道路来重新建构城邦的道德根基,其领军人物长相怪诞,还受到阿里斯托芬的《云》(*The Clouds*,前419)的嘲讽。面容丑陋、肌肉松弛而且臃肿肥胖,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并非希腊理想的人体化身,也没有在政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然而很难想出公元前5世纪还有另外一个希腊人能拥有对后人如此大的影响力。苏格拉底与其同时代的智者派学者之间的主要不同在于,他不认为美德(aretê)可以教授。相反,他坚信每个人都必须终生苦苦努力才能得到美德,他还认为美德等同于知识。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知,为了"认识你自己",必须运用严格的分析检验一切假设,

还要参与事关道德和其他重大话题的讨论。苏格拉底把伦理学看作是哲学探求的中心主题。无人能比苏格拉底更加赞美推崇希腊人对于教育的重视了,他们把事关个人和民众的所有重要事项都摆在公众(*en meson*)面前加以讨论。剧院借由表演实现的功能,苏格拉底则通过对话和不懈的探求来实现。

争夺控制权的斗争(一):前431—前404年

雅典和斯巴达于公元前431年间爆发战争的原因,是一个永无休止的争辩话题。从希波战争结束以来,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敌对就从未改变过,其实这一点就足够解释为什么会爆发战争了。战争爆发的催化剂,则是雅典对三个与科林斯关系紧密的城邦之间事务的一连串多维度的干预:科西拉(Kerkyra,科孚岛)、波提狄亚(Potidaea)以及麦加拉。科林斯和其他一些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成员认为雅典的干涉非常具有挑衅性,完全有理由对其宣战了,斯巴达或多或少地被迫实施行动。

斯巴达犹豫不决的部分原因,可以从修昔底德(1.80.3)通过国王阿希达穆斯(King Archidamus)之口所作的演讲来了解:

> 然而,要同这样的人们作战,他们距离我们路途遥远,对海洋也极其熟悉,同时方方面面都做好了最高级别的战争准备:个人和集体都很富足,装备有战船、战马和重装步兵,并拥有其他任何一个希腊地区都无法相比的众多人口,最后还有数量众多的纳贡同盟——我们有何理由仓促发起这场战争?[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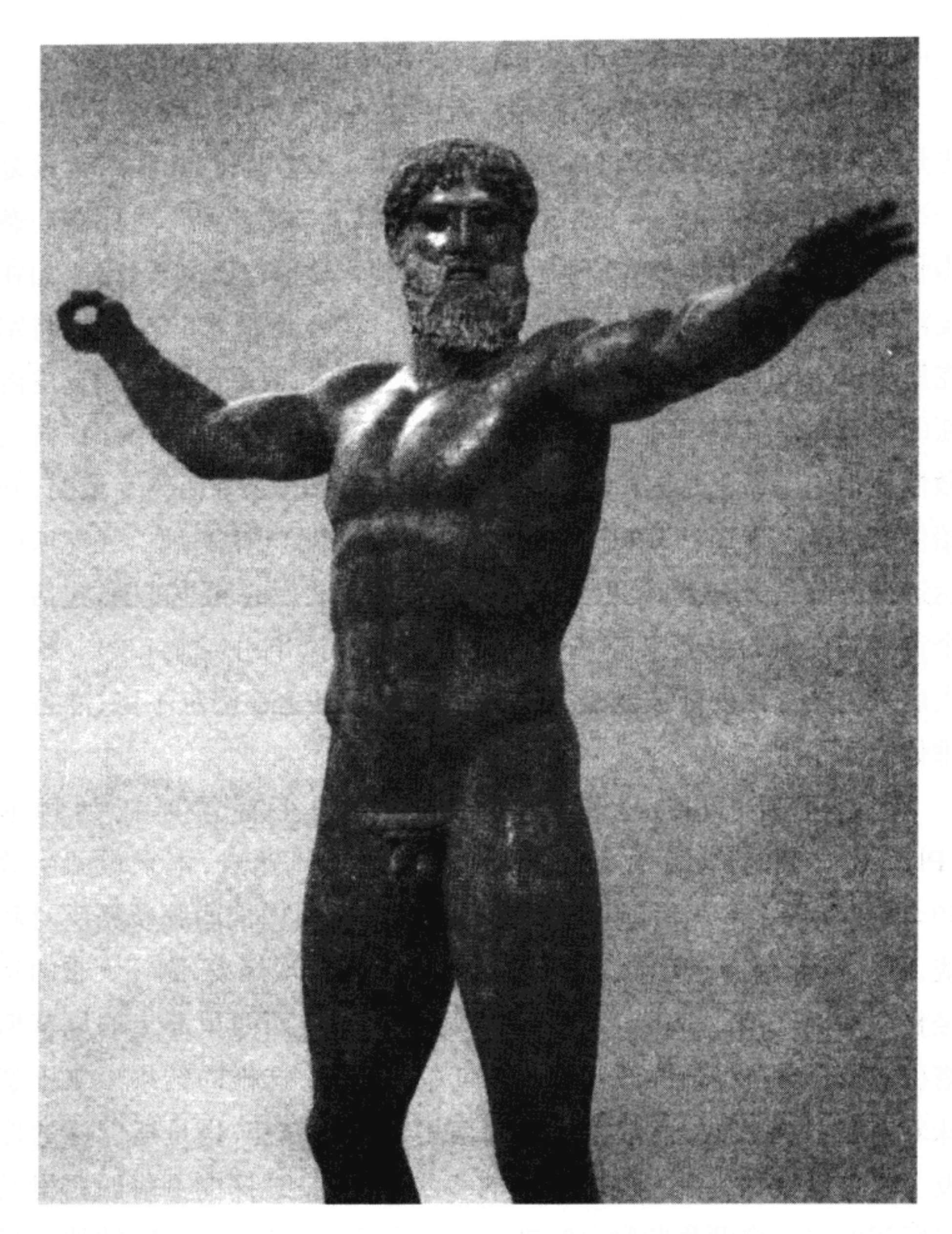
雅典其实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城邦,但是其重装步兵的数量总共也只有1.3万人,可能比伯罗奔尼撒人能够召集起来的数量要少三倍。因此雅典的基本战略就是避免陆上作战,使用海上优势扩大战果。所以雅典人期望能通过持久消耗来赢得战争。伯里克利在雅典公民大会上提醒道:"伯罗奔尼撒人缺乏跨海远距离作战的经验,因为他们彼此

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使得经济困顿而受到严格的限制。”(1.141.3)[7]

不出所料,公元前 431 年春天,斯巴达人率 3 万大军攻打阿提卡,先是围城,然后主要破坏橄榄树和其他作物。这种侵略几乎每年重复一次,直至公元前 425 年。为了报复,雅典人也如法炮制,同样定期袭击伯罗奔尼撒海岸城镇,有时还会在这些地方建造自己的要塞(比如在皮洛斯和墨色那)。雅典人频频取得胜利。在公元前 425 年,雅典将军克里昂(Kleon)把 120 名斯巴达人和其 170 名同盟军围困在靠近皮洛斯的小岛斯法克特里亚(Sphakteria)上。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雅典人傲慢地拒绝了斯巴达人所提出的和谈条件。斯巴达人便改变策略,开始侵扰位于色雷斯(Thrace)的雅典人的食物和收入来源地。一支斯巴达远征分队长途奔袭,侵犯了雅典人在爱琴海北岸的利益范围,包括一个黄金和白银的主要来源地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前 422)。雅典人后来未能夺回安菲波利斯。这时雅典和斯巴达都疲惫不堪,准备安排休战。

45

尼西亚斯(Nikias)和约(前 421)在国王普雷斯托纳科斯(Pleistonax)和雅典政治家尼西亚斯居中斡旋下达成,本来意图生效 50 年,但实际上 6 年后即被打破。斯巴达和雅典内部的强硬派反对和谈,科林斯人也拒绝签字。公元前 415 年战争再次爆发,胸怀大志的年轻贵族亚西比德(Alcibiades)说服公民大会支持西西里岛上的厄基斯塔(Egesta)对抗相邻的城邦塞利努斯(Selinus),这样的结果事实上意味着对叙拉古宣战,而叙拉古是西西里最大的城邦,也是斯巴达的盟友。修昔底德认为雅典出此策略的真实意图,是试探能否将西西里及其所属的丰富资源收归雅典管辖。在公元前 415 年春天,60 艘战船扬帆起航,亚西比德此时却被召回,行将受到不忠的指控。于是他决定逃往斯巴达。远征军最后以惨败收场。在斯巴达的支援和亚西比德的出谋划策的帮助下,叙拉古首次予以雅典沉重的军事打击。雪上加霜的是,同样是在亚西比德的建议之下,斯巴达的国王阿吉斯(Agis)率兵侵犯阿提卡,并在非常靠近农田耕地的东北方的山上(德科里亚,Dekelea)建造了军事要塞。



人体美：这座宙斯或波塞冬青铜像完美地展示了希腊人关于平衡和比例的理念(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 Athens)

具有讽刺性的是，反而是雅典在削弱消耗中最后输掉了战争，虽然它也设法持续打了 10 年仗，期间有盟友变节投靠了斯巴达阵营，还经历了一连串的政权更迭，包括公元前 411 年的一次寡头政治集团的政变。在波斯人的经济援助下，伯罗奔尼撒人最终建造起一支海军，强大至可与雅典海军匹敌。在吕山德(Lysander)的英明指挥下，斯巴达人

于公元前406年在列斯博斯岛附近赢得一场重大胜利,并于次年在羊河(Aegospotami)附近获得决定性胜利。摧毁了雅典海军后,斯巴达人将雅典人团团封锁。雅典人最终于公元前404年初兵乏粮绝,被迫投降。吕山德任命了后世所称的“三十僭主”(Thirty Tyrants),这些当权者是对激进民主制持敌对态度的雅典人,并开始了一场针对其政治对手的凶狠反击。多达1 500人在随后的恐怖中被处死,但统治者的政敌——那些支持民主的力量在城墙外开始集结。公元前403年,雅典处于内战爆发的边缘,双方在斯巴达人的监督下又被迫达成和解。

战争的影响：艺术、哲学和城邦

伯罗奔尼撒冲突在许多方面给希腊社会带来了变革。传统意义上,战争就一直是高度仪式化、约定俗成的一种活动,其功能更像是争夺某种象征符号的一场决赛。战争胜败的风险赌注有限,仅有为数不多的城邦因为战败而招致毁灭。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公元前404年雅典人投降之后,底比斯人就主张将雅典城完全消灭。斯巴达人竭力拒绝了这种诱惑,即使当年雅典人曾屠杀了米洛斯岛全部男子,而米洛斯岛最初曾是斯巴达属下领地。 46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残暴,导致雅典人对人性产生了不太乐观的评价。米洛斯岛屠城一年后,欧里庇德斯将其创作的极其忧郁黯淡的《特洛伊妇女》搬上舞台,该剧集中刻画了特洛伊城被凶残毁灭以后,留下的孤儿寡母的悲惨遭遇。在修昔底德看来,这都应该归咎于城邦的平民,即普遍智慧的表面来源。他认为,对弱小的米洛斯岛轻易取胜,增进了雅典人扩大侵略的胃口,以为他们这时能够胁迫欺压像叙拉古这样更强大的对手:“民众(hoi polloi)没有意识到(西西里)岛的面积如此之大,岛上还有数量众多的希腊人和本地人。”(6.1.1)[8] 虽然修昔底德很尊敬伯里克利,但他显然相信,伯里克利之后的不太高尚的政治接班人已经通过迎合无能的民众,逐渐积攒起手中的权力。雅典名义上是民主体制,但实际上却走向了“权贵者的统治”(2.65.9)[9]。

希腊世界最大的困扰，却是其内部冲突(stasis)。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内部冲突已经扩散蔓延，威胁到城邦的道德根基。修昔底德对此进行评价时提到“道德的整体堕落”，因为内部冲突不受公开冲突下的通常规范所约束，所以会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野蛮行径。在提到公元前427年爆发于科西拉的一次内部冲突时，修昔底德这样评述：“有的父亲杀死了自己的儿子；有人从神庙里被拖出来，就在圣坛前遭到屠杀；有些人被关押在酒神的神庙里，最后在那里死去。”(3.81)[10] 重要的是，内部冲突和城邦之间的政治紧密相关。只要能打击竞争对手，并获得自己热衷的那种政治体制，派系头目们经常愿意牺牲掉自己城邦的主权。斯巴达和雅典就经常受到这些派系头目们的游说去对付他们的同胞。这是争夺希腊控制权的战争，同时更是一场事关意识形态的战争。

内部冲突被认为是关于城邦的所有错误的集中展示，但雅典哲学家柏拉图(约前428—前347)却冷酷地认为，每个城邦事实上都是由两个互相竞争的城邦组成，所以权力应该如何运作的问题注定是没有定论的。公元前4世纪，人们在继续讨论那些希波战争前就令希腊人绞尽脑汁的话题：什么是政府的最佳形式？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服务民众？柏拉图对于民主的失望以及像普罗泰戈拉这样的智者派所持有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导致柏拉图撰写了一系列高度理论性的长篇大作，并借此创立了政治哲学。柏拉图创作了一系列著作(如《法律篇》、《理想国》)，来阐述他的政治理论所依据的知识理论基础。柏拉图思想的一个特征就是城邦需要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在他内心的理想城邦——“首善之城”(Kallipolis)中，权力应该赋予具有哲学家头脑的国王来行使。

47

公元前4世纪初，希腊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是最血腥的战争之后，希腊人中普遍弥漫着一种情绪，觉得他们所在的世界危机四伏，正在日渐衰落。雅典，曾一度被其公民吹捧成“教化希腊人的学校”，这种骄傲旋即被战争的失败打得粉碎，但是更让人受伤的则是其内部的流血与杀戮。柏拉图及其在“三十僭主”时期的同代人所经历的内部冲突是如此

惨痛，以至于在公元前 403 年，当邪恶的寡头僭主政体统治结束之时，雅典人别无选择，只有既往不咎、互相赦免，即承诺努力忘却仇恨，这样整个"共同体"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然而，堕落颓废，无论是存在于真实中还是由虚构而来，都可以成为推动文化创新和思想发展的动力。在战后的雅典，这种氛围就培育了前现代时期最伟大的思想革命，尤其是哲学领域，更是得益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贡献。现代时期的诸多哲学家都认可一种观点，即所有其后的西方哲学基本上都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脚注或补充说明"，而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创立了另一个思想流派，其规模和影响也同样无法衡量。柏拉图在公元前 387 年成立了"学园"，一所吸引希腊世界各地的学生前来学习的机构，而亚里士多德——一名来自斯塔基拉(Stagira)的非雅典人，在位于城的另一端的吕克昂(Lyceum)教学。柏拉图的方法高度抽象，同时受其喜好数学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则对通过观察和划分自然现象、从经验上探寻自然规律更感兴趣。如果说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坚信可以塑造出完美公民的话，亚里士多德则首先由学生收集现存城邦及其历史的资料，以此为基础建立一套政治理论，来阐明存在的"天然的"不平等(如阶级、性别或主人/奴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得出结论：由民主的贵族阶层统治的城邦才是最佳的城邦。

更广阔的文化发展，揭示了希腊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善于自我批评，以及更少受到习惯常规的束缚。同时也显示除了雅典以外，其他城邦此时也具备了财力来兴建宏伟的建筑，将公共空间重新装饰一番。这个时期因其外观有点像巴罗克风格的雕塑和建筑而闻名，其标志是科林斯柱式，华丽的柱头上带有叶形装饰。雕塑则偏好更具流线型衣纹，雕像所摆的姿势也更具难度，包括因当时最著名的雕刻家普拉克西特勒斯的推崇而出名的 S 形曲线姿势。普拉克西特勒斯的作品同时反映了对女性人体的更大兴趣。公元前 4 世纪时产生了古典时代最杰出的女性人体雕塑作品，包括著名的"克尼多斯的阿芙洛蒂特"(Aphrodite of Knidos)。它本来是由科斯岛人出资创作的。当发现这

48

尊雕塑太过色情时,他们拒绝接受。这样雕塑就来到了附近的克尼多斯。在此地,阿芙洛蒂特吸引了游客慕名而来。

公元前4世纪时艺术家们还对用较少理想主义色彩的手法来刻画人性展现出极大兴趣。位于巴赛的阿波罗神庙是希腊艺术史上讨论最多的神庙,这是一座建在阿卡迪亚开阔的乡野之中的奇特建筑。神庙中的浮雕檐壁制作于公元前400年之后,为参观者刻画了凡人与半人半马怪人以及亚马孙人搏斗的神话场景。与帕特农神庙檐壁不同,巴赛的檐壁展现给参观者不安的暴力场面,呈现出悲苦的面容和扭曲的体形,因此极其发人深省,引起人们内心情感的激荡。

在公元前4世纪,人们还更坚定地努力重新建设城邦的外部环境,按照纵横直交的希波达姆斯式(Hippodamian)的方格线来规划完成。我们发现当时的注意力被更多地放在公共空间和建筑的合理布局上。所有的公共建筑都更多地符合一种统一的建筑风格,更加注重通过纪念碑和雕像来美化公共空间。对精益求精的追求,可以在诸如小亚细亚的普列尼(Priene)这类城市的建设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这座城市在公元前352年曾被迫迁往一处新址,按照完美的方格网模式重建。在普列尼,市民身份的认同体现在集市和公共建筑的选址上,每处公共建筑都通过遮蔽式的柱廊连通。甚至连北部没有城邦的民族都开始采用希波达姆斯式的建筑手法。马其顿国王阿基西劳斯四世(King Archelaus Ⅳ,前413—前399年在位)在佩拉(Pella)新建了都城,建筑布局就是按照纵横直交的方式规划,王宫坐落于城市中心区。在别处,城邦反映了人人平等的理想。我们发现在这个时期,人们建造神庙的兴趣在减少,而更热衷于建造公共设施,比如体育馆、剧院以及严格限于行政治理功能的建筑物,像议事堂(bouleteria,公民集会设施)。

49

争夺控制权的斗争(二):前404—前359年

雅典人的战败没有终止城邦之间的冲突,也未能在城邦内部减缓派别之间的争斗。事实上,在斯巴达人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时代,似乎在各个方面都激化了政治上的紧张局势。在雅典帝国以前的附属国中,

吕山德不再实行民主,而代之以精心挑选的寡头集团统治。贡品仍然从这些"被解放的"城邦中征收,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吕山德中饱私囊,这样按照希腊的标准,他已然变得极其富有。最初,斯巴达霸权的新时代开展了一场将希腊城邦从波斯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运动。吕山德以及当时的国王阿盖西劳斯二世(Agesilaos Ⅱ,前400—前360年在位)率领斯巴达人夺取了反对波斯人的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包括公元前395年在行省首府撒尔迪斯的胜利。然而,斯巴达的成就却导致即使如科林斯这样坚定的旧时盟友也深感不安。在波斯人的支持下,科林斯、阿尔戈斯、雅典和玻俄提亚结成了反斯巴达同盟,但是随后发生的科林斯战争(前394—前387)没有产生最终结果。公元前389年之后,尽管屡遭挫折,斯巴达人在波斯人的经济支持下依然在实力上占据主导地位——这时为了换取波斯人的黄金,仅被解放数年的位于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又被斯巴达人可耻地双手奉还给波斯人了。公元前387年,斯巴达人设法促成了一项安排(《大王和约》),禁止主要的城邦结成同盟来挑战斯巴达人的霸权地位。结果,底比斯无法再统治玻俄提亚,雅典再次被迫放弃属国,科林斯也不得不重新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

《大王和约》旨在构筑一种斯巴达主导下稳定的城邦间秩序,然而斯巴达的主要支持者并不容易约束。事实上,希腊人无法建立一种跨城邦的体制,来设法平衡诸强权之间的利益,并限制诉诸战争的可能性。在公元前4世纪的70年代,斯巴达的霸权地位开始瓦解。雅典人重建了舰队,并且能够设法利用反对斯巴达的情绪,新组建了一个包括许多小亚细亚城邦的海上联盟。触发下一场城邦大战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379年,底比斯的一个反对斯巴达的派别在雅典人的纵容下,暗杀了城内亲斯巴达的寡头统治集团,驱逐了斯巴达驻军。随后发生了冲突,新成立的雅典盟军经过两次大的海战(前376年和前375年)摧毁了斯巴达海军。而底比斯首先重新组建了玻俄提亚同盟,接着在公元前375年在特古拉(Tegyra)击败了斯巴达人。在公元前371年,底比斯在琉克特拉(Leuktra)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在战术天才厄帕米农达(Epaminondas)的率领下,底比斯人在自己方阵的左翼部署了更

50

多排的重装步兵,借此构成足够强大的战斗力,一举击溃了对方方阵配备平衡的右翼。

琉克特拉战役被证明是希腊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其暴露出斯巴达社会结构上的一个致命弱点。到公元前 371 年时,斯巴达公民的总数量已经锐减至 1 300 人,仅是约百年以前大战波斯时公民数量的一小半。后来斯巴达人通过雇佣军来扩充数量,却未曾采取任何措施来扩大公民人口的基数。在琉克特拉作战的 700 名重装步兵中,有 400 人阵亡,此时斯巴达突然发现自己处于被完全毁灭的危急关头。紧迫的形势使国王阿盖西劳斯无暇顾及斯巴达绝不退却的禁令,允许 400 名幸存士兵撤回。仅一次战役就暴露了斯巴达的软肋,而更糟糕的还在其后。底比斯人随后率领 4 万名重装步兵,史无前例地侵犯至斯巴达本土,在城邦外围地区洗劫蹂躏。所幸洪水阻止了对斯巴达城的直接攻击。真正的打击在于底比斯人解放了奴隶,因为这样做等于把斯巴达军事体系赖以存在的经济根基彻底击垮。底比斯人将美塞尼亚的奴隶重新组织成一个新的反斯巴达城邦,连同伯罗奔尼撒中部同样反斯巴达的阿卡迪亚人,很快促成了一个联盟。这样在很短时间之内,斯巴达已然沦落为一个边缘化的角色。

其后底比斯对霸权地位的追求,同样证明没有一个希腊城邦能够促成一种稳定的城邦间秩序。在琉克特拉之后,底比斯人试图确立他们在伯罗奔尼撒、色萨利以及爱琴海地区的统治,同雅典人展开了一些角逐,旨在争夺海军霸主地位。然而人们不久就发现,底比斯的成功要归功于其战场上的战术策略以及两个将领佩洛皮达(Pelopidas)和厄帕米农达卓越的军事天赋。否则,底比斯人不具备经济实力来实现其地缘政治上的野心。显然在两大军事天才去世后不久,底比斯的主导地位就开始瓦解了。

局部战争的后果

在公元前 4 世纪,希腊的战争形式在一些重大方面发生了变化。传统上,战争一直是交战双方在方阵部署之间的较量,参战各方会遵守

一些规则和仪式。但是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众多常规习俗逐渐消失了。当代的观察家注意到,战争可以在任何季节发生,而且不分昼夜。战争的方式也变得日趋复杂。在进行后勤和战场战术策划时,将军们不得不更多地从战略全局角度展开谋划。凸显战术重要性的证明则是讲述作战的专门书籍,例如色诺芬(Xenephon)所著的《马术》与《骑兵指挥官》。作战辅助手段此时在战争中开始扮演更有效的角色,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引进了伏击战和其他一些"奇袭"战术。公元前4世纪的将军们给骑兵、侦察兵、弓箭手、投石手、轻步兵赋予了更大的重要性。尤其重要的是轻盾兵,其主要任务就是投掷重标枪,来打乱敌方的方阵。富裕一些的城邦开始使用雇佣军——数量越来越多的可供雇佣的士兵群体无疑也是局部冲突不断的一个产物。换言之,随着战争耗费越来越大,风险逐渐增大,希腊人开始藐视作战常规。

这些发展对城邦产生了哪方面的影响?研究国家形成的历史学家们发现,战争的危急关头经常推动变革的发展。城邦必须保持与对手的对等实力,否则就面临毁灭的风险。为了征税来养活庞大的军队、大型的军事要塞和越来越多的战舰,国家就要改良自己的财税体系以及官僚系统。在不太复杂的社会,像中世纪时欧洲的封建君主制国家,王室通过贵族阶层实现治理,贵族阶层则要提供军事力量作为回报。城邦没有采取以上的任何一种途径。政治仍然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业余事务,大多数城邦规模太小,不足以养活一套官僚体系。希腊的城邦也没有能力逐渐扩大发展为更大的国家。城邦对于那些外来人而言,是一个排外的社会实体。在雅典,公民资格严格限于那些父母双方均为雅典人的男子,没有余地让杰出的外来人如品达、希罗多德以及亚里士多德成为公民。恰如一个研究国家形成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希腊的城邦制度是一条"死胡同"。[11]

为了满足自身的安全需要,公元前4世纪时的许多城邦整合资源形成同盟和联盟。玻俄提亚同盟可能是第一个这种形式的联盟,但一些在文化上一脉相承的城邦,像阿卡亚人、埃托利亚人,以及阿卡迪亚人,彼此间具有共同的传统、神话来源和体制机构,根据希腊的标准也

占有广袤的领土，开始在公元前 4 世纪和前 3 世纪在城邦间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

52 然而，将来是属于那些中央集权的王国的，因为他们能够更高效地整合广袤领土上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形成的规模远远超过即使是最大的联盟所能企及的程度。独立的希腊城邦于公元前 359 年开始走向末路，当时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开始将其传统上分散的王国纳入自己的集中统治。接着他将统治范围扩大，越过南巴尔干地区直至色萨利，截至公元前 338 年，他以往已经迫使绝大多数希腊城邦形成一个联盟。菲利普的成就归功于许多因素，但是其主要的批评者——雅典的演说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指出了其中的关键：

> 他对所有公开的或秘密的活动的掌控、他在统管军队、国家以及财政方面的综合地位、他与军队的永不分离，都赋予了菲利普在驾驭军队的速度和效率方面的真正优势。[12]

在菲利普二世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希腊世界一直在绝佳的孤立环境中生存，在一定程度上远离波斯的困扰，从而得以自由处理一些小规模的战争和内部冲突。菲利普领导的马其顿拥有强大实力，可以摆平上述两种矛盾，把希腊世界融入由那些大君主国主导的国际主流舞台。从此之后，希腊的各个城邦在国际舞台上就只能扮演相对不太重要的角色。一些像罗得岛那样的城邦能够设法谋求一套独立的“对外政策”，但它们只能在各个强权之间争斗的夹缝中生存。

但是到这个阶段时，希腊城邦已经建立起一套强大的文化传统。即使在公元前 4 世纪初，已然弥漫着一种已经抵达人类成就顶峰的感觉：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以及欧里庇德斯创作的悲剧不可能再被超越。正是这种“古典”文化，后来被马其顿国王传播到近东以外，并远至中亚的撒马尔罕(Samarkand)和印度的印度河流域，还被罗马人带至不列颠和其他西欧地区。换言之，正是从公元前 4 世纪中叶开始，城邦文化开始了向“世界”文化的转变。

第三章　希腊化时期(前 359—前 27):从菲利普二世到奥古斯都

作为古代最伟大的建筑之一,同时也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摩索拉斯陵墓(Mausoleum)高耸于哈利卡纳索斯(现在的博德鲁姆)——这个小亚细亚西南海岸的主要城邦。同诸多海外殖民地一样,哈利卡纳索斯的居民也是由希腊人和当地人组成:这里的当地统治者积极地推行希腊文化和卡里亚文化。摩索拉斯陵墓本身即是不同文化交融汇合的一个产物。它建有独特的 36 根爱奥尼亚式石柱,以及可与帕特农神庙浮雕檐壁媲美的一系列精美雕刻。这座宏伟建筑高达 45 米,下有一个 38.4 米长、32 米宽的底座,是摩索拉斯(Mausolus)的墓室。他是包括附近岛屿和克里特岛在内一大片地区的总督和实际统治者。摩索拉斯在公元前 370 年定都哈利卡纳索斯,当时还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这座城市同时拥有集市、体育馆、剧院和其他具典型城邦特色的建筑和设施;其城市规划也遵从希波达姆斯式设计。然而使得该城独具特色的却是摩索拉斯陵墓,尽管外观属于希腊式,其功能却完全是非希腊的。摩索拉斯得以建造如此张扬而宏伟的建筑,本身就清楚地证明了他个人拥有强大的权力。同当时众多卡里亚人一样,摩索拉斯已经充分“希腊化”了,但哈利卡纳索斯不仅属于整个社会,也是属于他自己的城市。日常的城市管治仍然由公民实施,但他们不再享有最高

53

的统治权。

对于熟悉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人来说,公元前4世纪预示着一个全然不同的外部世界。菲利普二世,一位比摩索拉斯更有权势也更具魄力的专制君主,将其统治扩大至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其继任者亚历山大更是如此,随后的"希腊化"时期是属于国王们的,但是在19世纪首先创造出"希腊化"这个术语的历史学家们认识到一个事实:像马其顿这样的地区性国家的兴起,并未预示着城邦的消亡。相反,城邦成为了诸多帝国(包括罗马帝国)统治和文化的基础。事实上,在希腊化时期的国王及后来罗马人的统治下,大西洋和印度之间的世界通过一套由希腊城市或准希腊城市构筑的网络,获得了整合与交融。我们发现从公元前4世纪起,希腊主义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文化。

54

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马其顿

公元前338年,在喀罗尼亚(Chaeronea)战役中,马其顿击败了由城邦组成的联盟。次年,菲利普在科林斯主持了一次大会,他提议寻找途径来解决希腊分裂和动荡的局面。他迫使希腊人认识到联合起来对抗波斯人的必要性,提醒他们要记得波斯大王薛西斯曾因为掠夺宗教圣所而激怒了神灵,同时波斯人统治的小亚细亚还有许多希腊人等着他们去解放。菲利普能够得到许多希腊领导者的道义支持,因为他们把波斯人视为最紧迫的麻烦,其中包括雅典政治家艾索克拉底(Isokrates),他一直在呼吁希腊人团结一心共同对抗真正的敌人。科林斯同盟已经形成,其成员都一致承诺停止内部冲突和城邦间战争。同时,所有城邦之间的分歧都必须交由仲裁解决,为了防止内部的动荡,成员国不得作出宪法方面的修改——菲利普在此前已经设法确保了把亲马其顿的显贵安插在大多数城邦的统治要职之上。

科林斯同盟被认为是一个"泛希腊"(Panhellenic)的组织,而且这是史上第一次,大多数希腊城邦在政治上达致团结。仅仅只是斯巴达、西部希腊族群以及其他一些边远的城邦没有加入其中。同盟正式成立,旨在捍卫希腊人的自由与自治。其成员的利益由理事会

(synedrion)代表,这是一个正式的机构,其负责人就是菲利普。事实上,理事会只是一个工具,菲利普用它来统治希腊人以及实现其在东方扩张称霸的野心。菲利普的最终抱负是挑战波斯的强权,为实现此目的,他需要希腊的人力和资源,或至少在他征战亚洲时需要实现大本营基地的稳固。菲利普的宣传鼓吹确实在许多希腊人中激发起了热情,而且他还给出了战胜后可以掠夺抢劫的承诺。同时,他安排了四座按战略意义布局的堡垒来制衡希腊人。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挥舞着大棒,菲利普整合起希腊人的力量,开始对抗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公元前336年,同盟投票决定对波斯发动全希腊参与的远征,同时菲利普获得授权,可以征用同盟内每个成员国的人力和其他资源。

55

不用说联合起整个希腊世界,仅是菲利普设法统一了马其顿这一事实,在当时都令许多人震惊。如同菲利普自己的儿子曾经指出的那样——一个由"一无所有的游民"或身着兽皮的羊倌组成的王国,如何能够成为希腊的主人?从荷马时期以来,马其顿就是一潭死水,看上去毫无发展。其人口主要是由高地牧民和散居在低地的农民组成。马其顿的国王被迫展开与强大的贵族阶层之间的竞争,而对那些控制高地地区的领主则只有名义上的统治权。马其顿的贵族们,尤其是那些被选作国王的同伴(hetairoi)的贵族(他们是构成宫廷阶层和精锐骑兵部队之主力),将自己比作荷马史诗里的巴赛勒斯。国王和手下的同伴在喧闹的酒宴上狂饮,这种场合下脾气会变得火爆,相互之间会辱骂争吵,甚至引发流血冲突。王位的传承尤其令人担忧。阿基西劳斯一世(约前413—前399年在位)杀死了自己的叔叔、堂兄弟和同父异母的兄弟后,才掌握了统治权。掌权者还不得不谋求更有权势的同伴的拥护,因为这些人可能会转而支持王室内另一个图谋权位的对手。显然,菲利普及其儿子亚历山大都很警惕同伴以及他们传统上拥有的权利,尤其是"选举"国王的权利。

同古典时代一样,一直到现代,马其顿人所具有的希腊特性是一个存在诸多争议的话题,但同时毫无争议的一点则是,马其顿在希腊历史上确实起到了深远而重要的作用。在希波战争结束之后,当人们开始

有兴趣认真考虑希腊主义的定义时，是城邦中的希腊人确定了这个话语。希罗多德主张希腊主义可以通过血缘关系、宗教、语言和生活方式来加以界定，这样马其顿人很明显无法满足全部这些标准。国王亚历山大一世（约前 498—前 454 年在位）最初被拒于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外，直至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纯粹的希腊人阿尔戈斯后，才又得到了参加运动会的资格。从更加客观的方面看，尽管带有地区特性，马其顿的宗教仍然可以辨别出是属于希腊的宗教，同时其贵族阶层也都接受过希腊教育：原因很明显，马其顿人对荷马特别感兴趣。要辨别马其顿社会普罗大众的文化属性比较困难，但从对佩拉城的最新碑铭研究中，揭示出马其顿语言是一种与奥林匹斯山地区的西北方言相关联的希腊语。马其顿人无法通过"希腊性"检测的地方在于其"生活方式"不符合希腊标准，而希腊标准的生活方式主要就是"城邦的生活方式"。在喀罗尼亚战役爆发的前些年，菲利普正在寻求将其霸权扩展到希腊南部，菲利普的反对者们所坚持的一点就是马其顿人的非希腊特性。尽管如此，马其顿的贵族们一直以来就坚持认为他们是希腊世界的一部分，而菲利普就是要领导这个希腊世界进行一场对抗共同敌人的"泛希腊"的事业。

56

在公元前 5 世纪，马其顿君主统治的威望得以提升，亚历山大一世、佩尔狄卡斯二世（Perdikkas Ⅱ）以及阿基西劳斯一世开拓疆土，开始控制马其顿相邻地区，北至伊利里亚（Illyria），东达色雷斯。资助希腊艺术家，把地区性的奥林匹亚节庆活动提升至全希腊的地位，这些举措都提高了马其顿贵族阶层的希腊化程度。公元前 4 世纪初期的政局极不稳定，菲利普二世在公元前 359 年掌权之后，迅速铲除了政治上的其他对手。随着他在巴尔干地区统治地位的确立稳固，其在国内的统治权威也得以巩固，变得无懈可击。借助娴熟的外交手段、通婚联盟以及最重要的军事优势，菲利普将伊利里亚、色雷斯、伊庇鲁斯和希腊南部悉数纳入其个人统治之下。及至他准备向希腊南部各地拓展时，他手下已经拥有庞大的经济资源，包括储量丰富的金矿银矿，以及从最近征服的地区征收而来的巨额税收。同波斯大王一样，菲利普完全有能力供养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常备军队。不同于其在希腊的其他

竞争对手,他拥有足够的人力资源,足以克服众多挫折。另外,作为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菲利普能够迅速动员所属资源,因此他获得了对抗希腊其他地区结成的任何联盟的决定性优势。

菲利普能够获得统治地位的最重要因素,在于他具备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军事天赋。在很短时间内,菲利普就设法将王国纳入自己的个人统治之下,随后分化并统治了因分崩离析而孤立无援的希腊人。菲利普年轻时曾在底比斯做了数年人质,期间在厄帕米农达和伯罗庇达斯的指导下学习战争艺术。做了国王以后,菲利普重新整编了马其顿军队,创立了一支在当时可以摧毁其他任何步兵队列的方阵。每个步兵都装备了一支长矛(sarissa),长达4.5米,必须用两手持握。训练这些士兵的时候力求方阵能够做到高度灵活机动,这样组合成方阵以后,就形成了一堵由长矛构筑的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菲利普还非常善于在战斗中协调组织军中的各个兵种(骑兵、弓箭手、投石手以及侦察兵)。短期之内,他就淘汰了过时的希腊传统作战方法。

57

公元前336年,菲利普准备夺取对波斯的统治权。帕米尼奥(Parmenio)率领的先遣部队在公元前336年冒险挺进至小亚细亚,但听闻菲利普被刺身亡的消息后被迫撤回。在一个典型的马其顿式节日庆典上,菲利普遭到暗算身亡了。当时国家面临陷入混乱分裂的可能。菲利普的儿子——亚历山大只有十来岁,而像帕米尼奥这样咄咄逼人的将军极有可能对王位虎视眈眈。菲利普遇刺后,希腊人趁机退出同盟,宣称独立。但是,亚历山大迅速而坚决地控制住了时局。在数周之内,他在内部铲除了潜在异己并重新稳固了马其顿在希腊南部的统治地位。帕米尼奥在恢复对伊利里亚和色雷斯控制的过程中不负众望。公元前335年,底比斯再次反叛,亚历山大杀一儆百,摧毁了全城,将所有幸存者卖出为奴。年轻的国王竭力恢复自己王朝的统治,希望能够追随父亲的梦想,征服亚洲。

亚历山大大帝

经历一连串重大战役后,亚历山大最终征服了波斯帝国。在小

亚细亚的格拉尼库斯(Granicus,前 334)展开一场较量后,他又在叙利亚北部的伊苏斯(Issus,前 333)获得一场重大胜利,随后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高加米拉(Gaugamela,前 331)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正是在高加米拉一战中,亚历山大奠定了自己作为伟大征服者的地位和威望,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实际上交出了他的领土。然而亚历山大的野心远不止于此。关于这一时期我们所获得的最好的资料来自阿利安(Arrian),他坚信年轻的国王内心充满了继续征服的热情:

58

> 他绝不可能满足于眼下征服取得的战果,即使他已横扫欧亚,将英伦诸岛归入欧洲,将欧洲纳入亚洲,他也不会止步。他会永远寻求征服未知的领土,不为战胜别人,只是为了挑战自我。(7.1.4)[1]

亚历山大率军马不停蹄地向东进发,穿过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和喜马拉雅山脉西端,沿印度河而下。因为害怕手下士兵的不满与反叛,这才停止进入恒河流域(Ganges River)。公元前 325 年被迫退至巴比伦时,亚历山大作为波斯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开始了其对波斯的统治,但为期不长。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死于高烧,年仅 33 岁。

从此以后,产生了无数关于亚历山大的研究著作和传记,特别是探讨其指挥才能、政治抱负、遗产和个性方面的作品。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吸引了无尽的评论,但真正令人称奇的是他活得自得其所。亚历山大在严格意义上具备了荷马史诗中所讲述的武士特质。事实上,他曾试图超越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同敌人空手搏斗,经常身处危险困境之中,数次身负致命伤而后又绝处逢生。其马其顿部下能对他始终效忠,原因就在于他的非凡勇气,同时也由于他总是能率领手下从胜利走向胜利。亚历山大是杰出的军事战术家,经常率军战胜数量远大于自己的强敌。在高加米拉,他率 4.7 万人击败了少说也有两倍于自己、可能多达 25 万之众的波斯

军队。

亚历山大也很会巩固其征服的战果。波斯帝国有一个成熟的政治体制，亚历山大以及他的继承者都很明智地采用了波斯帝国已有的行政管理机构。另外，地方上的贵族们也被吸收融入新帝国的权力体制内。亚历山大对各种当地的传统都很敏感。在东方，他采用了拜倒礼(proskynesis)，一种谦卑恭顺的臣服礼，他属下的马其顿的贵族们就对此忿忿不平。他受到埃及人的热烈欢迎，要拥其为法老。尽管他没有获得波斯的王位，亚历山大仍然宣称自己是“亚洲”的主宰。在其帝国的都城巴比伦，他享用了一些当地象征王位的礼仪。亚历山大三次娶妻都是出于政治目的，其中包括大夏(Bactrian)公主罗珊妮(Roxane)，他还曾经命令 3 000 名马其顿士兵迎娶了波斯新娘。

59

构建如此庞大的帝国，其目的何在？仅仅由于亚历山大受到激情的驱使？抑或他确实拥有世界性的政治眼光？还有，他是否一直致力于建造一个“希腊”世界帝国？后来的传记作者像阿利安就乐于认为他确实具备如此谋略并付诸实施。在《远征记》(*Anabasis*)一书中，阿利安以亚历山大的口吻告诉大流士：

> 你的祖先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来到马其顿和希腊其他地方，来攻打我们。我作为希腊盟主(hegemon)，希望找波斯人报仇，进入亚洲。(2.14)[2]

亚历山大一定坚信他入侵波斯领土是一次泛希腊的冒险事业。在格拉尼库斯战役之后，他对待希腊战俘的态度就异常严厉，因为他认为这些战俘“为了外邦人而与希腊交战”(阿利安，3.23)[3]。每次作战，亚历山大都别出心裁地同希波战争联系起来，以不断确认此项使命的历史属性和特定的希腊属性。火烧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看上去是为希波战争复仇的象征性举动，而公元前 330 年 6 月在埃克巴坦那(Ekbatana)解散同盟，明显是东征讨伐结束的一个信号。他不信任希

腊盟友，并在时机适当时无情地对待他们，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对泛希腊主义的信念不真诚。这恰恰说明了在波斯王朝被消灭以后，起初的事业对于亚历山大而言已不太重要。相反，在其接下来的统治中，亚历山大专注于实现其政权的“普遍”属性，坚信他的天命是达致天下一统。

总之，绝大多数专家都认为亚历山大的首要动机并非泛希腊主义，而且即使是作为次要动机，一旦他将波斯帝国据为己有，泛希腊主义也失去了其通行的价值意义。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个人天命和他所谋求的在诸神中的地位。他率军进入现在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时，他的属下对其专断风格日渐反感。因为骑兵指挥官克雷托斯(Kleitos)质疑他的成就，亚历山大将其处死，然后安坐在军帐中绝食三天，但当他听说作为宙斯之子，法律正义本质上就是“国王以任何方式所实施之任何行为”(阿利安，4.9)[4]时，就从军帐中释然而出。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领土被他征服，亚历山大也经历了一场个人被神化的过程。

60

世界帝国可能适合于一个神化了的人，但是这种“神”却无法长生不老来建造一套历久不衰的帝国体制。事实上，菲利普和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帝国更多归功于其个人领袖魅力和非凡才能，而非任何形式的管理体制。完全可预见的是，如同荷马史诗里激烈竞争的国王一样，那些属下执著地你争我斗，企图继承亚历山大的权力衣钵——但是没有一个人可能步其后尘。尘埃落定之时，政治格局不再大国一统，而是群雄并起。

希腊化的王国(前 323—约前 250)

对于那些内心残酷而且野心勃勃的属下来说，亚历山大还有继位者这一事实毫无意义，尤其是亚历山大同父异母的弟弟菲利普·阿里达乌斯(Philip Arrhidaeus)智力尚有缺陷，而罗珊妮之子还未出生。地位最高的佩尔狄卡斯，理应扮演摄政王的角色，但是同其竞争的将军们很快发现他当摄政王也是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结果没过多久，佩

尔狄卡斯也被迫同诸多其他野心膨胀的继业者(diadochoi)展开角逐。在随后激烈的争斗中,绝大多数继业人都被刺杀或在战场上阵亡,其中包括佩尔狄卡斯,他于公元前320年在埃及的一次军事行动中被谋杀身亡。在马其顿内部,亚历山大母亲奥林匹娅(Olympias)一直致力于辅佐其年幼孙子的掌权大业,并在公元前317年谋杀了其继子。公元前311年,当时马其顿的统治者卡山德(Kassander)除掉了年轻的亚历山大四世以及罗珊妮。及至公元前307年,继业者已经正式使用“国王”(巴赛勒斯)头衔。

可能继业者中最狡诈的当属托勒密(Ptolemy),即后来的托勒密一世·索特(Soter,意为“救星”,前323—前283年在位),他第一个获得了作为权力基地的领土。他选择了埃及,最为富有同时也是帝国中最具战略防御地位的地区。其他人采取了对帝国不是“全获”就是“全失”的策略,虽然只有佩尔狄卡斯和其他两个继业者一度接近于完全拥有了整个帝国。佩尔狄卡斯在埃及遇刺身亡后,最具实力的将军是“独目”的安提戈努斯(Antigonos Monophthalmos),恰好也是菲利普二世的同时代人。尽管年龄偏大,安提戈努斯却掌握了亚历山大帝国的大部分领土,但是他的对手们联合起来,于公元前301年在伊普苏斯(Ipsos)战役中终结了其野心。安提戈努斯最终战死,时已81岁高龄。20年后,塞琉西(Seleukos Nikator,前312—前281)重新征服了所有亚历山大时期的亚洲领地(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阿富汗,还短期占据过印度河流域),但他在夺取马其顿的战役中遇刺身亡。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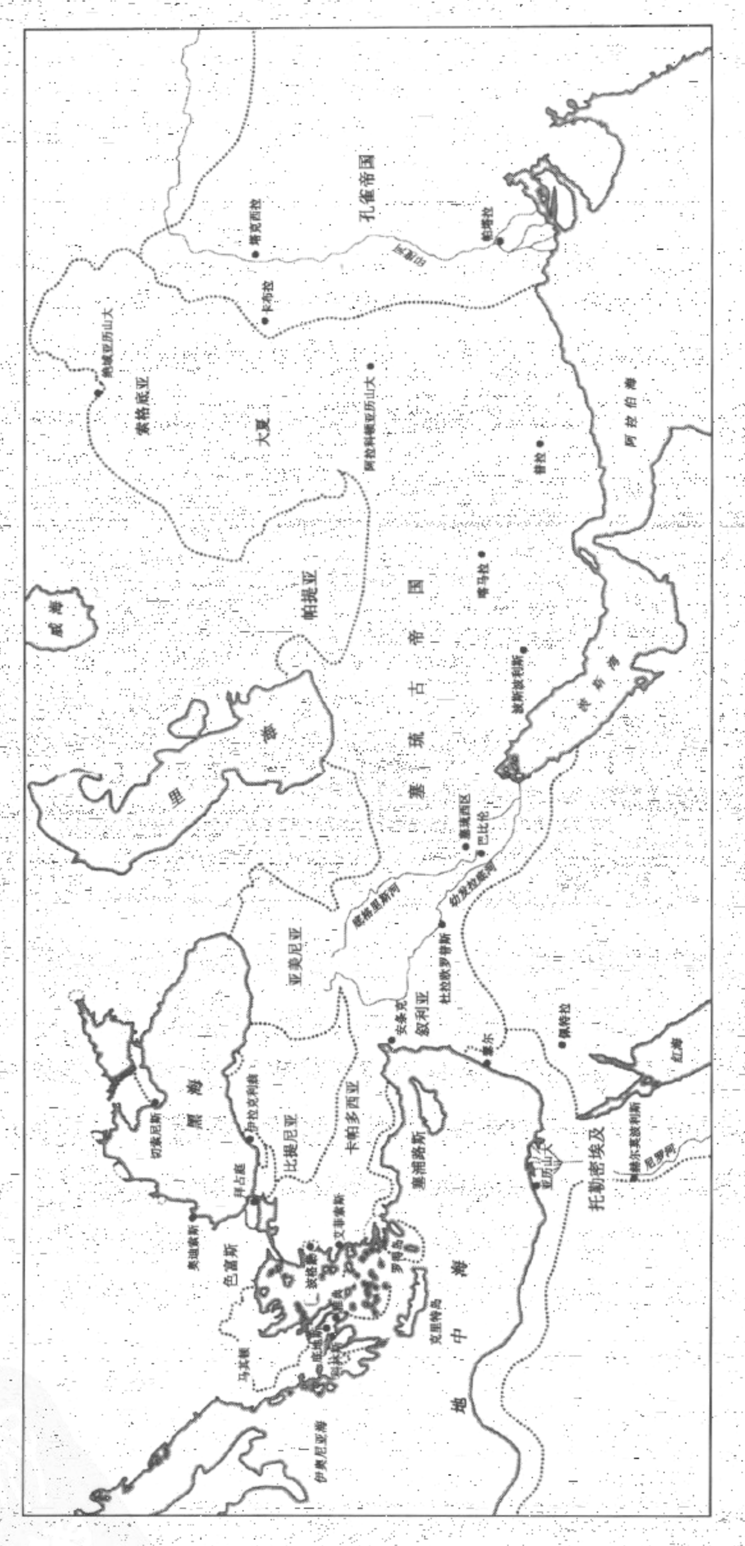
至此大局已定,一些传承下来所谓的希腊化王国已经初具雏形。托勒密王朝仍然控制着埃及,有时势力范围还会扩展至塞浦路斯、黎凡特(Levant)部分领土以及爱琴海地区。虽然到公元前248年时帕提亚人(Parthians)已经开始收回伊朗中部的领土,塞琉西王朝仍然占据着最大面积的领地,包括近东、波斯和中亚。公元前256年,一个分离出去的、拥有希腊风格都市中心的希腊化国家在巴克特里亚(Bactria,中国史籍译为大夏,大体上包括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地区)成立

了，并且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大约在公元前180年，这个王国再次发生分裂，在印度河流域形成一个新王国，并将统治延伸至恒河流域，现代学者称其为印度-希腊王国。

在地中海，涌现了众多中等规模的王国。公元前277年，安提戈努斯·贡那塔斯在马其顿建立了安提柯(Antogonid)王朝，而一些强大的地区性政权也在安纳托利亚(大体上即今天的土耳其)开始形成，包括波格蒙(Pergamon)和本都(Pontus)。迦太基和罗马在地中海中部地区展开角逐，叙拉古曾一度成为该地区的一个强国。在公元前304年，阿加索克利斯(Agathokles)——一个来自叙拉古的僭主——自封为一个统一的西西里的国王，但其后60年中其继业者们纷争不断，最后被迫将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岛屿奉送给了罗马。

亚历山大的传奇，塑造了希腊化君主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追求目标。这些政治实体之间彼此交战，因为每个国王的理想都是重新统一亚历山大的帝国，并继承他的衣钵。如此一来，每个希腊化时期的王国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使其统治者获取军事上的丰功伟绩，实现其个人野心。国王之间永不停歇地互相征战，为此动员了大规模的职业化军队。这些士兵并非为国家作战，而是各为其君主卖命。征收来的巨额钱财使得一些君主，尤其是塞琉西王朝，有能力养活和调遣数量超过菲利普二世所率领士兵两倍的庞大军队。然而，不停的讨伐征战也催生出一个恶果，即"军备竞赛"，即使再多的财富也会消耗殆尽。

合法性是困扰所有希腊化时期的国王们的一个首要问题，尤其是亚历山大的继业者中没有一个拥有王室血统。因此新掌权的这些国王只能发明新的传统，宣传他们与神灵之间的特殊关系。在讲希腊语的民众当中，他们创立了能够彰显神圣意义的官方称谓，比如"救世主"(soteros)，甚至"神"(theos)。同时他们也竭力达致非希腊语民众对国王统治所抱的期待。在埃及臣民面前，托勒密的行为举止都极像法老，被认为是活生生的神——托勒密王朝诸王的画像给人很明确的印象，即该王朝已然完全本土化了。



希腊化时代诸王国(约前270)

世界范围的希腊化

64

总体而言,希腊化时期的国王们创造出了一套意识形态和运作模式,这些也都得到了希腊民众和非希腊民众的响应。但是构成希腊化社会本质特征的还是古典时代的那些传统。无论亚历山大的动机如何,其征服所带来的影响却是将希腊主义传播至当时世界的每个角落。即使后来的印度统治者阿育王(前 269—前 232 年在位)都坚持使用希腊语作为铭文所用语言。不同形式的希腊城邦可以在遥远的波斯湾巴林以及中亚大河沿岸地区出现。阿富汗北部的艾哈努姆(Ai Khanum)城拥有一座剧院,能够容纳多达 6 000 名观众,还有一个体育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馆之一。在巴基斯坦北部有一座建于公元前 180 年的老城坦叉始罗(Taxila),它是按照希波达姆斯式的城市规划风格建设的,而且其中的佛教建筑也带有希腊设计的特点。印度-希腊王国(约前 180—前 10)是一个由类似希腊的贵族阶层统治的广袤国家,带有希腊和佛教艺术传统相融合的特征。这种融合似乎还对中国人创作的佛像雕塑产生了影响。

在希腊周边地区,像美索不达米亚、黎凡特和安纳托利亚,希腊化的影响要更加深远。希腊化时期的国王们建立了大约 100 座新城,都按城邦而建,其中有好几个城市的规模比希腊本土的还要宏大。因此安条克(Anitoch,叙利亚)和塞琉西亚(Seleukia,美索不达米亚)可能最多拥有 50 万居民,而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更是多达一百万人口。起初这些新城邦的定居者大多是从希腊本土来的士兵和商人:亚历山大的征服使从爱琴海地区加速涌入了最大一批移民,其中有商人、学者、艺人和劳工,都是为了在希腊化的东方"新世界"追寻致富的好时机。每座新城都以城邦的方式运作,拥有一切必要的市政设施和宗教场所,以及生活便利设施和娱乐场所。所有这些城邦沟通的语言自然是希腊语,它同时还是娱乐和艺术创作所用语言。新城邦内也居住着一些当地人,只不过时间一长,这些当地人都完全或部分希腊化了。

正是在这个时期,希腊精神成为身份认同的一个首要问题。希腊

来的移民蜂拥来到亚洲和埃及，在同当地“野蛮人”打交道时，更加感觉到定义自己文化的迫切需要，因为希腊主义正是国王们所推崇的文化。事实上，希腊化的君主国家极其渴望被当作“希腊”君主国家来对待，因此才不遗余力地建造典型希腊风格的城市。波格蒙的统治者为了掩盖其充满疑点的希腊属性，捏造了同亚历山大的血亲关系。阿塔尔王朝(Attalids)把波格蒙改造成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希腊城市之一，在向德尔菲这样显赫的泛希腊中心捐赠时出手阔绰。塞琉西王朝未曾努力将巴比伦希腊化，但是他们在底格里斯河畔建造了一座名为塞琉西亚的新城，作为一个中心城市，在归属帕提亚人统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座新城仍然按城邦的方式运作。

从任何标准来看，亚历山大城都堪为希腊化时期最伟大的城市，特别是它展示了在金钱不是目的的前提下，一个希腊城市应当如何建造。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把亚历山大城看作是城市设计的杰作：“亚历山大城的地势形似一座钟表；依两海而建……整个城市街道和道路十字交错，极其适合马匹和马车穿行通过。”(17. 1. 8)[5] 城内还建有宏伟的纪念性建筑，比如七大奇迹之一的法罗斯岛(Pharos)灯塔、缪斯神庙(Mouseion，即博物馆)，以及一座可以与雅典的学校媲美的教育机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居世界首位，可能多达 70 余万册。毫无疑问，这座城市如磁石般吸引着各地学者。这也成就了亚历山大城作为希腊学习和研究无可争议的中心的地位，尽管还有其他城市试图对此加以挑战。欧迈尼斯二世(Eumenes Ⅱ，前 197－前 159)在帕加马建造了一座图书馆，来竭力提升波格蒙的地位，馆内藏书数量可观，也达到了 20 万册。因为托勒密王朝不愿向他们出口纸莎草纸，波格蒙人还发明出了羊皮纸。

正是语言凸显了希腊化世界的统一。以阿提卡希腊语这种古典时代极负盛名的语言为基础形成的一种新的共同方言(koine dialektos)或共通语(Koine)，是希腊化世界的一种标准沟通工具。存在一些明显的证据显示，其他希腊人不满阿提卡的主导地位，共通语就成了官方、商务往来以及教育所用的语言。所有的哲学论著、科学文献、戏剧诗歌

甚至宗教著作,都使用这种能被最广大读者阅读理解的语言。在新的城邦,希腊移民们肯定带来了许多彼此无法沟通的方言,共通语这时就起到了居中沟通的媒介作用。另一个重大发展是,共通语快速传播至小亚细亚和安纳托利亚其他地区,并且逐渐取代了当地的语言。

66

既然希腊主义是希腊化城邦的主流文化,所以许多非希腊的民众也不可避免会学习希腊文化和语言。例如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就变成了讲希腊语的群体,并且从托勒密二世·菲拉德尔福斯(前 282—前 246 年在位)资助的摩西五经希腊译文中受益颇多。后来,随着来自爱琴海地区的希腊移民人数越来越少,希腊化的统治者们认为有必要在本地贵族中推广希腊主义。到公元前 2 世纪时,托勒密王朝的君主觉得时机适宜,可以给予臣民们合法的希腊身份了。换言之,这样就可以"变成"希腊人了,前提条件是接受过希腊教育,学会了希腊语言以及希腊生活方式。这个话题在随后章节还会进一步探讨,此处仅需指出的一点是,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坚信希腊主义没有必要在种族特征上保守排外,即使注重"种族意义"的那些希腊人仍然坚持血统标准的重要性。希腊主义变成一种具包容性的文化,是其能够在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中保持世界文化地位的唯一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必须承认,希腊化的国家并没有将希腊方式强加到自己臣民身上,原因可能是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社会动荡。公元前 167 年发生了马加比起义(Maccabean Revolt),冲突的起因仅是耶路撒冷的传统守旧者与正在经历希腊化的犹太人之间的争执。总之,希腊化的族群和没有希腊化的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是由企图强迫同化而引起的。事实上,希腊族群仍然把自身视为与众不同,对于别的臣民仍持有一种"殖民主义者"的傲慢姿态。随着希腊主义升格为一种尊贵文化,而且事实上亚历山大的帝国是合理地经由"手中之矛"(征服)打下的江山,希腊人至少在一开始对其他文化似乎并不感兴趣。事实上众所周知,希腊游客蔑视亚历山大城和其他位于亚洲的希腊城市,认为这些城市只是徒有希腊的外表,实则非常"野蛮"。反之,其他族群的自以为是也很普遍。有的导游会提醒那些想去参观雅典和其他"历史"中心景观的

游客：这些古迹看上去破败不堪，还有那些公共设施，像喷泉，要么缺水要么陈旧过时。

希腊人和非希腊国民之间发生冲突，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希腊人限制其他人拥有城邦公民身份和使用市政设施，尤其是体育馆。然而随着岁月流逝，族群间的沟通和融合变成了时代潮流。这一时期的希腊著作显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即淡化和模糊希腊人与“其他人”之间的界限。当时还极其热衷于建立家谱，来展示比如在希腊英雄和埃及英雄之间以及神与凡人之间的血缘纽带，承认诸如腓尼基人(Phoenician)在自然科学上取得的成就或犹太人对于哲学思想所作的贡献。同时，东方的宗教开始对希腊人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这方面，没有人比印度-希腊王国的国王们受到的影响更深，他们转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米南德一世(Menander Ⅰ，约前 155—前 130 年在位)很可能皈依了佛教，而米南德二世(Menander Ⅱ，约前 90—前 85 年在位)则肯定信了佛教。同时，一些东方教派在希腊人中很流行，其中有的教派在诸如提洛岛这样传统的希腊宗教中心里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化上的融合也以其他多种形式出现。在艾哈努姆，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一个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庙，里面包括一座看似宙斯的大型雕塑。这里的人们崇拜一个希腊人称作阿耳特弥斯(Artemis)的女神和一个当地人熟知的月亮女神。在埃及菲拉德尔斐亚(Philadelphia)，拜神者们给希腊以及埃及的诸神造庙，尤其是伊希斯(Isis)和塞拉皮斯(Serapis)这样的神，对两个民族的崇拜者都很有感召力。

亚历山大的征服确实改变了世界，但同样重要的是，不可夸大希腊主义对亚洲和埃及的本土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总而言之，希腊主义影响的范围限于城市地区。绝大多数人口，也就是农民群体，并未受到多大影响。而且还有许多重要的城市也没有被希腊化，如巴比伦、耶路撒冷和孟菲斯(Memphis)。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整个希腊化的东方以及其他地区，阿拉姆语作为波斯帝国的一种通用语，一直保留着其“国际”语言的地位。阿育王在旁遮普的铭文也是用这两种语言撰写的。

希腊主义的改造

在后亚历山大时代，希腊文化经历了哪些变化？在这个国王主导的时代，城邦、民众(koinos)的价值观以及艺术的功能都受到了哪些影响？自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连绵不断的内部冲突和激进民主的泛滥，使得希腊社会在面对平等主义和民众价值观时倍感困惑，犹豫不定。到了希腊化时期，民众仍然重要，但是希腊世界当时处于君主的统治之下，与这些君主相比，民众的地位最多只是居其次。然而，同具有荷马时代风格的国王一样，马其顿人拥护的是精英主义的价值观和个人利益。同时，个别希腊人已经开始积累财富，并借此获取非同寻常的权力和影响力。同前几代的贵族不同，新的精英(aristoi)已然具备了个人财力来建造宏大公共纪念性建筑，以及出钱资助艺术家。

如此这些改变对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希腊化时期对于科学、哲学和文艺创作而言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期众多的杰出人才，从阿基米德、芝诺到波利比阿，都具有贵族血统。这些人衣食无忧，有足够空闲来学习、写作、做实验，以及建造发明各种昂贵奇妙的机械装置。在王室资助之下，希腊学校得以在机械制造、工程学、天文学、医学以及几何学等诸多领域取得里程碑式的进步。在这个时期众多杰出人才中，就有几何学之父欧几里得(约前 330－前 275)、测量出地球周长的博学之士埃拉托色尼(约前 276－前 194)，以及发明了星盘的希帕科斯，他发现了分点岁差以及如何预测日食。

更多的金钱意味着更多的艺术创作。最富足的几个朝代——塞琉西王朝、阿塔利王朝以及托勒密王朝，似乎都不惜花费巨资，在其都城建造大理石纪念性建筑。托勒密王朝，因为养活的军队规模较小，所以拥有了最大规模的可支配资金，决心把亚历山大城建造成世界的超大规模城市(megalopolis)。从地标到平常的街景，整座城市就是一个奇迹。阿塔利王朝则试图把波格蒙打造成新雅典。该城拥有多座名声在外的景观，包括宙斯圣所、著名的体育馆和可以容纳一万观众的剧院。这座城市沿着山丘的一侧依山而建，在山丘的高处屹立着宏伟的宫殿以及国王

的武器库。经过一套复杂的水压系统,可以把水由山下抽取至山上。

希腊艺术所经历的变化,反映了对于古典时代深切的怀旧情绪,同时还体现了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希腊化时期的艺术别具一格之处,在于其运用了古典形式来为权力新贵以及极其庞大的艺术市场服务。君主们利用艺术来反映和合法化其帝王权力。留存至今的艺术作品大多为帝王雕像,刻画了国王要么正在作战、狩猎,要么身着华丽神圣的礼服配饰。因为有了出手阔绰的资助,艺术作品通常规模更大,细节刻画更加华丽。最具标志性的希腊化时期雕塑当属萨摩色雷斯岛上的胜利女神像——一座雕饰华丽的大型女性身体雕像,现在保存在卢浮宫。比起典型的古典时代雕像,胜利女神像更具"巴罗克"风格,波格蒙神坛的浮雕檐壁上随处可见的小雕塑也是如此。与古典时代的艺术相反,新艺术传达了更直接的信息。同帕特农神庙的浮雕相比,波格蒙人的巨人战役(gigantomachia)檐壁中刻画的人物表情和姿态更具表现力也更直接,而留给想象的空间有限。

69

希腊城市规划在希腊化时期达到最高水平。从中亚的艾哈努姆到安纳托利亚地中海沿岸的以弗所(Ephesos),新城邦展现了希波达姆斯式体系教科书般的匀称整齐。同时,希腊化时期城市的特别之处体现在其私人捐助的规模和影响上。这个时期的铭文显示,个人能够把城市看作是其私人封地。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来自萨摩斯名叫布尔加罗斯的人,有一段铭文列举褒奖了他对社会所做的善举,包括他在借给别人钱财方面的慷慨大度。铭文这样写道:"人们决定赞扬亚历克西斯(Alexis)之子布尔加罗斯(Boulgaros),因其杰出美德以及对公民的友善,所以在酒神节上授予他金冠。"[6] 而在平常生活中,城邦一如既往地扮演着以前的角色。事实上,市政机构在撰写铭文方面更加积极努力。正是萨摩斯的"公共机构"发布了嘉奖布尔加罗斯的政令。从基层治理的角度,亚历山大以及后来的继业者们认识到了保持城邦及其所属机构的价值。希腊化时期的国王们视城邦为实行自治的实体,总体上遵守着城邦与王室间关系的协议和安排。

因此,在希腊化时期,君主与城邦之间达成了一种调和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王自居为城市的解放者,作为回报,心存感激的城市给予国王神圣的荣耀以及公众纪念建筑。托勒密君主作为神圣的统治者,

以绝对权力统治着当地的埃及人，但是亚历山大城的公民们却拥有公民大会以及地方行政官，受到不同的待遇。后来的托勒密统治者废除了这些难以对付的公民机构，但是仍然依赖那些民众领袖来管理亚历山大城内部的事务。

后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 323 年去世。其后不久，希腊城邦寻求独立。亚历山大在马其顿的摄政王安提帕特（Antipater）在克兰农（Krannon）战役中击败了反叛的希腊人，但是他以及随后的继承者都没有能够统治马其顿以南的领土。马其顿也确实作为希腊化时期的一个主要王国出现，但是旧的城邦已经在保护其自身权益方面变得娴熟起来。事实上，希腊化时期的各个王国内部之间的互相争斗，更利于希腊人从中获取更多利益。在爱琴海，托勒密王朝处心积虑地制约马其顿的权力，并花费巨资支持那些城邦和联盟。事实上，马其顿的国王们总是在不停地争取和拉拢希腊人，给出的承诺是金钱和自由（eleutheria）。

70

在政治上，希腊最强大的实体当属那些同盟，尤其是埃托利亚同盟以及阿卡亚同盟。埃托利亚人是一个散居在希腊西部地区的族群，在古典时期并不引人注意。因为在解决公元前 280 年发生的高卢人入侵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从此以后便声名鹊起，随后成为城邦间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很快控制了希腊中部大部分地区。另外一个重要同盟就是伯罗奔尼撒北部的阿卡亚同盟。这两个同盟都是通过方言和血缘来维系，并在公元前 3 世纪将马其顿人成功逐出希腊南部：他们在锐意进取的西息温的阿拉托斯（Aratos，前 271—前 213 年在位）率领下，于公元前 243 年攻占了马其顿人驻守的重镇科林斯，接着在公元前 229 年驱逐了马其顿设在阿尔戈斯和雅典的驻军。

对于绝大多数城邦而言，独立的外交政策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也有例外，那就是罗得岛、雅典和斯巴达。作为拥有五个海港的大岛，罗得岛处于连接欧洲和地中海主要交通干道的理想地理位置。同时，作为主要的海上中心，罗得岛拥有雄厚财力来建造宏伟建筑，例如同是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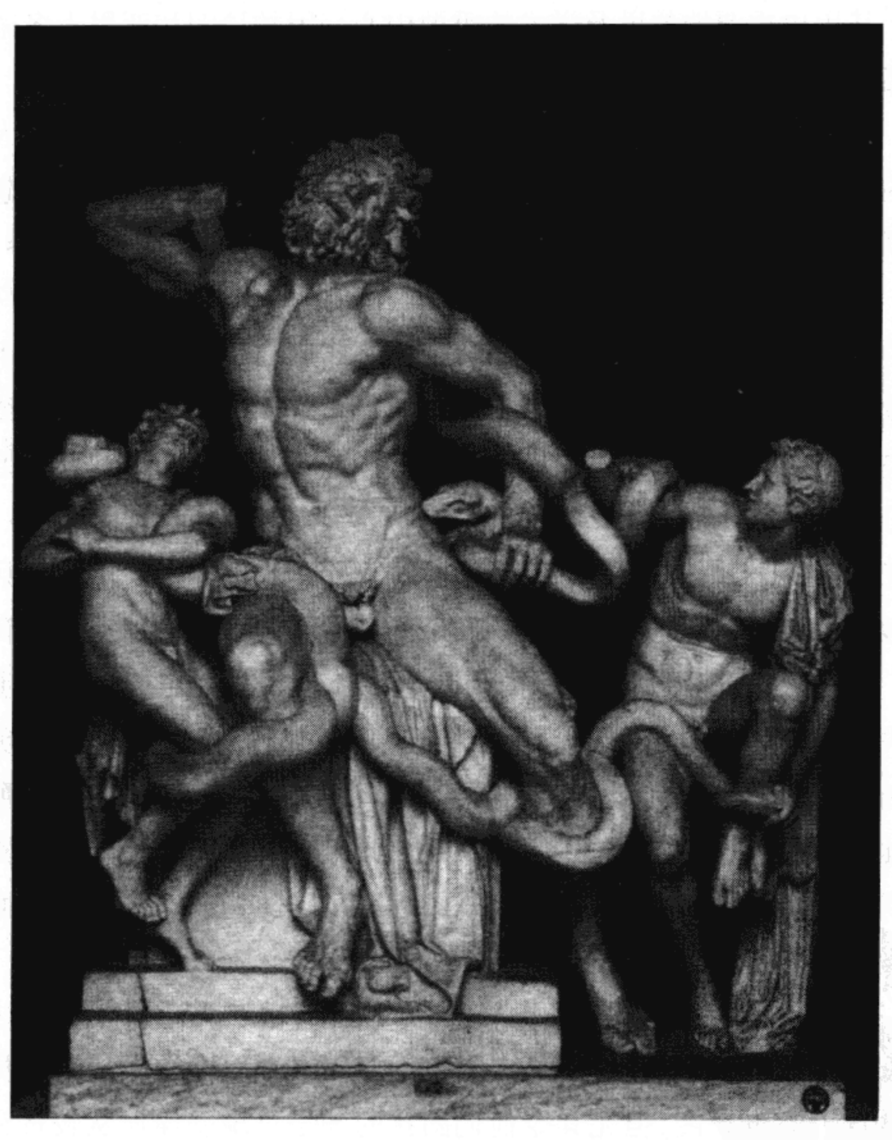
代七大奇迹之一的巨人雕像，同时拥有实力来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另一方面，雅典不再拥有海上强权，尽管它曾经两次设法领导(但都未成功)联盟来对抗马其顿：一次是前 323－前 322 年发生的拉米亚(Lamian)战争；另一次是前 268－前 262 年间的克里莫尼迪兹(Chremonidian)战争。在公元前 229 年，富足的雅典人通过贿赂马其顿驻军而解放了该城，此后再也没有考虑过对外征讨。相反，雅典人满足于其历史重要地位以及学术的重要中心。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闻名的学校持续其辉煌，一直到了古代晚期。

另一方面，斯巴达人在努力寻求恢复往日的荣光。在亚历山大时期的泛希腊东征中，斯巴达很明显被排斥在外，但其统治者依旧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重新扮演希腊事务中的霸主角色。阿瑞乌斯(Areus，前 309－前 265 年在位)在公元前 280 年召集了一个希腊联盟攻打马其顿，挑战埃托利亚人，并击退了公元前 272 年来自伊庇鲁斯的皮洛士的进攻。他在随后攻打一个马其顿堡垒时阵亡。到这个时期，斯巴达的公民的基数已经锐减至 700 人，而这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却占有了绝大部分土地。公元前 244 年，国王阿吉斯四世(前 244－前 241 年在位)设法通过解决土地危机，恢复了斯巴达军事力量。为了恢复招募士兵的基数，必须重新分配土地以及减免债务，还得重建旧式的斯巴达教育体系。然而，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也很激烈。在阿吉斯一次军事征讨失败而丧失颜面之后，他受到审判，最后被处死。15 年以后，克琉墨涅斯三世(前 235－前 222 年在位)于前 229－前 227 年间在伯罗奔尼撒北部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顺势成功实行了土地改革。克琉墨涅斯同时还重组了斯巴达政治体系，虽然名义上是要重建传统秩序，而实际上建立的是一套希腊化风格的独裁统治。

克琉墨涅斯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旨在重新建立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的主导地位。斯巴达在该地区的传统竞争对手极其警觉地看待这一复苏企图，但尤其令他们困扰的却是克琉墨涅斯从较贫穷的公民那里所获得的支持。土地的兼并在整个希腊南部都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对此不满的穷人希望克琉墨涅斯能够免除他们的债务。在

71

公元前 225 年，他占领了阿尔戈斯，随后一年又包围了科林斯。阿卡亚领导人阿拉托斯曾经比任何人都更不遗余力地试图消除马其顿人在希腊南部的影响，他这时才意识到相比较而言马其顿人并不是最邪恶的对手。在安提戈努斯三世的率领下，马其顿人和阿卡亚人于公元前 222 年在塞拉西亚(Selassia)击败了克琉墨涅斯。斯巴达遭到重创，克琉墨涅斯推行的激进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得以撤销。



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这座希腊化时期雕塑的罗马复制品，展示了希腊艺术朝着更富于表现力方向的演变，虽然这种表现手法更加微妙(Cortiledel Belvedere, Museo Pio Clementino, Vatican Museums)

希腊化时期对城邦内部事务造成哪些影响？马其顿的统治是否终结了内部冲突？对此疑问没有简短的回答。亚历山大死后，城邦之间的冲突再次成为常态，只不过这个时期的首要政治分歧在于是支持马其顿还是反对马其顿。同时，新时代出现的帝国开拓了绝大多数希腊人的眼界。菲利普和亚历山大推行的泛希腊主义，以及波斯帝国被泛希腊联盟征讨进而推翻这一事实，在希腊人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事实上，他们此刻赋予了泛希腊主义理想更多重要意义。在外交关系中，使节们经常会谈及希波战争以及温泉关、萨拉米斯岛和普拉提亚战役，这些战争已然成为泛希腊主义理想的重大历史参照事件。在希腊化时期，人们对泛希腊的节日庆典产生了更大兴趣，而研究市民历史的学者们，则忙于撰写那些能够证明自己家乡城邦具有希腊属性的乡土历史——整个公元前3世纪期间，学者们发现了800部这种历史著作的残本。希腊身份似乎已经变成了最重要的身份。

73

罗马的军事扩张（约前280—前269）

赫剌克利得斯·彭提科斯(Heraklides Pontikos)曾师从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而且(可能)提出了日心理论(以太阳为中心)，是古典希腊时期提到过罗马的少数几个作者之一：他把罗马比作一个希腊城市，或者认为它就是一个希腊城市。希腊化世界直到公元前280年才真正注意到罗马，也就是在他们袭击了意大利南部城邦塔拉斯(Taras)之后。其公民请求皮洛士给予军事援助。皮洛士是伊庇鲁斯巡回的统治者，也是希腊化时期唯一一个有兴趣向西部扩张的君主。皮洛士在两次战役中击败了罗马人：公元前280年在赫拉克利亚(Heraclea)，以及公元前281年在阿斯库路姆(Asculum)。只不过皮洛士在战斗中遭受的损失看上去有点惨重，由此就产生了一个习语“皮洛士式的胜利”，喻指以惨重的代价换取的得不偿失的胜利。

在公元前275年贝内温图姆(Beneventum)战役中，罗马人占据上风，此后皮洛士就永久放弃了意大利。我们至少可以推测出两个原因：作为罗马的执行机构，元老院不能接受战败的结局；另外，罗马手中握

有庞大的人力资源可供派遣;因此,罗马具有反败为胜的意愿以及实力。同所有希腊城邦不同,罗马城邦敞开大门吸纳别的民族。这种做法使得罗马得以扩张和壮大实力。及至公元前3世纪,通过命令那些盟国、受保护的城市以及被击败的敌人向罗马提供招募而来的士兵而不是贡品,罗马已经控制了意大利中部。通过人数上的优势以及坚定的意志,罗马人挺过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20—前201)。布匿战争所面对的对手是汉尼拔,古代最伟大的将军之一。尽管在特拉西梅诺湖(Trasimene,前217)和坎尼(Cannae,前216)两次遭到惨败,罗马人坚持到底,屡败屡战,终于在公元前201年取胜。在古代,罗马比任何国家都更有能力经历长期消耗战,从而最终获取战争的胜利。

为什么罗马人会来攻打希腊?回到公元前215年,马其顿的菲利普四世(公元前221至前179年在位)与汉尼拔构建了一个联盟,迫使罗马与菲利普的敌人结盟,其中包括波格蒙和埃托利亚。但是,罗马人在击败汉尼拔之前,并不准备与菲利普发生直接冲突。一旦击败了汉尼拔,罗马便迫不及待地团结尽可能多的希腊人。这支远征军的主帅弗拉米尼努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是一个讲希腊语的贵族,而且是有名的"亲希腊人士"。这一事实恐怕并非巧合。但是罗马最大的资产在于其军事优势。罗马"军团"作为一种步兵布阵,远比马其顿的作战法更加机动灵活。在公元前197年的库诺斯克法莱(Cynoscephalae)战役中,菲利普率领的方阵被引入一片崎岖不平的地势中,结果重装步兵阵脚大乱,在长矛武器之间暴露出了大片空隙。手持短剑的罗马军团士兵切断了菲利普方阵的防线,结果马其顿人惨遭屠杀。马其顿人在公元前168年的皮德纳(Pydna)战役中表现尚佳,但由于再一次误入崎岖地带,罗马人又大获全胜。马其顿的方阵突然之间被证明一无是处。

在随后的不到十年间,罗马一直是希腊地区毫无争议的霸主,到了公元前146年,马其顿已然沦落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同时,希腊原有的主要强权一个接一个被击败:先是公元前195年的斯巴达,接着公元前187年的埃托利亚同盟,最后公元前146年的阿卡亚同盟。罗马人

74

还证明自己实力要远远超过那些较远的东方希腊化帝国。公元前 190 年，塞琉古王朝的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Ⅲ，前 223－前 187 年在位)在希腊(温泉关)受到致命一击，接着在小亚细亚(马格尼西亚)再次遭遇挫败。突然之间，地中海在政治上已然成为一个单极世界。罗马元老院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当安条克四世(前 175－前 164 年在位)试图在公元前 168 年吞并埃及时，因从一个元老院特使那里得到简单而明确的警告，不得不放弃了全部远征计划。

关于干涉希腊的动机，学者们的观点仍然有很大分歧：在库诺斯克法莱之后，为何罗马如此坚决地要来维持纷争不断的希腊人之间的秩序？罗马的所作所为在多大程度上没有违背其最初所表明的意图？无论别有用意还是纯属巧合，罗马对于希腊的统治大约在公元前 2 世纪中叶时完全实现。罗马的统治地位为何未曾引起“泛希腊”地区的反抗，就如同在公元前 479 年击退薛西斯那样？一个解释是，罗马，至少在最初阶段，卷入希腊城邦间政治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希腊城邦间的问题。因此，弗拉米尼努斯的军团在公元前 197 年有效解除了马其顿对希腊世界的统治。在其后一年的地峡运动会(Isthmian Games)上，他声明希腊人获得了“自由”，罗马没有必要驻军，也不会对希腊人征收贡品(波利比阿，18.46)。在公元前 194 年罗马军队从希腊撤军之前，他还花了大量时间解决希腊人之间的冲突。但是，事实很快就变得很明朗，即罗马人关于自由的概念是有条件的；它坚决不允许任何希腊城邦实施任何令罗马元老院不满的外交政策。后来，当希腊城邦违背了罗马认可的协议，或者当有些强权比如斯巴达或埃托利亚威胁到其他希腊人的独立时，罗马就会实施干涉。

75

正如波利比阿(Polybios)指出的那样，罗马卷入了希腊政治的体系中。罗马控制东方的过程是缓慢而不可抗拒的。同时，罗马实施的惩罚确实是很严厉的。公元前 149 年，在罗马元老院的一个委员会就有争议的相关问题作出裁决之前，阿卡亚同盟就对斯巴达采取了行动。元老院随后实施报复，命令一些城邦从同盟中撤出，该举措引发了一场战争。因为科林斯人被认为是最难驾驭的同盟成员，所以尽管事实上

该城邦没有抵抗就归顺了罗马大军,它还是在公元前146年被洗劫一空,全体居民要么被屠杀,要么被贩卖为奴。在随后的公元前88年,希腊有些城邦因为支持米特拉达提(Mithradates)与罗马开战而被罗马洗劫烧杀。其中许多城市经历数代人的努力,才恢复元气。

被迫向罗马统治屈服的最后一块希腊领土是克里特岛。公元前69年,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Caecilius Metellus),后来称作克里提库斯(Creticus),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之后,终于夺取了该岛。直至公元前27年,在奥古斯都·凯撒统治时期,希腊才正式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罗马霸权:从共和国到帝国

阿卡亚贵族波利比阿是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可以媲美修昔底德,因其参加了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前171—前168)及所扮演的角色而被扣为人质,虽然“人质”一词并不恰当:被囚罗马期间,他都是以客人身份借住在贵族家中。在此期间,他同西庇阿家族(Scipiones)非常熟悉,这是对希腊文化和政治事务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非常有权势的贵族家庭。波利比阿开始对罗马社会及其政治体系变得非常敬仰,在其所著的概念复杂或者“具实用主义”的《历史》(大部分内容流传至今)一书中,他向他的希腊读者们解释了罗马得以统治希腊世界的原因。他的《历史》包括对罗马政治和军事体系的分析,揭示了罗马如何在其各社会阶层的不同利益之间达致平衡。

76

对于希腊社会,波利比阿明辨出其存在的根本性弱点:

>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期,整个希腊都面临着儿童的匮乏以及总人口的下降,其结果是一些城市开始荒芜,农业耕作水平已经萎缩。(36.17)[7]

他接下来指出,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在于希腊人自身,因为“男子们被膨胀了的抱负拖累,追逐财富,又好逸恶劳,结果都不愿成婚”。

波利比阿忽视了一点,也是造成罗马统治早期的希腊悲哀的最显

著原因，即其帝国式的贪婪。如果说罗马最初的动机是出于安全的需要，那么其对东方事务干涉的永久动力则是追求经济利益。经掠夺、赔偿以及进贡而来的财富使得统治阶层变得非常富有，其中一些财富还通过各种形式的资助流向中低阶层。随着罗马军团在东方的扩张掠夺，财富如潮水般涌入罗马。例如，公元前187年打败埃托利亚后，罗马人卷走了大约4万公斤银子、110公斤黄金、785座铜像以及30座大理石塑像。在许多古代以及现代的历史学家看来，贪婪掠夺是共和时代的罗马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

另外一个问题是罗马在希腊的军事行动所带来的破坏，交战的将军们强征了数额庞大的当地资源，空留下像雅典这样的大城市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例如凯撒和庞培之间的战争(前49－前45，在色萨利的法塞拉斯决定了最终的胜负)就属于这种实例。罗马政治家西塞罗(Cicero)当时一度怀疑究竟希腊的哪块领土能够幸免战火的摧残。随后发生在凯撒遇刺和安东尼自杀之间的一系列事件更是一段悲惨的经历。双方阵营都对罗得岛和安纳托利亚的城邦烧杀抢掠。冲突结束之后，又不得不为30个军团的安置买单，还要负担对帕提亚人重新开战的费用。

正是由于经济上巨额的掠夺以及这种持续的征税，造成了希腊城邦的最大困扰。对于定期有节制的征税，这些城邦已然习惯，是那些税务官(publicani)使情况变糟，因为他们事实上手握随意勒索的权力。税务官在罗马政治中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集团，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人们知道元老们参与征税集团的分成，而将军们在对外征战时通常要串通好这些税务负责人。如果总督一心只为谋求自己的发财致富，那些名为“行省”的领土上人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差。地方被勒索的司法案例中，最著名的当属西塞罗控诉盖尤斯·维瑞斯(Gaius Verres，前70)，后者对西西里的侵吞掠夺如此严重，以至于西西里无法延续其罗马主要谷物产地的地位，影响到了当地的正常生产。历史学家塔西佗指出，在共和时期，各个行省都受到搜刮掠夺，“各个列强互相争斗，(原因)是地方行政官的贪婪。法律也无法提供帮助，因为在暴

力、偏袒和最常见的贿赂面前，法律受到了歪曲和滥用”（编年史，1.1－2）[8]。

在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人开始面对帝国管理的权责问题。腐败的总督和税务官更加频繁地受到起诉追究，而征服者像庞培和凯撒也建立起了帝国行政管理的框架，赢得了威望。因此在这个世纪60年代，庞培在摧毁了塞琉古的君主制后，开始在管理近东地区事务上发挥重要作用；凯撒则在这个世纪的40年代担任独裁官，通过在元老院引进非罗马人而进一步强化巩固了帝国管理的根基。其后，凯撒的继业者们因为拥有专制权力，从而能够更加井然有序地解决地方事务。到了公元1世纪，地方各行省不再被视为摇钱树，不再出钱补贴罗马城的巨额开支。此时的皇帝们开始从全局角度出发治理帝国。

城邦和希腊主义在皇帝统治时期重新找到了用武之地。从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凯撒（前31－14年在位）开始，整个地中海世界就开始享受到强加的和平所带来的好处，即所谓的“罗马和平时期”（Pax Romana）。此时的军事征战仅限于边界地区，战争对于绝大多数臣民来说，已经变成了黯淡而遥远的记忆，其中包括希腊人，他们也被迫停止内部争斗。从事行政管理的贵族阶层现在被要求按照有序而高效的标准做事，并受到总督的监管。总督们则经常就地方事务认真地向罗马汇报。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个现实是，不得不首先剥夺这些希腊城邦的政治自由，然后才能发挥其维护行政秩序的全部潜能。

第四章　希腊罗马帝国(一)(前27－527)：从罗马和平时期到古代晚期

78

科尔涅利乌斯·苏拉(Cornelius Sulla)带给雅典人一个永远难以忘却的教训。公元前88年，雅典支持本都的米特拉达提（前120－前63)，他是最后一个勇于挑战罗马强权的希腊化时期的国王，也是在小亚细亚大规模屠杀罗马人和意大利人的罪魁祸首。这座"提秀斯之城"以前也曾对罗马表现过不忠诚，却都轻易避免了后果和惩罚，但这次面对的是当时最严酷无情的罗马人的愤怒，而且这个罗马人对希腊的事和人本来也不是特别喜欢。据传记作家普鲁塔克(50－120)记载，苏拉先是围城，接着用饥饿来惩罚雅典人，最后听任自己的士兵烧杀劫掠已经挨饿至奄奄一息的雅典人："直到今天，雅典人的死亡人数也只能以鲜血染红的大地面积来估算…… 许多人都说鲜血涌出城门，一路冲刷，染红了郊区。"(苏拉，14)[1]

但是，经过了几代人后，征服者和臣民的关系会发生变化。历史遗留的悲情在希腊贵族中还在延续，但总的来说雅典人和地中海地区绝大多数民族都慢慢意识到，罗马帝国的存在是件好事情。演说家普布利乌斯·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德斯(Publius Aelius Aristides，117－约181)，可能也是当时最有名的希腊人，于公元143年在其著名的"致罗马的演讲"中，对这种情绪做了最明确的阐述：

> 你们丈量和记载了整个文明世界的每一块领土；你们横跨河流，架设各种桥梁，穿山越岭，开辟通天大道，在人迹罕至之处布满驿站；你们统合各地习俗，达致安定有序的生活方式……虽然雅典公民开创了今天之文明生活，但这种生活由你们而稳固确立，人们都说，你们起步虽晚，却更优更强。(102)[2]

79

这是最好的时代，他盛赞罗马和平时期提供了最理想的条件，使得人们可以安享文明的“生活方式”。阿里斯提德斯是这波希腊学术复兴中的一个杰出人物，该复兴被称为“第二次智者运动”(Second Sophistic，约 60－230)，在此期间，罗马帝国的大多数重大文艺作品都产生于希腊。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阿里斯提德斯在强烈认同自己罗马人身份的同时，还能够极端珍视自己的希腊人归属感。

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历史，是更长的文化融合历史中的一部分。从最初默默无闻的一个拉丁语城邦，及至逐渐征服整个地中海流域，罗马持续不断地与希腊世界保持着接触，这种关系一直被视为彼此共生互利的模式：类似于大脑和肌肉的联姻，又像是文化和强权的联姻。对此，最近的学术界已经找到一种更复杂的解读图示，但无须争辩的一点即是，罗马帝国作为在西方文明史上最源远流长、文化影响也最深远的一个政权，同时也是“希腊”罗马帝国。

希腊迷恋(Graecomania)的起源

为何罗马人如此融入希腊文化？为什么他们允许希腊主义在罗马世界成为文化融合的根基？同其他意大利民族一样，罗马人在公元前 507 年建立共和国之前，就已经非常了解希腊文化。考古发现提供了希腊艺术、宗教和文艺所造成的影响的大量证据。谈及贵族式的生活方式时，意大利的贵族们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那里获得了诸多启示。到了希腊化时代，罗马贵族已经把希腊语作为教育用语。罗马贵族都必须精通希腊语，熟读希腊古典文献。公元前 3 世纪 80 年代，伊庇鲁斯的皮洛士(Pyrrhus)在接待罗马使者时，讲的是希腊语；波斯图米乌

斯·梅格鲁斯(L. Postumius Megellus)的希腊语太差，以至于激怒了听众，听众向他投掷粪便以示抗议。到了公元前 3 世纪末，当罗马军团首次踏足希腊土地时，罗马作家已经在用希腊语编写历史了，剧作家像尼维乌斯(Naevius)早就在为罗马观众改编希腊戏剧了。弗拉米尼努斯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前 200—前 197)中曾击败了菲利普五世，他就精通希腊语，可以使用希腊语进行内容复杂的谈判。

80

罗马人对希腊主义尊敬仰慕最明显的证据，是他们决心通过神话来建立起与希腊的血缘纽带。埃涅阿斯(Aeneas)是幸存下来的特洛伊王子，他往西逃亡，试图另辟新的领土以求东山再起。他的传奇被加以改编，成为罗马神话的基础。从公元前 3 世纪末的历史学家法比乌斯·皮克托(Fabius Pictor)的记载中，我们得知埃涅阿斯遇到一个名为伊范德(Evander)的伯罗奔尼撒国王，此人正在寻求建立一个新的领地，据说还把字母表介绍给了拉丁姆平原各民族。该传奇成为经典，其不可撼动的故事结构在维吉尔(Virgil)的史诗《埃涅伊德》(*The Aeneid*，作于公元前 1 世纪末的某个时期)中得以巩固确立。

罗马社会对于其他文化兼容并蓄，特别是来自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和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的影响，但是希腊文化作为一种地中海的高端时尚而格外受宠。随着帝国的壮大以及同希腊化世界的日益亲近，罗马人的兴趣转变成一种希腊迷恋(graecomania)，至少在主要的政治家和坚定的传统主义者老加图(Cato the Elder，前 234—前 149)看来是这样。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加图痛斥其他贵族，认为他们太轻易就摒弃了自己更完善的本土传统和道德体系。而正是这些罗马贵族们对希腊的生活方式情有独钟，其中包括裸浴和体育。在加图所作的最猛烈的抨击中，所有与希腊有关的都是其攻击的对象，他声称希腊人本性恶毒，希腊文学浅薄，只配略读。可以说是加图创立了拉丁语的散文体文学，企图借此反击希腊文学的垄断地位。

事实上，罗马贵族阶层非常敬仰希腊古典传统。在帝国的都城，到处都有来自希腊的哲学家、医生和教育者，其中许多是奴隶和人质，但他们所提供的服务都很受欢迎。都城里还充斥着希腊的艺术品，许多

由劫掠而来，也有大量的本土复制艺术品。希腊的艺术品和艺术家启发了罗马外部环境的希腊化，例如在建筑、雕塑以及圆柱(特别是科林斯柱式)等诸多方面。

81

随着贵族阶层日益意识到其自身作为地中海地区统治者的角色，掌握希腊主义甚至与其展开竞争，就越来越展现出其必要性，尤其是在维持对东方的帝国统治方面。并且，为了表现出统治阶层的表象特征，罗马人必须适应他们所见到的希腊化时期的政权体系。在重新建构的政治和文化秩序中，奥古斯都就尽可能提升拉丁语和拉丁语文学的地位，使其达至最崇高的层次，而希腊语和希腊经典作品则为其提供了衡量标准。诗人贺拉斯(Horace)就鼓励剧作家们从希腊经典作品中寻找灵感，而不是从较早期的拉丁语剧作家如普劳图斯(Plautus)那里。罗马城，作为世界之都，不得不与亚历山大城或安条克展开竞争。奥古斯都在指出他“发现罗马就是一座泥砖垒就的城市，需要用大理石将其装饰一番”时，可能言过其实，但罗马城确实需要在城市宏伟方面与亚历山大城一争高下。

自从罗马人开始在东方确立主导地位以来，希腊和罗马之间的互补关系就常被津津乐道。这种关系通常被定位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强权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之间的联姻。贺拉斯对此做出了最简练的阐述：“被俘获的希腊，将文化上野蛮的征服者俘获，把艺术传播至乡野土气的拉丁姆。”(《书信》，2.1.156)[3] 当然，这种和谐的观点掩饰了其中的矛盾冲突，这一点可以从对贺拉斯著作字里行间的解读中体会出来。毕竟，即使是婚姻关系也承载着诸多紧张冲突。希腊，作为被俘获的女性角色，通过小伎俩和耍花招，也俘获了擅长攻城拔寨的淳朴武士。罗马人把希腊人视为高雅文化和学术方面的权威，但同时也对其颓废和军事柔弱嗤之以鼻。贺拉斯在别处也曾提出警告，指出过于希腊化会导致柔弱无力的后果。

希腊主义如此强大，以至于罗马人不得不注意文化间的界限。在共和时期(前507－前31)以及整个公元1世纪，亲希腊的罗马人对自己不属于希腊人这一事实坚信不疑。《埃涅伊德》受到了责难。加图、

西塞罗和贺拉斯都告诫同胞,莫要忘记那些赋予罗马统治世界以力量的传统及美德。希腊人毕竟地位低下:他们通常被称作“希腊佬”(Graeculi,地位低下的希腊人)。希腊文化得以保留,但同时也被视为一种征服的权利,这样希腊文化就理应来强化罗马文化,而不是要取代罗马文化。西塞罗更是进一步认为罗马人在学习方面拥有更高的天资才智,一旦从事哲学和演讲术,他们会比希腊人更杰出。

但是大体而言,希腊主义和罗马特性被当作是互相补充的美德。奥古斯都时期最伟大的诗人维吉尔在其对埃涅阿斯传奇所作的经典性重述中,概括了两者之间的互相依赖性:

其他民族会更加惟妙惟肖地以青铜　　82
铸造活灵活现的人物,我坚信,
抑或打造出更加生动的大理石人像;
也会雄辩,会利用指针
来精确探索天路
以及精准预知星辰的升起。
罗马人则处心积虑为了统治
世上各民族——因为这些也可谓艺术:
平定天下,实施法治,
宽恕被征服者,桀骜不驯者予以剿灭。[4]

治权(Imperium)和“和平的甜蜜”

以上引文还提到了帝国的使命。在维吉尔之前,已经有过一些论述提到了对臣民的道德义务,以及赋予其文明(humanitas);但正是维吉尔的资助人奥古斯都首先在行省治理中引入了一种道德责任感。对于维吉尔而言,治权是“用来灌输和平时期习惯”(《埃涅伊德》,6.852)的一种方式,从而将臣民纳入维吉尔的同代人所称的“共同的祖国”之中。在罗马和平时期,臣民们开始习惯帝国统治,开始将整个帝国视为共同的祖国。希腊人和其他各省民众开始逐渐欣赏罗马治权的优点,

或者至少表示接受。也有极少例外，如公元66年和132至135年间犹太人的叛乱；否则，除了在边疆设要塞驻军以外，帝国统治者看不到在各城市或各行省之内驻军的理由。

在希腊东部，罗马的内战带来了巨大破坏，罗马和平时期在此具有实际意义。战争结束以后，"笑到最后"的屋大维·凯撒决心"用和平的甜蜜"引诱每个人。保护已经被征服的臣民，使其免受某些个虎视眈眈的罗马人的侵害，是屋大维改革行省制度的一个目标。在公元前27年，希腊本土被设为一个行省，称作"阿卡亚"(Achaea)，而希腊北部的城邦和地区被分别划入伊庇鲁斯和马其顿两个行省。再往东的那些城邦被归入其他一些行省，包括小亚细亚和比提尼亚(Bithynia)。各行省之间的边界后来经历多次重新划定，但行省治理的方法却有既定的模式。这时的官员都属于皇帝的代理人，其角色和职权都有明确限定，83 在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方面可发挥的余地有限。罗马非常高调地公开惩处了一批官员，凸显了奥古斯都及其继任者提比略(Tiberius)在解决行省弊政方面的严肃态度。罗马在处理来自希腊城邦的请愿方面更加认真有效。在授权审判了一些失职违规的总督以后，提比略在小亚细亚行省的威望和支持率都相当高。该行省的长者们感恩戴德，竞相为其建庙，歌颂其功德。

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仍然是一个由城邦组成的世界。雅典、阿尔戈斯和底比斯运作的方式大体上与过去并无不同。传统的宪政体制已经做了修改，以期适应罗马人对于寡头统治的偏好，但是一年一期的地方行政官制度和公民大会制度都得以保留。雅典公民继续享有令人羡慕、得到保障的权利。城邦还在颁布自己的法律，还在发行各自的硬币——在希腊东部有530个城市自己铸造各自的硬币，也还将各自征收的税收用于各自的市政服务。城邦之间的外交安排仍然保留，而与罗马的关系则通过协议安排确定。在帝国早期，许多城邦名义上仍然是"自由"的：如有必要，甚至可以向罗马派遣"大使"。例如在公元239年，在重新爆发的内战和王室混乱时期，皇帝戈尔迪安三世(Gordian Ⅲ)就曾就阿弗洛底西亚(Aphrodisias，在小亚细亚)的地位问题，回应

来自阿弗洛底西亚的使节：

> 你刚才递给我的政令上声称要归属我的统治，这与你们城市的古老地位以及对罗马人表示的善意和友情是极其适当的。礼尚往来……我保证维持你们在我开始执政时就一直享有的所有权利。[5]

皇帝们发现维持城邦自治的表象非常有利，因为帝国统治需要依靠这些政务上自我管理、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城市。地方上的贵族深感筹措资金、管理城市事务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就有利于皇帝追逐自己的利益和实现自身的抱负。图拉真(Trajan)和属下认真负责的比提尼亚总督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63－113)之间来往的书信，就揭示了皇帝对于哪怕是最琐碎的小事也做到了事必躬亲。例如：

> 普林尼致图拉真：陛下，普鲁萨(Prusa)的公共浴室年久失修，破烂不堪，民众热切盼望将其重建一新。在下认为您批准其恳请为宜……
>
> 图拉真致普林尼：如若建造普鲁萨的新浴室于该市财政无大碍，我们无理由不批准此恳请；前提是无需征收新的税赋，亦不会分流其既定重要服务所需之资金。(普林尼，《书信篇》，x23，24)[6]

84

皇帝统治下的城邦

普林尼的信件是了解早期帝国统治下希腊城邦历史的重要途径。但这一时期是怎样的一段历史？修昔底德和波利比阿对这种过分拘泥于细枝末节的方法不屑一顾，他们眼里的历史就是研究政治和国家。对帝国时期的希腊人而言，历史是他们阅读而来的，并非亲身经历所得。这个时期创造历史的主角是罗马人，因此这时希腊的历史学家，像阿利安(约86－146)、阿庇安(约95－165)以及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约 155—229)要么撰写希腊的辉煌过去和罗马的兴起,要么撰写那些皇帝。罗马和平时期的希腊名人包括像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德斯这样的演说家盖伦(Galen,129—约 200)这样的科学家、雅典的克劳狄乌斯·希罗德斯·阿提库斯(Claudius Herodes Atticus,约101—177)这样的富商,这些人根本就不可能引起修昔底德和波利比阿的注意而进入其编写的历史著作中。

在希腊历史上,罗马和平时期并非多事之秋,这也更加证实了阿里斯提德斯在其"致罗马的演讲"中所提出的观点,即当时其实是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公民活力和文化生机充分张扬的时代,尤其是在小亚细亚,阿里斯提德斯在此度过了整个一生。在希腊本土,共和制使城市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有所缩减后,因而也在经历一个重新调整的阶段。在帝国时期,出现了新的"希腊"城市,包括帕特雷(Patrae,帕特拉斯)、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埃迪尔内)和伊康(Iconium,科尼亚),还有许多以皇帝命名的城市,例如太巴列(Tiberials)和克劳狄奥波利斯(Claudiopolis)。

正如普林尼在《书信篇》中所证实的那样,每个城邦都必须独立且负责地运作。在被问及阿米索斯(Amissos)是否应该建设一个互惠互利的社会时,图拉真对普林尼提出了如下深刻见解:

> 在你来信中提出了阿米索斯(Amissos)公民们的诉求,如果根据他们自己的法律,通过正式的协议,获得了构建互惠社会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进行干预:尤其是在他们所获的资金并非用于叛乱结社的前提下。(《书信篇》,x93)[7]

85

同时,城市贵族们必须出资兴建浴池、水渠、举办节日庆典以及许多其他事项。有些希腊贵族个人可以出资供养整个城邦,还有些贵族甚至能够同其他城邦分享自己的财富。雅典人克劳狄乌斯·希罗德斯·阿提库斯在科林斯、特洛伊和温泉关都捐资兴建了公共建筑。对雅典人民,他留下来一座举办泛雅典娜运动会的体育场。还在卫城南

面兴建了一个剧院(希罗狄昂)。

在更世俗的层面上,贵族们还要履行“祭祀仪式”或公民职责。帝国对其市民领导层要求很高,并对那些逃避责任的领导处以严厉惩罚。因此,不断有人请求免除职责,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德斯就经常称病以求解除肩负的责任。总之,市政责任是相当繁重的。如下一段铭文节选来自卡林多亚(Kalindoia,马其顿),时间是公元148年,从中可见一斑:

> 克提莫斯的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os of Kertimos)之子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os),为人正直,堪称楷模,同时担任宙斯、罗马和神之子凯撒奥古斯都的祭司之职,展示出至高品质,不负其祖先名望以及自身美名,毫不吝啬地奉献诸神和资助家乡城市,自己全年出资提供祭品,按月由其城市供给宙斯和凯撒奥古斯都;同时,他还对诸神表达各种敬意,出资供公民们豪奢聚餐、尽情娱乐,宴请全城市民,有时全体参加,有时成群结伙,为了生活丰富夺目,在节日组织队列表演,还兴办声势浩大的各类竞赛,向宙斯和凯撒奥古斯都表示敬意……他不但出手大方,还自己出资兴建一座凯撒雕塑,以此永久缅怀奥古斯都对全人类所做之善举。[8]

那么阿波罗尼奥斯们得到了怎样的回馈?较早时期,西塞罗将类似阿波罗尼奥斯的一类人称作“最好的公民”(optimates),是理应得到罗马帝国特殊保护的。希腊贵族们享有法律特权,例如免受肉体的惩罚,而且通常会因其贡献而被授予罗马公民身份。罗马帝国同时保证每个城邦都由这类公民掌控。民主宪政体制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图拉真的继任者哈德良(Hadrian)通过赋予战神山议事会(Aeropagus)更大的权力,强化了有产者的地位,使得雅典重新回到了民主之前的宪政体制。

上述的铭文明确指出了,城市的地位关键取决于每个城市与皇帝的关系。城市之间竞相争取皇帝的垂青。演说家和哲学家狄奥·克里

86

索斯托(Dio Chrysostom,40/50—110)曾对其比提尼亚的同胞讲道,作为城邦已然没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了:

> 你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对于一个城市的荣耀、一个民族的尊严和该城市在访客和总督们中的口碑而言,这一切都自然而然会因为该城市内的建筑物、节日庆典、其公民免于司法审查以及并非如同"村庄"一样拥挤在一起,而得到很大的提升。(《演讲集》,40.10)[9]

要想得到承认、享有城邦的荣耀,先得符合一定的标准。人口数量的规模和特定的公共设施,比如剧场和公共浴池,这些是基本要求。作为大型宗教中心或能够兴办万众敬仰的庆典,对于希腊城市而言意义重大。像雅典这样的城市有资格吃老本,或者享有作为行省首府而带来的荣耀。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城邦基本上都在彼此竞争,以期获得象征性的首府地位,包括类似"第一城"或"大都市"这样的头衔。这种情形下,皇帝的垂青意味着一切。小亚细亚的城邦属于希腊世界里最富有的地区,人们感觉它们在争取皇帝的垂青方面是最不遗余力的。因此到公元 1 世纪末时,在小亚细亚至少有 34 个皇帝受到顶礼膜拜。地方统治阶层和互相竞争的城市之间毫无节制的你追我赶经常导致无限制的、不负责任的庞大开支,因而促使皇帝不时下令强制实行严格的预算开支措施。同样原因,哈德良的继任者安东尼努斯·皮乌斯(138—161 年在位)下令限制每座城市任命学校里教授的名额。

东地中海世界的城邦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希腊特征"?值得一提的城市都具有标准的城邦特征,例如希波达姆斯式城市规划、公民大会、剧院、体育馆、市场以及柱廊,但绝不意味着只有希腊城市才具备这些特征。在黎凡特,尤其是在埃及,我们发现城邦具有多种文化影响的交汇融合。例如,在叙利亚南部的伯斯楚恩(Bostrain),每年的节日期间都会举办希腊运动会,目的却是为了纪念当地的神灵杜萨莱斯(Dusares)。在不远的巴尔米拉(Palmyra),最重要的宗教圣地是贝尔

神庙(Temple of Bel)，虽然神庙本身带有浓烈的希腊和罗马特色，却是为了献给非希腊的神。罗马的影响也很深远，尤其是在道路和排水设施、沟渠建造以及水泥使用方面。罗马浴室，带有独特的加热系统和累进式的加热空间，是希腊城邦最显著的一个特征。这种浴室取代了此前相对简单的浴室，虽然它在希腊世界通常仅是希腊体育馆的一个配套设施。希腊以东地区还热爱角斗士比赛，尽管从事这种活动的场地是经过改造的希腊剧场，而非罗马圆形露天竞技场，后者在东方地区修建数量极少。

活着的博物馆：雅典、斯巴达和爱琴海世界

希腊本土情形如何？进入公元1世纪后，希腊人仍然在经受人口减少之累，这也是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具体表现。在当时的人们眼里，人口减少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希腊已经陷入停滞不前的地步。狄奥·克里索斯托曾听过一位土地拥有者抱怨他们"超过三分之二的土地都变得荒芜，原因是人口减少和疏于打理"：

> 我自己就拥有大片土地，我想许多人同我一样，土地不仅分布在山丘地带，而且还在平原地区。如果有人愿意耕种这些土地，我不仅会免费提供此类机会，还会非常乐意付钱给他。(《演讲集》，7.34)[10]

然而，仔细研究最新的考古数据，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更加积极的结论。考古发现证实了农村的人口确实在减少，但迁出去的人口流向了新兴城市，像伊庇鲁斯的尼科波利斯(Nicopolis)，该城由奥古斯都为了纪念在亚克兴(Actium)附近击败马克·安东尼而建。像玻俄提亚全区的人口都显著减少，但阿卡亚一直保持着帝国内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位。人口减少还可能是因为畜牧业更加有利可图，尤其是绵羊和山羊的放牧，另外，也可能是由于在罗马征服之前就出现的大规模地产的发展。地方上的那些显要人士拥有"大片土地"，同时抱怨人口减少带来

的种种弊端，其中包括狄奥·克里索斯托本人，他们都可能是这些问题的始作俑者。

同现代希腊一样，罗马统治下的希腊也在利用其历史资源。雅典和斯巴达尤其具有优势，可以充分利用罗马人的亲希腊情结，以及那些来自东方希腊城市游客的兴趣。这个阶段的斯巴达，已然在各个方面都同其他任何一个希腊城市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其居民不得不重新展示其历史，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斯巴达人建造了一系列历史建筑物，来纪念无与伦比的军事史，例如，波斯柱廊就是利用普拉提亚战争中所获的战利品建成的。罗马统治下的斯巴达值得一览的地方如此之多，以至于在波桑尼阿斯对斯巴达城的描述中，限于篇幅不得不将介绍的范围限于推介最重要的景观。斯巴达变成了一座鲜活的博物馆。在公元前 21 年对斯巴达的一次访问中，奥古斯都通过吃素餐表达自己对斯巴达辉煌过去的敬意。及至公元前 1 世纪末，游客们得以有幸重新体验来库古教育体系，包括斯巴达严厉的训练方法和近乎残忍的惩罚措施。斯巴达甚至一度想方设法重新使用多利亚方言。

88

出于众多原因，雅典仍然是游客最主要的目的地。年轻的罗马和希腊贵族们仍在源源不断、不辞劳苦地来到雅典，进入当地著名的学堂学习，包括学园和吕克昂，而那些来去匆匆的游人只为一睹雅典城的风景名胜。罗马时代雅典的中心地带挤满了各种新建筑，许多古典时代的建筑如今都被那些极度欣赏雅典的希腊化和罗马时代的捐赠者所建造的建筑所掩盖。从罗马人对雅典的慷慨大方、出手阔绰上，可见罗马对于雅典的尊敬。奥古斯都的女婿，马尔库斯·阿格里帕(Marcus Agrippa)负责修建了一座可以容纳上千观众的大礼堂(Odeion)。奥古斯都本人亲自监督建造了新市场，而哈德良皇帝则慷慨资助了城内数座规模宏大的建筑物，包括宏伟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以及哈德良图书馆。

对于罗马人爱好希腊的这片心意，希腊人当然会在需要时加以利用。在追求特权、对付城邦竞争对手以及寻求减免罚款和其他形式的惩罚时，城邦的代表通常会引用对己有利的神话和历史，即使这种典故

与所面对的事例毫无关联。皇帝们通常以一个城市在历史和神话上的重要性，以及该城以往与罗马的关系，来评价该城市的价值。例如，特洛伊作为埃涅阿斯的城市，经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批准获得了免税的特权。拥有辉煌的历史未必保证能够成功，但确实于成功有益。那些在荷马史诗和神话中被一笔带过的最不起眼的族群，或者曾经参加过希波战争，都可能享受到优厚的待遇。如此一来，历史悠久的城邦就比那些较新的城邦占有先机。

公元 2 世纪的希腊特征

89

罗马人对于希腊文化的兴趣总是带有条件的，但在帝国时期则受到更少制约。在第一个皇朝——朱力欧－克劳迪安王朝(Julio-Claudians，前 31－68)时期，罗马人还相信存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来讲希腊语、穿希腊服饰。对一个人在公共场合以及私人空间里的言行，罗马礼仪有严格的要求。希腊语和希腊习俗在论坛或正式场合是不允许使用的，这些场合要求传统的罗马服饰和礼节。尼禄对于希腊的狂热喜好被认为是其性格颓废的征兆。而数十年后，凡希腊之事物皆加以推崇，这种做法却变成了一种美德。可以说哈德良(117－138 年在位)皇帝就对希腊很狂热。他位于提沃利(Tivoli)的别墅里到处都是希腊艺术复制品，也是他开创了蓄胡须的希腊传统。

事实上，在哈德良统治时期，希腊语超越拉丁语，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文艺品味和创作方面，拉丁语不再有竞争力。罗马人实际上偏爱的是希腊神话，他们模仿了希腊人安葬逝者的方式，就是以带有雕刻的棺材(sarcophagi)安放逝者。这些发展与其说凸显了罗马帝国的希腊化，还不如说是形成了一种更加多元融合的帝国文化，其中希腊主义扮演着难以磨灭的角色。在哈德良统治时期，多重身份认同变得普遍平常。皇帝本人出生时是西班牙人，罗马人的身份是必然需要，而希腊身份的认同却是心甘情愿。大学者琉善(Lucian，约 120－180)的母语是阿拉姆语，著书立说则使用希腊语，同时还认为自己是罗马人：他真诚地将罗马士兵称为“我们的”士兵。同时，希腊族裔在罗马帝国体

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普鲁塔克就曾担任要职，而希罗德斯·阿提库斯是元老院的议员。历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也是元老院的议员，后来担任过执政官，还在小亚细亚、非洲和巴尔干做过好几次总督。

因此，到了公元2世纪末，帝国的臣民们开始逐渐认同罗马帝国，但在这个帝国里，希腊人被赋予了特殊地位。公元131年，哈德良完成了他作为一个亲希腊者的最突出的举措，即负责创立了泛希腊联盟(Panhellenion)——一个囊括希腊各个较著名城市的联盟。其目的似乎是为了促进希腊文化发展以及希腊内部的文化交流。尽管我们没有明确证据考证其真实意图，有一点我们却很清楚，即其成员有着严格限制。除了极个别例外，仅仅那些能够从家系上追溯至早期古代希腊的城市和族群，才有资格成为联盟成员。

92

很显然，族系或家系在公元2世纪时对希腊人还很重要，但同样明确的一点是，这时候人们可以选择"成为"希腊人。拿琉善来说，他可以说比任何人都更具"希腊属性"，但却出生在讲阿拉姆语的科马吉尼(Commagene，叙利亚北部)地区的萨莫萨塔(Samosata)，当地的贵族接受的是希腊语及希腊文学的教育。琉善是著名的希腊演说家，周游意大利和高卢，并名利双收。但他在希腊和小亚细亚却有种外乡人的感觉，原因可能是他说话的口音以及他是叙利亚人的事实。后来他创作了80余部著作，包括文学对话、讽刺诗、戏仿和大量其他用希腊语完成的作品。他是文学黄金时代的最杰出人物之一。

在琉善看来，"希腊属性"从根本上讲是文化属性，在早期帝国时期这种属性还是获得精英地位的先决条件。即使在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塞琉西亚——一个帕提亚人统治下的欣欣向荣的城市，成为希腊人也意味着接受过希腊教育。琉善的建议明确指出，希腊教育是任何一个有志之士必须拥有的入门凭证：

> 即使你现在一贫如洗，出身卑微……不久之后，你将令所有人羡慕嫉妒，你会获得荣誉和升迁，享有美名，跻身上流社会，得到那些名门富贵之士的敬重……被委以高位，获得提升。[11]



罗马帝国(约 138)

长久以来,希腊"民族"与众不同的特征,看来是更加突出的文化沙文主义和挥之不去的积怨。同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德斯持相同看法的人仍然在悲叹希腊的衰败,梦想自己能够生活在更加辉煌的时代。公元2世纪中叶有位地理学家波桑尼阿斯,他对重要的希腊历史古迹的精准描述是现代人的一笔宝贵财富,而他对于罗马人出资兴建的建筑物就关注不多。

第二次智者运动(Second Sophistic,约 60－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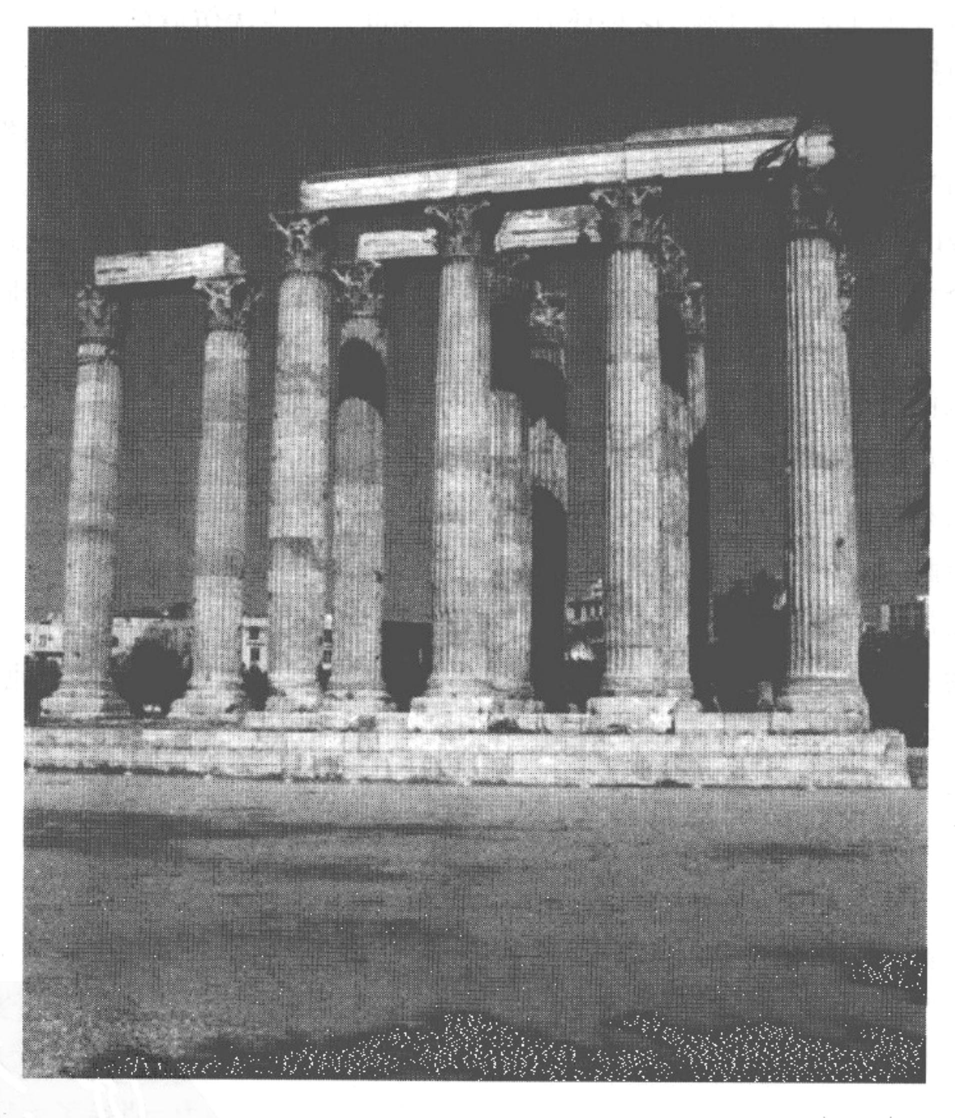
从公元1世纪的后期数十年开始,受过教育的希腊人找到了一种慰藉,即模仿古典时代的作者所著的文艺杰作,用"纯正"希腊语(即阿提卡语)创作自己的作品。共通希腊语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眼里不够典雅、有失体面。从尼禄统治一直到公元3世纪中叶,这个时期被称作"第二次智者运动"(约60－250),其间涌现出大量高雅的希腊文学作品,主导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学术研究。

93

追寻一种基于遥远过去的希腊身份重建,是这个时期的标志。雄辩家是这种风潮的主要倡议者,同时也是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雄辩是极其有用的一种才能。法庭和公民大会都需要技艺高超的雄辩家。在小亚细亚彼此竞争的城市之间,口才极佳的雄辩家可以帮助解决争端,或在总督及皇帝本人面前陈述一个特定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为一门学科,雄辩术在帝国各大学校曾风靡一时,同哲学一样都是最显要的学科。最负盛名的雄辩家并非老师,而是大众表演明星,像普鲁萨的狄奥·科克亚努斯(Dio Cocceianus,约40/50－110),他赢得了狄奥·克里索斯托("金嘴")的美名;法沃里努斯(Favorinus,约88－155)来自埃利特(Arlete,即今天的普罗旺斯),周游希腊,受到了哈德良和安东尼努斯·皮乌斯的关注,他们都邀请法沃里努斯加入其核心圈子;以及克劳狄乌斯·埃利亚努斯(Claudius Aelianus,165/170－230/235),作为当时著名的演说家,他后来得以名垂青史的却是其涉猎广泛的著作,内容从自然历史到田园生活。

尽管身患间歇性发作的疾病,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德斯仍然周游各地,期间演说辩论,听者众多。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161－180)对其敬仰崇拜,在造访士麦那时专门拜访阿里斯提德斯。阿里斯提德斯擅长一项歌功颂德式的演说,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致罗马的演讲”(Oration to Rome),另外一项则是慷慨激昂式的演说——一种专门展示演说者智慧、博学和语言技巧的训练。后者事实上属于一种修辞训练,演说者围绕著名的历史转折关头而进行与事实未必相关的陈述和辩论,例如：尼西亚斯是否应该派一支援军增援被围困在叙拉古的雅典士兵？雅典人是否应该将德摩斯梯尼送给菲利普？普通听众



罗马时期的希腊主义：巨大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在哈德良皇帝的支持下建成,传达了“罗马人”对于希腊的怀旧情结

从演说者的机智辩论中得到消遣和感动,而对此迷恋的爱好者们则着迷于修辞和辩论的"形式":演说者对阿提卡希腊语的熟练掌握、驾驭语言的技巧以及演说风格。

第二次智者运动对于古典时代的迷恋不应该解读为对罗马统治的排斥。如同阿里斯提德斯在"致罗马的演讲"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希腊贵族们有充分理由对罗马心怀感激:只有罗马可能实现希腊文明所提出之愿景。然而,尽管关于古典希腊的回忆使得阿里斯提德斯及其希腊同胞自觉与众不同,这种怀旧情绪同时也会产生忧伤情怀。对过去的灿烂辉煌念念不忘,这种怀古念旧情结进一步证明这些人活在过去,而现在和将来则属于罗马。事实上,第二次智者运动时期也带有强烈的"罗马"特征。为了同帝国权力核心维持良好关系,享有超越其他族群的优势,希腊人被迫迎合罗马人对于希腊历史和文学的喜好。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次智者运动迎合了罗马人对希腊的怀旧情怀。希腊人不得不讨好这些蓄胡须的亲希腊人士,像哈德良和马可·奥勒留,他们迷恋的是希腊的过去,而非现在。哈德良在雅典大兴土木,其中兴建的图书馆和奥林匹亚宙斯神庙使得周围的建筑相形见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对希腊过去迷恋的外在表露。泛希腊联盟即是他促进希腊融合的方式,借此实现了希腊人自己从未达成的目标,只不过是按他的安排实现的,并在其监控之下。作为回报,心怀感激的希腊人树立起一座拱门来纪念哈德良,并在上面刻有铭文,指出雅典是"他"的城市。

四面楚歌的罗马帝国(约 170 — 400)

罗马和平时期的终结在本书中是又一个分水岭。随着帝国的安全日益成为头等大事,帝国辖下的臣民,包括希腊人,越来越认同自己属于"罗马人"。在马可·奥勒留统治下,特别是在公元 2 世纪 70 年代,罗马开始奋力保卫北方边界的安全。马科曼尼人(Marcomanni)、夸迪人(Quadi)和科斯托博契人(Costoboci)一起形成巨大压力,消耗了帝国大量资源——科斯托博契人渗透至巴尔干地区,甚至到了希腊。奥古

斯都体制下的经济和行政系统在过去200年间运行良好,但马可及其继任者们却不得不面对更集中的来自“蛮族”的威胁。对罗马安全造成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至于其后的塞维鲁王朝(Severan,192—235)的皇帝们不得不竭力打造自己军事强人的地位。马可本人掌权期间的很多时间都是在边境度过的,他在此期间很可能用希腊语写就了大量哲学思考文章(《沉思录》)。从此以后,皇帝们几乎无暇在都城生活。

在塞维鲁王朝结束后约50年,罗马帝国真实感受到了即将灭亡的危险。一个新的波斯王朝——萨珊王朝(Sassanids),尤其是在沙布尔一世(Sharpur Ⅰ,243—270年在位)统治下,频频发动战争侵犯罗马,导致罗马帝国在边境地区损兵折将,许多城池失守。自从汉尼拔以来,罗马还未曾遭遇如此可怕的劲敌。同时,因为罗马集中精力对付东部边界,又使得其北方防线门户大开。在3世纪50年代早期以及60年代末期,哥特侵略者涌入爱琴世界,造成大范围的破坏。对此恐怖时期我们所知甚少,仅知道科林斯、阿尔戈斯、塞萨洛尼基和斯巴达都遭到了洗劫,导致像色萨利这样的广袤地区一片荒芜。公元267、268年,雅典也遭到抢劫,但据我们所知,在一个名为赫伦尼乌斯·德克西普斯(Herrenius Dexippus)的历史学家的率领下,雅典城进行了同仇敌忾的抵抗行动。据说,赫伦尼乌斯·德克西普斯通过激励雅典人感念其灿烂历史,将雅典人凝聚起来奋勇抗敌。位于广场的诸多建筑毁于战火,这一历史名城的大部分地区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只是一片废墟。

对于希腊城市及其在帝国体制中所起的作用而言,这个危机四伏的时期具有深刻的启示。在罗马和平时期,小规模政府足矣。皇帝们非常乐意保留一种基本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地方统治者阶层负责征收税款,并行使着大部分政府的职能。这种体系有能力对付偶发的边界冲突,但在面临日耳曼人和波斯人的双重威胁时,就会轰然崩溃。同时,地区冲突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疯狂的物价上涨会击垮经济体系,各城市随之难以承担各自的地方治理职责。因此,在公元3世纪时,城市不再是帝国体制下的经济根基。军事形势吃紧需要最高层对经济资源更直接的管控,但皇帝们在此危难时机进

96

行必要的管理结构调整实在是困难重重。公元3世纪还有一个特征，即在位皇帝的频频更换，有些甚至上台仅短短数周。军队的各派系转眼就会支持对立的篡权者，其结果是内战不断、皇帝更换频繁。像奥勒利安(Aurelian，270—275年在位)这样的皇帝，尽管推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一生却危机重重。他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功勋卓著，却死于来自其王室家族内部的一场阴谋。

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政治动荡以及内战不断的时代，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帝国治理体系。在此体制下，希腊城邦的角色变得更加被动。新型的罗马帝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治理体系。体制如此设计纯粹是出于需要，因为这个体系在动员帝国资源方面更加高效。及至戴克里先(Diocletion，283—305年在位)统治时期，帝国已具备了召集多达25.8万名士兵的动员能力；而在公元2世纪时，最多只能动员18.6万人的军队。戴克里先是巩固了新型中央集权体制的最重要人物，他将行省级区域重新改造成规模更小、效率更高的行政治理单位"大区"(diocese)。行省的首府这时被称作"都市"metropolis，(母亲城市)，不仅控制行省内其他各中心，而且还是各种人才汇聚之地。希腊城市，例如塞萨洛尼基、安条克、士麦那，以及尼科美底亚(Nicomedia)都位居早期这种大都市之列。如此一来，普通的希腊城市就丧失了大部分市政活力和生机。城市统治者居住在有限的小环境中，资助节日庆典和公共设施的能力大为减弱。那些以前为市政训练年轻人的学校，此时可能只为行省和帝国治理培养人才。

97

然而，对于城邦已死的论调，研究古代晚期的历史学家们和考古学家都提出了异议和反驳。对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发现，可能受公元3世纪的社会变迁影响，城市规模和影响大为缩减，但绝大多数城市仍继续生存，跟希腊的情况很类似。考古学家发现，在哥特人侵略之后，希腊的人口规模在逐渐增长。玻俄提亚的城邦数量，从古典时代、希腊化时代早期的70座锐减至罗马和平时期的33座，及至古代晚期又恢复至45座。在希俄斯(Chios)，城邦发展的走势也一样：古典时代56座，罗马和平时期10座，古代晚期28座。更加振奋人心的是在广袤土

地上都有人开垦定居,因为农田耕种之需越来越大。皇帝们也未曾放弃将城邦作为基本治理单位的想法。事实上,在整个公元 4 世纪,一直有人大声呼吁恢复公民领袖的显赫地位及其传统角色。皇帝尤利安(Julian,361－363 年在位)可能是最后一个对希腊狂热的统治者,就曾设想过要重建基于希腊城邦之上的古典帝国。

但事实上公民领袖已经无法再扮演管理者和资助者的角色。只有在北非,因为没有遭受公元 3 世纪里的各种危机困扰,这里的城市才能如以往那样运作。在诸多方面,城邦作为独立运作的实体,已然成了过去。

98

文化上的分歧(约 230－400)

戴克里先认识到过于庞大的帝国管理所面临的挑战并非一个帝国当局单独所能承受,因此他任命了一个同等地位的共治皇帝,紧接着又设立了两个地位稍低的皇帝。约一个世纪之后,出于相同原因,帝国分裂成为两个实体(395),而且其政治边界与语言差异上的界限紧密吻合。至此,帝国的东西两半形成了文化上彼此独立的两个部分:东部的希腊语帝国和西部的拉丁语帝国。这种文化上的分歧该如何解释?

希腊和罗马的结合体在危机重重的公元 3 世纪以及基督教兴起以后的某个时期,开始逐渐解体。这个时代的皇帝们都出身于行伍之中,总体上缺乏贵族所接受的教育。戴克里先选择希腊城市尼科美底亚作为其行政首都,但他需要懂希腊语的翻译来帮助沟通。很明显,他要求在政府沟通上使用拉丁语。对于戴克里先及其公元 4 世纪时的继任者而言,坚持使用一种语言符合当时罗马统治末期的中央集权化发展趋势。因此,在他统治期间以及公元 4 世纪里的多数时间,拉丁语享有比希腊语更高的地位。同时,在讲拉丁语的那半个帝国以内,悄然发生着一种文化上的转变。精通希腊语曾经只是罗马贵族表明其身份的一种想望,而现在关注的则是必须精通拉丁语。君士坦丁(Constantine,306－337 年在位)的母语就是拉丁语,可能在家乡伊利里亚受教育,所以在家中并不使用希腊语。虽然这位精力极其充沛的皇帝选择了希腊

城市拜占庭作为其新的都城,并且与讲希腊语的贵族和主教们来往密切,君士坦丁仍然需要借助翻译来沟通。

同时,尽管希腊语仍然是西方罗马教育的一大特征,合格的教师数量却极少,而且大多数城市也几乎请不起这样的老师。希腊语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还跟拉丁语文学的复兴有很大关系。西方教育这时都围绕着拉丁语语法和对经典作品的研习而进行,像西塞罗的信件、维吉尔的诗歌以及塔西佗(Tacitus)的《历史》这样的经典著作。显然,荷马和阿提卡语剧作家的作品在西方仍然有人读,但绝大多数读者不懂希腊语或所知甚少,他们都更加愿意阅读翻译成拉丁语的作品。公元4世纪末期的修道士哲罗姆(Jerome)对西方罗马的读者贡献良多,因为他将希腊语的神学典籍翻译成了拉丁语。

事实上,正是基督教在两个不同的罗马帝国的形成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起初,共通希腊语是传播福音以及早期教会的最初使用语言,新的宗教信仰最初也是在讲希腊语的海外犹太人中间传播。早期传教士中最伟大的一位——保罗(Paul),就拥有希腊语的教育背景,用希腊语在安纳托利亚和爱琴世界传教。他所行走的路线也是演说家通常行走的路线,所写的信件也都是寄给希腊城市的。构成《新约》的书卷是用共通语写就的,据信使用这种语言可以拥有最大规模的读者群。但基督教也同时针对非希腊语的族群,像埃及的乡村、叙利亚、亚美尼亚(Armenia)以及阿拉伯半岛等,在这些地区福音的传播能够以当地方言进行就变得至关重要。其结果就是将这些当地口语方言固化为书面用语。及至公元4世纪,古叙利亚语(Syriac)、亚美尼亚语和科普特语(Coptic)——在埃及使用的通用口语,不仅是祈祷和礼拜的用语,而且变成了教堂管理和神学的正式用语。亚美尼亚语字母文本在公元4世纪得以发明,是为了满足一个独立国家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一个独立的“民族”教会的需要。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在罗马帝国的西半部分讲拉丁语的教徒。在这里,拉丁语成了教堂礼拜仪式或“弥撒”的用语,圣经被翻译成了许多拉丁语版本。另外一个促使形成独特拉丁语教会的因素,是西方的

主教们在公民事务中所享有的影响力。一旦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合法化，并赋予其在帝国各宗教中的特殊地位，距离基督教社团领导人开始检验其在社会事务中的重要角色与作用，就仅仅是时间问题了。这种趋势对讲拉丁语的西方具有最明显的影响，原因在于这些城市和社区更加以地区为中心，而不太愿意服从于帝国的中央集权统治。因此，西方的城市开始诞生相当有影响力的人物，像科尔多瓦(Cordoba)的欧西阿斯(Ossius，约 257－359)，以及米兰的安布罗斯(Ambrose，339－397)。大无畏的安布罗斯是第一个公开挑战皇帝权威的宗教领袖，他要求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必须为公元 390 年发生在塞萨洛尼基的屠杀 7 000名不服统治的平民事件而忏悔。

在教会人员，尤其是罗马主教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安布罗斯不屈不挠的姿态在拉丁教会的思维中树立起一个先例。罗马主教在基督教教会里享有象征性的崇高地位。罗马是罗马帝国的传统都城这一事实，加之罗马拥有圣彼得和圣保罗的遗骨，使得罗马主教享有令人信服的崇高地位。可能促成独特“拉丁”教会形成的最重要因素，至少在早期阶段，是北非主教，来自希波(Hippo)的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所扮演的角色，他所著大量著作，尤其是《上帝之城》(426)，最大程度上建立了一个自成一体的拉丁语神学传统。在此之前，基督教信仰和实践的诸多事务都被东方的博学主教们用希腊语来确立并实施。奥古斯丁使得这套神秘而且(经常)难于理解的哲学体系的大部分能够更加容易地被拉丁语读者们理解。他同时创立了一系列独特的拉丁语神学感知概念，比如恩典和得救预定论，从而奠定了促进形成不同的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的根基。 100

作为异教的希腊主义

在这段历史中，基督教意义重要还有另外一个重大原因。在喧嚣的公元 3 世纪的某个时期，“希腊的”这一用语不再代表种族意义上的归属。事实上，帝国的绝大多数臣民，无论讲何种口语方言，已经开始认同自己罗马人的身份。用现代话语来阐述，即罗马已经变成一个“民

族"或联合体,形成了一个紧密融合的社会,在共同关注帝国生存的前提下合为一体。同时,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及其在社会各个层面日渐普及,"希腊人"这一用语就开始专指那些坚持传统宗教信仰和活动的人群。及至公元4世纪,"希腊人"一词成了基督徒羞辱异教徒的一个用语。

从君士坦丁统治开始,罗马帝国又面临一次新的社会分裂。罗马政治日渐基督教化,但也被迫在异教徒和基督徒中间进行调解。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学习中心。在雅典、亚历山大城和波格蒙,希腊人仍然拥有威望极高的学校。正是在雅典,基督徒称之为"叛教者"(the Apostate)的皇帝尤利安接受了教育,并秘密地放弃了基督教,转而成了一个"希腊人"。尤利安最大的抱怨在于:受古典希腊启迪、由异教徒所建立的罗马正在被基督教篡夺。在其短暂执政期间,尤利安寻求希腊或异教的复兴,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夺回被基督徒夺去的利益。因此,他撤回了赋予教会的经济资助,取消了由基督徒垄断的官方闲职。

基督教思想家和异教徒思想家对社会和宇宙持有不同见解,但都坚信一种至高无上的存在的起源,这种起源提供了思想交锋和辩论的共同基础。因此,哲学家和神学家都受到古代晚期主流思想传统——新柏拉图主义的启迪。极其关键的一点是,基督教神学家承认柏拉图和希腊思想的价值,因此他们并不排斥希腊主义本身,特别是在他们看来,希腊哲学的许多思想为基督教神学提前做好了准备。凯撒里亚(Caesarea)的巴西尔(Basil ,330—379),基督教隐修制度的创始人之一,撰写过一篇名为《谈年轻人如何从希腊文学中受益》(374)的短文,他就坚持认为基督徒可以在忽略希腊主义所蕴含的异教内容的同时,受益于希腊主义的价值。他同时也认为有必要使用像阿提卡这样的复杂语言,来创作复杂深刻的神学典籍,而不是使用像共通语这样过于简单的语言。因此,尽管做希腊人是要避免的,但希腊主义的有些方面还可以挽救出来,为基督教所有。对于基督教利用了古典典籍这一做法,尤利安斥之为极度虚伪。因此,他在362年下令禁止在基督教学校教授希腊古典作品,也不许将阿提卡语用于基督教神学。

101

在谈到希腊文艺传统的生存时，很难低估其“价值”的重要性。巴西尔所提概念的妥协性就意味着基督徒们获得了特许，不仅可以阅读、还可以保有异教徒所创作的作品。因此，在异教消失很久之后的中世纪和现代，基督徒们决心保留古典传统，包括由叛教者尤利安本人创作的作品。

希腊罗马帝国末期(约395－527)

公元395年在罗马历史上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Ⅰ，379—395年在位)过世后，罗马帝国正式一分为二，尽管在法律上仍然保持着统一，但希腊和拉丁两个部分这时各自为政，有各自的统治者、管理系统、预算和军队。数年之内，两个帝国将接受“蛮族”入侵的考验。自从公元4世纪70年代起，匈奴人——一批来自中亚令人生畏的游牧武士，就开始涌入中欧和东欧地区，迫使该地区的哥特民族进入罗马领土。在401年，西哥特人(Visigoths)入侵意大利，405年以后，其他的哥特族群同匈奴人一起，也涌入帝国之内。在公元5世纪的早期，哥特人在此定居并逐渐瓜分了西罗马帝国。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被推翻了。东罗马帝国同样竭力抵御侵略者，但它得益于一个更加统一的统治阶层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运作良好的政治体制。事实上，这座都城对于帝国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狄奥多西二世——帝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408—450年在位)的统治时期，城墙得以重建，构筑成了坚固的堡垒群。主城墙有5米厚，12米高，每隔55米建有高塔，塔有18－20米高。狄奥多西所筑城墙不仅保卫了城内免受哥特人和匈奴人侵扰，同时还保卫了作为帝国纳税基地的这些地方的安全：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尤其是埃及。最起码，东部的皇帝们可以通过巨额贿赂来退敌。城墙使得东罗马帝国能够经历风雨而平安无事，当尘埃落定时，帝国并未损失丁点领土。 102

作为联系更加紧密的实体，人口更多、经济更具活力的那一半罗马帝国进入了一个自从罗马和平时期以来未曾经历过的新阶段。在狄奥多西二世之后，帝国产生了诸多强大而具才华的皇帝，包括马尔西安

(Marcian,450—457 年在位)、利奥一世(Leo Ⅰ,457—474 年在位)、泽诺(Zeno,474—491 年在位)、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Ⅰ,491—518 年在位)、查士丁一世(Justin Ⅰ,518—527 年在位)和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Ⅰ,527—565 年在位)。这些统治者拥有世界上最精良的国家和地方管理体系。有时花钱买退侵略者要比公开作战、与其对峙更加划算,这确实算得上精明决策以及无与伦比的富足的一种表现。显然,古代晚期的地中海地区较之在罗马和平时期要贫穷弱小一些,但是相对而言,泽诺和查士丁统治下的帝国仍然算得上当时最富足、最彪悍的强权——马尔西安和阿纳斯塔修斯留下的财富(分别达 4.5 万公斤黄金和 14.5 万公斤黄金)根据中世纪早期标准可以说是天文数字。

与讲拉丁语的另一半帝国分离后,经过精简的这一半帝国同时也变得更具希腊特色。拉丁语仍然是皇家使用语言,在法律和军事管理的有些领域也仍在使用。除此以外,东罗马帝国是一个讲希腊语的国度。在皇帝和下属官员之间的交流、日常行政事务的处理、所有教堂的交流、宗教性的聚会,以及绝大多数帝国臣民彼此的沟通上,都使用希腊语。在东部,城邦也找到了焕发生机的新机会。公民领袖们仍然期待在议事厅里监管城市事务——每个够格的城市都必须拥有一个议事厅。但赋予城市崭新活力的,则是庞大并仍在扩张中的教会所扮演的角色。因此,这时的重要城邦都是主教或大主教所在地。在当地,主教们事务繁忙,负责教堂建筑的建造和维护、慈善和福利服务,以及诸多宗教及世俗事务。重要的一点是,主教及其神职人员承担了许多以前由当地贵族担任的角色——地位较高的神职人员通常都来自当地贵族。一个主教能够在其辖区内发挥多大的影响力,无疑取决于其个人性格或个人魅力,但很明显在任何一个城市,现任的主教都是权力的中心。

103

希腊城市重新焕发活力,近期关于公元 5 世纪和 6 世纪的考古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帝国各地都在大兴土木,除了巴尔干北部行省,这些地区在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入侵时首当其冲受到打击。对于希腊而言,有一部重要的公元 6 世纪时的文献——希洛克勒(Hierocles)所著的地

名录(Synekdemos)，其中有关伯罗奔尼撒地区就记载了80个城邦的名字。大量的考古证据证明，在科林斯、安菲波利斯和塞萨洛尼基出现了建筑、制造和商业活动的持续发展。此时的雅典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大学城，建筑活动通常都集中在修缮重要建筑上，例如对哈德良图书馆的修建。而兴建新建筑大都在这座古典城市剩余的开阔空地上进行。例如巨人宫(Palace of Giants)——狄奥多西的妻子尤多西娅(Eudokia)一家的住宅，就是一座巨型建筑物，占据了古老市政中心的大片面积。通常，土地都用来建造大型教堂。随着神庙失去了其用途，公民领袖们通常在当地主教的授意下，负责从这些旧式的异教徒信仰的遗址上挪用一些材料，然后建起规模宏伟的教堂。有时，旧建筑直接成了教堂。例如在塞萨洛尼基，圆柱形建筑加列里乌斯陵墓(Mausoleum of Galerius)就被改造成教堂，献给了圣乔治。大城市的另一个显著特征被认为是拥有军事堡垒。因此，位于西亚安纳托利亚的城市阿弗洛底西亚，本来位于帝国最安全的地区，也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城墙，这些城墙在很大程度上只起象征作用。

近年来，历史学家们逐渐认识到古代晚期的生机与活力。日耳曼人的侵扰确实颇具破坏性，但是同时代的基督徒们错误地认为，文明已经被一波又一波的野蛮人洗劫一空。事实上，在整个西罗马帝国，希腊罗马文明的痕迹清晰可见，而在东罗马帝国则几乎毫发未损。但古代晚期同时还是一个过渡时期，远古世界在此期间经历重新调整，诞生出诸多与以往不同的特征，足以贴上“中世纪”的标签。罗马帝国的拉丁和希腊两部分沿着不同的轨迹各自缓缓发展，结果催生出两个不同的世界，它们的区别与其说是使用语言上的不同，不如说是拥有不同的基督教文化。而最终出现在东部的，将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希腊世界。

104

第五章　希腊罗马帝国（二）（约500—1200）：东正教的胜利

105　我们的君主政体是模仿你们而来，依照你们设计的优秀体制而设置，你们是唯一的帝国，我们仅是模仿。正因追随你们，我们才得以走在其他所有民族之前列。[1]

这段表白是由伟大的东哥特（Ostrogoth）国王西奥多里克（Theodoric，471—526）对皇帝阿纳斯塔修斯吐露的真实心声。尽管统治着一个庞大的日耳曼王国，下辖名城罗马，西奥多里克大体上承认东罗马帝国才是唯一的真正帝国，而他自己，至少从名义上讲，仅仅是一个总督。直到查理曼（Charlemagne）的加洛林（Carolingian）帝国在公元8世纪末开始崛起之前，西方的基督徒，包括罗马的主教们，一直认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才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古代晚期大约自君士坦丁时期开始，至公元7世纪中叶的伊斯兰征服为止。要想了解古代晚期的世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罗马历史的延续性。甚至罗马共和时期的传统都仍然在这一时期发挥了强有力的影响作用。仅举一例，即使像阿纳斯塔修斯这样的皇帝都必须经过一致拥护才能“当选”。这种职能通常是由元老院或全体军人来承担，或者更好，由君士坦丁堡的民众来行使，获得授权的场所是在大

体育场(Hippodrome)里。但与此同时，古代晚期也被认为是通往中世纪的桥梁。因此，不再需要任何掩饰把皇帝称作是第一公民(princeps)。就如同讲希腊语的臣民们所描述的那样，国王是一个专制君主，其统治权被认为是君权神授。阿纳斯塔修斯是上帝在人世间的最高代表，是联系天国和尘世的关键纽带，而其属下臣民则是“上帝的选民”，是“新希伯来人”。君士坦丁堡本身也获得了神圣光环，被认为是新耶路撒冷以及新罗马。

106

罗马帝国在形式上又延续了一个千年，但现代的历史学家们都将其称为“拜占庭帝国”或“拜占庭”，因为在公元3至8世纪的某个时期，罗马帝国变形成完全不同的一种体制。毫无疑问，拜占庭及其讲希腊语的贵族阶层仍然认同希腊罗马传统，但真正使得这个充满活力的复杂社会与以往不同的，却是其针对基督教的态度和方式。具体而言，拜占庭的显著体征是其对教义真实性或正统性(orthodoxia)的执著。在拜占庭人的头脑中，帝国的命运和恪守严格的正统观念是紧密相连的，这就意味着上帝的恩惠取决于虔诚的信徒是否信守正确的耶稣论，或圣像崇敬是否是神圣的规仪。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使得帝国创立了一套信仰以及文化习俗，逐渐被外面的世界称为“希腊”基督教或希腊东正教。从阿纳斯塔修斯直到末代皇帝(在1453年死于都城保卫战)，希腊语一直是政治和教会(这一点至关重要)所用语言，同时也是街头巷尾最普遍的口头用语。而且，拜占庭人从未放弃自封的希腊文艺传统守卫者的身份，一直坚信古典希腊传统是属于他们的传统。因此，在诸多意义丰富的层面上，罗马或拜占庭世界同时还是希腊世界：虽经根本改造，但正宗属性始终如初。

公元6世纪

在许多意义上，查士丁尼算得上拜占庭第一位中世纪时期的皇帝，但他本人却认为自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罗马”皇帝。他生于483年，起初取名为佩特鲁斯·塞巴提乌斯(Petrus Sabbateus)，来自一个讲拉

丁语的伊利里亚人家族,在将近二十岁时移居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的叔叔弗拉维乌斯·尤斯提努斯(Falvius Iustinus)当时已经晋升为地位显赫的皇宫侍卫。查士丁尼在幕后运作,协助其叔叔于518年继承了皇位,从此在其叔叔的皇朝内部一跃而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实权人物。在公元527年,他获得了皇位,一心想青史留名。他的雄心壮志从其所实施的法律变革上可见一斑。在公元529年,他下令编制了罗马法典,即查士丁尼法典(*Codex Iustinianus*),这是一项浩大的事业,由杰出的法律博学之士特利波尼安(Tribonian)负责领导完成,随后不久又相继完成了《学说汇纂》(*Digest*)、《法学阶梯》(*Institutes*)和《新律》(*Novels of Justinian*)。等到公元534年这些杰作完成之时,法典的规范体式以及欧洲民法的基础都得以建立。

107

除了奥古斯都、戴克里先以及君士坦丁,查士丁尼算得上是能代表一个时代的为数不多的皇帝之一。他拥有诸多功绩,其中之一即是将君士坦丁堡成功打造成一座名副其实的帝国都城。虽然在两个世纪以前就由君士坦丁大帝开始创建,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相比较罗马和亚历山大城而言,由于缺乏历史资源,城市发展受到了制约。城市建设时断时续,主要在有皇帝入驻时才得以发展,比如在狄奥多西时期。公元532年,在不太体面的尼卡起义(Nika Riots)之后,整个城市主体毁于一旦,查士丁尼从而获得了一个赋予这座城市永久丰碑式面貌的绝佳机会。五年之内,这座城市庆典中心的辉煌程度从根本上得到加强。城市建设中主要是建造了许多教堂,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圣索菲亚教堂(Hagia Sophia)就是当时的杰作。

同时,对以前属于西罗马帝国势力范围的地区,查士丁尼寻求建立自己的直接统治。公元533年,一支规模不大的远征军在伟大的将军贝利萨留(Belisarius)的率领下重新从汪达尔人(Vandals)手中收复了北非和迦太基城。受到远征军速战速决的鼓舞,查士丁尼集中力量对付意大利,在公元535年由贝利萨留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重新纳入罗马管辖。及至查士丁尼统治末期,帝国版图已经扩张至阿尔卑斯、北非以及西班牙南部的一部分地区。

关于查士丁尼时代是否属于“黄金时代”的问题，一直以来只是猜测和臆断，尤其是因为他收回西罗马帝国的努力极大地消耗了帝国的资源，还有他摧毁了被征服的那些地区。而且，查士丁尼心目中真正的罗马帝国有意识地摒弃了许多古典时代的传统。因此，希腊教育，尤其是希腊哲学，受到肃清，从而使得帝国更具基督教特征。在公元527年，他关闭了柏拉图创立的学园。查士丁尼在其法典(1.11.102)中指出，他认为希腊人的“疾病”不应该再腐化学生了，最终这群希腊人中的一些人跑到波斯国王那里寻找庇护。普罗科庇乌斯(Procopius)和吕底亚的约翰都是推崇古典传统的卓越文人，他们在针对文化人的无情打击中受到了很多迫害。这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神学主导的时代，这个时代属于像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这样的编年体学者，他们记述历史的方法不同于修昔底德，而与圣经有更多的相同之处。

108

查士丁尼时代的其他许多方面也预示着中世纪模式的到来。他留给后人的都城不再是具有希腊罗马风格的棋盘式街道布局：这时的居民区布满了曲折蜿蜒的街道和死胡同。在艺术上，我们发现当时背离了对人体象征性的表现方法，而专注于展现宗教事务和相关主题。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当属位于拉韦纳(Ravenna，意大利)的圣维塔莱教堂(San Vitale)里的极具表现力、但相当缺乏立体感的查士丁尼和皇后西奥多拉(Theodora)的人物像。一侧站立着几个教士，分别手持十字架、福音书和香，查士丁尼手握圣餐面包，而西奥多拉从教堂东面的另一端面向皇帝，东方三博士伴随在她身旁，手中捧着圣餐杯。将皇帝和皇后与教士区别开来的唯一特征是头上的光环和身上的配饰。

在查士丁尼统治的中期，帝国的时运开始改变。在意大利东哥特人的抵抗，迫使帝国扩张陷入停顿。接着，在公元541—543年间，地中海世界受到鼠疫的侵袭——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鼠疫反复爆发，可能夺去了罗马一半人口的生命。查士丁尼本人也发生了转变：他失去了对国家事务的兴趣，从公众视野中隐退，选择了隐居独处或者由神学家陪伴。在晚年，他极有可能遭受了精神崩溃。普罗科庇乌斯在自己作品中既展露出对皇帝的敬重又表现出强烈的反感，披露说皇帝会频频

丧失自我控制的理智。查士丁尼的继任者查士丁二世(565 至 578 年在位)恢复了帝国的经济实力,但身负贪婪成性的恶名。在其统治时期,另一日耳曼族群——伦巴德人(Lombards),占据了意大利大部分领土,帝国手中仅保留了拉韦纳、罗马和那不勒斯周围的飞地。查士丁的麻烦并不止于此,他与波斯萨珊王朝重新交恶,在多瑙河畔还出现了阿瓦尔人(Avars),这是一支来自欧亚大草原(Eurasian Steppe)的新兴游牧民族。阿瓦尔人伙同占据多瑙河北部地区的斯拉夫民族,越过了帝国的北方防线,使得整个巴尔干地区陷入一片混乱。

查士丁二世和提比略二世(Tiberios Ⅱ,578—582 年在位)未能重新夺回巴尔干诸行省,也没有做到克敌制胜,但局势在莫里斯(Maurice,Maurikios)(582—602 年在位)的统治下获得明显好转,后者是一位杰出的将领和战略家。历经数年征战,莫里斯终于将波斯人、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驱逐出去,有时甚至越过了原来的边界。

109

濒临崩溃的边缘:公元 7 世纪

在 7 世纪初,帝国虽然看似强大如初,但却屡屡受到外敌、经济负担和一再发生的瘟疫的侵扰。虽然可以想象得到,莫里斯的罗马帝国在此后数世纪内都将会保持地中海强权这一地位,但也很难防御来自北方边界和东部边界同时发生的入侵。尤为严重的是,帝国在颇具毁灭性的内部分裂面前,显得那么不堪一击。

莫里斯发动的战争导致预算拮据,经济困顿导致士兵领不到足额军饷,君士坦丁堡的民众丧失了免费食物供应的待遇,这些群体就不再支持莫里斯了。公元 602 年,驻扎在多瑙河畔的军队拒绝执行一项军事行动的命令,反而在百夫长福卡斯(Phokas)的率领下向都城开拔。由于城内弥漫着不满的情绪,里应外合之下,福卡斯的人马进入城内。莫里斯最终被抓获,后被处决。福卡斯成了皇帝,这样就终结了两百多年以来(相对而言)有秩序的王朝更替模式。

与此同时,波斯的库思老二世(Khusro Ⅱ)谴责福卡斯为篡位者,并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讨伐行动,从而夺取了叙利亚。在 613—619 年

间，库思老一心谋划着要为亚历山大大帝发动的第一次希波战争所造成的破坏报仇雪恨，先是重新夺回了埃及，接着将目光投向了君士坦丁堡本身。同时，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也觉察到了在巴尔干半岛随意驰骋的良机。在阿瓦尔人的协助下，波斯人在 616 年将君士坦丁堡团团包围。帝国似乎处于崩溃的边缘，而这时福卡斯已经被才华过人的希拉克略(Heraclius，610－641 年在位)推翻，后者曾一度官拜拜占庭驻迦太基的总督。尽管希拉克略帝国的大部分领土被侵占，但萨珊王朝战线展开过长，同时希拉克略还可以依赖教会以及教会下属的经济资源，尤其是盛传波斯人曾经犯下针对基督徒和教会财产的恶劣行径：公元 614 年，当获悉萨珊王朝从耶路撒冷夺走了“真十字架”(True Cross)后，希拉克略的臣民们义愤填膺。公元 626 年，拜占庭人解除了阿瓦尔人和波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联合围城，阿瓦尔人带来的威胁从此逐渐消退。希拉克略此时专心对付波斯人，并于公元 627 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尼尼微(Nineveh)一举击败了波斯人。库思老次年被推翻，其子喀瓦德(Kavad)继位，叙利亚和埃及重新回归拜占庭统治。

希拉克略挽救了帝国，但在精心实施了罗马历史上最令人惊叹的复兴历程之后，旋即遭遇来自阿拉伯沙漠意料不到的威胁。阿拉伯民族一直以来都是罗马近东地区的熟悉面孔，但他们从未对帝国的统治构成过严重挑战。在 7 世纪 20 年代，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领导和伊斯兰信仰感召下获得统一。在穆罕默德之后不久，其继承者(哈里发)艾布·伯克尔(Abu Bakr)率领虔诚的穆斯林数次侵入拜占庭和波斯帝国。无论有无预谋，入侵者将其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统治维持了下去。最初，拜占庭人视穆斯林为一股精力充沛的异教徒势力，可以将之收买，或者认为他们会慢慢退去，但是这些入侵者胸怀征服世界的雄心，并意志坚定地将其付诸实施。

110

伊斯兰教已经把阿拉伯人改造成一支协调有序、富有活力的军事力量，作战能力方面胜过波斯和拜占庭。波斯帝国解体，变成了伊斯兰世界(dar al-Islam)的一部分。经过耶尔穆克战役(Yarmuk，636)的挫败之后，希拉克略痛恨与阿拉伯人在开阔战场作战，遂将军队撤至托罗

斯山(Taurus),借助这一近东和小亚细亚城市之间的有效屏障来御敌。关键的一点在于,穆斯林通过减轻税负、宽容当地的宗教利益,牢牢巩固了其在先前罗马领地上的统治地位。犹太人和非东正教的基督徒(例如基督一性论者)此时不再受到官方的骚扰。穆斯林还于641年征服了埃及,而亚历山大城坚持抵抗直至646年。

伊斯兰帝国或“哈里发国家”的突然崛起震撼了罗马/拜占庭帝国。公元641年希拉克略去世后,帝国沦落为一个被边缘化的小势力范围,包括安纳托利亚、色雷斯,以及卡拉布里亚(Calabria)、西西里、撒丁(Sardinia)和北非。丧失了叙利亚和埃及,迫使帝国仅依赖其以前收入的四分之一勉强生存。安纳托利亚此时成了帝国的大粮仓,同时还是收入来源和军事招募的基地。穆斯林的前进势头在托罗斯山暂缓下来,但拜占庭人却无法阻止阿拉伯人利用山间小道发动奇袭,直达安纳托利亚;也未能阻止阿拉伯人在674至678年、717至718年对君士坦丁堡发动的两次猛烈进攻。

7世纪的“黑暗时代”

伊斯兰的征服以及鼠疫的爆发导致了城邦和希腊-罗马都市文化的终结。阿拉伯人的侵扰迫使安纳托利亚转变成遍布军事据点的开阔地带,以保卫当地村庄的平安。那些古老城市的原址,像艾菲索斯、撒尔迪斯和波格蒙都遭到遗弃,数量锐减的公民都迁移至附近的城堡(kastra)内定居。传染病流行使得一切雪上加霜。一些城市,例如鼠疫肆虐的阿弗洛底西亚,就彻底消失了。拜占庭人别无选择,只有撤退至巴尔干,只剩数个军事堡垒中心还在掌控之中,像位于伯罗奔尼撒的塞萨洛尼基和莫奈姆瓦夏(Monemnvasia)。事实上,及至公元700年,帝国辖下仅有两处地方还可称得上是城市。除了君士坦丁堡,还有就是塞萨洛尼基——圣季米特里奥斯(St Demetrios)之城,孤零零地矗立在由斯拉夫族群控制的土地上。即使都城也几乎未能在这个多难的时代得以幸免,其人口锐减至近4万人,大片城墙之内的城区土地重新变成了农田。土木城建仅限于对已有建筑结构的维护上,即使如哈德

111

良水道(Aqueduct of Hadrian)这样的重要建筑也失修破败。

具讽刺意味的是，希腊-罗马城市在伊斯兰帝国辖内生存了数十年之久。在倭玛亚王朝(Umayyad, 661－750)时期，埃德萨(Edessa)和安条克这样的城市一如既往般繁荣昌盛，尽管这些城市被穆斯林修建的城市所超越，比如开罗、摩苏尔和巴格达。倭玛亚王朝还使用希腊语处理政府事务，至少最初时期如此。事实上，希腊学术在更加开明统治秩序的恩惠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这时的统治氛围珍视“希腊智慧”，重视古典作品的翻译和掌握。穆斯林的支持对永久保护希腊学术的传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当时在危机重重的拜占庭，学术活动几近消失。大马士革的约翰(约 665－749)是公元 8 世纪时最伟大的希腊神学家，他同当时许多作者一样，在宽容的穆斯林统治之下，自由创作了新颖的作品。叙利亚的基督教贵族也是如此，他们受到希腊学术传统的启迪，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起初，阿拉伯人的统治运用了共通希腊语和现存的拜占庭体系，但是随着自信心的增长，他们开始渴望创立独特的伊斯兰文明。及至公元 8 世纪初，阿拉伯语已经取代了希腊语，城市也开始呈现出独特的穆斯林外貌，清真寺和穆斯林学校开始取代教堂和修道院。与此相反的是，哈里发国家正在变得日益波斯化，尤其是波斯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s)于 750 年推翻了倭玛亚王朝，并将其都城从大马士革迁到了巴格达。事实上，自从征服了萨珊帝国，阿拉伯人在文化上就被波斯文化所征服。结果，伊斯兰高雅文化和艺术兼容了波斯和阿拉伯的共同影响。正如现代历史学家彼得·布朗所称，阿拉伯的兴盛同时代表着波斯对希腊和罗马的最终胜利。[2]

112

与此相反，拜占庭已经落魄地进入了一个“黑暗时代”。除了帝国安全问题令人担忧以外，考古数据还揭示了在物质条件方面的陡然衰落，雪上加霜的是公元 679 年保加尔人(Bulgars)的到来。这又是一支突厥游牧部落，他们在色雷斯安定下来，建立起对当地斯拉夫族群的统治，这些斯拉夫人自此也开始向多瑙河以南迁移。各个斯拉夫族群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希腊本土定居。对当时这些地区的政治形势我们几乎

一无所知,只是了解到希腊绝大多数大陆地区处于斯拉夫人统治之下,有些资料文献还提到了这个时期希腊人口的锐减。现今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们在辩论中把血统关系看得至关重要,他们认为希腊人的命运变得关键之原因在于:他们的命运决定了现代希腊人是真正的希腊人还是经过希腊化而改头换面的斯拉夫人。尽管如此重要,但从现存的证据我们无法明确希腊文化上的人口构成,我们只是知道在该地区居住着分布甚广的斯拉夫人,以及希腊人在阿提卡、伯罗奔尼撒东部和诸岛占据主导地位。我们还知道有些希腊人逃亡至安纳托利亚和意大利南部,后来其中许多人的后裔被遣返回希腊。

至于7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本身,此时则变得更具希腊特征,至少从使用语言的角度来看,其统治之下的领土都是讲希腊语的地区。历史学家们眼中的帝国开始成为一个内向型政体,念念不忘希腊历史上辉煌顶峰的衰败,并努力寻求救赎。很明显,上帝遗忘了其新"选民",而其中原因众说纷纭。上帝的旨意通常要由战争来检验和证实。穆斯林坚信他们自己的成功证实了穆罕默德启示的真实和正确,而拜占庭人则认为自己的不幸是所犯宗教错误受到的神的惩罚。要想重获上帝的喜爱,他们必须重新确立真正的东正教信仰。因此,在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Ⅱ,641—668年在位)统治时期所遭受的军事挫败对许多人而言,意味着基督一志论派观点的一无是处,这种神学观点是皇帝偏爱的、解决事关基督本身的困境的一种方法,认为基督具有神、人两本性,但只有一个意志。

在更具体的层面上,拜占庭认识到要生存,必须根据军事部署来重组行省社会以及治理结构。在黑暗时代,被称作军区(themata)的地方行政单位取代了更小型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由戴克里先创立的"大区"。每个军区都由一个军事将领(strategos)统治,他拥有自己的常备武装力量。位于安纳托利亚的军区还能够召集到那些已经复员的士兵来扩充实力,他们被遣散并获赠土地后在边界地带安顿下来。因此边境地区就由这些彪悍的军人来把守,而且保卫帝国的领土完整与他们本身利益息息相关,他们也熟悉阿拉伯人和保加尔人的作战方法。这

113

样一来帝国就具备了专业的地方预备武装，如有需要则可以迅速地部署作战。但是，这种做法存在至少一项重大缺陷。地方上的军事总督在拜占庭政治中开始扮演重大角色，其中更具野心者有能力推翻皇帝。君士坦斯二世，可能是军事体制改革的设计者，毫无疑问也是改革后的第一个牺牲品。他面临来自一个东部军区的军事领袖的反叛。后来又是另外一个军事领袖在公元 668 年刺杀了皇帝，但他争夺皇位未果。随后在公元 695 至 717 年发生了一连串的宫廷政变，其中许多都是由军事总督策划和实施的。

这些演变大大改变了帝国贵族阶层的本质。随着地方管治划归军事统治之下，地方上的统治阶层纷纷涌至君士坦丁堡，在此开始想方设法进入元老院，并获得政治机构的显要职位。这也显现出，业已形成的贵族区别于其他人群的身份界限，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模糊消失了。新的帝国贵族的最显著特征是其对皇帝和帝国特权的依赖。大体而言，此时的贵族都渴望在政治行政体系中谋得一个职位，从而获得俸禄，这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拜占庭这时有了一个权力强大的皇帝，以及一个毫无安全感的贵族群体，这些人无情争斗，以求谋取帝国的官位，结果往往导致朝廷内部阴谋纷争不断。

第一次圣像破坏活动（717－775）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出现了第二波阿拉伯扩张主义。在 698 年，拜占庭丧失了迦太基和北非，到 711 年时哈里发国家已经扩张至西班牙，并进一步延伸至中亚。717 年，在保加尔人协助下，一支强大的穆斯林军队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但是运气这次眷顾了拜占庭人：阿拉伯舰队在开进时被桑托林火山岩浆埋没，这次事件被拜占庭认为是一次好兆头。拜占庭人同时还有一件秘密武器——一种称作“希腊火”的神秘液体，与水接触后会燃烧，可以用来摧毁阿拉伯舰队。阿拉伯军队仍然一心想着攻破城墙，但不得不熬过极其严寒艰苦的冬天，还有鼠疫和来自以前盟友保加尔人的袭击。最终围城得以解除，率众抵抗的将军叙利亚的利奥（利奥三世，717－741 年在位），获得支持成了

114

皇帝。

所幸的是,717 年的阿拉伯人围城之后,类似事件再没有发生。哈里发国家内部持续升级的纷争,以及发生在 750 年的阿拔斯接掌权力,给了拜占庭恢复元气的时间,使拜占庭在东部前线建立起了均衡的军事实力。利奥精明强悍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741—775 年在位),建立了三支精锐部队直接归自己指挥,从而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同时强化了个人安全。这些部队(tagmata,意为皇帝的卫队)就驻扎在都城以内或附近地带,形成了拜占庭军队的核心力量。事实上,在利奥和伊苏里亚王朝(Isaurian,717—842)统治时期,帝国开始在表面上显露出趋于正常的态势。皇帝们得以用心处理那些"和平时期"应该解决的事务,利奥开始着手司法改革,君士坦丁修复了公共纪念建筑和诸如主水道这样的公共设施。同时,君士坦丁对都城慷慨大方,彰显帝国取得的丰功伟绩。他还将来自希腊和爱琴海岛屿的定居者重新安顿在都城的郊区。

然而,伊苏里亚王朝的皇帝们率领帝国恢复元气的事实,并不足以平息众多的批评。事实上,现存的资料对他们的评价极不友善,有些甚至将这对父子比作是路西法。人们只记得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废除了圣像崇拜,而对他们所达成的其他所有成就则一概无视。

在公元 8 世纪和 9 世纪,反对圣像崇拜的论战使我们对当时拜占庭所知的一切黯然失色。基督教信仰中圣像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基督的圣像的作用,在神学典籍中并非首次出现,但是在早期的伊斯兰征服之后,这一话题凸显出至关重要的意义。利奥反对圣像崇拜的根本理念,可以从他同哈里发欧麦尔二世(Umar Ⅱ,717—720 年在位)的通信中一探究竟。他在信中认为圣像崇拜从圣经中找不到支持,欧麦尔则强调了穆斯林在军事方面取得的成功是与他们严格禁止圣像崇拜紧密相关的。在希拉克略时代,拜占庭人在征战中携带圣像,还把圣母的圣像带到堡垒城墙上,但是他们却遭受到一个接一个失败。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利奥相信圣像是一个累赘和不利因素。既然纯正的"东正教"是对付厄运的唯一保障,那么圣像崇拜就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非正

统的，因此是要被禁止的："圣像破坏"字面含义即是"将圣像打碎"。现代学者们也将利奥的这一政策解读为其对教会和通行宗教实施更大影响力的一个举措，尤其是出于对圣徒膜拜进行制约的考虑。通过将那些虔诚的信徒纳入集中控制之下，皇帝可能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来防止对东正教的偏离。

圣像破坏在拜占庭社会的方方面面得到了相当大的支持，尤其是在军人之中，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拜占庭人而言，圣像是一个几乎家家必备的亲密物件。耶稣、圣母和圣徒的圣像被视为同圣灵沟通的方式，提供了获得神的保佑和庇护的直接通道。那些支持者宣传圣像是神的表征，但是批评者认为圣像被视为圣物是那些支持者的自作主张。帝国到处都是圣像，许多因具有神奇的力量而出名：有些圣像据说还会哭泣和流血。

利奥反对圣像崇拜的决心在公元 726 年变得更加坚决，当时在桑托林又爆发了一场火山喷发，天空被染黑，爱琴地区遭受了大块浮石的侵袭。公元 730 年，他命令教士将圣像移出教堂。我们的文献来源都是对此事件做了极其不友善的记载，记述了这场迫害的地狱般场景。有一文献如此评述皇帝：

> 发狂的野兽把属下所有臣民召集至一处，在人群中像狮子般咆哮，从内心的愤怒喷发出火焰和怒骂，发出这样令人悲伤的命令："制造圣像是一种盲目崇拜的技艺；圣像不可受到崇拜。"[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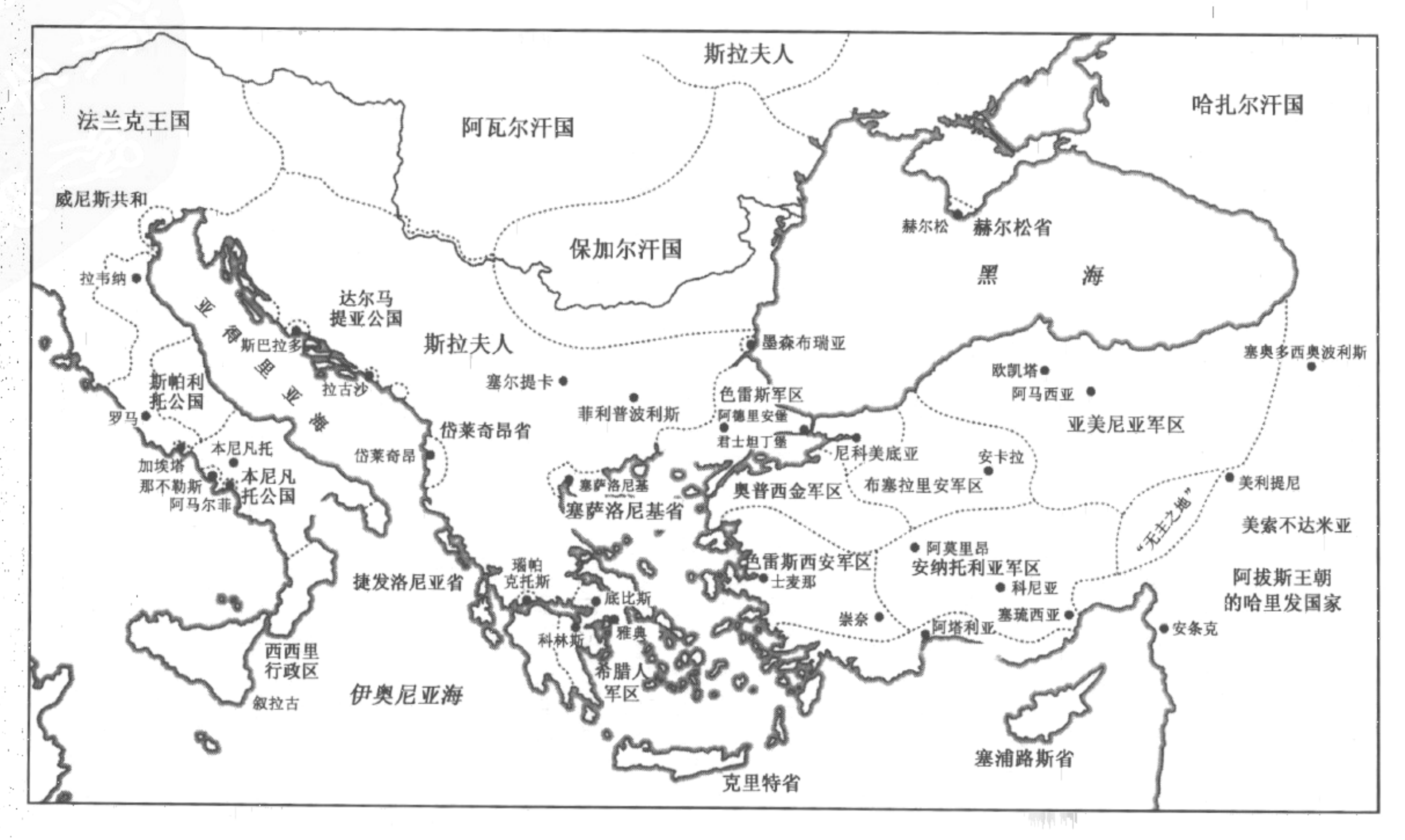
历史学家们不太情愿关注如上这些带有偏见的文献，尤其是考古研究并不支持那种认为当时发生了恣意破坏的看法。但在君士坦丁五世统治时期，神职人员和修道士的确受到了迫害，当时产生了至少一位有名的殉道者：公元 764 年，圣斯德望(Stephen the Younger)——修道士团体的创立者和圣像崇拜的坚定捍卫者，就受到严刑拷打，最后被处决。

东正教的胜利(775－843)

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包括皇室成员在内,绝大多数拜占庭人仍然是“圣像崇拜者”。官方正式恢复圣像崇拜(787)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是再后来,军方对抗保加尔人遭遇失败,又导致钟摆摆回原点。公元811年,保加利亚可汗克鲁姆(Krum)的军队俘获了皇帝尼基弗鲁斯一世(Nikephoros Ⅰ,802－811年在位),用他的头颅做成了一个酒具。反对崇拜圣像的利奥五世(813－820年在位)设法逆转局势,在与保加尔人的斗争中占据上风时,废除圣像的官方运动重新开始了。随后是一系列迫害活动,但这第二波的圣像破坏活动,较以往更具有激烈辩论和思想交锋的特征。无论争论的双方孰是孰非,参与辩论的人都充满热情地大量读书,以便获得广博而有力的论据。教育得以在君士坦丁堡复兴,它同时也得益于从8世纪90年代开始,有许多基督教学者从东方穆斯林世界的宫廷和修道院来到君士坦丁堡,他们迁移的原因是当时东方世界的官方态度不如以前宽容。其中有编年史家乔治·辛凯洛斯(George Synkellos),他的著作激发了人们对于历史学的崭新兴趣。教育再一次专注于阿提卡希腊语和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哲学和科学。我们甚至发现“希腊人”一词被褒义地用来描述那些潜心古典研究的人。因此,因教授古代哲学和数学而著名的数学家利奥(约790－869),就称自己为希腊人,即使这个称谓仍然具有异教徒的寓意。总之,希腊主义的复兴反映了希腊文化不再惧怕伊斯兰教,对自身的传统也更有信心。这个时期至关重要,因为古典作品转而载录于羊皮纸,后者比古典文献所用的纸草纸更加持久耐用;同时还见证了小书写体(连笔的草体)的发明,这样更加容易抄写和复制文本。

117

但是圣像破坏活动最有力的影响,却是在将“东正教”界定为一种独特的基督教形式方面所起的作用。在838年,令拜占庭社会震惊的事发生了:穆斯林洗劫了阿莫里昂(Amorion),一个位于安纳托利亚中心的市镇,在东部边界线以内。圣像破坏活动名誉扫地。因此在公元843年3月11日,圣像正式得以恢复,这一天也被当作是重归东正


斯拉夫人
法兰克王国
阿瓦尔汗国
哈扎尔汗国
威尼斯共和
保加尔汗国
赫尔松
赫尔松省
黑海
拉韦纳
亚得里亚海
达尔马提亚公国
斯拉夫人
斯巴拉多
墨森布瑞亚
塞奥多西奥波利斯
欧凯塔
斯帕利托公国
拉古沙
塞尔提卡
阿马西亚
罗马
色雷斯军区
菲利普波利斯
阿德里安堡
亚美尼亚军区
岱莱奇昂省
君士坦丁堡
本尼凡托
尼科美底亚
安卡拉
加埃塔
岱莱奇昂
那不勒斯
本尼凡托公国
塞萨洛尼基
布塞拉里安军区
美利提尼
阿马尔菲
奥普西金军区
塞萨洛尼基省
"无主之地"
美索不达米亚
阿莫里昂
瑙帕克托斯
色雷斯西安军区
安纳托利亚军区
捷发洛尼亚省
士麦那
科尼亚
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国家
底比斯
崇奈
塞琉西亚
科林斯
雅典
阿塔利亚
安条克
西西里行政区
希腊人军区
叙拉古
伊奥尼亚海
塞浦路斯省
克里特省

拜占庭帝国（约 780）

教的纪念日。一直到今天,在大斋节的第一个星期天,人们都会纪念这一事件,称之为"正教节"。然而,东正教与其说是得以恢复,不如说是经过了重新塑造,因为圣像破坏活动的深远影响是将圣像变成了东正教信仰的主要内容。神学家们,比如大马士革的圣约翰(St John of Damascus,约 665—749)以及圣狄铎主教(Theodore of Studios,759—826)就已经提供了此类观点,主张圣像是沟通现世和神灵之间的必要渠道。圣约翰有如下阐述:

> 上帝怎么可能是由无生命的物质孕育而来?…… 上帝的本性同以往一样,上帝造就的人充满活力是得益于拥有逻辑条理且富于理性的灵魂。此外我还尊敬和善待一切物质。通过这些充满神奇力量和恩典的物质,我的灵魂得到拯救。[4]

118 圣像得到认可,成为同神灵沟通的媒介,因此获得了可以匹敌圣餐和圣礼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如此,圣像受到更加严格的教会规约。从 9 世纪开始,圣像就限于教堂内部和家庭使用,风格和规范必须严格得到遵守。具有图解式鲜明风格的"拜占庭"圣像,线条粗犷、着色浓郁,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标准。圣像一直以来都作为表达虔诚的一种共同普遍象征而被教会借用,牢固地确立为一种标准。

公元 843 年的"东正教的胜利"之所以影响深远,还有一个原因。在外人的眼里,以圣像为中心的信仰使得东正教具备了"希腊"属性。正是这一具有希腊属性的东正教在 9 世纪时得以在巴尔干斯拉夫人和罗斯人中广为传播。事实上,从这一时期开始,可以看到一系列"希腊"东正教国家开始形成,出现了一个通过统一的教义和宗教活动而维系起来的"共同体"。显然,语言问题相比较而言已经不太重要了。由来自塞萨洛尼基的著名传教士圣西里尔(St Cyril,826—882)发明了格拉哥里文字(古代斯拉夫字母),将斯拉夫语确立为教会语言。

希腊的复兴(800—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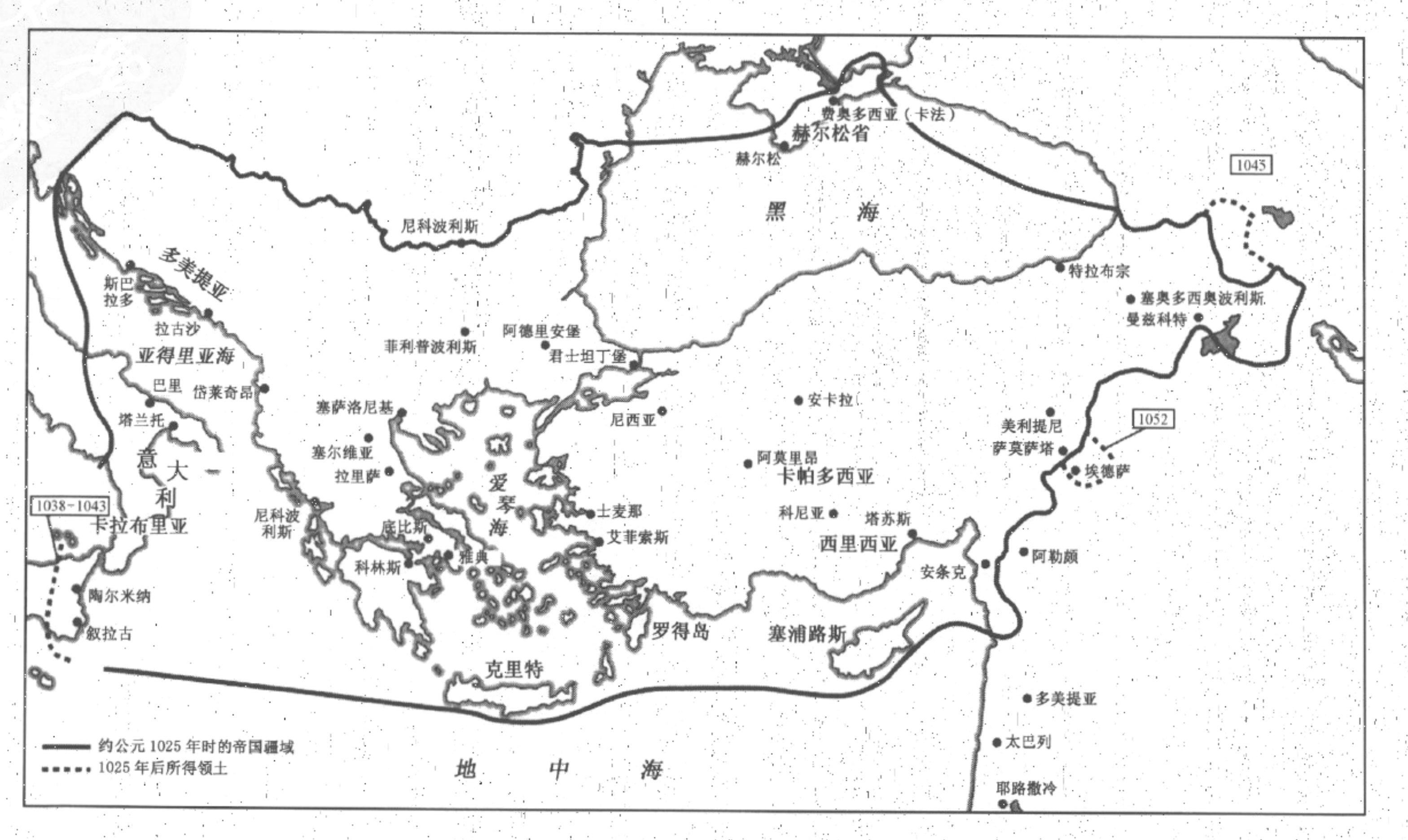
拜占庭的时来运转伴随着其物质处境的改善。考古数据显示人口

出现了增长，农业产量开始提高。农业增收受益于气候变暖，以及随之而来的耕种季节的延长，同时，免遭外敌侵略而带来的安全形势，也促进了农业发展。此时我们又可以看到拥有一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例如阿德里安堡、安卡拉（Ankyra）、艾菲索斯、特拉布宗（Trebizond）、尼西亚（Nicaea）和士麦那。繁荣发展的另一表现是重新引进帝国硬币并大规模流通。因为税收持续增长，同时纳税的基数也显著扩大，特别是伴随着帝国在希腊收复了越来越多的领土，国库收入大量增收。拜占庭再一次变得富有，君士坦丁堡开始恢复以往的荣耀。尽管缺乏资料证据的支持，但利奥六世（886－912年在位）所颁布的法令还是显示出，大兴土木得以恢复，因为利奥六世下令强调了严格管理建筑拨款以及建筑物之间界限划定的重要意义。欣欣向荣的又一佐证是奢侈物品的贸易额增长明显，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贵族阶层中存在着显著而奢侈的消费风潮。

119

希腊也开始缓慢复兴。为数不多的几个仍由帝国统治的希腊南部地区，被组建成“希腊”军区，并以科林斯作为其中心。塞萨洛尼基是另一个军区的都城，而克里特岛和伊奥尼亚岛屿则形成规模小一些的地方区域。重新征服希腊剩余领土的行动开始于君士坦丁五世时期，但大部分使命在尼基弗鲁斯一世（802－813年在位）统治时期得以完成。对于这些征战，我们所知甚少，仅了解到征战的主帅是一位名为斯克雷罗斯（Skleros）的名不见经传的将军，编年体史文献很少有关于他的记载，原因可能是此等出征本身乏善可陈，抑或因为皇帝当时忙于同保加尔可汗克鲁姆较量。重新征服希腊，可能是出于收复帝国领土的意图，也可能是为了对付斯拉夫族群，他们一直在不断侵扰诸如帕特拉斯这样欣欣向荣的拜占庭辖下市镇。

斯克雷罗斯建立的功绩奠定了希腊复兴的舞台。随着再次征服，广袤的土地得以开垦，从而涌现出新的农业人口聚居区。帝国的意图非常明确，通过将忠于帝国的拜占庭人迁移至马其顿、色萨利和伯罗奔尼撒西部这些内陆地区，使原来这些地方的当地居民在数量上不再占有优势，从而易于安抚和统治。有意思的是，希腊的本土居民从这个时



费奥多西亚（卡法）
赫尔松省
赫尔松
1043
黑海
尼科波利斯
特拉布宗
塞奥多西奥波利斯
曼兹科特
多美提亚
斯巴拉多
拉古沙
亚得里亚海
巴里
岱莱奇昂
塔兰托
意大利
1038-1043
卡拉布里亚
陶尔米纳
叙拉古
菲利普波利斯
阿德里安堡
君士坦丁堡
塞萨洛尼基
塞尔维亚
拉里萨
尼科波利斯
底比斯
科林斯
雅典
爱琴海
士麦那
艾菲索斯
尼西亚
安卡拉
阿莫里昂
卡帕多西亚
科尼亚
塔苏斯
西里西亚
安条克
美利提尼
萨莫萨塔
1052
埃德萨
阿勒颇
罗得岛
塞浦路斯
克里特
多美提亚
太巴列
耶路撒冷
地中海
约公元 1025 年时的帝国疆域
1025 年后所得领土

拜占庭帝国(约 1025)

期开始被称为希腊的人民（Helladikoi），而非以前含蓄不清的“希腊人”（Hellenes）。

自查士丁尼时代以来，希腊就再没有呈现出这样人口增长、城市蓬勃焕发的安定局面。希腊能够重获繁荣和都市出现蓬勃发展的势头，都得益于该地区能够重新融入地中海贸易网络，这种贸易网络的地域范围甚至可能更广阔——考古学家们在伯罗奔尼撒西部的迈索尼（Methone）挖掘出土了一块中国瓷器的碎片。从公元 7 世纪开始，海上贸易一直绕开希腊大陆而进行，原因是其贸易中心地位的衰落，只留下如莫奈姆瓦夏（Monemvasia）这样为数不多的堡垒前哨。但是在 9 世纪时，贸易重新回归希腊，繁荣景象可以从自 30 年代开始穿过科林斯湾的川流不息的运输得到见证。科林斯湾当时通过如帕特拉斯、瑙帕克托斯（Naupaktos）和科林斯这样的港口而辐射至内陆地区。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还从不断增加的发掘自科林斯的硬币规模上得以证明。科林斯被当时路过的朝圣者描述为一座被重新唤醒的城市。雅典、底比斯、帕特拉斯和科林斯再次成为富有的制造中心，同时建筑方面也出现了复苏和发展。新建的教堂和修道院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北部到处可见。

拜占庭帝国（863－1025）

121

安纳托利亚仍是帝国的腹地，但由于来自东部边界酋长国（穆斯林小公国）穆斯林的侵袭，帝国领土一直遭受分裂蚕食。位于安纳托利亚中东地区的卡帕多恰（Cappadocia）边界一带的基督教居民已经懂得后撤至大量的地下城（位于现在的格雷梅［Goreme］、凯马克利［Kaymakli］和德林库尤［Derinkuyu］附近），这些地方足以容纳数以千计的人长期生活。这些令人称奇的地下生活区拥有正常生活环境所应有的所有设施，包括教堂、餐厅、磨坊、储藏间以及水井。然而，从公元 9 世纪后半叶开始，这些完善的避难所逐渐遭到废弃闲置。从 863 年起，随着在安纳托利亚以东的拉拉康（Lalakaon）取得了一场对穆斯林军队的重大胜利，拜占庭人不仅设法维持了边界的稳定安全，同时还取

得了不时越过边境入侵穆斯林领土的优势。

力量对比的转变在帝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分水岭。在中世纪早期的国家里，拜占庭能够与众不同，原因在于其拥有庞大的官僚体系和高效的税收系统，帝国依靠后者可以征收到大部分收入。贵族阶层也依赖于由税收提供的办公开支和薪酬。然而，从公元9世纪中叶开始，掠夺而来的战利品变得极大丰富，沿着边界地带催生出一个经济上独立的贵族阶层。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权贵(dynatoi)，这些新兴军事贵族构筑起地区性的权力网，影响力甚至经常跨越帝国国界，这样就在帝国之内形成了另外的政治权力中心。与帝国统治尤为相关的是，这些权贵们不断扩大对土地的占有，导致农民阶层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少，这样就削弱了帝国的经济结构以及军区这样的地方行政机构，而后者是招募军事力量的主要来源。

经济独立的贵族阶层的兴起，对皇帝构成了重大挑战，但同时也是拜占庭强权复兴背后的活力所在。重新征服希腊的"斯克雷罗斯"就是权贵阶层中的佼佼者，正是他们恢复了拜占庭作为军事强权的名望。

然而，拜占庭帝国的复兴并不能仅仅以领土扩张来衡量。事实上，在公元10世纪末期巴西尔二世统治之前，帝国一直都不愿占领那些可能难以固守的领土，也不会去争夺绝大多数居民不是东正教信仰者的土地。官方的意识形态主张普天下都是帝国领土，但这种宣示只具象征意义。因此在对外交往中，拜占庭使节总是希望别人能认可皇帝作为普天下的统治者(pantokrator)的地位。实际上从7世纪开始，帝国在精神上和军事上都受到制约，因为首先要保卫其现有的领土。另外，即使在此番复兴中，与对手相比，帝国军队也并未占据绝对优势。公元9世纪时，在一场对抗穆斯林军队的持久而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帝国失去了西西里。位于西西里的最后一处据点在902年失守之后，帝国又不得不转而应对第二次由沙皇西美昂(Symeon，893－927年在位)率领的保加尔人带来的生死挑战。

仅仅是在公元10世纪中叶时，拜占庭才重新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当其主要的对手——阿拔斯哈里发国家、保加利亚帝国和

122

加罗林帝国——要么溃散要么衰败之时，拜占庭才开始有胃口扩张其领土。955 年，因其学术成就而更为世人熟知的“紫衣贵族”(Porphyrogenitos)——君士坦丁七世(913—959 年在位)，此时派遣自己的得力军事主帅尼基弗鲁斯·弗卡斯，率兵来到与叙利亚交界的地带，摆平那些来自穆斯林武装的侵袭。尼基弗鲁斯趁势对叙利亚和亚美尼亚大部分领土提出领土要求，最后将这些地区变成了帝国辖下的军区。从此帝国走上了扩张之路：公元 965 年征服了西里西亚和塞浦路斯，967 年征服了亚美尼亚剩余领土，并在 969 年拿下安条克。尼基弗鲁斯还利用自己帝国军事统帅的身份，在公元 963 年罗曼努斯二世(Romanos Ⅱ)突然去世之后，夺取了帝国的继承权。他的侄子和继位者约翰·齐米西斯(John Tzimiskes，969—976 年在位)将帝国的统治扩张至黎巴嫩和保加利亚东部，并屡屡侵入巴勒斯坦。

从 867 年起，帝国皇位就一直掌握在马其顿王朝手中，但尼基弗鲁斯和齐米西斯属于福卡斯家族，也是权贵阶层中势力最强大的家族。公元 976 年齐米西斯去世，皇位本来只能传给巴西尔，即罗曼努斯二世的幼子来接替，但是巴西尔当时尚未成年，被迫与两位势力强大的将军角逐来捍卫自己的皇位：一位是巴尔达斯·斯克雷罗斯，另一位是巴尔达斯·福卡斯。巴西尔二世(976—1025 年在位)最终胜出，但是继位是在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且破坏极大的内战之后，获胜原因主要是获得了来自基辅罗斯(Kievan Rus)——一支不久前已经皈依东正教的新兴强大势力的支持。正是罗斯给皇帝提供了瓦兰吉亚卫士，这是一支由罗斯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组成的精锐雇佣军，由他们来担任皇帝的侍卫。

巴西尔二世作为皇帝的杰出成就在于他恢复了拜占庭在地中海地区超级强权的地位。他征服了保加利亚，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和叙利亚大部变成帝国辖下的受保护国。在巴西尔统治期间，拜占庭达到了中世纪时权力的巅峰。再后来，他被称为保加利亚人屠夫(Boulgaroktonos)而被后来人念念不忘，据说他弄瞎了 1.5 万名战俘的眼睛，给其中十分之一的人留下一只眼睛，这样他们就可以将剩下的

123

人领回保加利亚。现代学者们认为这个传言几乎可以肯定是后人的杜撰,但它确实反映了巴西尔年轻时为了争夺皇位而养成的残酷无情的性格。事实上,巴西尔并不喜征战,但他意志坚定地保持自己对军队的严密掌控,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他的大半生都在征战中度过。

尽管巴西尔在军事上战功卓著,但拜占庭仍然是一个防卫至上的帝国。因为同查士丁尼时期帝国采取的闪电式侵袭战略相比,巴西尔采取的征服策略代价过于昂贵。同样,他统治下所担负的巨额军费开支,以及以奢侈的礼物馈赠为特征的帝国外交策略,都花费巨大。这些开支都要由普通纳税人,即农村的农民群体来承担。可以预测,连年征战造成了强烈的社会不满,而他采取的那些特别措施,例如暂时免除国家的税收,全都于事无补。

事实上,巴西尔采取的极其古怪的对策,使其急需资金的弟弟君士坦丁八世(1025—1028 年在位)迫切要求快速征收那批前期暂时停交的税赋,如此一来便造成了更大的社会不满。经济问题在其继任者们统治期间仍然存在,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持续不断的边界战争,以及造成破坏性通胀的拜占庭硬币贬值。

科穆宁的崛起(1025—1095)

然而,拜占庭面临的最大威胁,却是几个咄咄逼人的新兴外部强权,它们来自三个不同方向,在君士坦丁堡合流汇集。佩切涅格人(Pechenegs)是一个游牧民族,从 11 世纪 40 年代起越过多瑙河发起大规模侵袭。同时,塞尔柱人(Seljuks)是一支隶属于乌古斯(Oghuz)突厥人的族群,皈依了伊斯兰教,占据了里海以南的大片地区,并从此频频对拜占庭东部边界发动侵袭。第三个挑战在 11 世纪 60 年代开始出现:诺曼人——一支得到教廷支持的强大封建势力,开始争夺拜占庭在意大利南部的领土。从军事角度来讲,佩切涅格人、塞尔柱人和诺曼人给帝国造成了各不相同的麻烦。身为游牧民族,佩切涅格人和塞尔柱人擅长骑马和射箭,如此一来,他们与不太机动灵活的步兵部队交手时,通常占据上风。另外一方面,诺曼人是典型的封建骑士,他们在重

装骑兵或徒手搏斗方面，强大至根本没有对手。拜占庭人并非在战场上没有能力与这些族群抗衡，因为这时候的帝国已经开始依赖外国雇佣军团，他们同样拥有上述重要的军事技能。因此，典型的 11 世纪拜占庭军队里拥有众多突厥骑兵和拉丁骑士，得益于帝国强大的税收体系，它具备了别国难以匹敌的实力来雇佣这些最优秀的武装力量。

然而，如巴西尔二世的军事征战所揭示的那样，帝国的税赋体系有着自身的局限。佩切涅格人和塞尔柱人总是能够在花费很小的前提下，非常迅捷地召集起数量庞大的骑兵军队，而拜占庭军队耗费巨大，使得已经不堪沉重税负的农民雪上加霜。更关键的一点是，帝国无法对付同时发生的多起战事，这种局面在 11 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发生过。1071 年，诺曼人征服了拜占庭辖下的意大利领地，接着越过亚得里亚海，咄咄逼人地发动入侵。同年，罗曼努斯四世·狄奥吉尼斯（Diogenes，1068－1071 年在位）企图征服塞尔柱人，但所率军队在凡湖（Lake Van）附近的曼奇科特（Manzikert）遭遇严重挫败，罗曼努斯本人被俘。

接下来的 20 年，拜占庭陷入了动荡和混乱。塞尔柱苏丹艾勒卜·艾尔斯兰（Alp Arslan，1063－1072 年在位）在得到慷慨的妥协以后，释放了皇帝，但与此同时，杜卡斯（Doukas）家族已经在皇帝瓦兰吉亚人卫士的协助下，争夺了皇位。在拜占庭打内战消耗本国实力之时，塞尔柱人趁机不受抵抗就进入安纳托利亚，还带来了人数众多的穆斯林定居者。从这个较早时期开始，我们看到安纳托利亚逐渐“伊斯兰化”的进程，伊斯兰教慢慢成为中部高原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

同时，安纳托利亚边界地区的各大军阀家族开始争夺皇位，但等到尘埃落定时，希腊以外的所有行省都被内斗拖垮了。1081 年，阿莱克修斯·科穆宁（Alexios Komnenos）成为毫无争议的皇位继承者，但他不得不耗费心血出钱养活新招募来的雇佣军团，以此来保卫自己的帝国。值得庆幸的是，公元 1085 年诺曼人的领袖罗伯特·古斯卡尔（Robert Guiscard，1015－1085）在征战中阵亡，诺曼人给帝国造成的威胁由此慢慢消退了。塞尔柱人开始专注于自己的内战，而拜占庭人借助游牧民族库曼人（Cumans）的力量，于 1091 年挫败了佩切涅格人。

125

阿莱克修斯获得了休整时间，一方面可以恢复帝国的经济和税收，同时还要巩固其在君士坦丁堡的个人权威。同时，考虑到贵族间的争斗使得帝国处于崩溃的边缘，他还认识到了重构统治秩序的必要性。阿莱克修斯的解决之道是通过安排一系列精心筹划的通婚，来团结这些大家族。结果，科穆宁（Komnenoi）和其他军事豪门贵族，特别是和杜卡斯、巴列奥略（Palaiologos）和梅里塞诺斯（Melissenos）家族，开始逐渐形成一大皇族，垄断了最高权位，把统治秩序转变成一个紧密联系的家族圈子。

阿莱克修斯的另一主要任务是收复安纳托利亚，即帝国的希腊东正教腹地以及科穆宁的家乡。阿莱克修斯为此需要征召更多的士兵，所以他于1095年初派遣使臣来面见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Ⅱ，1088－1099年在位）。尽管我们无从得知他所写信件的内容，但他争取雇佣军团的请求极有可能是想借助于基督教教徒的互助力量来实现。然而，同年后期，乌尔班利用皇帝的请求，宣布发起针对东方伊斯兰世界的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目的是收复圣地。在乌尔班动员之下，很短时间之内，数以千计武装起来的基督徒朝圣者途经君士坦丁堡，朝着圣地进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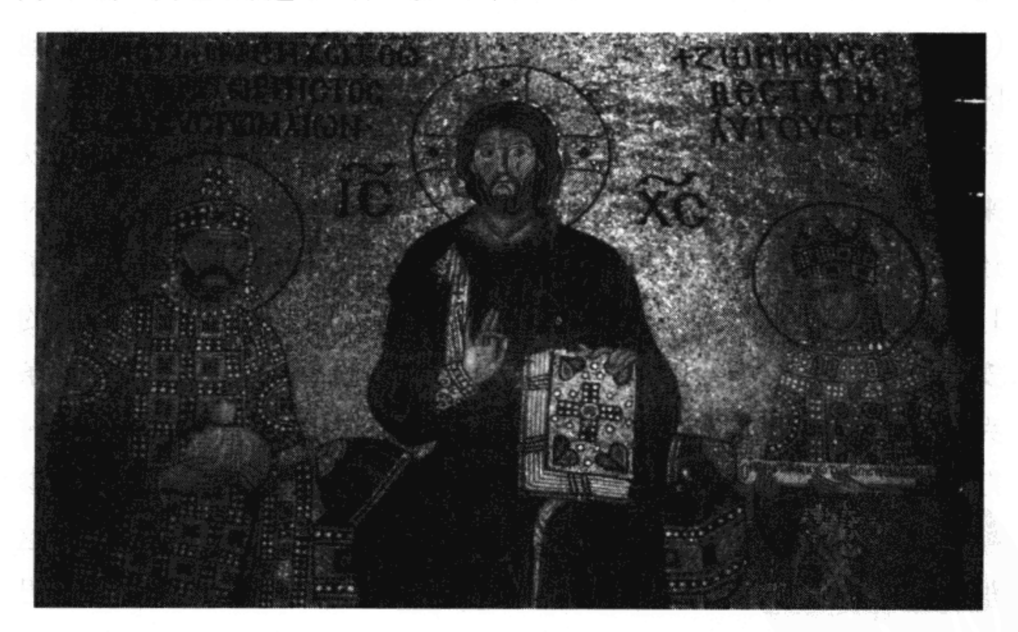
皇帝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揭开了十字军东征的序幕，同时也给帝国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因为他在国内的皇位从来就没有稳固过，他无法冒险允许一支武装起来的远征军长期存在，因为这些人可能被怀有野心的皇亲国戚加以利用。他也不能将这群毫无纪律的外来者们留在城内放任自流。但是，阿莱克修斯没有全心全意支持此次东征，给了参与东征的那些人怨恨他的理由，同时他的忠诚度也受到了质疑。阿莱克修斯寻找借口，没有亲自率军东征近东地区，因此未能帮助拜占庭重新获得它所积极争取的普遍威望，即使他设法获得了这些十字军首领们对他的宣誓效忠，以及将所征服土地和城市都归帝国统治的担保。作为回报，他的这些拉丁封臣将从他这里获得军事协助、物品供应和军事情报。

拜占庭和西方（1095－1180）

虽然诺曼人不断侵袭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使得拜占庭人极其羡

慕那种封建军事强权下的政权模式，但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拉丁欧洲很少引起拜占庭和近东地区战略思想家们的关注。当第一次东征成功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大部领土时，东地中海地区突然暴露在一股强大的势力面前，非常难以摆脱。从 10 世纪中叶开始，拉丁欧洲，包括所有那些受罗马主教直接精神领导的地区，已经发展成一个意识形态统一而且经济相对富足的世界。拉丁教会或罗马教廷也发展为一个更具雄心的组织，寻求行使对所有基督徒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发展的还有同样令人惊讶的欧洲封建贵族，以及他们拥有的召集起令人生畏的、庞大的武装力量的能力。拉丁自信心的增长，从拜占庭的道德威望慢慢衰落可见一斑，而这种衰落的证明就是罗马教廷获得了更有力而稳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以及拉丁国王们都偏爱宣扬自己拥有罗马帝国传统。在罗马教皇支持下，奥托王朝(Ottonians)在德国开始了复兴罗马帝国的进程，包括在 1027 年，康拉德二世(Conrad Ⅱ)加冕为“皇帝”，以及缔造了“神圣罗马帝国”。

127



帝国女人：佐伊皇后与第三任丈夫君士坦丁九世；佐伊辅佐了四位皇帝，并与其妹塞奥多拉 1042 年实行共治(Hagia Sophia, Istanbul, Turkey)

然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对于拜占庭帝国的未来有着更直接的意义。尽管面临极大的困难，派别林立的东征队伍还是历经长途跋

涉，越过安纳托利亚，控制了叙利亚西部和巴勒斯坦的大部分领土。因为认为来自皇帝的支持过于微薄，所以东征队伍对于未能偿还欠债并未心怀太多的内疚和自责，尤其是经历了1098年6月东征队伍被困安条克而阿莱克修斯未能伸手援救这一事件之后。后来，在人数占绝对优势同时又饥饿难耐的十字军把围城者打得落荒而逃时，阿莱克修斯的道德威望轰然坍塌。作为最高统帅，阿莱克修斯被认为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对于许多拉丁人来说，安条克围城印证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即“希腊人”是极其不可靠的盟友。同时，阿莱克修斯还维持着与伊斯兰国家的外交关系，本来这是地中海地区战时外交的正常举措，却也被拉丁人视为希腊人背信弃义的又一个例证。当十字军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建立起新的国家时，他们很少在意皇帝是否应该从中获得权利。

然而拜占庭人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于应对这种危险的处境，在阿莱克修斯、他儿子约翰二世(1118—1143年在位)以及孙子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Ⅰ，1143—1180年在位)统治时期，帝国一直保持着地中海地区唯一超级强权的地位。在阿莱克修斯统治的后半期，安纳托利亚西部大多数地区开始复兴，而到了约翰二世统治时，作为自巴西尔二世以来军事上最强悍的皇帝，他重新获得了对整个巴尔干地区的统治，同时还收复了除了半贫瘠的中部高原以外的安纳托利亚其他地区。到了1137至1138年间，在已经巩固了帝国在巴尔干地区和安纳托利亚的安全形势以后，约翰开始直接干预十字军国家的事务，主要是觊觎安条克，同时也为了谋求十字军对其普遍权威的认可。在曼努埃尔一世时期，帝国没有实施大规模的扩张，但通过在各个战线上积极的政治参与，也维持了帝国的战略地位。曼努埃尔对外政策的记录太过繁琐，这里无法一一细说，其中就包括典型的“拜占庭”策略，例如经济援助伦巴第联盟，以阻止德意志帝国扩张吞并意大利，以及将其女婿贝拉三世(Bela Ⅲ)在1172年扶上匈牙利王位。他手中最有效的武器就是黄金。拜占庭拥有的无与伦比的财富可以用来化敌为友。曾几何时，帝国的目标能够得以实现，所用手段即是输送黄金至奥托王朝、匈牙利、

128

罗马教廷、塞尔柱人和法国的金库中。

科穆宁王朝的黄金时代

拉丁人尽管崇敬曼努埃尔，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推崇“希腊人”。拉丁人（或被普遍称为“法兰克人”）以及有更悠久历史的罗马人都把拜占庭人看作是一个道德败坏、背信弃义的民族。编年体史家提尔的威廉(William of Tyre)告诉我们，曼努埃尔就很推崇拉丁人的一些品行，例如举止优雅和彬彬有礼，在他手下重用过许多拉丁人，他如此依赖“拉丁人的忠诚和才华，以至于不愿意重用希腊人，认为希腊人软弱、缺乏阳刚气概，只愿意把重要事务委托给拉丁人”[5]。在拉丁人心目中，拜占庭依赖外来的雇佣军就很能说明事实情况，就如同希腊人喜好奢侈品和学术胜过喜好作战一样。无需多言，一些人眼中的颓废堕落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则是精明老练。君士坦丁堡对于所有的外来人来说，即使是在最漠然的拉丁访客眼里，都是令人目眩神迷的。当编年体史家恰特的佛尔舍(Fulcher of Chartres)于1096年第一次造访君士坦丁堡时，对这座城市的规模和宏伟深感敬畏：

> 啊！君士坦丁堡是多么高贵美丽的城市呀！城内拥有如此众多的修道院和宫殿，建造工艺如此精美！在大街小巷你能目睹如此精美卓越的事情发生！城内的财富数不胜数，应有尽有，黄金、白银和各种的华丽衣裳，还有各种圣物。[6]

类似佛尔舍所作的热情洋溢的赞美非常普遍。一个多世纪以后，杰弗里·德维尔阿杜安(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曾写道：“那些从未到过君士坦丁堡的人会专注地凝视着这座城市，从未想象到世界上竟然会有如此神奇的地方。”[7]

如前所述，拜占庭的辉煌灿烂并非反映在其开疆扩土或显耀战功上，而是体现在雄厚的财富上，而最能体现这些特质的莫过于君士坦丁堡了。在科穆宁王朝统治时期，城内居民多达40多万，是当时欧洲人

129

口最多的城市,能与其媲美的只有穆斯林城市科尔多瓦-威尼斯,后者人口超过 8 万,就已经是最大的拉丁城市了。朝圣者、十字军和商人都对这座城市的繁华宏伟和其作为世界性城市的活力震撼不已。每一个途经金门(Golden Gate)、穿过主大街而来到市中心的人,或者从阿德里安堡之门起步经过其他路线来到市中心的游客,都会目睹这一座座宏伟建筑:大教堂、雕塑、广场、宫殿似的宅邸、医院、福利设施,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建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同时还有奥古斯塔广场(Augousteion)、大体育场和坚不可摧的狄奥多西城墙。如同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城以及早期帝国时期的罗马城,君士坦丁堡的城市风貌传达了一种帝国的虚荣矫饰,以及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和成就感。就此而论,以及从其他许多方面来看,12 世纪时的拜占庭仍然是一个"古典"社会:拜占庭人眼中的理想社会仍然是想象中理想化城邦的景象。

到了科穆宁时代,帝国再一次成为城邦的世界。塞萨洛尼基仍然是第二大城市,拥有 15 万居民,但其他标准规模的城市,像科林斯、奥赫里德(Ohrid)、莫奈姆瓦夏、雅典和底比斯,最多就只有 2 万人口。希腊在这一时期特别重要。一个阿拉伯地理学家曾经说过,仅在伯罗奔尼撒地区,就有 13 至 16 座大城市。一个地区是否能够成为中心的判断标准是该地区的生产力和贸易量。科林斯和底比斯成为丝绸和服装制造的主要中心。迁入的移民数量的多少是一个城市活力的标志。来自埃及法蒂玛王朝(Fatimid)的犹太难民给希腊大陆带来了玻璃和丝绸制造的专业技能:有多达 2 000 名犹太人迁移到底比斯定居。可能当时正在发生的城市复兴的最显著标志,就是城市里的贵族们在一定程度上准备投资艺术品,尤其是开始出钱资助建造教堂了。

令拉丁人对拜占庭文明印象深刻的还有其他方面,例如官僚化的政府机构和帝国权威的非凡影响。根据中世纪的标准,拜占庭帝国是一个政权极其集中的国家:其影响力直接渗透至每一个地方区域。它可以做到施行单一货币以及度量衡的单一标准。因此,在许多重要方面,拜占庭的体制仍然是一个复杂的古代社会结构,同时也证明它比中

世纪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具凝聚力、更富有活力。

130

拜占庭人在维护希腊教育传统方面不遗余力。从希腊化时期至今，标准课程的内容就没怎么发生过改变。一般的拜占庭贵族都理应掌握阿提卡希腊语，还要熟读古典文献。12 世纪尤其见证了纯文学的繁荣发展。古典剧作家、诗人和哲学家灵感迸发，创作出新著作和独具匠心的仿写作品，还出现了大量的学术批评著作。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塞萨洛尼基的优斯达希斯(Eustathios of Thessaloniki，1115－约 1196)的著作，他对荷马、品达和阿里斯托芬都做了细致的点评。这个时代还产生出大量在科学、医学、地理和其他许多世俗领域的研究成果，因此可以以盛产“经典著作”而自居，例如安娜·科穆宁娜(Anna Comnena)的《阿莱克修斯传》(*Alexiad*)，就是一部可以媲美任何古代伟大著作的历史文献。

学术研究得益于一个文艺“氛围”，或类似于喜爱阅读的大众群体这样的社会背景。安娜·科穆宁娜和其他富有的贵族资助那些有前途的学者，并招待那些与自己拥有相同文艺和学术品位的文人。尽管没有诸如拜占庭大学之类的机构，君士坦丁堡以及其他主要拜占庭城市都拥有数目众多的个体学者，而国家还会给各个世俗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们提供薪酬。另一个中世纪拜占庭的显著特征是，读书识字并不局限于社会统治阶层。毕竟，帝国行政机构里到处都是与文字打交道的工作人员，这些人都出身卑微。显然在社会中间阶层中也随处可见会读书识字之人。科穆宁时代的显著特征是希腊乡土文学的繁荣，尤其是浪漫作品和讽刺作品的兴旺：正是经由这个时期，我们确定了第一部关于迪杰尼斯·阿克里塔斯(Digenis Akrites)的书面记载的时间，这部作品算得上是最著名的拜占庭史诗了。当然，拜占庭和中世纪欧洲的大部分文艺著作本质上还是宗教主题(圣徒传记、神学作品，尤其是讨论异端邪说的作品)为主，但正是拜占庭赋予了世俗研究以相对重要的意义，才形成了东、西方之间最显著的对比。

正是与希腊主义之间的深切共鸣，将科穆宁文化同较早期的拜占庭历史真正区别开来，同时也同西方同时代的文化发展相区别。为什

么希腊主义有如此大的魅力？原因与蛮族有关。这些人已经渗透至拜占庭世界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其中的法兰克人（十字军中的骑士、朝圣者和商人），同时还包括维京人、突厥人、斯拉夫人、格鲁吉亚人和其他许多在帝国军队中服役的族群。拜占庭的贵族们觉察到一种紧迫性，迫切需要就“罗马主义”做一定义，对他们而言，其中的精髓即是希腊传统和教育。公元9世纪时，希腊主义被认为与一些个人紧密相连，像数学家利奥，但到了11世纪和12世纪时，对此定义的兴趣变得更加普遍和彰显。人们开始读到一些学者宣称希腊古典传统是“我们”的传统。在一篇献给皇帝约翰一世的演讲中，宫廷诗人西奥多·普罗德罗莫斯（Theodore Prodromos，约1110—1170）将敌人塞尔柱突厥人比作薛西斯时的波斯人，赞美皇帝拒绝把“属于我们希腊”的土和水给予塞尔柱人。

131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穆宁的贵族们开始把自己视为希腊人。相反，上面所述仅是诸多属性中的一点，这些属性决定了他们属于罗马人：事实上，东正教在这些属性中无疑更具重要意义。但是，随着蛮族攻占了都城、瓜分了帝国，希腊主义也确实在随后而来的时代里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六章　希腊世界(1200－1700)：法兰克人和奥斯曼人统治下的生活

1180年曼努埃尔·科穆宁去世后不久，拜占庭宫廷堕落为一个充斥着宫廷密谋、谋杀和政变的滑稽展示舞台。早期科穆宁王朝统治下帝国享有的荣耀迅速褪去，曼努埃尔心怀抱怨的继位者们，允许外国军队在各地恣意妄为，国家逐渐滑向破产边缘。拜占庭帝国最终轰然坍塌。1204年，一支十字军为了弥补巨额债务，夺取了君士坦丁堡并在城内洗劫掠夺；各个地方行省支离破碎，变成了一些更小的地方区域。 132

1261年，一个希腊东正教统治者收复君士坦丁堡，宣称恢复“罗马帝国”。在短期之内，声名显赫的迈克尔八世·帕里奥洛加斯还成功地将帝国建造成一个地区强权，但在恢复国内事务的秩序方面不太顺利。迈克尔坚信自己有能力让时光倒流，重新建立起帝国统治者的道德和政治权威，自己会成为像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一样的传统意义上的绝对统治者。但是，世界自科穆宁时代以来，已经发生了太多改变。1261年时的希腊世界(oikoumene)在拉丁人入侵的影响下，虽然整体上已经更加融合协调，但不像以往那样容易接受统一的帝国统治这样的传统体制。当拜占庭军队出征收复伯罗奔尼撒时，他们就遇到来自当地希腊人和拉丁人的反抗。具有“罗马”属性不再意味着一定要成为罗马臣民。

究竟什么发生了改变？拜占庭帝国得以长存，是独裁体制和东正教的基督徒臣民之间融合统一的产物。这种融合统一的首要象征即是皇帝和他辖下的城市。只要君士坦丁堡尚存，帝国就不灭。然而，拉丁人造成的中断期(1204—1261)极大地削弱了这种联系。拜占庭从科穆宁统治以前就开始持续打压贵族阶层权力的增长，以及其他倾向分散的力量(包括城市、修道院和地区等各个层次)，但这一中断期加快了这个凝聚力消退的进程。在1261年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形下，希腊世界将“东正教”视为罗马身份认同的根本标准。在塞浦路斯和伊庇鲁斯这样偏远的地方，希腊人有时心满意足地生活在外国封建宗主的统治之下，这时他们心中的最高道德权威就是教会，而非皇帝(以及辖下的城市)。

133

通往1204年之路

如果要找出拜占庭帝国衰亡背后最主要的因素，那么应该是贵族统治阶层甘愿牺牲掉帝国的利益，来换取个人一己之私利。在1180年曼努埃尔去世之后，统治者之间自相残杀的突出才能就得以充分暴露和施展。从一开始，各种邪恶的宫廷阴谋围绕着阿莱克修斯二世(1180—1183年在位)的摄政权而展开。阿莱克修斯二世的母亲，安条克的玛利亚(Maria)化解了来自其继女的挑战。但最终是曼努埃尔的一个侄子、也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安德洛尼卡·科穆宁(Andronikos Komnenos，1883—1885年在位)，于1182年用武力获得了摄政权。虽然年过六十，安德洛尼卡却如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胸怀大志。1183年，他觉得地位足够稳固，便将皇后和阿莱克修斯两人统统勒死，接着在统治家族内部发动了一场血腥残酷的清洗运动，来铲除所有潜在的竞争对手。许多人逃亡到外国宫廷寻求避难，还乞求这些国家进行干涉，来对付安德洛尼卡。同时，由于边境防务受到忽视，这些地方遭到了侵占和劫掠。1185年，当诺曼人占领了塞萨洛尼基的消息传来之后，安德洛尼卡被废黜，受到暴民的虐待。暴民们接着迫使伊萨克·安格洛斯(Issac Angelos)继位。伊萨克是统治家族里地位低微的一个成员，也是当时留在君士坦丁堡为数不多的家族成员之一。接下来的十

年里(1185—1195)，伊萨克在恢复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权力方面多少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急速耗尽的财力和来自皇族内部成员的不断挑战，使他倍感压力、疲于应对。

同时，拜占庭在国际上逐渐被视为一个人尽可欺的软弱对象。1189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队伍就获准肆无忌惮地洗劫马其顿和色雷斯。1191年理查一世(狮心王)没有受到抵抗，就拿下了塞浦路斯。后来，伊萨克死于自己的兄弟阿莱克修斯三世·安格洛斯(Angelos，1195—1203)幕后策划的一场密谋，这之后拉丁人就懒得再对拜占庭使用外交礼节了。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1190—1197年在位)为其计划中的东征要求拜占庭出钱出力时，阿莱克修斯三世竟然非常丢脸地照办了：他为此下令开始征收一种新的税种，即声名狼藉的“德意志税”(Alamanikon)。然而，对于拜占庭对十字军东征表现出来的消极被动，罗马教廷极其失望。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1198—1216年在位)直言心中的不悦：

134

> 你们理应尽最大可能充满热情地参与，如此你们方可在遥远的地方熄灭或助燃冲突之火焰，以防冲突之火以某种方式一路燃至你们的领土之上。[1]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在曼努埃尔去世以后拜占庭的急速衰亡，是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所导致。有人指出，国家税收的减少是因为贵族阶层持有越来越多的土地，而且享受着税赋减免和其他许多特权。另外，帝国未能维持地区军事防务力量，经济发展也没有跟上急剧增长的战争开支的需求。也有许多人提到希腊基督徒和拉丁基督徒之间日益增长的隔阂。尤其令拉丁领导人恼火的是，拜占庭拒绝接受罗马教廷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还有就是拜占庭准备与穆斯林强权之间增进联系。可以肯定，有相当数量的拉丁人都认为希腊人不比异教徒好多少，甚至认为拜占庭本身就是圣战的合法目标。

也有别的观点认为，真正致命的唯一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是所有

中世纪君主们共有的问题,是耗费力量来遏制分离势力的增长。在13世纪一开始时,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神圣罗马帝国在12世纪90年代就陷入了内战的泥潭,而英格兰国王约翰正在处理一场危机,最后结果是大宪章的签署。事实上,没有一个地区的君主参加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去中央集权化的进展在巴尔干-安纳托利亚地区更为突出,这里曾有过统治着整个地区的帝国(保加利亚、塞尔柱和拜占庭),而其时,君主们却都被迫反击来自家族内部成员和其他贵族的不断挑战。在这一时期政治日益动荡的背后,是君王和其他统治者们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于劫掠来的战利品,使发动战争变得日益迫切。因此这个时代是国与国之间政治极其动荡不安的一个时代:历史学家拉伊奥(Angeliki Laiou)就发现,应用混沌理论来阐释该时期国际关系的本质再适合不过。[2]

135

这一时期另一个重大发展,是拜占庭与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海上强权威尼斯的关系不断恶化。威尼斯曾经一度是拜占庭的附属国,在此期间通过利润丰厚的东方贸易变得富足起来,及至11世纪,威尼斯人的大型市场和商人集聚区在东地中海地区随处可见。同时,拜占庭逐渐变得高度依赖威尼斯的海上霸权。1082年,威尼斯出面帮助化解了诺曼人带来的威胁,拜占庭给予威尼斯大规模的免税回报。及至12世纪,威尼斯以及其他几个意大利海上强权,例如热那亚和比萨,从十字军国家那里也获得了相同的特权。这几个强权合伙控制了地中海海上贸易。由此,拜占庭商人和官员不可避免地逐渐对意大利同行们所享有的特权心生怨恨。1171年,威尼斯人从君士坦丁堡被驱逐出来;在1182年,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受到城市暴民的攻击。意大利人通过武力手段恢复其商业利益仅仅是时间问题,而1204年的十字军东征就提供了这个机会。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4)

第四次东征出师不利。首要问题是要满足威尼斯人开出的海上运输的要价(8.4万银马克)。尽管面临来自内部的极大反对,十字军首

领还是同意先在君士坦丁堡作短暂停留，将最近刚被废黜的拜占庭皇帝的儿子阿莱克修斯·安格洛斯扶上皇位，以换取20万银马克和1万名拜占庭士兵。当威尼斯人和十字军于1203年6月24日抵达城墙外时，他们受到城内守军非常不友好的对待。在非常熟悉君士坦丁堡地形的八十多岁高龄的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的带领下，十字军对防卫最薄弱的地方——靠近布雷契耐宫殿(Blachernae Palace)的海堤发起猛攻。最后，当时的皇帝弃城而逃。8月1日，阿莱克修斯四世(Alexious Ⅳ)登上皇位。他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同十字军结清欠账，但这时国家已经破产。通过洗劫教会财产，他总算是付清了部分欠账，但等到教会财产被洗劫一空后，公开冲突在所难免。1204年4月9日，十字军开始攻城，12日攻入城内。城内守军的军事抵抗瞬间瓦解。

十字军卓越出众的军事才能在1204年得到充分展示，但同时也暴露出拜占庭统治阶层的可鄙。当时皇帝的卫队准备要反抗御敌，可是新登位的皇帝和高层政治家族却落荒而逃，丢下城内老百姓不管不顾。随之而来的疯狂屠杀尽管在一天后被喊停，可能仍然至少有2 000名君士坦丁堡人被屠杀。 136

事实上，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标志着东正教世界和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永久决裂。双方之前的矛盾，比如1054年发生的教会分裂，只是教会事务上的分歧，可以通过辩论和妥协得以解决，但1204年实施的暴行在东正教基督徒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比洗劫和杀戮更令人震惊的是亵渎圣物的暴行，特别是发生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里面的事件。拜占庭编年体史家尼西塔斯·卓尼亚铁斯(Niketas Choniates)有如下记述：

> 圣坛，由各种珍贵材料构筑而成，受到全世界的敬仰，却被打成碎片在士兵中间瓜分……都是些流氓无赖，负罪之人，性格暴烈的仆人，恶魔的随从……亵渎了耶稣，坐在主教的座位上，唱着淫秽下流的曲调，手舞足蹈。[3]

现代的历史学家们指出,与攻占穆斯林城市之后的行径相比,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的所作所为已经算得上是非常克制了,但是对教堂的亵渎给东正教世界留下了创伤。而且,君士坦丁堡不仅仅是一座城市这么简单。甚至在西方世界看来,这座城市依旧是“君士坦丁大帝之城”,而在东正教基督徒眼里,它是一座圣城:它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和牧首所在地,还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圣物收藏,包括“真十字架”。1204 年在东正教基督徒心中留下的永久影响,就是将罗马教廷和拉丁教会妖魔化了。这时身为东正教徒也就意味着要反拉丁教会。英诺森三世本人也担忧这种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希腊教会“遭受如此多的劫难和迫害,以至于他们在拉丁人身上看到的,仅仅是万劫不复的例证和黑暗带来的后果”[4]。

拉丁中断期(1204—1261)

5 月 9 日,作为十字军领导人之一,佛兰德的鲍德温(Baldwin of Flanders)被推选做了皇帝(鲍德温一世,Baldwin Ⅰ,1204—1206 年在位),但其辖地仅限于君士坦丁堡和周边地区。各行省被划分成一些封建小国,1204 年事件的指挥者,蒙费拉的博尼费斯(Boniface of Montferrat)被赏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王国:以塞萨洛尼基为中心,包括马其顿和色萨利西部的大部分领土。威尼斯人资助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要价高昂:他们控制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牧首职位,以及城市商业区。威尼斯还占领了克里特岛,以及诸多小岛和大陆上的港口,这些海港构成了连接亚得里亚海和君士坦丁堡的海上路线。随着海军实力和海上贸易能力的飞速增长,威尼斯成了 1204 年事件真正的大赢家。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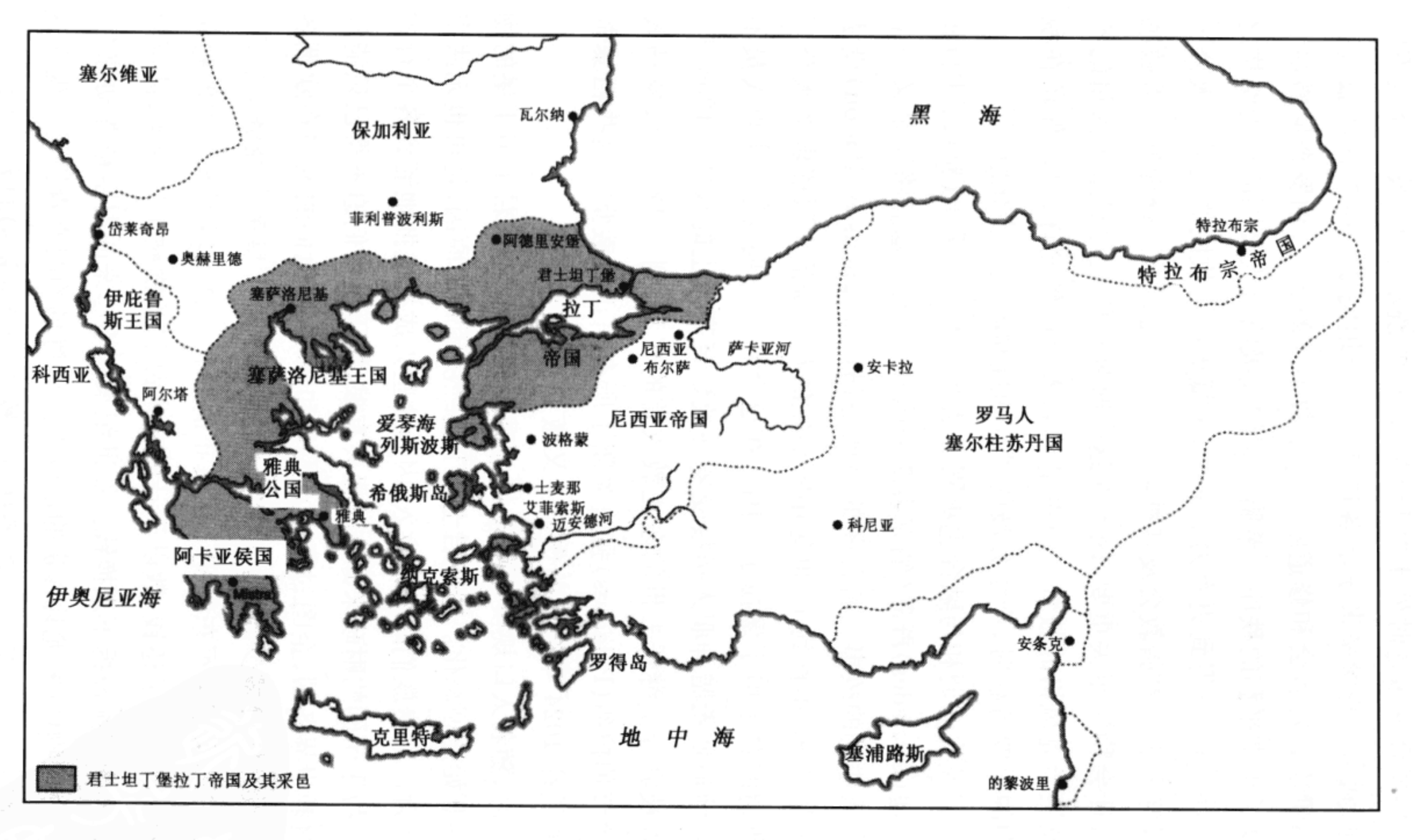
拜占庭剩下的其他一些行省没有怎么抵抗就轻易被占领了。在色雷斯、马其顿和色萨利,通常所称的“法兰克人”是被一些当地人热烈欢迎着进城的,他们认为拜占庭统治阶层腐败透顶,被人民摒弃是罪有应得。再往南,法兰克人战胜了来自希腊军阀(archontes)起初的一些抵抗,例如阿戈利德(Argolid)的利奥·斯古罗斯(Leo Sgouros)和拉科尼亚(Lakonia)的卡马特罗斯(Kamateros),最终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封建

国家。伯罗奔尼撒这时处于“阿卡亚亲王”的统治之下，被划分成不同的封地，利用一些堡垒来统治各自辖下的当地民众。尽管在征服过程的开始阶段针对教会和修道院实施了数不尽的暴行，伯罗奔尼撒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平和的秩序。希腊军阀们被吸收进大公国的权力结构之中，而当地的农民得到更有力的保护，来抵御高地牧民的侵袭。大公国还积极努力满足希腊教会及其神职人员的利益诉求。处理好宗教敏感话题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因此在这个时期很明显地建造了大量的希腊以及法兰克风格的教堂。当希腊神职人员得到允许，可以保留在税务方面的重要特权时，产生分歧的潜在可能也被进一步化解了。

相同模式的调和与融合也巩固了法兰克人在阿提卡(雅典公国)和基克拉迪(Cyclades)群岛(纳克索斯公国)的统治。塞浦路斯是又一个法兰克人成功的故事。普瓦图的吕西尼昂(Lusignans of Poitou)设法实现了从 1197 年直到 14 世纪中叶稳定的君主统治。最脆弱的大公国当属所谓的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在这个帝国时期，拉丁神职人员不遗余力地迫使希腊神职人员接受罗马教廷至高无上的权威。1206 年，希腊人被剥夺了继任去世的东正教牧首的权利，到了 1214 年，罗马教皇的使节伯拉纠(Pelagius)强迫关闭了所有东正教教堂。这些粗暴做法只能是往 1024 年造成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同时，随着人口规模急速从 40 万减少到接近 5 万，君士坦丁堡的物质条件开始急剧恶化。造成君士坦丁堡经济困顿的原因，是再也无法指望那些拜占庭贵族们的个人收入，因为这些人成批成批地溜到各个行省去了。拉丁帝国的财政来源这时极其有限，拉丁皇帝们迫不得已只能周游基督教世界各国，企图讨要一点人员和钱财，但他们的困境在欧洲各个宫廷没有博得多少同情。事实上，正是由于拉丁皇帝在经济上破产，才导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犯下了真正的罪恶。君士坦丁堡城内的财富被洗劫一空。为了还钱，数以千计的艺术品和圣物被出口变卖，甚至皇宫屋顶的铅皮都被拆下来换钱。数世纪来积累起来的财富被洗劫掠夺。在被掠夺的物件中，尤其珍贵的是位于大体育场的四座青铜马。现在这四座青铜马在威尼斯，守卫着圣马可大教堂(St Mark's)的大门入口。

139



拉丁中断时期（约1214）

小拜占庭帝国

新兴的东正教国家开始迅速涌现，实力上完全压过了拉丁国家。每个新成立的东正教国家都宣称自己是拜占庭帝国的替代者。其中包括位于安纳托利亚黑海沿岸东部的“特拉布宗帝国”，以及覆盖希腊大陆西部大部分地区的“伊庇鲁斯君主国”，其缔造者迈克尔·杜卡斯是皇帝伊萨克一世·安格洛斯的堂兄弟，他后来又占领了色萨利大部(1212)和威尼斯人控制下的港口科西拉和岱莱奇昂(Dyrrachion，1214)。其继位者是其兄弟西奥多·安格洛斯(Theodore Angelos，1215－1230年在位)，他收复了塞萨洛尼基(1224)以及阿德里安堡(1228)，这样几乎恢复了帝国原有的疆土，但最后被保加利亚人击败并俘虏至1237年。与此同时，他的亲戚仍然担任国王，持续统治着希腊北部的绝大部分领土。

继承拜占庭的政权中最强大的当属“尼西亚帝国”，它出现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统治者是阿莱克修斯三世的女婿西奥多一世·拉斯卡里斯(Theodore Ⅰ Laskaris，1204－1222年在位)。尼西亚成为君士坦丁堡贵族阶层、高级神职人员、教育者、学者和商人的新家园。重要的一点是，尼西亚皇帝们展现了遵循罗马和拜占庭制度习俗方面的极高效能，在新环境和新人中，这些制度习俗表现出非凡效率。西奥多甚至设法恢复了以前的军区级体系，但他最为可贵的国家治理手段则体现在他采用的拜占庭财税体系上。不同于经济拮据的拉丁帝国，“拉斯卡里斯王朝”拥有实力来雇佣数量庞大的拉丁雇佣军，还建造了一支规模可观的海军舰队。

140

尼西亚帝国在数位颇具才能的皇帝的治理期间繁荣发展，政治稳定，经济充满活力。这一时期在希腊文化史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从9世纪开始，拉丁基督徒们已经逐渐相信自己是真正的罗马人，而被拉丁人描述为希腊人(Graikoi)时，拜占庭人总是心生不满。但在第四次东征之后，拜占庭人将希腊传统单列出来，认为这是在文化意义上使得自己优越于拉丁人的原因所在。我们甚至注意到“希腊人”这一称谓被

用来在族群上进行自我定位。不可否认，证据固然有限，却相当有说服力。尼西亚皇帝约翰·瓦塔挈斯(John Vatatzes,1222－1254 年在位)留存至今的信件里有一个习惯，就是将“希腊人”当成“罗马人”的同义词使用。他的儿子及继位者西奥多二世·拉斯卡里斯(Theodore Ⅱ Laskaris,1254－1258 年在位)曾经明确宣称自己是希腊人后裔。在他所写的一封信中，他宣称尼西亚就是新希腊：“我们现在的环境同当时如出一辙：当时的希腊语言我们现在在使用；我们血脉里流淌着他们的血液。”[5] 牧首也开始把自己视为“希腊”机构，对斯拉夫人和其他东正教民族的兴趣明显地不再如以往。牧首日尔曼二世(Germanos Ⅱ,1223－1240 年在位)曾经谈及辖下希腊教徒的民族纯正性，还准备承认保加利亚教会的半独立地位。

在后续的所有希腊国家中，正是尼西亚帝国最有资格作为拜占庭的合法代理。重要的一点是，尼西亚成了东正教牧首的暂时所在地。尼西亚同时还拥有希腊语学术最杰出的一些学校。最重要的一点，拉斯卡里斯王朝将收复君士坦丁堡视为最优先之事务。历史学家尼西塔斯·卓尼亚铁斯(Niketas Choniates)更是将这一理念提升，认为尼西亚是“新的锡安山”，但也期待君士坦丁堡重新成为“上帝选定的土地”，前提是他们得先赎罪。

拉斯卡里斯王朝在等待属于自己的时机。他们最害怕的是法兰克人再发动一次东征来进行复仇，还有就是竞争对手伊庇鲁斯统治者也有同样的野心。1259 年，决定性时刻到来，迈克尔二世联合希腊的法兰克人统治者，与尼西亚人在希腊北部发生冲突。当时的尼西亚皇帝迈克尔·帕里奥洛加斯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扫清了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的道路。然而，在迈克尔进行任何实质性准备工作之前，该城已经在十分诡异的情形下落入迈克尔的手中。由 800 名尼西亚士兵组成的一支队伍凑巧来到君士坦丁堡的城郊，偶然得知整个拉丁人守城军队都在外执行任务。于是在 1261 年 7 月 25 日，士兵们就这样被带入城内，收复了君士坦丁堡。迈克尔正式入城是在 8 月 15 日，他加冕登上了皇位，成为迈克尔八世(1261－1282 年在位)。拜占庭帝国正式得以恢复。

141

拜占庭归来(1261－1282)

迈克尔八世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此时的君士坦丁堡已是一片荒凉。城内建筑处境悲凉；甚至布雷契耐宫殿都被宣布为危楼而无法居住。重新恢复城内的人丁兴旺以及重建城内的环境，将是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但是最紧迫的担忧却是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反应。报复在所难免。末代拉丁皇帝鲍德温二世(1228－1261年在位)，派兵加入了威尼斯人和阿卡亚亲王威列哈督因的威廉(William of Villehardouin，1246－1278)组成的队伍，但是迈克尔派出了三支队伍挫败了上述力量带来的威胁，并在此过程中斩获了许多座岛屿和伯罗奔尼撒人的堡垒。同时，迈克尔还在与伊庇鲁斯君主国和保加利亚人的作战中屡获胜绩，并将塞尔柱突厥人驱逐出了小亚细亚的迈安德河(Maeander)盆地。1269年，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统治者安茹的查理(Charles of Anjou)牵头组建了一支新的反希腊人十字军，迈克尔化解了这场危机。他出其不意地与罗马教廷就教会联盟展开了谈判，教会联盟最终于1274年在里昂会议(Council of Lyon)上得以通过。查理第二次发动十字军东征的企图，于1282年被所谓的西西里晚祷起义(Sicilian Vespers)再次挫败，这次群众起义可能也是西西里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我们有强烈理由怀疑，是拜占庭在背后出钱资助了这次起义，并在其中扮演了一定角色。

1282年，拜占庭帝国的前景看起来一片光明。在其繁忙统治的末期，迈克尔在各个战线上都击退了威胁，并开疆扩土，把拜占庭重新建造成一个主要政治强权。甚至君士坦丁堡都开始展现出帝都风范。在随之而来的自信之下，迈克尔八世将自己视为“新的君士坦丁”，但在君士坦丁堡人眼中，他同罗马教廷之间达致的交易使得他的威望大打折扣。这样一来，他的命运就同早期圣像破坏活动时期的皇帝们一样了。同罗马教廷和睦友好，可能避免了帝国遭受强大的军事攻击，但这么做却在东正教社会民众中间造成了巨大悲痛，而同罗马教廷谈判建立联盟则更会招致强烈谴责。在君士坦丁堡针对抗议者而采取的残酷报复

142

只能使事态更加恶化。迈克尔在 1282 年去世后，教会拒绝为他举办葬礼仪式，他最后只能在一处没有被祝圣的场地下葬。

因此，迈克尔在国内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在拉丁中断期，教会阶层获得的越来越强大的道德权威。事实上，在整个希腊世界，皇帝的角色已经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在尼西亚帝国时期，皇帝已经被重新定位成人民和教会的“仆人”，而牧首阿赛尼奥(Arsenios)于 1261 年将迈克尔逐出教会，理由是他用邪恶的手段篡夺了尼西亚皇位。后来，桀骜不驯的伊庇鲁斯和特拉布宗君主给自己找的反抗迈克尔权威的理由，就是迈克尔已经被驱逐出了教会。皇权和教权之间平衡的转变，阿赛尼奥本人曾作过非常明确的表述：

> 如若说权力小的必须服从权力大的，那么教会就是权力大的，因为教会的领袖是耶稣，而牧首是其形象代言人。牧首圣化和钦定了皇帝，而皇帝也需要获此恩典。因此皇帝理应心怀感恩之心，服务教会及其作为耶稣形象代言人的领袖。[6]

加泰罗尼亚人和奥斯曼王朝(1282—1328)

凭借其非凡的军事及外交才能，迈克尔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将拜占庭恢复至一个受人尊敬的国际地位。但好景不长。在 14 世纪不稳定的政治条件下，地中海东部每个国家都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在迈克尔那个显然不太具备统治天赋的儿子安德洛尼卡二世(1282—1328 年在位)手里，帝国迅速退回到危险的边缘。

为了庆祝新皇帝登上皇位，各国之间的敌对情势暂时得到缓和。受到这种氛围鼓舞，安德洛尼卡解决了由其父亲军事扩张而导致的财政预算困难，方法是裁减了陆军的规模，同时撤销了海军编制。鉴于帝国在战略方面的脆弱性，以及国际关系中的掠夺本性，这些措施算得上是令人惊讶的短视行为。边界问题不可避免地再次来袭。在 13 世纪 90 年代，帝国在三处边界都遭到大规模的领土损失。塞尔维亚人已经夺取了马其顿北部和阿尔巴尼亚，而没有了拜占庭海军的抵抗，威尼斯

人也夺取了更多爱琴海岛屿。这时，土耳其人也意识到他们有能力占领——而不仅仅只是侵扰——帝国富有的安纳托利亚各行省。安德洛尼卡对于外敌侵略所作出的反制措施效果不彰，首要原因是他本人欠缺军事领导才能，而在后期则是因为缺钱少人。在其统治后期，安纳托利亚几乎完全落入土耳其人之手。政府管制能力欠缺是原因之一，但也要考虑到长期累积的诸多结构性矛盾，其中绝大多数都同权力的去集中化这一大趋势有关。在此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是从 11 世纪开始实施的大额税收减免措施，其中的受益者包括教会、修道院、贵族以及城市和地方上的政治掮客。在迈克尔八世和安德洛尼卡二世统治期间，豁免权和其他特权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得到分享，同时世袭土地也被大规模地派发，以期能换得兵役的来源。

所有上述这些造成的全面后果就是，国家的财政基础以及承担雇佣军队的能力被极度削弱。安德洛尼卡通常只能派出不足 2 000 人的军队。另外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些雇佣军人觉察到国家财力变弱，他们的忠诚度可能会大打折扣。1303 年，加泰罗尼亚大军团提供了一支由 1 500 名骑兵和 5 000 名步兵组成的军队，其要价可能比国家一年的总收入还要高，但身处绝境的安德洛尼卡只能承受。接着，加泰罗尼亚人大胜土耳其人，但同时攻击和洗劫了希腊人，最后不可避免地将矛头指向了拿不出钱来的雇主。这支雇佣军持续数年在拜占庭、安纳托利亚、色雷斯以及马其顿烧杀掠夺，帝国陷入一片混乱。结果，土耳其人在安纳托利亚侵占了更多领土，而热那亚人则控制了许多港口城市和岛屿。这种压力到 14 世纪的最初十年终于减退了，但这时留给帝国的领土仅剩下君士坦丁堡、色雷斯、马尔马拉海周边地区和位于希腊的一些飞地。

正是在遭遇加泰罗尼亚人造成的混乱和动荡期间，一支小规模的乌古斯突厥人武士在奥斯曼率领下，建立了奥斯曼酋长国，位于尼西亚和萨卡亚(Sarkaya)河以东不远处。1302 年，洪水泛滥，给帝国在萨卡亚河沿线的防御造成破坏，使得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拜占庭领土上发动圣战(gaza)，结果涌入了数目众多的穆斯林定居者。到了奥斯曼的继

位者乌尔汗(Orhan,约 1324－1362 年在位)统治时期,奥斯曼人占领144 了最后一批拜占庭大城市:先是普鲁萨(Proussa,1326),接着是尼西亚(1331),最后是尼科美底亚(1337)。

奥斯曼的军事力量在于它能够吸引到大量的家臣,它许诺给这些人土地和奴隶。因此早期的奥斯曼军队里有许多基督徒武士,尽管其核心追随者是来自中亚的突厥武士。如同来自这个地区的传统游牧军队一样,早期的奥斯曼军队战斗力很强大,但并不是特别老练。奥斯曼军队主要由马背上的弓箭手组成,擅长机动和奇袭。他们不太情愿在开阔战场与纪律严明的拜占庭军队相遇,他们唯一的进攻战术就是围城,然后用挨饿迫使城内人投降。而在这个时期,拜占庭还没有办法和能力不让这些危险的机动战士进入其城市郊区。

不同的命运(1328－1354)

由于缺乏原始的资料记载,我们对奥斯曼酋长国早期的内部动态了解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并非仅仅是其军事实力带来的结果。相反,从各种希腊和土耳其资料文献里面我们可以得知,奥斯曼王朝(House of Osman)在国家建设和帝国扩张政策方面具有极其丰富多样的手段和策略。其智谋才略非常清晰地反映在,如若必要,他们会打破突厥和伊斯兰的传统和常规。即使在意识形态上同异教徒针锋相对,奥斯曼人发现明智的做法是寻求与基督教强权建立联盟,并通过婚姻安排来巩固这种联系和纽带。因此,早期的奥斯曼统治者常常会有基督徒母亲和妻子。在争取和维持武士侍从们对自己的忠诚方面,奥斯曼人也好像比对手更加成功。事实上,在整个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对于任何一个统治者而言,要想生存就必须维护贵族和其他重要武士之间的团结。这个时期塞尔维亚人势力的崛起,个中原因就可以通过在贵族之中结成的团结来解释。在将自己的内部纷争最小化了之后,奥斯曼人就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可以充分利用竞争对手存在的内部分歧了。

同时,拜占庭的衰亡并非必然结局。在精力充沛的统治者安德洛

尼卡三世(1328—1341 年在位)及其忠诚而精明的大臣约翰·坎塔库泽努斯(John Kantakouzenos)的治理下,拜占庭开始再次展现出以往的活力。年轻的安德洛尼卡军事领导才能卓越,在其领导下,拜占庭重新确立了在巴尔干南部地区的优势。通过重新控制伊庇鲁斯和色萨利,他辖下的帝国这时包括从君士坦丁堡到亚得里亚海的广袤领土;其中大部分土地都是肥沃的农田,这样就为帝国提供了雄厚可靠的经济基础。奥斯曼人在安纳托利亚的扩张收效很大,希腊南部的法兰克人首领,包括加泰罗尼亚人(他们早在 1311 年就控制了雅典公国),都被迫承认安德洛尼卡的宗主权,而塞尔维亚帝国的缔造者史蒂芬·杜尚(Stephen Dushan),尽管已经宣称自己就是所有东正教民族的"沙皇",这时也被拜占庭成功地遏制。

因此,拜占庭曾经一度展示自己能够在诸雄之间争得一个令人尊敬的强权地位,而当安德洛尼卡在 1341 年 6 月突然去世后,这一切瞬间归零。根据任何标准,约翰·坎塔库泽努斯都是继承皇位的一个天才人选,而且在安德洛尼卡去世后,他处理善后事务以及迅捷而成功地化解一连串重大边界危机的能力也证明了这一事实。但是,为了争夺摄政权,很快爆发了内战。安德洛尼卡的儿子尚未成年,皇后是萨瓦的安娜(Anna of Savoy),她背后有牧首和阿波考寇斯(Apokaukos)大公支持,从而行动迅速,很快就解除了坎塔库泽努斯的政治权力。坎塔库泽努斯受到了一连串的挑衅,例如家庭财产被煽动起来的暴徒洗劫掠夺,他开始了还击报复。

这场内战最具破坏性的一面是各方都借用了外国势力,而这些外国援手注定是要收取丰厚回报的,其中包括拜占庭的领土。开始时,坎塔库泽努斯动用了塞尔维亚人军队,后来越来越依赖艾登(Aydin)的土耳其埃米尔乌穆尔(Umur),两人之间还建立起兄弟般的手足之情。此外还有奥斯曼埃米尔乌尔汗,此人后来成了坎塔库泽努斯的女婿。这些同盟看上去都是建立在真诚的情感纽带之上——乌穆尔拒绝迎娶坎塔库泽努斯的女儿,因为俩人实际上是"兄弟"关系,后来这个女儿嫁给了乌尔汗。这种家庭式纽带并不意味着坎塔库泽努斯的同盟就不会

利用拜占庭的困境来牟利。到了1346年，在坎塔库泽努斯已经赢得战争并登上皇位成为约翰六世后，绝大部分巴尔干地区领土都落入了塞尔维亚人手中。史蒂芬·杜尚宣称自己是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的皇帝。接着在1354年，色雷斯南部的一场自然灾难决定了帝国的长期命运。3月，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靠近欧洲一方的堡垒重镇加利波利(Gallipoli)的居民被迫迁移，因为一场地震摧毁了他们的家园。奥斯曼人同穆斯林定居者迅速占领了这片废墟，重新建造了防御体系，并拒绝将其交还给以前的盟友。一夜之间，奥斯曼人在欧洲大陆拥有了滩头阵地，色雷斯唾手可得。

146

在吞并了加利波利之后的十年中，奥斯曼人占领了该行省的大部分领土，包括后来成为奥斯曼新都城的古城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君士坦丁堡能够幸免完全得益于狄奥多西城墙，除非敌人从海上攻击，否则君士坦丁堡仍然是固若金汤。几乎在150年以前，十字军曾在威尼斯人的协助下攻破过海堤，但奥斯曼人这时仍缺乏海军力量。早年，他们对攻城犹豫不决，因为他们也害怕拉丁基督徒的报复。奥斯曼人的谨慎使得拜占庭又苟延残喘了一个世纪。

奥斯曼人的属国(1354—1451)

早期奥斯曼国家的独特之处在于，与其他地区性强权不同，它在设法逐渐积累实力和领土。情势变得更为明显的是奥斯曼人获得了在巴尔干地区无可争辩的实力，而该地区的人口中绝大多数过去是、将来也仍然是基督徒。当然，奥斯曼人早期曾经在意识形态上决心与基督教强权长期作战，但他们在实践中也意识到，调和与基督徒的利益以及与基督徒王室通婚是必要的手段。例如，有证据显示，巴耶塞特一世(Bayezid Ⅰ)甚至有兴趣建立一个融合了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宗教，这样就可能整合他辖下的所有臣民。奥斯曼统治权威得以巩固的关键，在于将基督徒贵族吸收容纳到新的政治秩序中来。奥斯曼能够征服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主要在于获得了属国的支持，而其中既包括基督徒也有穆斯林，绝大多数都与迅速扩张的帝国体系利害相关。

其他主要的进展包括建立绝对的君主制以及一支只对统治者效忠的常备军队。穆拉德一世(Murat Ⅰ,1362－1389 年在位)创立了一支由奴隶组成的强大私人军队，称作禁卫军(Janissaries)，素质精良，由那些从基督教家庭征召而来的男孩组建，从小按穆斯林培养，在国家机构里接受训练。后来，在 15 世纪早期，王朝继承的问题通过"独子继承制"(unigeniture)加以解决：将新统治者的兄弟姐妹处决掉，以防将来可能对王位带来挑战。通过改造调整旧的土耳其、波斯、伊斯兰和拜占庭的传统，奥斯曼人还引进实施了相当有成效的国家体制和实际操作手段。因此，他们采用了非世袭的土地分封体系，即半封建的蒂马尔制度(timar)，其设计目的是为了支撑一支建立在统治者恩惠基础上的骑兵队伍，其灵感来自类似拜占庭的普罗诺伊亚制度(pronoia)。

与此相比，1354 年之后拜占庭的历史走势则完全不同。在十年内，都城被奥斯曼人完全包围。帝国的国库收入和人力储备尽管微不足道，但帕里奥洛加斯家族仍然设法发动了一连串的内战——先是约翰五世和曼努埃尔·坎塔库泽努斯(Manuel Kantakouzenos)在 14 世纪 50 年代末期打了一仗；接着，约翰和其长子安德洛尼卡四世(1376－1379 年在位)之间发生战事；约翰和其次子曼努埃尔之间也发生了武装冲突；另一方面，约翰和安德洛尼卡的儿子约翰七世之间也打过一仗。每次在拜占庭阵营中发生类似冲突之际，奥斯曼人总能从中坐收渔翁之利。

147

尽管嗜好内斗，但拜占庭帝国统治阶层对于奥斯曼人带来的威胁却很少心存幻想。鉴于自身小得可怜的军队规模，以及微薄的资源基础，拜占庭唯一的希望，却具讽刺性地寄托在再一次十字军东征之上。1369 年，约翰五世甚至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非常公开高调地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但这一极其谦恭之举却不仅没有为拜占庭在西方赢得多少好感，还在国内完全违背了民意。在造访许多王室宫廷之后，他于 1371 年两手空空回到君士坦丁堡。当奥斯曼人在同年后期彻底击败塞尔维亚人后，约翰追随塞尔维亚领导人，寻求封臣的地位。从此以后，拜占庭人被要求在需要时，要向奥斯曼统治者(这时称作苏丹)提供

军事协助。1390 年，拜占庭人被召出兵参与围攻费拉德尔菲亚，这是一个位于安纳托利亚的孤立的基督教军事据点，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独立。

获得皇位后，曼努埃尔二世·帕里奥洛加斯(1391－1425 年在位)拒绝仅被当作属国封臣对待，因此引发了奥斯曼人对君士坦丁堡和伯罗奔尼撒的直接攻击。苏丹巴耶塞特原本计划要踏平幸存的基督徒要塞，但后来不得不对付突然杀到的蒙古人。蒙古人在安卡拉(1402)取得大胜，使得经验不足的奥斯曼帝国陷入一片混乱。拜占庭这才设法收复了从 1387 年起就落入奥斯曼人手中的塞萨洛尼基，以及色雷斯沿着海岸线的大片地区。曼努埃尔同时还慷慨协助了在接下来的奥斯曼继位权的争夺中最终胜出的穆罕默德一世(Mehmet Ⅰ,1413－1421 年在位)。随后，两个国家开始了和平共处，直到曼努埃尔之子约翰因为支持一个觊觎王位者而疏远了穆拉德二世(1421－1451 年在位)，穆拉德接着对拜占庭人宣战。到 1424 年时，拜占庭人手中仅留下了君士坦丁堡和伯罗奔尼撒。

拜占庭在末期的那些年里，主要工作是做出更多努力来游说西方，企图获得西方的支持。约翰八世(1425－1448 年在位)的努力换来了佛罗伦萨公会议(1438－1445 年在位)的召开，会议按罗马教廷的条件，宣布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联合。不用说，绝大多数拜占庭国民喜欢苏丹胜过喜欢罗马教廷，但和睦关系的确为再一次十字军东征铺平了道路。干涉来得非常及时。穆拉德不得不去对付发生在安纳托利亚的一场大叛乱，还要巩固他传给自己 11 岁的儿子——少年老成的穆罕默德——的皇位。闻知此消息，拜占庭人决定释放觊觎奥斯曼王位的乌尔汗。接下来的混乱在奥斯曼都城埃迪尔内制造出一片惊慌，城内燃起了大火。穆斯林开始逃往安纳托利亚避难。此时，穆拉德被迫与安纳托利亚的对手讲和，率军回到巴尔干。1444 年，他在瓦尔纳(Varna，在保加利亚)击败了一支强大的十字军，接着从无所作为的十来岁的儿子手中重新收回皇位。拜占庭人再次因其背叛而受到惩罚，但穆拉德这时已无心再次挑起军事冲突。君士坦丁堡再次被围是在 1451 年穆

148

拉德去世以后，那时穆罕默德为了替自己在第一次统治时期遭受的羞辱而雪耻，一心要将君士坦丁堡收入囊中。

关于15世纪时的希腊世界

随着拜占庭帝国慢慢滑向衰亡，希腊世界获得了更大更重要的意义。此时很值得回忆的一点是，自从1261年起，大多数希腊人就一直在帝国以外生活。“希腊世界”包括其他希腊国家（摩里亚王国[Archontate of Morea]以及特拉布宗帝国），分散在法兰克人统治以及威尼斯人统治下的领土，例如塞浦路斯和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尽管在安纳托利亚居住的东正教人口持续减少，但在这一广袤地区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仍然能够发现相当规模的希腊人聚居区，包括中部高原（卡帕多恰），在这里生活的东正教人群讲的都是土耳其语。

在奥斯曼征服的早期，生活过得最好的希腊人群，是那些和平投降的人，1387年塞萨洛尼基的情形也是如此。根据各方说法，该城曾经短暂地焕发出活力：在1402年暂时回归拜占庭统治时，造访者为城内修道院的宏伟而感到惊讶。然而，当奥斯曼人1422年又打回来时，城内居民开始抵抗，奥斯曼人久攻不下。直到1430年3月，城墙才被最终攻破。随后城内发生了大规模的劫掠、强暴和奴役。未能做到以穆斯林定居者为主重新构造城内的人口分布后，奥斯曼人下令迁回幸存的希腊人，包括7 000名已经被奴役的希腊人。该城一直保持着希腊人在城内的微弱多数，一直到大约15世纪末期，但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人数都最终被从西班牙驱逐出来的犹太人超越。到1519年时，犹太人口已经超过了人口总数的一半。 149

在15世纪的前半叶，真正展现出活力的希腊世界的一部分当属摩里亚王国(Despotate of Morea)，一个行使自治的拜占庭领地。在历史长河中(1349—1460)，摩里亚王国不断从该地区的拉丁公国手中夺取领土，成了拜占庭末次文化全盛时期的中心，即“帕里奥洛加斯复兴”(Palaiologan Renaissance)。其都城米斯特拉(Mistra)因其数目众多的学校和图书馆，成为来自希腊世界各地的希腊学者心目中的灯塔，从

而吸引了各方杰出人才，像特拉布宗的贝萨利昂(Bessarion，约 1399－1472)和格弥斯托士·卜列东(Gemistos Plethon，约 1360－1452)，后者是一个君士坦丁堡本地人，也是当时最伟大的学者。

摩里亚王国不可避免地也落入了奥斯曼人手中(1460)，同样，名字过分华丽的"特拉布宗帝国"也在第二年遭遇相同命运。特拉布宗能够幸存这么久，要归功于本都山脉，它起到了阻隔来自安纳托利亚中部侵略的屏障作用。事实上，在拜占庭和伊斯兰之间漫长的国际关系史中，本都地区一直幸免于战事，没有遭受频繁的侵袭以及随后而至的分裂。因此，与安纳托利亚其他地区形成对比的是，本都在 1461 年后相当长时期内，都一直大体上保持着希腊东正教的主流：1520 年，本都的希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大约 86%。这一地区能够几乎安然无恙地在奥斯曼接管时期存活下来，是因为其最后一位希腊统治者没有抵抗就投降了。修道院机构在其中也扮演了很有趣的角色。修道院得到了奥斯曼宫廷内部显要人物的资助，其中包括玛利亚(后来的居尔巴哈[Gulbahar])，即巴耶塞特二世的妻子以及赛利姆一世(Selim Ⅰ)的母亲。结果，本都修道院一直控制着大片的内陆山谷和当地基督徒村庄，在修道士们警惕的眼光注视下，这些村庄在希腊东正教口袋里平安度过了数个世纪。

君士坦丁堡沦陷(1453)

随着 1453 年临近，君士坦丁堡人感觉到了末日来临。预言的传统也显示出不妙征兆，尽管有些居民，例如后来的牧首金纳迪乌斯·斯科拉里奥斯(Gennadios Scholarios)，就相信毁灭之年会是在 1492 年。奥斯曼人也将攻占君士坦丁堡看作是天意。穆罕默德二世一直让其占星家们时刻留意。年轻的苏丹对权力的掌控还不稳固，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名望和政治生命全都取决于是否可以攻占这座最后的"帝国"城市。因此，攻城准备工作一丝不苟，也不惜一切代价。1453 年春天，他在君士坦丁堡城外集结了庞大的奥斯曼军队。对攻城人数的估计各有不同，但可能多达 6 万步兵、4 万骑兵以及数以千计的辅助人员。穆罕默

150

德的武器装备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大炮以及储备有3万发大炮弹丸。城内的拜占庭人被迫防守7公里长的城墙,而兵力只有当地军队不足5千名的士兵和2千名主要来自热那亚的外国盟军。

尽管人数少得可怜,君士坦丁堡人的抵抗却很勇猛。一开始,奥斯曼人损失惨重,到了5月底,在奥斯曼人阵营内部开始有人担忧他们命中注定不会成功。奥斯曼人提出了和解条件：只要君士坦丁堡答应每年进贡7万杜卡特,他们就停止攻城。对此天文数字般的要价,君士坦丁堡人断然拒绝。在5月29日一大早,奥斯曼苏丹下达了最后攻城的命令。布雷契耐宫殿附近的城墙被大炮轰开,奥斯曼人涌入城市外围,穿过了郊区。拜占庭士兵战斗至最后一名士兵倒下,其中包括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六世,后来再没有发现他的遗体。

君士坦丁堡被洗劫了三日。不出所料,城内居民绝大多数要么遭到奴役要么遭到屠杀。劫掠看上去疯狂,却是有组织的行动,范围也很彻底。惊慌失措的君士坦丁堡人要么躲在家中,要么逃往教堂企图寻求神灵保护;然而即使是圣索菲亚教堂也未能幸免。奥斯曼人将其大门击倒,赶走挤作一团的人群,把里面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洗劫一空。有一些守卫者成功逃出,其中就包括热那亚人,他们夺取了奥斯曼人丢弃的船只,船上的船员都跑到城内抢劫财物去了。还有一支克里特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固守着一座堡垒,穆罕默德难于攻下,最后允许这些士兵毫发无损地离开。对于城内剩下的人来说,这座城市已经变成了一座如地狱般的死亡之城。

君士坦丁堡的最终陷落确实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终结,但1453年并非表面上看上去那样是截然的分水岭。毫无疑问,君士坦丁堡骤然变成了一个伊斯兰帝国的都城,而圣索菲亚教堂也成了一座清真寺。违背常理的一点是,帕里奥洛加斯家族仍然在行使权力,就如同许多拜占庭贵族家族一样。君士坦丁的全部三个侄子,也是其当然的继位者,都被穆罕默德收纳。这三个侄子中的两个,我们对其情况略知一二：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弥赛·帕夏(Mesih Pasha),奥斯曼舰队统帅,再后来还担任过大维齐尔(Grand Vizier,苏丹的主要大臣),另外一个就是　151

穆拉德·帕夏(Murat Pasha),1480年率兵攻打罗得岛的统帅之一。事实上,奥斯曼统治阶层中随处可见以前塞尔维亚的、保加利亚的、阿尔巴尼亚的和希腊的贵族,其中还有许多人同以前的基督徒亲戚保持着密切联系。同时,也有许多人遭到迫害。卢卡斯·诺塔拉斯(Loukas Notaras)大公,曾经讲出那句名言——"土耳其的包头巾要好过罗马教廷的冕状头饰",可能也是1453年时级别最高的拜占庭贵族,他就被认为不够可信。在试着让诺塔拉斯担任城市长官以后,穆罕默德就在6月把诺塔拉斯及其几个儿子一起处决了。

对于以前的臣民而言,不管是富人抑或是穷人,无论他们多么哀悼痛惜拜占庭帝国的衰亡,这时终究可以在强大的新政权统治下谋求繁荣发展了,这个新强权有能力给他们带来和平,即"奥斯曼和平"(Pax Ottomanica)。与拜占庭的皇帝们不同,奥斯曼的苏丹们能够做到法律的贯彻与实施、保护农民免受贪婪的贵族阶层的迫害,以及终止那些造成破坏伤害的武装冲突。一些基督徒还大幅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收入。奥斯曼强权的扩张还带来了希腊商船运输的大规模复兴。奥斯曼人一心提升自己臣民的地位,同时试图终结意大利人在海运上的主导优势。根据黑海卡发(Caffa)港口提供的数据,在1487至1490年间,注册有41名穆斯林船长,21名希腊船长,仅有4名意大利船长。大多数来往于奥斯曼港口的货物运输这时都由犹太人和希腊人负责,同时帝国的对外贸易份额也持续增长。及至16世纪,希腊人家庭大多从事国际贸易以及金融业务。这些人后来被称为"法纳尔人"(Phanariots),因为他们都集中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法纳尔区(Phanar/Fener)。这些新兴的希腊精英们在都城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东正教神职人员也发现他们可以从伊斯兰统治者手中获利。事实上,出于获得当地基督徒的支持以对抗拉丁西方之需要,穆罕默德非常渴望自己被视为东正教的保护者。因此,东正教教会阶层获得了统领帝国东正教臣民的广泛权力,还得到许可重建安纳托利亚的教会建筑。同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一样,东正教也被认为是一个如同"国中之国"

的社会体系,拥有自己的领导人和法律系统。

152

拉丁希腊

奥斯曼帝国最终确实发展成一个海军强国,但在海上它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同陆上一样的主导权。因此意大利人在爱琴海维持了一定的实力。威尼斯人在希腊大陆控制着许多岛屿和海岸要塞,而热那亚人则在1455年以前一直占据安纳托利亚重镇(老)波卡依亚(Phokaia)以及新波卡依亚,在1462年前一直占领列斯博斯岛,直到1566年还占据着盛产肖乳香的希俄斯岛。在爱琴海地区的另一拉丁势力是圣约翰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ler of St John),这是一支修道士武装力量,早年间从叙利亚被驱逐出来,后来14世纪早期时将活动范围转移到了罗得岛以及周边岛屿。他们一开始抗住了奥斯曼人一连串的攻击,但最后在1522年被打垮了。圣地(Holy Land)沦陷许多年以后,塞浦路斯拉丁王国是坚持存活下来的另一个法兰克人建立的国家。吕西尼昂王室以及获得封地的贵族一直到14世纪中叶都享有不受约束的权力,因为欧洲人对塞浦路斯蔗糖有着大量需求,该国的经济得到繁荣发展。塞浦路斯于1473年成为威尼斯的一个受保护国,并于1489年被正式吞并。

威尼斯是唯一一个无法从地中海东部地区完全被排斥出去的拉丁基督教国家。尽管在对抗奥斯曼人侵略的战争中战败了,威尼斯还是足够强大到把那场战争拖延了很长时间,后来依赖海上帝国取得了经济的繁荣发展。1571年前,塞浦路斯是这个海上强国的一部分,克里特岛在1669年前、蒂诺斯(Tinos)在1710年前都是其属下的一个地区,而爱奥尼亚群岛和基斯里亚(Kythera,基里拉[Cerigo])则是在威尼斯于1797年被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侵占以后才被割让。占领的时间长短各异,这个海上之国还控制着一些港口城市,如勒班陀(Lepanto,瑙帕克托斯)、莫登(Modon,迈索尼[Methoni])、柯仑(Coron,科罗尼[Koroni])、纳瓦里诺(Navarino,皮洛斯[Pylos]),以及莫奈姆瓦夏:上述后四个港口保卫着连接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大通道的安全。在16

世纪末,威尼斯帝国内仅有不到 50 万希腊国民,可能仅占希腊总人口的 20%。老百姓都不可避免地往帝国的中心聚集。威尼斯吸引了数量可观的讲希腊语的族群,其人口规模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最终威尼斯打破了天主教官方的禁令,于 1573 年建造了一座东正教教堂——圣乔治教堂(San Giorgio dei Greci)。在 1478 至 1580 年,威尼斯的希腊人已经从 4 000 增长至 1.5 万人,是意大利境内最庞大的希腊人社区。

153

在伊斯兰教和文艺复兴之间的希腊主义

因此,到 16 世纪和 17 世纪时,希腊世界已经分属奥斯曼帝国和威尼斯帝国。绝大部分希腊人都生活在奥斯曼和平体制中,给希腊社会统治阶层带来许多重大利益,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但威尼斯也提供了至少一个关键优势:同意大利其他地区一样,威尼斯重新燃起了人们对希腊艺术和学术的爱好。

然而,奥斯曼人对其属民的文化日益排斥,明显对希腊主义毫无兴趣。到了 16 世纪时,奥斯曼帝国版图已经囊括了穆斯林近东地区以及圣城麦加和麦地那,这时的帝国变成了一个更具伊斯兰特征的国家。只有穆斯林才能进入统治阶层,教育机构(devshirme,穆斯林学校)也被加以改造以符合穆斯林国家的独特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其他形式的学术活动都被有意识地加以限制。希腊教会得到允许,可以办神学院,但如果想从事世俗的学术活动,或参加医生和律师的培训,富裕的希腊人就不得不把儿子送往意大利,有时还要远至巴黎以及牛津。

一扇门关闭之后,另一扇门又开启了。奥斯曼强权的崛起同文艺复兴在时间上恰好吻合,后者被视为对古典传统的重新欣赏和重视。意大利人兴趣的产生肯定在时间上早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但希腊学者和手稿涌入意大利,确实对文艺复兴中的学术活动以及艺术创作起到了重要的激励作用。抵达意大利的希腊人以担任抄写者(手稿的誊写者)和教师为主。特别有价值的是那些希腊原文写就的古典作品手稿,尤其是借此能够更准确地翻译那些名篇杰作。希腊学者作为翻译者和阿提卡语老师,对此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在 1463 年时,第一

个希腊语教职在帕多瓦(Padua)设立，许多担任此职位者都来自希腊东部，包括来自克里特的著名人文学者马科斯·摩索洛斯(Markos Mousouros，1503－1509)。格弥斯托士·卜列东则于1439年在佛罗伦萨举办了关于柏拉图学说的著名讲座，帮助重建了柏拉图在西方教育中的地位，并鼓励科西莫·德梅第奇(Cosimo de Medici)出资兴建了柏拉图学园。卜列东作为一位杰出学者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后来伯罗奔尼撒被奥斯曼人征服以后，一支意大利远征队专门授命去找回他的遗体。

以前的理论认为，希腊学者涌入意大利，提供了燃起文艺复兴之火的火种，从而催生出现代性。这种说法并非只是赞美之词，拜占庭学者所起的重要作用确实不可低估。大量的文艺复兴艺术作品都描述了出自希腊神话的场景，或者像一些独特的名作，例如拉斐尔的"雅典学院"(The School of Athens，约1510)，就刻画了那些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期最伟大的哲学家。这些作品都直截了当地对希腊传统表示了敬意。意义更加重大的是古典时代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方法的复兴。在大师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中，我们再次看到了作为美的定义对象的人体。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约1500/1504)这样的作品中的裸体和阳刚之美，比拜占庭时期创作的任何作品都更具"希腊"特征。

流向意大利的不仅仅是学者和文稿。那些准备投入罗马教廷怀抱的东正教神职人员，通常会被接纳，并委以主教之职。其中有一些甚至高升至最高的职位。来自特拉布宗的巴西利奥斯·贝萨利昂(Bassilios Bessarion)曾经是尼西亚教区名义上的领袖，后来就担任了红衣主教。在罗马，他是移居到意大利的其他希腊人的庇护者。其他神职人员则在卡拉布里亚讲希腊语的社区中安顿下来，因为卡拉布里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希腊世界的一部分。有个名为彼得·费拉格斯(Petros Philarges)的克里特人最后担任了教皇，他就是亚历山大五世(1409－1410年在位)，尽管他的职业生涯并不是从东正教神职人员起步的。同许多来自希腊统治阶层家庭的小孩一样，费拉格斯也被送往意大利接受教育(他在帕多瓦和牛津求学，在巴黎大学讲学)。事实上，在近代

时期的最初阶段里，奥斯曼领土和海上强国威尼斯的希腊人通常都会把家中的年轻人送到西方大学里求学。

威尼斯的希腊人群有一项创新成果，而这项创新对于希腊文化将产生重大的长远意义。现代学者们已经逐渐认可一个事实，即在形成新的跨国界的族群中，印刷出版以及图书贸易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5世纪末期开始，出现了希腊"印刷文化"。而分布很广且分散的希腊世界发现作为大众阅读群体，这是又一个可以增强凝聚力的源泉。奥斯曼人在1729年前都完全禁止印刷，迄今原因不明。因此，希腊的图书贸易开始发展却是在意大利。第一部以希腊语印刷的书籍是一部语法书，于1476年在米兰印制而成，但实际上，是一个名叫撒迦利亚·卡利基斯(Zacharias Kalliergis)的克里特人，在1499年于威尼斯开创了希腊最初的印刷出版行业。更多的印刷出版机构随后在威尼斯和其他中心城市出现，满足了大众对于书籍的需求。尽管其中绝大部分是宗教作品，但事关世俗学术研究以及满足大众兴趣的书籍所占的比例在逐渐增加。很重要的一点是，许多用希腊地方方言写就的大众书籍也得到了出版，尤其是一些诗歌体的史诗和浪漫文学作品。其中特别吸引人的一些作品，例如《阿波考普斯》(*Apokopos*)、《贝利萨留》(*Belisarios*)和《阿波罗尼》(*Apollonios*)，在16—18世纪都以数个版次印刷出版。

155

文艺复兴重塑希腊文化的程度，可以从威尼斯人统治下的克里特城市所经历的文学和艺术的繁荣发展中一探究竟。及至16世纪，当地的威尼斯统治阶层已经开始使用克里特希腊语，多少融入了克里特社会；从威尼斯到访克里特的达官贵人对当地贵族们母语不流利的程度感到困惑。在哈尼亚(Chania)、干地亚(Candia，伊拉克利翁[Iraklion])和雷西姆农(Rethymnon)形成的是一个混合型社会，它们对于文艺复兴带来的艺术形式非常欣赏，但却渴望以希腊语的形式来体验这些艺术作品。克里特画家，比如迈克尔·达马斯金诺斯(Michael Damaskinos，约1530—约1591)以及多米尼克·塞奥托克普洛斯(Domenikos Theotokopoulos)，后者更有名的名字为埃尔·格列柯(El

Greco,约 1540—1614),得以游走于拜占庭风格和文艺复兴风格之间,设法融合各种元素,并创作出具有高度原创性的作品。克里特文艺复兴最著名的却是其文学创作。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创作于威尼斯人统治时期最后一个世纪的体裁各异的戏剧、史诗、浪漫文学以及诗歌作品。如同在古典时代以及 16 世纪的意大利一样,克里特观众能够欣赏这些成熟而又高度原创的戏剧作品,同时评点社会生活。

奥斯曼人的征服骤然终止了克里特岛上的文艺创作,虽然一些当地名著,例如文森佐·科尔纳洛斯(Vitsentzos Kournaros)所著的 1 万行的浪漫作品埃洛克里托斯(*Erotokritos*),仍然在希腊世界被饶有兴致地广泛传阅。克里特岛也凑巧是帝国取得的最后一块重要领土。数年之内,帝国的军队在围困维也纳的战役中(1683)遭受了罕见的挫败,而紧接着这场失利,又在与欧洲基督徒军队的较量中遭遇了多场失败。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随着世界实力对比的平衡开始朝着有利于欧洲基督徒一方转变,奥斯曼帝国经历了从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向最弱小的国家转变的过程。随着强大实力慢慢逝去,希腊人和其他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开始设想一个没有穆斯林统治者的未来。

第七章　现代希腊的形成(1700－1910)：种族渊源与国家建设

奥斯曼帝国在1768－1774年与俄国的战争遭受惨败后，就陷入了156严重困境。俄国取得了进入黑海的权利，并对港口城市君士坦丁堡造成了直接威胁。接下来的几场战争进一步暴露了奥斯曼在抵抗侵略时的不堪一击。实际上，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已成为当时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列强们急需解决并在日后一再商议的问题：后来演变成了著名的“东方问题”。奥斯曼帝国的长久存在可以维持基督教国家间的实力均势，而这一切都要依靠“欧洲病夫”的苟延残喘才得以继续存在。

对于奥斯曼帝国中的基督教徒来说，欧洲的支配地位影响意义深远。亚美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福利成为国际关注的问题，但是受到特别注意的还是希腊人。毕竟，18世纪是启蒙运动的时代，也是文化知识从古典传统中得到启示而蓬勃发展的时代。因此，希腊人在西方印象中占有特殊地位，尤其是此时，欧洲逐渐把古典希腊看作是本民族文化的发源地，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都坚信他们也是希腊人。然而，同哈德良时代的罗马人一样，现代欧洲从自身的角度产生了一些对希腊的看法，他们告诉希腊人自己究竟是谁，并且为重新觉醒的希腊设定了蓝图。

157 19世纪30年代，在欧洲大国的庇护下，希腊成为真正的民族国

家,而国家的边界、宪法以及国家元首均由欧洲政治家们商议决定。因此,重新觉醒的希腊逐渐沦为欧洲的工具——或是欧洲现代性的一方面。然而,崭新的希腊开始了自己势不可挡的迅速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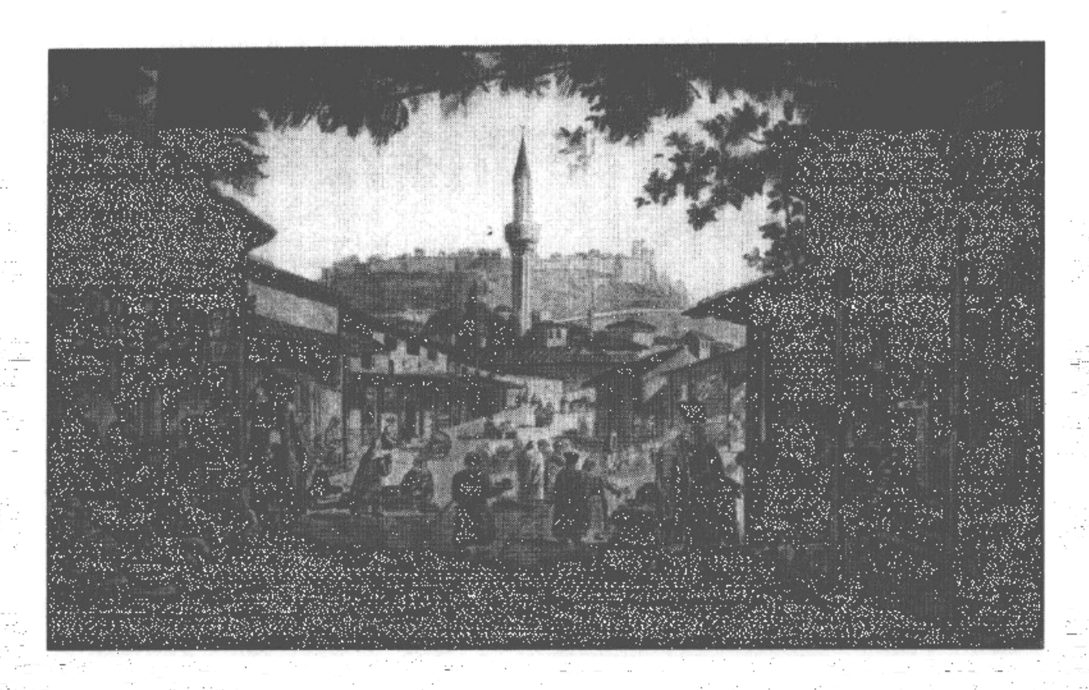
18 世纪的希腊世界

在民族主义时代前,“希腊性”意味着什么?在奥斯曼统治的后期,谁是希腊人?这些问题没有直接的答案,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第一点也是长远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欧洲或西方人的观点,他们把整个世界视为一个划分明确的各种民族的集合。西方旅行者的文字中就有关于奥斯曼帝国中居住着大量不同民族的记载。这个称为“土耳其”帝国的国家中却居住着包括希腊人、保加利亚人、阿拉伯人以及很多其他种族,但他们对这些称谓却不以为然。然而在通常情况下,这些被赋予的称谓随后会演化成民族身份的基础。

西方人把希腊人视为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基督徒。这些希腊少数民族聚居于人们常常提到的希腊历史上的核心地带:伯罗奔尼撒半岛、希腊中部、阿提卡、爱琴海、爱奥尼亚群岛、塞浦路斯及克里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本国”领土中没有一块是完全由希腊人居住的。希腊中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还聚居着大量信仰东正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和瓦拉其人,而穆斯林土耳其人则集中聚居于城镇中。还有祖先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的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和聚居于如克里特岛的说希腊语的穆斯林,他们是由基督教改宗伊斯兰教。法兰克人及威尼斯人的统治在基克拉迪群岛和爱奥尼亚群岛还留下许多说希腊语的天主教聚居区。

在希腊北部,人口的组成则更加多元化。在伊庇鲁斯、色萨利和沿马其顿海岸线生活的大部分居民也许都说希腊语,但在内陆和北部地区,希腊族多集中于城镇中。平原和山丘上密集居住着不同民族的穆斯林和斯拉夫人,而阿尔巴尼亚人和瓦拉其人则占领了陡峭的高地。一些巴尔干中心如拉里萨和塞雷(Serres)本质上与穆斯林城无异,但其余的地方就显示出语言、信仰密集混杂的特点。希腊人在色雷斯和

159



奥斯曼时期的希腊：在西方人看来，雅典同伊斯兰"东方"辖下的其他任何地区并无不同，这正是 Edward Dodwell(约 1805)的这幅水彩画所展示的主题(Benaki Museum，GE23059)

君士坦丁堡是重要的少数民族。

希腊人在除巴尔干及群岛地区以外的地方分布很稀疏。在 18 世纪的进程中，可以在欧洲各处，甚至是离伦敦和圣彼得堡很远的城市找到散居移民。另一种希腊人口的扩散是拜占庭在安纳托利亚和意大利统治的残余形成的。在卡拉布里亚南部和阿普利亚中部存在着大量的"希腊人"的城镇。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本都的希腊人，他们的村庄一排一排布满了整个高山地带和特拉布宗地区的海岸线。尽管安纳托利亚内陆，尤其是开塞利、科尼亚、安卡拉周围的地区零星分布着东正教居住区，但除此以外，绝大部分安纳托利亚人说土耳其语或是穆斯林。希腊语少数情况下还可以听到。法拉萨位于开塞利和叙利亚的腹地之间，一种古希腊方言在这儿得以延续到 20 世纪早期。然而爱琴海海岸和马尔马拉海周围，由于不断接触巴尔干群岛上的居民和来自岛上的移民，希腊语变得非常普遍。在 19 世纪初，希腊人占士麦那总人口的约 20%，尤其在福恰、基奥斯、艾丁、博德鲁姆这些城镇中所占人口比

重更大。

第二种观点来自标准的奥斯曼观点，这就是信仰。在18世纪，如果某个希腊人被问起自己的身份，回答不是“基督徒”，就是“罗马人”(土耳其语 Rum，希腊语 Rhomios)。然而，做罗马人意味着成为希腊东正教基督徒。因此，这种称谓适用于所有东正教徒，而他们的母语可能是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瓦拉其语、格鲁吉亚语或阿拉伯语。只有在教堂事宜上，罗马表现为用作礼拜仪式用语和圣经语言的希腊语，它还经常引起使用斯拉夫语的主教和教区居民的不满。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是把希腊看作是一种高层次文化的象征。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中，尤其是在东正教教徒占大多数的巴尔干地区，希腊的语言和教育在上层社会和新贵中被视为一种标准。因此就像希腊化和罗马时代一样，希腊文化被视为社会资本。巴尔干的贵族如果受过希腊教育或至少采用希腊方式就可以变成希腊人。比如在贝尔格莱德，在19世纪40年代前政客们都说希腊语且追随希腊的时尚。希腊语也是巴尔干商业贸易联系的媒介，因此像布加勒斯特、菲利普波利斯(普罗夫迪夫)、奥赫里德和莫纳斯提尔都是希腊化的城市。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讲，前几章中提到的希腊罗马帝国并没有整个消亡。 160

希腊世界中的许多领导人物的家乡都是讲多种语言的地区，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变成了希腊国家文化中的重要人物。18世纪的两个重要的思想家埃欧斯波斯·莫里西奥达克斯(Iospos Moisiodax，1725—1800)和里加斯·韦勒斯蒂里斯(Rhigas Velestinlis，1756—1798)都是瓦拉其人，但他们也可称自己是希腊人。莫里西奥达克斯在学校学习希腊语，并且给自己起了个希腊化的名字：“莫里西奥达克斯”(moisiodax)，这是他的罗马尼亚出生地莫西亚的古希腊名称。希腊最著名的文化力量的象征体现于阿里·帕夏(1715—1822)的宫廷里，他是一个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君主，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有力地统治了西巴尔干地区。阿里在约阿尼纳的宫殿以众多任职于各部门的希腊贵族著称，但是最令人惊叹的是，他把希腊语变为了宫廷用语。阿里还在自己的领地推广希腊教育和艺术，确保约阿尼纳的所有学校都配备

良好的师资。作为一个野心勃勃意欲统治巴尔干地区从而使之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君主,阿里认识到希腊语言和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治理和自治

希腊世界的基层社会是如何组成的?奥斯曼人更愿意与团体协作。在希腊世界中,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公社。这些公社,是古代城邦的遗留,它们是正式的机构,但筹集资金的权力有限,主要是发挥司法功能。它们最初使用罗马法,后来越来越多地使用普通法。公社大多由当地有权势的人控制,比如村里的牧师或有影响力的人。在奥斯曼人认为难以控制的地区,比如品都山区不登记在册的社区村庄或是伊庇鲁斯的扎格瑞(Zagorachoria)自治区,公社的职能更像是独立政府。

在范围较大的地区层面上,事情则更加复杂。整个帝国是地区和奥斯曼国家中央政府间特别安排下的聚集体。比如伯罗奔尼撒半岛就似乎是有重要自治权的地区。这里有一个元老院专门负责处理管理和税收事宜,而代表们都是从公社中选出的。这个元老院时常派代表们去君士坦丁堡向帝国官员问询。尽管每一种政治安排都包含某种税收特许和自我管理权,但是奥斯曼国家中央政府与如马尼(伯罗奔尼撒半岛)、扎格瑞、皮立翁山、阿陀斯山、本都修道院,以及希腊大部分岛屿间的政治关系都不同。

161

但是帝国中还有广大地区既没有国家中央政府也没有省级官员的有力控制。巴尔干崎岖不平要求解决问题的高山地区由天主教神职人员和山匪控制,这些山匪在北方称为海杜克(haiduk),在南方称为克莱夫特(klepht)。最重要的是,这些山匪在路上抢劫行人,在低地乡村偷窃牛羊,激起民愤。然而,与地中海的强盗们相比,这里的山匪被赋予了特立独行逍遥法外的逃犯形象。山匪的英勇事迹是山区村庄里广为传诵的故事主题。因1821年希腊起义而家喻户晓的赛德罗斯·科洛克托尼斯(Theodoros Kolokotronis)就是一名山匪,他声称,做强盗是一种获得荣耀的方式:“克莱夫特的称呼就是一种赞誉……父亲们祈祷他

们的儿子可以有朝一日成为克莱夫特。”[1] 然而，在浪漫的外壳背后，这其实是奥斯曼政府试图控制或顺应当地而制定的另一套权力结构。有个叫斯托纳里斯(Stournaris)的伊庇鲁斯山匪，控制着120个村庄，有一支由400多人组成的护卫队，他的家族拥有大约50万头绵羊和山羊。

奥斯曼帝国中的希腊领袖

在奥斯曼帝国中，东正教教堂变得更加希腊化。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权力得到了大大提升，因为所有东正教教区都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其中包括亚历山大城、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古代牧首教区，以及设在奥赫里德和佩奇的巴尔干牧首教区。1766年在佩奇的塞尔维亚牧首的取消，以及一年后在奥赫里德的保加利亚牧首的取消，部分是由于希腊教会统治集团决心维持自己在此地区的控制权。希腊教堂自食其力地在希腊北部开办学校以抵制保加利亚语及阿尔巴尼亚语的使用。1770年，来自埃托利亚的传教士科斯马斯(Kosmas)视察村庄时挑动事端，特别刺激聆听者：“只要发誓在家不说阿尔巴尼亚语的人站起来说不，那我就赦免他们的所有罪恶。”[2]

164

在奥斯曼体制中，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是鲁姆(意为罗马的)社区的首领。牧首的终极职责是保证教区的忠诚并按时缴纳赋税。具体负责收纳赋税是下属教区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他们经常使用自己的爪牙作为强制执行者。因此，农民们认为高级教士才是真正的压迫者，而这种情况在17至18世纪东正教征收重税以补贴高级教士不断增加的债务时尤为突出。每次选举，教区胜出的候选人为了显示自己优于前任牧首，会给苏丹及其要员缴纳更多的钱财。这种敛财方式实在有利可图，以至于苏丹宫廷规定了速度更快的牧首更迭制度：17世纪中共有58次牧首选举，这使得每届任期不足两年。1730年，教区的负债额高达相当于7 000公斤黄金。

在鲁姆社区地位很高的还有君士坦丁堡的法纳尔人。这些举止优雅、见识广博的家族在18世纪开始崭露头角，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奥斯

奥斯曼帝国(约1683)

曼帝国是数得上的富豪。法纳尔人是医药、金融和银行领域的行家，因此对苏丹具有巨大的利用价值，但是在18世纪，他们由于对欧洲语言和文化的了解而至关重要。他们经常为苏丹担任翻译官，并且在外交事务和条约签订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也在自治的基督教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济亚(现罗马尼亚)担任摄政王(hospodars)，还因此背负了“凶残的统治者”的骂名。

法纳尔人以身为奥斯曼国家忠诚臣民而感到自豪，然而单单是他们仍为基督教徒的事实就意味着法纳尔人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和大多数的东正教徒一样，法纳尔人相信奥斯曼的统治将是短暂的。在典型的拜占庭思维方式中，人们相信穆斯林的宗主权是上帝对其过去所犯下罪孽的一种报应方式，但对上帝选民的救赎也是上帝神恩计划的一部分。所有阶层都对预言特别痴迷，并且对智者利奥、阿加桑耶卢斯之类的占卜者的预言烂熟于心。在其后的希腊革命中担任领袖的赛德罗斯·科洛克托尼斯在其回忆录中说，预言在他的宗教成长中起到主要作用。很明显的是，许多他的同龄人被怂恿参与1821年的起义也是由于预言让他们热切期待最终的胜利。这胜利就是推翻穆斯林宗主国，恢复罗马(拜占庭)帝国。预言称：罗马人将重新收复君士坦丁堡及其帝国，忠诚的国民将见到“大理石帝王”君士坦丁十一世在1453年战争失败后的回归。另一个流行的预言说的是金色头发的民族将要到来，而人们普遍认为这就是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人。

165

这些预言广泛传播的影响直指奥斯曼帝国的潜在弱点。作为伊斯兰政体，奥斯曼一直实行忍耐政策，而此政策顺利实施的必要前提是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保持强大的国力。但由于拒绝和非穆斯林平等相处，因此一旦国力下降，就不可能再指望非穆斯林忠诚于国家。奥斯曼的统治秩序和穆斯林都希望非穆斯林能够永久地接受政治和社会上的从属地位，或者皈依为穆斯林。这种从属关系可以从日常生活的种种限制中体现出来，比如非穆斯林没有携带武器或骑马的权利，他们有严格的着装规定。虽然许多规定实际上并没有实施，但是法律和税收等其他不平等规定就加强了这种从属关系。牧首地位的不稳定及法纳尔人

偶尔的傲慢行事都时刻警醒着基督教徒,他们的幸福安宁完全取决于穆斯林的忍耐。

希腊起义的背景(1770—1820)

直到18世纪后几十年,希腊的统治集团才开始认真思考政治解放问题。转折点是1768至1774年的俄土战争,它表明了欧洲开始具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巴尔干基督教徒感到,如果能够得到欧洲的有力援助,那么他们就能够挑战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了。1770年发生在伯罗奔尼撒和克里特的早期起义,就是在俄国承诺在资金和军事上给予支持的背景下爆发的。

奥斯曼的实力相比基督教欧洲陡然下降成了现代希腊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由于欧洲各个国家变得越来越中央集权化,奥斯曼和其他几个伊斯兰大国(莫卧儿印度帝国、波斯的萨非王朝)一直向与先前相反的方向移动。在17至18世纪的进程中,奥斯曼国家逐渐把大量权力移交给当地军阀,并委任他们解决当地问题,如乡村的负债和强敛赋税等。一些军阀开始养尊处优,还想方设法挑战奥斯曼的统治。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Ali Pasha)军阀(1769—1849)和巴尔干地区稍显逊色的阿里·帕夏军阀就如此。巴尔干的许多地方都被基督教军阀控制着。在伯罗奔尼撒地区,拉马塔的帕纳约蒂斯·贝纳基斯(Panayotis Benakis)领导了1770年的起义,但以失败告终。俄国观察员发现,他的这次起义缺乏广泛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是缺乏其他伯罗奔尼撒军阀的支持。

欧洲国家在军事和技术上不断创新,在调动资源和资助军事创新方面能力更强,而且实力日益壮大,而国家权力的分散使亚洲国家更难以与实力壮大的欧洲国家在军事上维持均势。从1735至1739年的早期俄土战争起,俄国就更加精通于火力调动和严明军事编队。另一边的奥斯曼帝国只能依靠军阀势力来增加军队人数,而这些人装备落后且缺乏训练。奥斯曼帝国面对欧洲的挑战反应迟缓。假如奥斯曼帝国为了缩小与欧洲的差距而开始在国家、行省和军事上进行改革,那么就

算改革从赛利姆三世(Selim Ⅲ，1789－1807年在位)开始，也需要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能追赶上欧洲。

欧洲的经济优势对非穆斯林群体也有着许多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在一个多世纪的进程中，奥斯曼帝国的城镇一直忙于搞对外贸易和信贷业务。法国是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挂着欧洲各国国旗的希腊商船却和英国、俄国、荷兰做生意。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希腊商人的商船不但取代了法国商船，并且还超过了威尼斯和马耳他。在1786至1813年之间，希腊船队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商人们也赚取了巨额财富。

这笔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用来振兴希腊教育。和日后希腊民族神话中所描绘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强迫孩子们夜晚在秘密地点集合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希腊世界相比穆斯林社会资金支持更充足，教育资源安排更合理。1821年前，希腊世界内的办学热情就已经被游客们注意到了。英国的地形学家威廉·马丁·里克在他的著作《希腊研究》一书中，对希腊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他写道：

167

> 在经济条件不错的情况下，不论是在希腊本土，还是在土耳其的其他地方，或是在奥地利的领地，抑或是在俄国，没有一个希腊社区不支持学校教授孩子们古希腊语，或是高雅教育(polite education)中的一些其他重要学科。[3]

随着希腊商船队的扩张，希腊人移民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尤其是在地中海或黑海的主要商业中心，如的里雅斯特和敖德萨。在这里，希腊商人、知识分子、学生和各行业专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联合会，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对希腊世界很感兴趣，并且认真思考它的前途。总体看来，海外的希腊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并且可以在土耳其帝国经济行情大跌中获得利益。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圈子里，一个解放希腊世界的计划被首次提出。

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一些性质相似的团体幻想着许多理想

中的欧洲"国家"。当提及民族主义的出现时,现代历史学家们因幻想一种基于自由的理想和制度的新型国家而强调"批判的大众"的重要性。这种设想反过来会取代建立在神权和贵族特权基础上的现存君主制度。这些批判的大众出现于政府的一般危机中,这种危机随法国大革命和其对整个欧洲政治影响的扩散而达到顶峰(1789—1815)。移民中的希腊思想家们和巴尔干人都被卷入了漩涡。在1790至1800年期间,希腊出版物对非宗教的研究开始超过宗教研究(192比128),更多的书在探讨哲学问题。在主要的移民中心如维也纳,希腊人可以看到本国的学术期刊。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物是1790至1800年之间发行的杂志《日报》(*efimeris*)。通过阅读杂志,希腊读者可以随时了解法国的发展和整个欧洲对法国发展的反应。

168

向现代希腊过渡

关于自治的含义,希腊人从来就没有达成过一致。有权势的人,如天主教大军阀们,关心的是如何提高他们的个人权力和自治权,而其他人则是被心中的理想引领着。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理念对那些社会地位不断上升的商人和各行业专家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希望可以在各个统治层级按照能力大小来分配权力。然而,欧洲革命时代的暴力行为在更多保守的希腊人的脑海中留下了一个肯定的想法,那就是如果有一天奥斯曼帝国被推翻,那么取代它的会是某种形式的东正教旧制度。

更加广阔的欧洲大环境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欧洲在全球主导地位的上升必然会加强大量的自我反省和对自我以及包括逐渐衰弱的奥斯曼帝国在内的整个穆斯林世界态度的重新评价。在18世纪晚期,欧洲的学术界和文学界为了一己之利,把伊斯兰国家描绘成衰败、专制、野蛮、落后,其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一种截然相反的西方自我形象。同时,希腊是欧洲以及西方文明发源地的概念也被加深,这种概念被用来解释其在艺术和科学创造方面的天赋谱系。雪莱在他狂想曲般的作品《希腊人》中称:"我们都是希腊人。"

与雪莱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没有表现出同样的激情，但是欧洲人长久以来已经把当代希腊人视为自己的同胞，或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亲属。因此希腊人以及他们的政治命运变成了一件关乎大众利益的事。1770 年伯罗奔尼撒半岛起义的失败成为重要时刻，以其为背景出现了大量阐述希腊解放事业的虚构或现实的出版物，包括伏尔泰的颂歌：

我要让雅典重生
让荷马歌颂你的战争
让一百位德摩斯梯尼的雄辩
复活你的心和双臂[4]

当代希腊人也理所当然地被欧洲的热情所感染。受过良好教育的希腊人更是如此，对于他们来说，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向自己的希腊同胞传授本民族的遗产。与这项职责紧密相联的人物是阿扎曼蒂奥斯·科拉伊斯(Adamantios Korais, 1748－1833)，一位重要的古典主义学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巴黎。他对希腊世界改造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编辑了“希腊文库”，将希腊古典名著翻译成现代语言，专门用于教育当代的希腊人。他坚信，希腊人民的新生将会随着对古代光辉遗产的学习而到来。是科拉伊斯推动了基于阿提卡语和当代通俗希腊语相结合的高等希腊文形式的发展。纯净语言——现代希腊语后来成为希腊国家和希腊教育的书面语。

169

这种文字的优点之一是为现代希腊交流带来了更丰富实用的词汇。但是，它被命名为最纯净的语言也暗示了当代希腊文化的自卑情结：普通希腊文由于混杂了外来词汇而不纯正，这些外来语削弱了希腊语的真正影响，因而应该被删除掉。和许多其他西化的希腊人一样，科拉伊斯特别热衷于排挤神职人员，他认为这些人是使希腊文化倒退的罪魁祸首。科拉伊斯认为，希腊人应该指望他们的西方邻邦，因为西方文明一向对希腊遗产表示特别的忠诚。他声称，巴黎就是新雅典：

想象一个拥有 80 万人口，比君士坦丁堡更大的城市，这里有各种学术专业和众多图书馆。在这儿，科技文化发展异常繁荣……所有的这些景象已经在希腊消失了。[5]

因此，想要变得更加“希腊化”，希腊人必须更加欧洲化。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和文化是重要的不利因素。新希腊必须退出颓废的伊斯兰文化占主导的东方，重新加入崛起中的西方。

另一位希腊重要的杰出人物是里加斯·韦勒斯蒂里斯(Rhigas Velestinlis)，他也被称为里加斯·费厄里奥斯(Rhigas Pheraios，1757—1798)。与隐居的科拉伊斯不同，韦勒斯蒂里斯是一位无畏的政治活动家，他从事密谋工作，撰写过重要的革命宣传材料。他是个典型的反对奥斯曼统治、倡导希腊独立的活动家。他在色萨利的安波拉奇亚(Ambelakia)接受教育，后成为一名学校教师，在君士坦丁堡担任法纳尔人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斯(Alexander Ipsilandis)的秘书。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启发，他试图在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地区举起革命大旗。他的想法是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共和国，其中包括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信仰，包括穆斯林，他们通过希腊的教育和语言学习而相互团结。在 18 世纪 90 年代，他完成了一系列政治宣传材料的创作，包括《鲁米利亚居民的新政治宪法》(*The New Political Constitution of the Inhabitants of Rumeli*)、《小亚细亚》(*Asia Minor*)、《群岛》(*The Archipelago*)和《摩尔达维亚与瓦拉济亚》(*Moldavia and Wallachia*)。这些作品共印刷了 3 000 册，被散发到希腊世界各地。在文章中，他号召建立一个不分种族、不分语言的希腊共和国，包容奥斯曼帝国中的所有居民：希腊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瓦拉其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和其他的每一个民族。[6] 1798 年，他被人出卖给奥地利当局，然后被移交至奥斯曼政府。他在去君士坦丁堡的路上被杀害。

170

韦勒斯蒂里斯被处死后，更多的个人和团体投身于挣脱奥斯曼统治枷锁的事业中，政治宣传册也越来越多，但是一直到 1814 年都没有形成一场统一的运动。“友谊社”是在敖德萨形成的一个秘密团体，参

与者包括商人、专家、学者，还有学生。1818 年，友谊社将总部迁至君士坦丁堡，在那儿筹划如何推翻奥斯曼统治。这种地下运动的关键问题在于，如果不能首先发动群众起义，那么运动就不能取得成功。当时希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 19 世纪前 10 年在俄国帝国宫廷任高级大臣的扬尼斯·卡波迪斯崔阿斯(Ioannis Capodistrias)伯爵(1776－1831)，他就认为这种运动的目的是鲁莽轻率且不负责任的。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希腊当权者的一致观点。整个运动的参与者不足 1 000 人，但是在鼓动有兴趣的群体参与运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尤其是动员了海杜克、克莱夫特、天主教军阀和富有同情心的主教加入。到 1820 年，企图策划一系列暴乱的计划在希腊当权者中尽人皆知。在奥斯曼帝国的各个部分及其边境地区同时发起攻击的计划已策划完毕。一旦举起革命大旗，密谋者希望心怀不满的群众会在起义中奋起，把陈旧的政治制度清除出去。

希腊起义(1821－1825)

希腊起义发生时，社会巨变的各方面条件都已成熟。拿破仑战争对于希腊海运是个好消息，但是 1815 年暂时中断的冲突使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原材料需求骤减。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几年中，海盗、强盗活动猖獗，当地商业和制造业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遭受重创。因此，只要在希腊举起革命大旗，就会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参与。然而，对奥斯曼国家构成更加严重威胁的是像阿里·帕夏这样的当地军阀。“亚尼纳雄狮”利用战争时期稳固了自己在巴尔干地区的实力，到 1819 年，很多人相信他能够召集一支 4 万人的部队。1820 年，负责逼迫其他军阀就范的苏丹顾问哈莱特·埃分迪(Halet Efendi)进行了清剿阿里的行动。忠心耿耿的巴尔干军阀们被命令征集军队，向伊庇鲁斯进发。

171

这次战争看似是一个举起希腊自由大旗的绝佳时机。由于成千上万的奥斯曼部队都被牵制在巴尔干西部，“友谊社”计划在多瑙河流域各省、君士坦丁堡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发动一次协同一致的起义。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济亚的起义由这个秘密组织新指派的领袖、曾任沙皇

亚历山大一世副官的法纳尔人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斯(Alexander Ipsilantis)领导。1820 年 10 月 8 日,伊普西兰蒂斯准备率领一支由 5 000 名缺乏战斗经验的爱国人士组成的名为“神圣军团”的混合部队,与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Tudor Vladimirescu)领导的一支约 65 000 人组成的更加庞大的罗马尼亚军队汇合。一旦部队接到动员令,被压迫的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地区的各个民族就会起义反抗他们的压迫者。然而当神圣军团终于在转年 3 月进入摩尔达维亚后,民众却没有发动大规模起义。原来,罗马尼亚人在法纳尔人大公的残酷统治下遭受着巨大痛苦,是不可能支持希腊运动的。因此伊普西兰蒂斯和弗拉迪米雷斯库只能面对不可避免的奥斯曼大屠杀。6 月 19 日,伊普西兰蒂斯的军队在德勒格沙尼的战斗中进行了一次虽然无望但却相当奋勇的抵抗。伊普西兰蒂斯随后被捕并被处决。可以预见的是,虽然在只有少数希腊人聚居的君士坦丁堡计划中的自杀性起义并没有发生,但是整个希腊世界仍遭受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领导鲁姆社区的主教和其他一些希腊杰出人士在 4 月 10 日被执行绞刑。

然而,在希腊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起义就有着更加切实可行的纲领。1821 年 3 月,地方首领(Kapetanoi)起义对抗奥斯曼宪兵队,在纳夫普利翁、卡拉马塔和的黎波里的穆斯林社区进行大屠杀(当希腊起义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针对首都、士麦那和希俄斯岛的希腊社区的报复行动也开始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南部划归马尼的彼得罗贝伊·马夫罗米哈利斯的统治下,同时赛德罗斯·科洛克托尼斯把自己的势力延伸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其他领导们也纷纷感觉到,反对苏丹政权的时机到了。3 月 25 日在临近帕特拉斯的卡拉夫里塔,伯罗奔尼撒半岛名人会议结束后,当地的主教盖尔曼诺斯宣布总起义开始。3 月 28 日,马夫罗米哈利斯发表声明,宣布脱离奥斯曼帝国而独立,并于 5 月在卡拉马塔组成政府。

172

北部的情况相比稍显复杂。阿里·帕夏在与土耳其帝国的对抗中失败。基督教山匪们不是支持他就是反对他,尽管也有一些人袖手旁观,只为等待最佳时机再出来干预。然而,当伯罗奔尼撒半岛叛乱成功

的消息传播开来后，许多在希腊中部的首领们转而反对奥斯曼统治，比如皮奥夏的奥季塞乌斯·安德鲁特索斯(Odysseus Androutsos)和米索隆的乔治·卡赖斯卡基斯(Giorgos Karaiskakis)。由于帕萨拉的康斯坦丁诺斯·卡纳里斯(Konstantinos Kanaris)和海德拉的安德鲁斯·米奥尤利斯(Andreas Miaoulis)率领希腊海军使用海盗战术骚扰奥斯曼航运，奥斯曼也逐渐失去了对爱琴海的控制。希腊在海上的主导地位令奥斯曼运送军队镇压起义和保持补给线的畅通难上加难。在卡拉夫里塔宣布独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起义就解放了希腊南部和岛屿地区。1822 年 1 月 24 日，阿里·帕夏的失败使奥斯曼军队有了喘息的时机，然而到此阶段，南方起义的局面已经尘埃落定。此时，希腊起义似乎已经成功了。

然而，很快暴露出的问题是大家起义的目的千差万别。“友谊社”倡导的政治原则对于首领来说都过于抽象，在后者看来，“希腊”不过是个模糊的概念。但是大家达成共识的一点是：如果要保持起义的胜利成果，必须要建立独立国家。在 1821 年 11 月，希腊共有 3 个独立政府(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希腊和东希腊)，但是到 1822 年 1 月，他们在埃庇道罗斯起草了一部临时宪法，这使得希腊成为拥有参议院、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共和国。所有代表在原则上都同意使用中央集权制，但是船长们和天主教士豪们却很不情愿交出自己手中的权力。实际上，1821 年前就控制着某些地区的地方豪强者，在起义期间仍然延续着自己在这些地区的统治。

因此，在对抗奥斯曼势力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协同一致的作战。事实上，由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中部的小纷争不断，大部分发生在 1822 至 1824 年期间的战争都是地方首领之间的争斗。1823 年至少存在着两个政府，到 1824 年中，两政府一直在不断混战。同时，奥斯曼勉强寻求身为军阀和埃及统治者的穆罕默德·阿里的帮助，条件是把克里特归他，而将伯罗奔尼撒半岛交给他的儿子易卜拉欣管理。1825 年初，埃及派出了一支由 1.7 万人组成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并迅速征服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由雷西德帕夏(Reshid

173

Pasha)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向希腊中部的地方首领发动进攻。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这其中包括 6 月底马克洱伊安尼斯(Makryiannis)在阿尔戈斯附近取得的一场辉煌胜利,希腊起义很快就被有效镇压了。到 1827 年,希腊人手中仅存的战果就只有纳夫普利翁和科林斯了。

国际环境(1825 —18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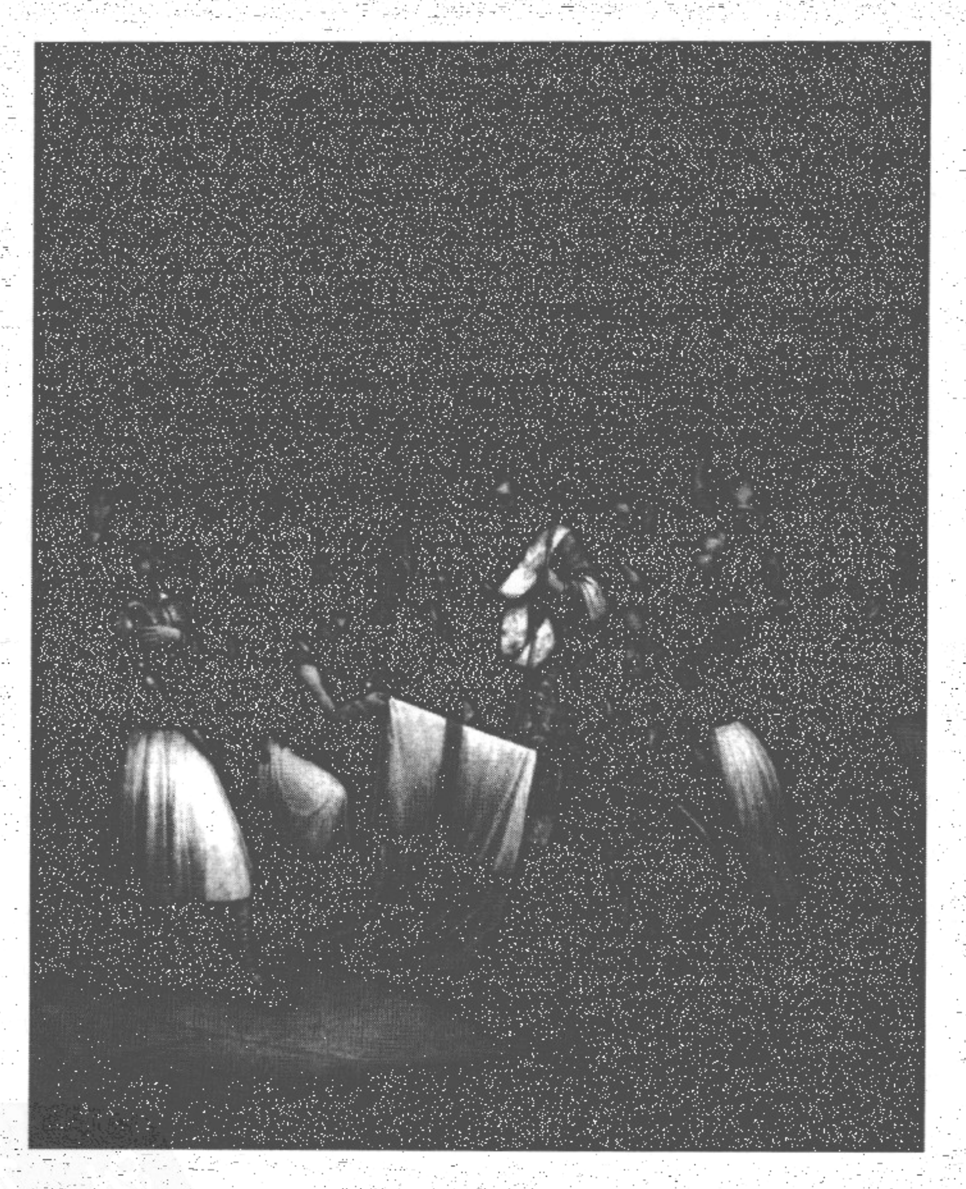
在此同时,欧洲大国密切关注着希腊的局势。尤其紧张的是俄国,它可能会代表共同的东正教教徒进行斡旋。同时,民意也需要考虑。欧洲社会一致支持希腊,许多亲希腊的人迅速加入为希腊而战的队伍中,这包括大诗人拜伦爵士,他为希腊独立事业捐献了一小笔善款并且战死在一场战役中(1824 年 2 月)。他为欧洲政府不愿出面干涉而感到困惑。1821 年,拜伦的朋友雪莱毫不掩饰地说:

> 这些文明世界的统治者对于本民族文化发源地的国家的子孙,对于他们正从废墟中爬起的惊人处境无动于衷的态度,实在让一个观看这出道德大戏的观众摸不着头脑。我们都是希腊人。[7]

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引起混乱后,欧洲各国宫廷的关键任务就是维持国际势力均等,这意味着保持巴尔干地区、君士坦丁堡和近东地区不受俄国人控制。1821 至 1825 年期间,“希腊问题”一直是风平浪静的国际外交中最引人关注的外交问题。大国对于公开冲突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最初追随奥地利政治家克莱蒙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inich)的领导,他的策略是拖延俄国的行动直到希腊起义被镇压。然而,寻求自由的希腊人会得到残忍的异教徒的怜悯的想法在许多有影响力的人们看来是不现实的。在埃及侵略伯罗奔尼撒半岛时,列强们的实用主义才被大众舆论所压倒。关于作为欧洲文化摇篮的希腊将会被非洲移民重新占领的谣言散布开来。1825 年秋天,当英国人决定要和俄国人一起强令奥斯曼执行他们的决议时,希腊毫无疑问获得了自治权。奥斯曼的反抗随 1827 年纳瓦里诺战役的

175

结束而被最终镇压了。在这次战役中，奥斯曼-埃及联合舰队在四小时内被摧毁，使埃及人从希腊撤离。当法国军队被派去占领伯罗奔尼撒半岛时，由沙皇尼古拉一世率领的俄国军队穿越了多瑙河。到 1828 年 8 月，在俄军处于君士坦丁堡战斗距离内时，奥斯曼政府同意按英国和法国提出的希腊独立后的条件求和。



希腊主义、东正教和民族性：1821 年 4 月 25 日在洞窟教堂(Church of Aghia Lavra)，勇士首领起誓后发起了希腊起义(by Theodoros Vryzakis, Benaki Museum, CE8970)

因此,现代希腊成了满足欧洲共同利益的外交决策的产物。它的形成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伦敦公约(1832 年 5 月)和君士坦丁堡条约(1832 年 7 月)。与此同时,希腊在 1828 年 1 月招纳扬尼斯·卡波迪斯崔阿斯担任国家总统。作为一位在外交界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卡波迪斯崔阿斯是位保守人士,他赋予处于反动君主制统治下的欧洲大陆的希腊以高尚体面的外表。他马上开始实行起各种改革,从土地分配到国家军队的组织。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成功应对土豪和天主教军阀们的不顺服和被剥夺自由选举权的人们与日俱增的仇恨。1831 年 10 月 9 日,在疏远马尼的权势家族马夫罗米哈利斯后,他在首府纳普良被暗杀。

当国家再次陷入混乱时,希腊舰队与立宪政府的关系突然陷入僵局。西方大国看到了设置一个更专制政府的机会,这个政府与任何欧洲复辟制度没什么不同。在仔细寻找后,西方大国选定了巴伐利亚的奥托王子作为希腊的第一任国王:希腊人称他为“奥东”。由于奥托继位时还是个未成年人,他的父亲,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一世国王就指派了三位摄政代替他统治希腊。

176

后独立时期的希腊

希腊王国的边境问题也是主要商讨的议题。伯罗奔尼撒半岛、阿提卡和希腊中部形成了希腊的中心地带,而许多附近岛屿也划归进了希腊疆域,被命名为基克拉迪群岛和萨罗尼克诸岛。然而在希腊独立战争中起关键作用的克里特岛、萨默斯岛、希俄斯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却仍然归奥斯曼帝国管辖。因此,奥托统治时期的希腊面积只有如今希腊的约三分之一,且人口只包括奥斯曼帝国中讲希腊语的基督教徒中的一小部分。自战争前开始,希腊人口数量就大幅下降,从 1821 年的 766 470 人一下跌落至 1828 年的约 60 万人,尽管从 1838 年起,人们开始看到一些令人欣慰的恢复。1833 年人口的一半有余(约 53%)居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25%居住在希腊中部,22%居住在群岛地区。希腊王国同时也是大量瓦拉其人和东正教阿尔巴尼亚人的家园。

新希腊是在不利的外部环境下建立的。工业根本不存在,海运自拿破仑战争后就一蹶不振,国家的许多建筑都已是断壁残垣。一位早期到雅典参观的游客看到这里几乎没有完整的建筑。就在奥托国王到来前,伟大的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侄子克里斯托夫(Christopher Wordsworth)在他的著作《雅典与阿提卡》中写道,古代的遗迹看似更加完美了:

> 现在的雅典处于一片废墟之中,街道几乎全部废弃了,所有的房子几乎都没有屋顶。教堂只剩下光秃秃的围墙和一堆堆的石子和灰尘。整个雅典只有一座教堂可以提供服务。孤零零的几座木质房屋中,仅有一两座结构还算结实。路两旁的木板搭成的帐篷就是所有雅典人可以夸耀的居住地了。[8]

在帕特拉斯、卡拉马塔以及其他城镇,情况也是如此。乡村也陷入了极度的贫困中:662 座村庄被夷为废墟,大部分橄榄树林被毁,牲畜的数量也减少了九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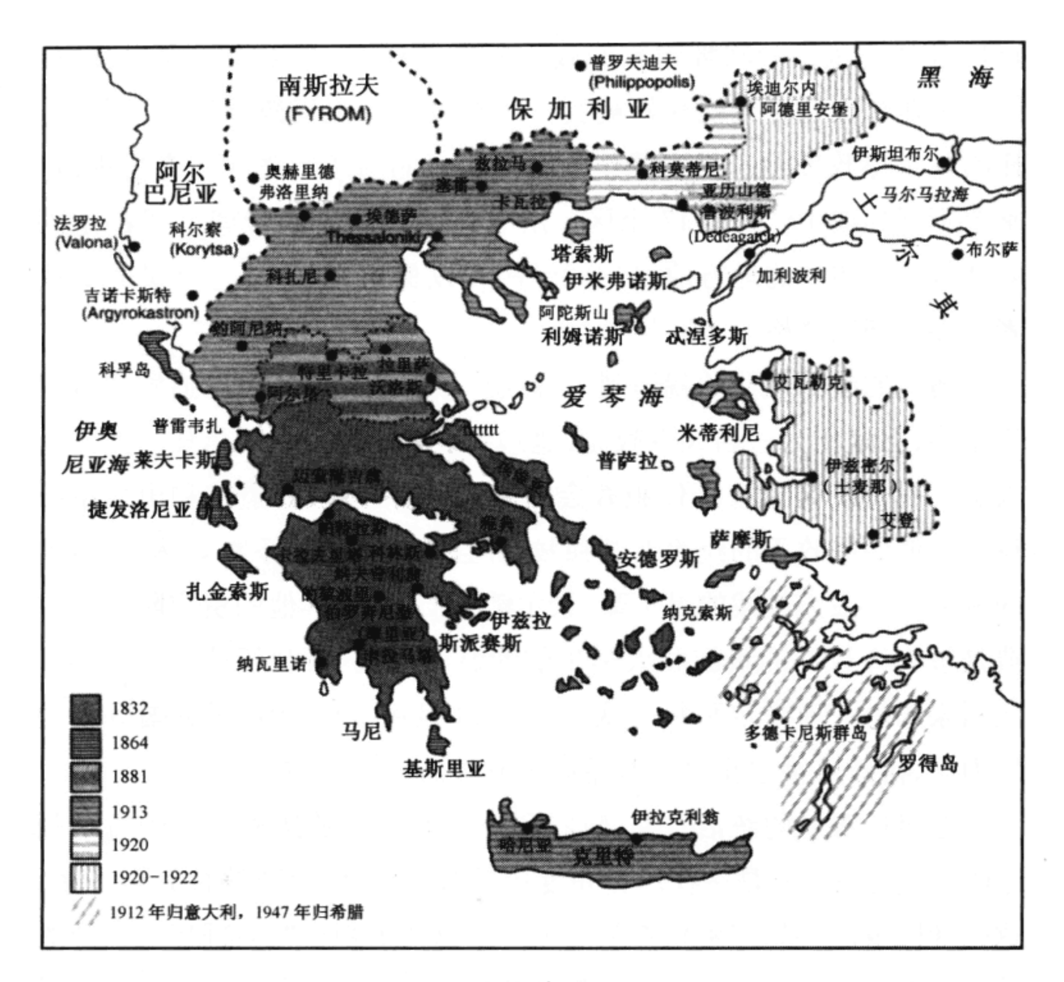
因此,对于新政权来讲,重建工作是个巨大的挑战。另一个挑战来自土地的重新分配。广义上的目标是重新分配穆斯林放弃的土地,让人民都有独立财产而安居乐业。最佳的耕地实际上在穆斯林手中,但是自从起义开始,这些耕地就已被擅自占地者占用了。另一个问题是地产划分的边界。由于希腊缺乏合适的地籍测量方法,因此,从独立开始,法院里就充斥着各类地产划分纠纷。卡波迪斯崔阿斯颁布了一部测量法,但却造成了希腊地主和擅自占地者间的巨大纠纷。国会为应对农村土地问题,于 1853 年颁布了所谓的"捐献"法,它有效地把每份土地面积限制在 4 公顷以下。国家还宣布,如购买土地,除支付全款外还要额外支付 6%的地税,所有款项需在 36 年内付清。因此,普通的农民家庭根本不能自给自足,无法偿还国家的按揭贷款。由于土地在土壤质量和水源使用上差异巨大,许多农民家庭的债务不断攀升。农民们只能被迫干些手艺活,季节性地去更大的田产劳动、到商船上工

作,或去类似亚历山大城和士麦那这样的地方找工作。因此,土地改革不但没有改善贫困问题,而且还使之有所加深,强化了希腊由来已久的移民传统。

希腊的商船海运业在希腊独立后得到了积极的发展。在19世纪30年代,希腊人重新收回了在地中海贸易中的份额,成为俄国向欧洲其他国家和中东地区粮食出口的主要运送者。这段时期还出现了希俄斯海上运输"王朝",比如总部设在伦敦的拉里斯兄弟公司和罗多卡纳基斯家族(Rodocanachis family)企业。希腊海运的发展大大刺激了帕特拉斯、埃尔穆波利斯等一系列希腊港口的发展。1821年埃尔穆波利斯港口的人口还不足200人,到1840年人口就增长到1.2万人,而到了1860年,人口达到2.5万人。到19世纪中期,帕特拉斯已成为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主要农产品经销地,而它也成为希腊王国第二大城市。与国外资本以及人口迁居地网的大量接触把帕特拉斯转变成为一个国际化城市,很多用欧洲语言开设的商业学校都设立于此。城市当时商业繁荣的景象可以从许多新古典主义建筑和在这座城市同时存在许多地方性报纸杂志上表现出来。

1834年,雅典由于拥有大量历史遗迹的优势,而被选为希腊首都。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人们试图把首都留在纳夫普利翁或转移到科林斯、特里波利斯或阿尔戈斯,但是奥托的摄政府考虑到雅典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维持西方大国支援的重要性,决定把首都设在雅典。由于现代历史学家有到处散布消息的习惯,因此,雅典从来都不是座安静的城市。在奥斯曼统治时代后期,雅典的人口仅1万多,城市中建有36座教堂、清真寺和一座伊斯兰修道院,参观的西方游客经常往来于城市中。然而,让大多数人达成一致的是:雅典从此必须永远异于其他奥斯曼城镇。作为新希腊的首都,雅典必须更加欧洲化。主要设计者——德国设计师莱奥·冯·克伦茨(Leo von Clenze,1784—1864)确定,"雅典的设计工作属于欧洲事务"。

新城市将建立在普拉卡和莫纳斯蒂拉基偏北,主要集中于如今宪法广场、协和广场和古罗马神庙的中轴线一带。而国家资金的缺乏意



现代希腊

味着工期进度的缓慢，但是到 19 世纪 70 年代，现代雅典的雏形已经日益明显。城市中有林荫大道、广场（宪法广场、协和广场）、科学院、国家图书馆、王宫（扎皮翁宫）、贝丹大酒店，以及公园和广场。私人捐助至关重要，是海外的希腊富豪们为城市著名建筑的建设提供了资金。其中有罗马尼亚的万杰洛斯·扎帕斯(Evangelos Zappas，1800－1865)，他是第一个提议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人，还有乔治·阿韦罗夫(Giorgos Averoff，1815－1899)，他是亚历山大城的主要棉花商，负责了 1896 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场地——泛雅典娜体育场的修建工程。

179

奥托统治时期(1832－1864)

新希腊是一个建立在君权神授基础上的绝对君主制国家。和

1815 年以后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政治制度一样，希腊废除了立宪政府，接受了在拿破仑时代就开始被实行的有效的官僚行政体制。因此，奥托的几个摄政废除了奥斯曼统治时期实行的烦琐的省级制度安排，把整个王国分成 10 个州，47 个区。所有这些行政区的管理当局都是国家委任的。传统的地方政府（公社等）得以保留，但是地方官员的候选者要接受国家严格的审查。

奥托的统治从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尽管他的血统可以追溯到科穆宁皇族，但是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他感到很难取得民众的信任。尤其令人感到屈辱的是摄政王侵犯教会的方式，包括解散修道院和出售宗教珍宝。他的摄政王的统治专制独裁，并且内部间纠纷不断。然而，给他的统治造成最大挑战的是土豪、天主教军阀，以及其他的贵族阶层。雅典是被剥夺权利的贵族和大学生们的温床，他们抵制新秩序并密切关注国家的每一项决定和每一次失败。19 世纪 30 年代，在英国巨大的压力下，摄政府被迫指派一些希腊人到政府部门工作。

在奥托漫长的统治时期，政府和社会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就是领土收复问题：无论是站在历史角度还是宗教角度，只要符合其中一条，这个地区就应该划归到新希腊王国中。这些被视作“大希腊”一部分的地区主要包括伊庇鲁斯、色萨利、马其顿、克里特、爱奥尼亚、士麦那、君士坦丁堡和其他的一些地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1832 年划定的国家领土并不完整。在奥托统治时期，希腊最有权势的贵族扬尼斯·科勒提斯（1773—1847）就反对把首都设在雅典，因为当时希腊世界理所当然的中心是君士坦丁堡。是科勒提斯第一个提出了“大理想”（Megali Idea）的概念，即希腊民族注定要为收复这座城市以及拜占庭帝国而输送它的灵力。重要的是，“大理想”在社会各阶层都引起了共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印证了上帝的选民将为君士坦丁堡带来救赎的预言。

180

国家对希腊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需要成立民族国家？在欧洲，最初构想出国家的概念是为了创造一种公正的社会秩序，但是在原有的政治制度复辟后，国家除了加强自身的实力外似乎就没有别的目的

了。和许多19世纪出现的新型民族国家一样,希腊在领土收复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它的存在是为了追求领土扩张的外交政策。对于更多有政治影响力的阶层来说,收复领土是国家存在的目的政府将根据其收复领土的表现而被评价。

实际上,"大理想"被证明是危险的、高风险的任务,如果没有大国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从军事上说,希腊根本就不是奥斯曼帝国的对手。然而政治家们却坚持蛊惑民众,提高他们的期望。经过一段时间,民众长期的失望削弱了国家的合法性。1838年土耳其-埃及危机爆发和1840年克里特起义第一次显示出了民众舆论的力量。这时,已经解散了摄政府独立掌权的奥托国王被迫采取行动实施"大理想",但是让他羞愧的是,一位军阀已先发制人：扬尼斯·瓦伦察斯(Ioannis Valentzas)领导了一次袭击土耳其统治下的色萨利的行动。各大国迅速出面干涉。然而令奥托更加耻辱的是,这些国家威胁,如果袭击持续,就要扣留国家贷款。1843年9月,一队官兵包围了他的王宫。由于害怕希腊陷入混乱或是俄国可能推选出一位东正教徒候选人代替奥托,西方大国们都同意了这些密谋叛乱者的要求。希腊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立法权力移送给立宪代表大会。

1844年,新宪法一经出台,希腊似乎立即成为拥有最先进政治制度的欧洲国家。所有年龄超过26岁的男性都拥有选举权,国家统治权看似掌握在选举出的官员手中。然而在现实中,政治权力被掌握在少数几个有权势的人物手中。像科勒提斯这样的有钱人为了积累个人权势可以通过以选票换取工作、受到保护或接受其他有利条件作为交易,因此创造出一张巨大的政客关系网。从1844年直到1847年去世,科勒提斯控制着最大的关系网,有了它,他可以如独裁者一般统治着整个国会。同时,奥托还受到了更严重的政治阻碍,但是由于他是西方大国推举出的君主,他得以勉强维持到1862年,此时他在西方大国心中已声名狼藉。在另一番彻底的搜寻后,西方列强选定了乔治——丹麦克里斯蒂安亲王的二儿子为候选人。1863至1913年之间,乔治一世作为希腊国王执政。

181

乔治一世和特里库皮斯时代(1863－1893)

随着新王朝的到来,一部新宪法也应运而生,这是君主与代议政府之间的新妥协。国王保留了巨大的权力。他拥有解散政府和撤换大臣的权力,宣布战争签订条约的权力,而且仍然享有军队领导权。政府此时由政治同盟组成,他们可以形成国会中的多数派。然而实际上,要形成政府同盟需要政治保护人和潜在的被保护人之间的大量协商。结果联合政府不断更迭,政治混乱连续出现,最终促使君主过度干预政权——新国王执政期间的前 11 年间共成立过 23 个政府。

然而,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政府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在政治人物们还把精力集中在"大理想"和宪法问题上时,人口的过快增长和城市化问题的真正挑战出现了。在奥托执政的最后时刻,人口是 1 096 864 人,但是到 1870 年,就已增长到 1 457 894 人,到 1896 年就已攀升至 2 433 806 人了。城市在这段时期的发展令人惊叹。在 19 世纪 90 年代,超过 31%的人口城镇化或半城镇化。雅典-比雷埃夫斯联合城市的人口从 1860 年的 47 750 人升至 1890 年的 150 000 人;帕特拉斯的人口则增长了一倍,从 1870 年的 26 190 人增长到 1896 年的 50 154人;与此同时,色萨利地区的特里卡拉(Trikala)的人口也从 1 100人增长到 30 387 人。这段时期人口增长的基础是农业生产力和出口贸易的急剧增长。19 世纪 60 年代晚期至 70 年代,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葡萄园灾难性地爆发根瘤蚜传染病后,希腊葡萄的出口形势一片大好。希腊的农产品第一次享受到国外巨大的需求。1881 年,由于平原面积广大且灌溉条件良好,希腊农业区延伸到了色萨利地区。

182

希腊社会跟随欧洲总体趋势发生变革。制造业和工业的扩大迎来了工人阶级社团和组织的增长。从 1867 至 1889 年间,希腊大工厂的数量从 22 个增加到 145 个。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里,由于工业的发展,沃洛斯的人口增长了八成。然而随着经济现代化进程,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比如城市过于拥挤,卫生和犯罪问题严重。来到城市中心的新移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年轻男性,他们有很高的荣誉感,但却有

暴力倾向，尤其是在雅典。游客们会为咖啡馆中每位男士都佩戴枪支的情景所震惊。因此，杀人率与国际水平相比明显偏高：1870 至 1900 年间杀人犯的比例是十万分之七十九，而混乱的科西嘉也不过是十万分之二十一。

到 19 世纪末，希腊的中产阶级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店主、办事员、官僚、体育专业人员)，典型的资产阶级追求以及社交形式不断发展，比如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度假、散步。典型的中产阶级成人是杂志和浪漫小说的忠实读者。外国观察家们都惊叹于他们对政治的强烈兴趣和对报纸的渴求。一位评论家在其世纪之交的作品中写道："如果问希腊人读些什么？那么答案一定是，首选报纸。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出版业在人们生活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9] 中产阶级的增长实际上对国家造成了严重威胁，因为它要向对国家发展充满希望的公众负责。从 19 世纪后几十年开始，数量不断扩大且充满责任感的公众时刻关注着国家动向。随着国家的每一次失败，无论是否确有其事，人民游行和公路暴力的威胁也随之而来。

关于国家目的思考的第一次重要改变就发生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那时查理拉奥斯·特里库皮斯(Charilaos Trikoupis)刚刚开始其若干次首相任期中的第一届。他认为伟大希腊的神圣追求必须通过国内的发展来开始。从 19 世纪 80 至 90 年代初，国家制订了关于修建铁路的第一个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比如国家铁路网、公路建设计划，以及科林斯运河建设(1881－1893)，一项里程碑式的伟大工程是由一家属于君士坦丁堡银行家安德拉斯·辛格洛斯(Andreas Syngros)的希腊公司完成的。当特里库皮斯刚开始执政时，希腊仅有一条长约 12 公里的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铁路。到 20 世纪初，希腊的铁路总里程超过 1 000 公里，连接了雅典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希腊中部和色萨利，在 1912 年国土边界扩大后，铁路建设继续延伸。到 1892 年，建设公路 4 000 公里，还有 1 000 公里仍在建设中。到 1893 年，电报传输线长达 9 000 公里，共有 186 个电报站。其余政府指挥的国家建设还包括扩大公立学校规模。大中小各阶段学生的在校人数得到了大规模增长，尤

183

其是小学中的女生人数从1860至1900年共增长了10倍(从8 000到82 000)。

对于特里库皮斯来说,国家建设要和国家发展同步进行,但是这些发展却付出了巨大代价。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国家建设工程大部分凭借国外贷款和国家赤字支持,这些贷款迅速增长到不可控制的程度。国家大幅提高赋税以偿还利息,但到1893年,由于法国的藤本作物收成逐渐恢复,希腊的葡萄价格暴跌,希腊此时实际上已经破产。1895年,特里库皮斯在其最后一次大选中失利,并于转年去世。由于他的国家建设方案并没有取得成功,希腊民众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到更为直接且荣耀的领土收复问题上。

大众政治与国家动荡(1890－1910)

1890至1910年间,希腊被打上了"大众社会"的记号:频繁的选举,观点鲜明的批判性报刊,跻身于众多称自己有男性普选权的欧洲国家之列。所谓的"公众舆论"如此一致地聚焦于领土收复问题上就如同重视保护古典希腊遗产一般。如果现用地名过于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或土耳其化,就改用古典时代的名称,因此数不清的地区、城镇和乡村都重新改名。几个世纪以来被熟知的恰岛(Tzia)和基西拉群岛也分别被改称为凯阿岛和基斯里亚。从被称为希腊现代史之父的康斯坦丁诺斯·帕帕里戈普洛斯(Konstantinos Paparrigopulos)开始,历史学家们在撰写和讲授希腊历史时都认为,古典希腊、拜占庭时代的希腊以及现代希腊之间存在着宗谱式的联系。

184

古典遗迹的重要性在现代希腊人潜意识中的集中表现就体现在所谓的"语言问题"上:到底是使用纯净语言还是通俗文字作为希腊大众生活的标准用语呢。实际上,任何针对于希腊文字的举动都可能引发大规模骚乱甚至流血事件。在1901年11月,通俗文字版圣经的出版引起了语言纯净主义者的暴力性反抗,这次"福音书"事件砸碎了雅典中心的很多建筑。接踵而来的成千上万人的游行以及时而发生的死伤造成了极度混乱,导致当时乔治·赛欧托吉斯(Giorgios Theotokis)政

府的垮台。1903 年 11 月，语言纯净主义支持者发动暴乱抗议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Oresteia*)三部曲使用通俗语言表演。

> 学生们上街游行，保卫埃斯库罗斯作品的纯净。骚乱爆发了，一名来自亚历山德里亚的无辜围观者被杀，拉里斯政府为了防止混乱升级，禁止引起事端的三部曲继续上演。[10]

如果政治演说是某种风向标的话，那么可以看到关于贫困和社会不公的事情是不那么重要的，这说明劳动者组织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在公共领域反映其关切。在 19 世纪 90 年代，最关键的是民族主义和"大理想"，党派报刊在煽动偏见产生、加深民众纠纷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直到 1896 年，大众对通过收复领土而获得民族重生的希望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当年 4 月，雅典举办了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次盛会使希腊成为全世界的焦点。这次运动会让民众更加关注国家的古代遗产，包括比赛和运动的价值。整个国家沉浸在对体育运动严重痴迷的气氛中，记者们纷纷把这种痴迷看作是希腊真正的力量和战斗精神。1896 年 3 月，报纸《卫城》上的一篇社论曾评价道：

> 我们看得到力量的地方，就能发现意志、决心、勇气和行动。那些没有胆量的人会被驱逐出境……个人的行为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哦，要是希腊能拥有数量众多的人口该多好。[11]

展示强健体魄的运动竞技与"大理想"的结合散发着不可抗拒的力量。4 月，当运动会开幕时，乔治国王在开幕式中代表希腊"被解放的部分"发表演讲，然而在运动会结束后不久，志愿者们潮水般地涌入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马其顿和克里特攻打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对于希腊政府给予这些非正规军的支持表示严重抗议，并威胁要发动战争。1897 年 4 月，战争真的爆发了。

185

当时的首相赛德罗斯·德利吉安尼斯(1845－1905)是特里库皮斯

曾经的对手和领土收复的倡导者。他被要求到克里特出面调停失控的宗派冲突,改变奥斯曼政府无力干预的局面。由于害怕冲突会促使俄国和巴尔干国家攻击奥斯曼帝国,欧洲大国快速行动,实施了一项有利于占人口多数的克里特基督教徒的政治解决方案:在奥斯曼宗主国统治的名义下实行自治;同时,一支希腊军队被派往马其顿。然而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尽管国家和各个政治阶级都有开战的强烈愿望,但在军事上却没做任何准备。希腊军队已经几十年没上过战场了:实际上,这支军队可能连维持治安和镇压军阀的任务都难以胜任。奥斯曼军队完胜了两场战役,四周内赢得整个战争的胜利。但是由于大国的干预,希腊的其余地方幸免于难。

虽然战争造成的领土损失不大,但是奥斯曼帝国欠下了一大笔赔偿金,希腊还要忍受把本国经济置于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财政委员会)监督之下的更大耻辱。就更广大的层面来说,1897 年耻辱的战败暴露了希腊军事上的薄弱和对如英国这样的欧洲大国保护的过分依赖。在国内,战争降低了民众的士气,破坏了国家和政治家们在民众心中的形象。民众认为他们太过腐败,只会搞些哗众取宠的政治活动。换句话说,国家让人民失去了信心。

韦尼泽洛斯的兴起

民众对“大理想”的兴趣逐渐减退,但是平静却没有持续。再次引起民众关注的事件是马其顿隐约浮现的危机和对这片最有价值的土地要被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强占的恐惧。当然,巴尔干东正教统治阶层渴望成为希腊人的愿望早已被遗忘。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几次事件的发展在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中促进了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些事件包括塞尔维亚语和保加利亚语从口语到书面文字的转化,以及希腊主教一直试图把希腊语普及到保加利亚各教区的努力。1878 年,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宣布独立,保加利亚成为自治国家。和希腊相似的是,这些国家都对领土分配感到不满,希望通过收复领土得到补偿。

希腊争夺马其顿地区最直接的竞争对手是保加利亚。自 19 世纪

186

90 年代起，希腊媒体和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就竞相举行政治宣传，试图赢得东正教农民的好感；但是从 1904 年开始，竞争逐渐演化为民兵之间的暴力争斗。村民们在巨大压力下声明他们忠诚于本民族，并且发现随波逐流是权宜之计。就像一个农民所说："我的祖先是希腊人，从没有人提过是保加利亚人。如果我们成为保加利亚人，我们就胜利了。但如果我们得成为塞尔维亚人，也没有问题。但从目前来看，我们最好还是成为保加利亚人。"[12] 很明显，语言并不是确保民族忠诚的标志。数不清的说斯拉夫语的马其顿人，大部分是没文化的工人，在保加利亚人袭击了他们的村庄后，他们感到自己在雅典的生活困难重重，许多人游说希腊政府进行干预。

在希腊，马其顿战士的故事激起了人们对过去英勇革命者的回忆，并且再次燃起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然而很少有人相信希腊政府会支持英勇的马其顿战士。几乎没人确实相信政治家们的执政能力。政府的快速更迭以及因语言问题而时常爆发的人民起义让人们感到国家政治系统非常混乱。1908 年青年土耳其革命爆发后，问题到达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这场革命让人们看到了立宪政府在长期的混乱后的恢复，和对包括奥斯曼帝国境内希腊人在内的各民族平等的承诺。这次革命许诺振兴奥斯曼帝国，然而在希腊人看来，它使希腊收复马其顿地区的渴望变得遥不可及。

1909 年 5 月，已组成军人同盟的军官们要求军队进行改革以提高希腊应对战争的能力。在数次失败后，军人同盟在 8 月 28 日夺取了政权。他们散布军官们没有保留权力意图的传言，却不肯把权力交回现有的政党手中。这时，一位克里特政治家的上台成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此人在克里特夺取自治权的斗争中受到过广泛赞誉。他就是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1864－1936)，他此前从没登上过雅典的政治舞台，但却在政治行动中有着令人满意的成绩，他曾用反党派政治的演讲俘获了大多数民众的心。在 1910 年 9 月的一次演讲中，他用"我不是以一个新政治党派的领导人身份来到此地，我只是带来新的思想"[13] 的演讲撇清了自己与任何政治组织的关系。他说，通过革命和复兴，国家

187

可以得到振兴。

换句话说，韦尼泽洛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把民族从国家中解救出来的形象。1910 年 8 月 8 日，原先的政党只赢得了国会 362 个席位中的 218 个。国王授予韦尼泽洛斯首相的职位，但是韦尼泽洛斯感到政治形势是向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的，因此他要求重新进行一次大选。11 月 28 日，他仓促组建的自由党压倒性地赢得了国会中的 300 个席位。他的胜利迎来了一批新的政治家，引领希腊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时代。

第八章　20 世纪的希腊：极端的时代

在 1900 年的时候，大部分希腊人居住的地区都难以用“现代”来形容。平民百姓住在小村庄里，典型的居住条件就是一个房间和几样简[188]单的家具。日常生活也与长久的社会和文化传统息息相关。自远古时代起，每年的重大节日都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大斋戒和各种纪念圣徒的节日。虔诚的宗教仪式、圣徒和天使拯救人类的力量、魔鬼的邪恶存在都说明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痴迷。所有人都相信“邪眼”的力量。神父通常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同样的人物还有村社长老，他们负责分发援助、控制公社的管理机构。人们用忠贞和道德来分别约束女性与男性的行为，顺之则维护了荣誉，逆之则是羞耻和屈辱。贫困一直是个大问题，由于种植技术和工具原始，产量很低。对于普通的农民来说，生活是痛苦的委婉之词，它充满着人生的悲伤和同毁灭所作的无尽斗争。村庄作为道义上的社区可以提供较好的环境，但这也被看作一个死胡同。解决的途径依旧是移民，在 1900 年大部分移民的目的地是雅典或美国。

然而到 2000 年，这种传统世界几乎全部消失了。没有了农民，除了去欧洲和美国深造的大学生们，希腊几乎没有移民了。如今，普通希腊人的生活水平和西欧国家的百姓大致相同。20 世纪是希腊漫长的[189]

历史进程中社会变动最剧烈的时期，这些变化都发生在这个有恐怖战争、外强野蛮侵占、饥荒频发和专制独裁的世纪。对于欧洲大部分国家来说，希腊的 20 世纪是个极端的时代。

希腊的美好时代

城市是社会现代化的征兆。对于阿提卡半岛的村庄来说，雅典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在这里，逐渐形成一个充满希望和理想的新型社会。1900 年，像沃洛斯和帕特拉斯这样的城市开始形成。1907 年，希腊全国人口达到 260 万，其中 32%是城市居民或者长时间居住在城市。随着工业发展，工人阶级团体和联盟逐渐形成，但是直到几十年后，他们才成为有组织的队伍并对希腊政治产生直接影响。

事实上，中产阶级成为新希腊建设的主力军，雅典这座城市则代表着新希腊的希望。除了如过度拥挤、犯罪率高和卫生条件差这些同样影响欧洲大部分城市迅速发展的问题外，雅典还拥有体现中产阶级品位与情调的优雅街区。主干道（比如雅典娜街、阿卡迪米亚斯街、菲勒里昂街和斯塔迪奥街）和广场（宪法广场和协和广场）两旁布满了树木和长椅，这些都是为散步和室外的咖啡店特别设计的。在 20 世纪前十年，雅典出现了燃气路灯、有轨电车和公共厕所，市政部门还专门雇佣统一着装的保洁人员打扫街道。

美好时代的雅典的现代之处还表现在妇女在公共场所地位的上升。在著名艺术家帕夫洛斯·马西奥普洛斯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现代城市中成年女性坐在咖啡馆中忙于工作的情景。西方的服饰是另一个中产阶级的区别性标志。出身富贵的雅典妇女喜欢颜色鲜艳的连衣裙和手套。她们喜欢谈论球赛、度假或和其他富裕家庭在海滨度假胜地新法勒隆邂逅的经历，雅典人乘坐有轨电车可以很方便地去新法勒隆。上流社会还喜欢散步，以及利用中产阶级独有的活动做媒。有家长陪伴的青年男女可以偷偷对介绍的对象瞟上几眼，如果可能的话，接下来书信来往，秘密的约会，有可能还会私奔。

希腊的中产阶级也活跃于国外，和潜力巨大的商业中心（如亚历山

大城、布加勒斯特、敖德萨、士麦那)有着紧密联系。比如亚历山大城是个十分繁荣的希腊人聚集地,他们既主导着棉花出口贸易和香烟生产,也主导水泥、肥皂、纸张的生产和酿造业(他们还引进了雅典第一家巧克力、汽水生产厂和第一家平版印刷工作室)。在士麦那(奥斯曼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和对外贸易中心),希腊人成为最大的单一文化团体。士麦那的希腊中产阶级掌握着商业和生产制造企业,从批发腌肉片到银行业,从食品、羊毛面料加工到海运和开矿。整个城市也满是和希腊人有关的部门和组织。1920年,该城的《希腊指南》中就提供了每个与人们生活相关的服务机构地址,包括叫凤凰、星球、帕拉斯和巴黎人的电影院和报社,一家希腊人开的医院,几家希腊银行和一家孤儿院。

20世纪的前十年,希腊世界中完全不同的部分在大西洋西岸形成了。在1896至1907年间,共有111 500希腊人移民到美国,还有128 789希腊人从希腊本土以外的地区移民美国。到1917年,大约有50万人通过艾利斯岛抵达纽约并定居下来,或者是前往像兰卡斯特(宾夕法尼亚州)和勒威尔(马萨诸塞州)这样的工业城市。许多人攒足路费后就回到了希腊,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愿意继续留在美国,这样也有利于把自己的亲戚或者同乡带到美国来。实际上,人们都在努力创造新的家园。即使像盐湖城这样偏远的地方,来自希腊的移民也自发组织起来成立公社,共同筹钱修建教堂。海外的希腊人十分推崇保持希腊的生活方式,他们开设希腊语言课程,组织打球或者野炊等活动。社区生活也开展起来,比如希腊人经营的咖啡店、饭店和匹萨店。能够品尝到家乡的特色美食是很重要的事情。在澳大利亚,一个很小的希腊社群几乎主导了整个国家所有的快餐店和奶品店。

191

希腊社区在北美、巴西、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扩散标志着全球移民的开始,但对于希腊来说,这并不是件好事情。希腊的很多青壮年流失到了美国的工厂和服务部门,而在外汇方面却受益巨大:从1903至1914年,希腊每年都能从美国侨民那里得到500万美元。到1910年韦尼泽洛斯组建起自己的第一届政府时,外汇收入对于国内财政的提高和更长远改革的实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巴尔干的"大清洗"运动和希腊的分裂(1910—1918)

韦尼泽洛斯作为首相的第一个任期内最令人关注的就是他狂热的立法计划：共有53个宪法修正案，涉及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许多是使社会职能部门和法院非政治化的，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依英国的标准，他所领导的自由党严格意义上说是松散的联合体而非政党，但却推动了很多重要公民权利的改革，这包括举行公众游行的权利、陪审团制度，以及禁止随意逮捕。许多与工作环境和薪水相关的改革也在进行，这保护了妇女和儿童的权益。

韦尼泽洛斯的改革似乎是在显示，他要将国家转变为服务社会的职能部门，而早期欧洲其他地区的福利政策仅仅是为了安抚社会，防止发生动乱。其实在国内，韦尼泽洛斯需要可靠的劳动力，这样他的政府就可以比前面任何一任政府都更加有效地追求"大理想"了。在这方面，他又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家，国家的主要开支都用在了军事方面。通过调整军官队伍和扩大军队人数到14.8万人，军队实力显著增强。同时，希腊的海军实力也得到了提升。

韦尼泽洛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1912年夏天，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黑山合谋发动对奥斯曼帝国所辖巴尔干地区的进攻，之后便是瓜分领土。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于10月18日开始，巴尔干军队迅速击败了土耳其的军队。希腊军队占领了马其顿南部大部分地区后开始匆忙向塞萨洛尼基挺进，并于11月8日抢在保加利亚人前几个小时到达此地。克里特地区、伊庇鲁斯和其余的爱琴海北部的所有岛屿地区最终也都被吞并了。战争的第二个阶段(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3年6—7月)发生在保加利亚和周围的邻国之间，结果希腊又增加了在马其顿中部的领土。

192

希腊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领土和人口扩大了两倍，但是巴尔干战争也激起了其扩大疆域的欲望，尤其是看到真的有可能实现"大理想"的希望。1913年3月18日，乔治一世在萨洛尼卡的白塔附近散步时被暗杀，他的继任者康斯坦丁一世(1913—1917年在位)被吹捧为末

代拜占庭君主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化身。然而成功也会招致怀疑。在占领了塞萨洛尼基后不久，一些希腊居民开始质疑这些看起来“非希腊”的领土的价值。在最初的极度兴奋之后，一个雅典人写信给家乡的妻子，告诉她自己的悲惨经历：

> 1913 年 5 月 14 日：我已经完全受够了。与其住在这个花花世界，我更愿意住在山上搭建的帐篷里。
>
> 5 月 19 日：我怎么会喜欢这个国际化的社会呢？这里 90% 都是犹太人。这里根本没有希腊文化，就连欧洲文化也算不上。这儿什么都没有。[1]

1913 年的人口普查发现，在塞萨洛尼基当地 157 889 中有 4 万希腊人，另外包括 45 867 的穆斯林和 61 439 犹太人。希腊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犹太城，农村人口绝大部分是穆斯林。

然而，战争也给了巴尔干国家一个解决问题绝佳机遇。在战争面具的掩盖下，加之当地民兵组织复杂，成千上万个穆斯林被塞尔维亚、巴尔干和希腊军队驱赶出家园。大约有 40 万穆斯林逃离巴尔干地区：1912 至 1914 年间，在这个地区只有不到 100 万人是纯正血统。土耳其人采取以牙还牙的报复行为。实际上，希腊人基督教徒已经从 1912 年开始从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的城镇和乡村逐渐撤离。1914 年，土耳其政府把另一批约 11.5 万人逐出东色雷斯，4 万多人逐出切什米及其近郊。总的来说，在 1923 年正式人口交换协议签订前，超过 100 万基督教徒逃离安纳托利亚和东色雷斯。

193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剧了地区的破坏。韦尼泽洛斯坚决支持英法俄三国，但是康斯坦丁国王由于与德国的皇室交往密切，认为同盟国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以国王特权保持中立。1915 年 3 月 6 日，韦尼泽洛斯请辞首相一职。尽管他在 6 月的重新大选中再一次以压倒性票数当选，但是君主利用干预权拒绝承认这个结果。同时，由于希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英法两国对希腊的中立态度非常不满。当新一届支

持德国的政府在雅典成立时，协约国以此为借口把军队派到塞萨洛尼基。1916 年 10 月，韦尼泽洛斯建立了替代政府，国家主权被一分为二。英法随即对"正统希腊"实施封锁，这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削弱了韦尼泽洛斯的支持基础。1917 年 6 月，康斯坦丁国王被迫流亡，这使得韦尼泽洛斯可以重回雅典并且对同盟国宣战。

国家分裂比其他政治危机所涉及的社会部门都多。康斯坦丁已经成为反对韦尼泽洛斯的自由改革计划、质疑为"大理想"而流血牺牲是否值得的聚点。然而，国家分裂最危险的是武装部队的政治化。军队当然会关心是否出面干预的问题，但是太多意见就形成了分歧。因此，是否忠诚就成为个人升迁的重要因素。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政治上的互相斥责。韦尼泽洛斯的支持者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清除教育、军事、法律和公共服务中的所有前统治者留下的痕迹，因此在希腊大众生活中建立了这样的一种模式，并在以后的政局变动时一直延续。

同时，安纳托利亚的乡村正遭受巨大的灾难。1914 年 10 月，当奥斯曼帝国以支持德国、奥匈联军的身份加入战争时，那些觉得会有安全威胁的族群开始从军事敏感地区中迁出。在海滨地区的居民都转移到安纳托利亚的内陆地区，许多人由于暴露身份和遭到穆斯林民兵袭击而丧命。本都地区损失惨重，因为俄国军队将此地变为战区。本都地区的民兵和俄军一起并肩战斗，这意味着本都地区在 1917 年俄军撤退时可能会遭到报复袭击。研究者发现，本都地区的希腊人是东安纳托利亚被列为大屠杀对象的几个族群中的一个。

194

小亚细亚的灾难(1918－1922)

1918 年，希腊以战争胜利者自居，它期待着得到胜利的果实。1920 年 8 月，希腊得到了几乎整个色雷斯东部的领土。而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被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所占据，分配给希腊的是士麦那和其周边地区。希腊占领区的主权问题将在 5 年后以全民投票的方式解决。

实际在 1919 年 5 月 15 日，希腊军队就已经被允许占领士麦那及

其周边地区了，但是治理此地比先前治理马其顿要难得多。毕竟，安纳托利亚的人口绝大多数都是穆斯林，而且还有民兵(Chettes)的问题，这些民兵在战争年代一直统治着乡村地区。希腊军队迅速陷入游击战中，这也导致了大规模的针对穆斯林民众的暴行。在1920年和1921年夏天，希腊军队两次进入内陆地区，占领的地盘比先前瓜分到的三倍还要大，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击土耳其人的抵抗活动，在经过两次大规模进攻后，希军抵达安卡拉周围地区，但他们发现自己孤军深入，自身难保。希腊军队因1920年国内政权更替，反韦尼泽洛斯的政府成立而变得实力削弱。在此情况下，支持韦尼泽洛斯的军官被遣返回家，取而代之的是反对韦尼泽洛斯的军官。而由前奥斯曼军官，包括凯末尔·穆斯塔法所领导的统一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一直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积聚力量，等待希腊占领军被削弱的时刻。

1922年8月26日，土耳其军队冲破敌人的防线，而希腊军队由于缺乏撤退计划陷入了一片混乱。希腊军队在逃回到爱琴海岸前烧光所有的东西，对穆斯林平民施以暴行。随着军队失败的消息被传播开来，基督教徒聚居区的人们害怕出现更糟糕的局面，开始跟随士兵逃到沿海地区。到9月6日，第一批军队到达士麦那时，土耳其的追兵紧随其后。希腊军队虽然及时撤退了，但是大部分平民在士麦那码头陷入困境。土耳其人进城后，有计划地大量屠杀亚美尼亚人聚居区的百姓。挤在码头的希腊平民也遭到袭击，现场虽有英法意美军舰，但它们作为中立观察者根据严格的规定不得干预。一个土耳其士兵描述了他的亲眼所见：

195

> 所有的海边都布满了异教徒的尸体。我们的士兵用刺刀将他们杀死。帕萨港有7艘英法希腊军舰。所有的希腊异教徒都纷纷投海。他们高喊着救命。即使是军舰也不能救他们。亚美尼亚人和异教徒们没有放弃他们的房子。非正规军烧毁了所有的房子。炸弹爆炸，枪声四起。大部分异教徒和亚美尼亚人被活活烧死。[2]

就像这段资料中所说，士麦那火光冲天，城里的异教徒们全部被杀戮。据估计，大概有10万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

希腊人的士麦那在大火中消失殆尽，随之消失的还有"大理想"计划。在土耳其的资料中，这场"地狱之火"被记载为一次消灭国家煽动性少数民族的清洗运动。在希腊，"地狱之火"则象征着一次国家灾难，它标志着民族统一梦想和在小亚细亚地区近三千年的希腊人生活史的结束。士麦那的遭遇表明：现代化也有其黑暗的一面。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是各国因民族排斥而产生种族灭绝和史无前例的大驱逐的时代。1922年的士麦那是历史长卷中最黑暗的一章。

难民的影响

1923年1月，希腊和土耳其在洛桑签署了新的条约。土耳其共和国取代了奥斯曼帝国，领土包括安纳托利亚、东色雷斯一直延伸到埃弗罗斯河的地区。希腊的地域除多德卡尼斯群岛外都和如今相同，这个群岛战后被划分给了意大利。土耳其和希腊就人口交换达成一致。大约有100万希腊东正教徒在条约签署前已离开土耳其，但是仍有20万人等待转移。而在希腊还有30万穆斯林，其中包括讲希腊语的穆斯林。在新组建的国际联盟(国联)和其主要代表——挪威科学家弗里乔夫·南森博士的努力下，人口交换顺利完成，这也将成为日后在国家监督下人口转移的一个典范。

人口交换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从国家的角度来说，难民在马其顿和希腊色雷斯东部的重新安置可以提高国家安全，因为当地的少数民族被淹没在那些忠诚于国家的移民者中。然而，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新的移民被视为本已稀少的土地和工作岗位的竞争者，因此当地的希腊人非常质疑他们的民族性。当地居民对难民们的敌意是不可避免的：1923年12月初，住在宪法广场临时帐篷里的难民就遭到一群高喊"滚回土耳其"、"滚回土耳其"的人群的骚扰。在马其顿乡村土生土长的农民和新移民的公开冲突也时有发生，由于没有土地测量，当地土生土长的基督教徒就随意侵占本应分配给穆斯林难民的土地。

希腊政府和国际联盟所成立的难民安置委员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希腊安置约 120 万难民，这其中包括从保加利亚被驱逐出来的 117 633 人。大约 60%的难民在马其顿定居，主要是居住在撤离的穆斯林和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准确地说，一共建立了 1 381 个乡村定居点，而大部分都定居在塞萨洛尼基，这使得希腊人占这个城市人口的多数。1912 年，马其顿一半不到的人口(大约 47.4%)不是希腊人，但是到 1926 年，希腊人就占到 90%。把这么多的难民安排在马其顿乡村，其政治后果之一是心怀不满的斯拉夫马其顿人成群结队地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这也成为支持斯拉夫马其顿独立的原因。

在原希腊领土更南面的地方，由于空闲土地很少，难民们都主要集中在大雅典地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带有安纳托利亚名字的新郊区(如新爱奥尼亚、凯撒里亚尼等)。虽然乡村的重新安置过程总体来说是成功的，但是在帮助城市难民的问题上，希腊政府和难民安置委员会就显得束手无策了。从雅典、比雷埃夫斯、塞萨洛尼基周边的流动帐篷和贫民窟搬到设施完备的住房用了许多年，同时难民也需要工作机会。历史学家认为安纳托利亚的劳动力和商人给希腊的经济带来了长远的好处，简要概括就是加强了其工业扩张。由于安纳托利亚专业技工的加入，工业确实取得了发展，比如地毯和香烟制造业。但是总体上看，工业和制造业不具备接收难民劳动力的能力。大量涌入的劳动力实际上给劳动力价格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当地评论员就被过多的小贩和私人手工业者为薄利争夺生意的场面所震撼。

197

战争之间的骚乱(1922－1940)

小亚细亚的灾难给政治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土耳其军队进入士麦那不久，9 月 26 日，韦尼泽洛斯一派的军官在尼古拉奥斯·普拉斯迪拉斯上校的带领下在雅典发动政变，国王被迫逊位流亡。前首相季米特里奥斯·古纳里斯等六名军政要人被草率地审讯并处决。可以想象，反对韦尼泽洛斯的人理所当然都被从公共服务和军事岗位上撤换。1923 年 10 月，由韦尼泽洛斯的反对者发动的政变的失败造成了更大

规模的混乱,而韦尼泽洛斯的支持者坚持要废除君主。1924 年 4 月 13 日的公民投票中,70%的选票支持建立共和国。

和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希腊的高层统治者虽然百般努力希望稳定政治秩序,但都以失败告终。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了持续 10 年的经济混乱,自由民主政府在就业和福利方面一直未能达到民众的期望。当然,希腊有自己特殊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存在支持韦尼泽洛斯和反对韦尼泽洛斯政府之间的分裂,而分裂在处决古纳里斯之后变得更加尖锐。另一个问题是在"大理想"无法实现后,国家没有其他的理想来取代它。当 1928 年韦尼泽洛斯重掌大权之后,政府提出了解决国内问题的新"大理想"计划,但这要以增加大规模政府开支为前提,这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是不可能实现的。同其他国家一样,希腊被不断增加的社会动荡所困扰。农民和工人通过游行抗议或加入工会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在 1917 至 1928 年间,希腊工会会员人数从 44 230 增长到 167 509。从 1924 年起,希腊共产党组织了一次纪律严明组织良好的工人运动,由此来表达工人的不满和动员其成员。在大萧条时期,工会的参加者和工人的不满情绪显著增加,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希腊共产党已成为国会中令人瞩目的力量。

198

与此同时,大部分希腊政治家们仍然坚持认为国家政府应该主要处理高层政治(比如对外政策和立宪事宜),人民的不满只不过是安全问题。韦尼泽洛斯的支持者和反对派都认为,对于社会动乱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残酷镇压。在两次大战期间,警察力量壮大为日益庞大和复杂的机构,和其他公共开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警察的收入和福利成为国家政府特别关心的问题。警察整天忙于处理不断发生骚扰的工会会员和拿着短棒的示威者。死难事件不断发生。

政治暴力已经成为大萧条时期整个欧洲都普遍存在的人民生活的现实写照。议会制度陷入瘫痪,统治独裁不断加剧。在希腊,1935 年 11 月恢复君主立宪制,但却是在公然违规操纵公民投票结果的情况下通过的。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国会系统逐渐陷入瘫痪,由于希腊共产党拒绝合作,因此失去希腊共产党支持的领导党未能组成政府。4 月,国

会投票通过允许因过度保守的观点和对政治家的憎恶而著名的扬尼斯·梅塔克萨斯将军通过法令统治国家。8 月，梅塔克萨斯向乔治二世（1922—1924 年，1935—1947 年在位）进言，说共产党已势在必得，宪法应该终止。希腊因此屈服于许多欧洲国家采取的模式。经国王同意，梅塔克萨斯建立了独裁政府。

梅塔克萨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典型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式的独裁者，但是他在外表和性情上更为保守。除了废除工会外，他还废除了出版自由，禁止一切表现出文化颓废的艺术形式，包括土耳其通灵音乐——伦贝蒂卡。作为一名军人，梅塔克萨斯热衷于标准组织化。他从意大利青年团和希特勒青年团得到灵感，组织了大规模的青年运动。他授予警察和特务机关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用于根除共产党势力。约有 3 万人被捕后被流放到凯阿岛或偏远的圣埃夫斯特拉提奥岛上。和许多当时的独裁者一样，梅塔克萨斯寻求各个阶层的支持，因此他制定了新的社会政策：最为著名的政策之一就是引入了一周五天工作制，并且设定最低工资。然而他的主要统治武器仍是政治镇压，在他的统治下，希腊社会仍然陷于严重的两极分化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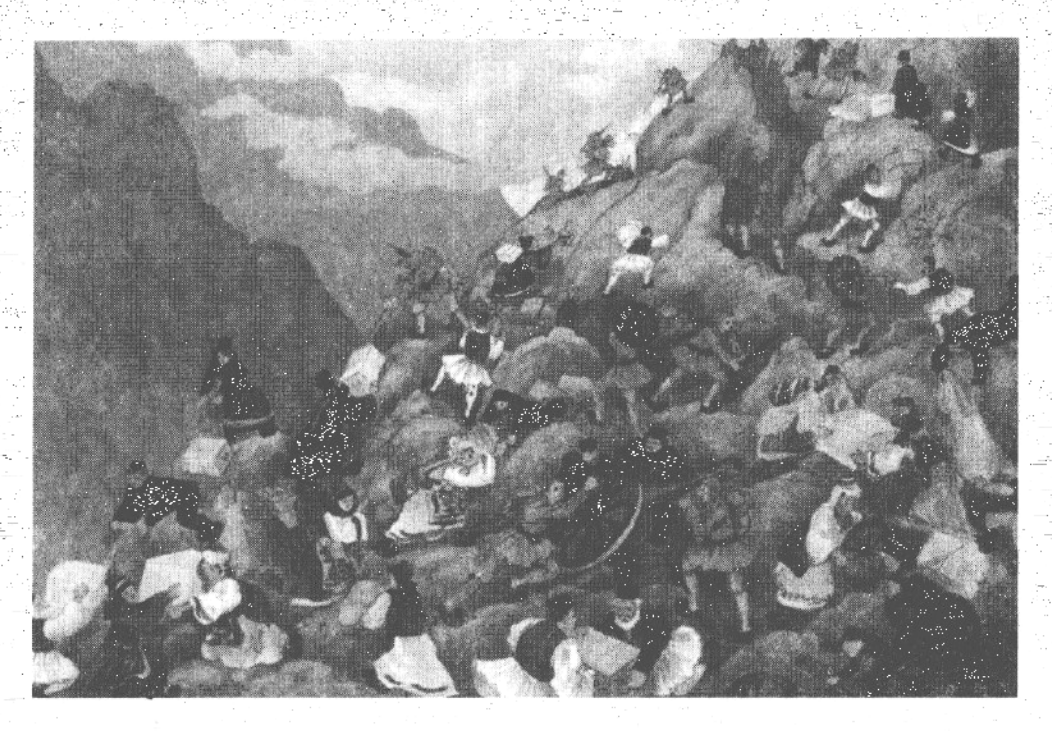
199

轴心国占领下的希腊（1940—1945）

1940 年 10 月 28 日，墨索里尼命令驻扎在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军队入侵希腊。此时德国刚刚打败法国，但仍处于和英国交战当中，墨索里尼寄希望在希特勒忙于其他战事的时候攻占新地盘。但由于准备不足，所以墨索里尼的部队很快便被希腊军队击退，希军追击到阿尔巴尼亚内陆地区。

希腊社会在面临外来侵略的情况下，短期内可以显得十分团结，但德军现在也不可避免地采取了直接行动。4 月 6 日，德军通过保加利亚边界进入希腊。希军和英军没能遵循先前制定的合作策略，很快就在德军的闪电战中落败。4 月 26 日，德军攻占了雅典卫城。但是在克里特的战斗却进行得十分激烈，一直从 5 月持续到 6 月。此时，希腊国王和一些政客逃到了埃及，并建立了流亡政府。数月前在阿尔巴尼亚

战争中一战成名的乔治·措拉格鲁(Giorgos Tsolakoglous)将军在国内来抵御轴心国的入侵。但是他很快就投降并成立了傀儡政府,一世英名荡然无存。整个希腊沦陷,意大利占据着大部分领土,而德国则控制着雅典、塞萨洛尼基和其他战略要地。由于保加利亚支持轴心国的入侵,因此得到了东马其顿和色雷斯的大部分地区。10万名希腊人在短时间内就被清洗出了这片地区。



爱国主义:这幅宣传画展示了在1940年10月意大利入侵之后的国家团结(Gennadius Library, Athens, Greece)(图片来源:Snark/Art Resource, New York)

为了避免重蹈德国在一战中的覆辙,希特勒政府着手建立一个不拖累后方的帝国,因此像希腊这样的占领区很快就被掠夺一空。到1941年后半年,饥荒席卷了城市和岛屿。而英国的海上封锁政策使得情况更加恶化。1941至1943年间,共有30万平民死于饥饿。直到1942年春天,才从土耳其运来首批救灾物资,但是迫于局势压力,只允许红十字会和中立国瑞典发放救灾物资。岛屿上的居民很快就用尽了当地的资源,由于禁止捕鱼,被饿死的平民无数。比如在希洛斯岛

201

(Syros)，1939至1942年间每年的死亡人数从435人升至将近3 000人。

随着战争的进行，通货膨胀愈演愈烈，黑市交易日益猖獗。1940年一条面包的价格是10德拉克马，但是到1944年中就涨到了3 400万德拉克马。同时傀儡政府效忠于轴心国，根本不能保护本国人民的利益。最终，志愿团体和工人组织成为领导力量，一场民族运动在1941年悄然兴起。1941年10月10日，工人解放阵线成立，并从不同阶级、不同职业吸收支持者。它在初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食品救援和定量配给食物，同时也提供福利服务。例如，主要的活动组织者玛丽亚·曼桑索普洛斯就在希腊中部地区领导育儿服务组织。在农村，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领导村庄组织利用好资源、征用粮食和其他物资支援其他地区。截至1942年底，工人解放阵线的组织已经散布在希腊各个地区。整体看来，这场运动是受到人们欢迎的。

希腊内战的起源(1943—1946)

工人解放阵线受人欢迎主要是因为其先进的政治理想，但是大多数人同样意识到，支持着这一阵线的是希腊共产党。尽管工人解放阵线的成员是来自社会的不同行业，但是大部分领导人都是希腊共产党员。同时，组织结构和纪律性都明显带有希腊共产党的印记。因此，在政治相对保守的地区，比如伯罗奔尼撒地区和希腊中部，工人解放阵线自然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阵线，所以乡村领导人通常拒绝合作。在此情况下，工人解放阵线便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一些历史学家称之为“红色恐怖”，工人解放阵线准备通过暗杀和其他形式的政治暴力使人顺从。工人解放阵线的袭击发起了新一轮的政治暴力，并逐渐上升为更大规模的冲突。 202

与此同时，工人解放阵线的当务之急主要是处理和轴心国之间的关系。在1942年间，全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了工人解放阵线的军事力量，尽管还有其他的组织，但是全国人民解放军是目前规模最大最有效的抵抗力量。在1942年底，希腊的抵抗开始以不同方式向轴心国力量

发起挑战。敌军的哨所、军营和护送车队都成为袭击的目标。1943 年 5 月,全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希腊的主要城镇——格雷维纳,并且俘虏了意大利驻防部队。在这之前,3 万名抵抗士兵已经在品都斯山区和伯罗奔尼撒地区活动了。

1943 年 9 月,墨索里尼下台,意大利驻希腊的军队投降。德国迅速占领了意大利统治区,并进行了包括恐吓平民在内的反叛乱运动,旨在切断物资供应。上千个村庄被毁,暴行随处可见。1943 年底,由于游击队击毙了 78 个德国人,伯罗奔尼撒的卡拉夫里塔村全村的男人都被处决。同时,希腊的犹太人被视为消除的目标。在意大利的管理下,犹太人还可以寻求庇护,但是在德国人的手中他们唯一的庇护就是一本土耳其或西班牙的护照。除了少数犹太人,希腊的 7.5 万名犹太人,包括塞萨洛尼基的 5.5 万人都惨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

抵抗力量还要对付雅典傀儡政府建立的希腊辅助军队。这些安全部队是为了对抗共产党人而建立的,虽然大部分的应征者是一贫如洗急于找到工作的平民,但他们都热情高涨。这些安全部队身着传统百褶裙,寻找共产党。他们还发起了一波"白色恐怖":滥杀无辜,强奸,抢劫。在反对不断加剧的政治暴力和预计德国在欧洲战败的情况下,工人解放阵线开始思考战后的出路。工人解放阵线无法在没有英国帮助的条件下来领导希腊,特别是在苏联拒绝支持的情况下。战后最令人期待的政治格局是:由流亡政府和乔治二世主导的政府。1944 年 5 月,工人解放阵线接受了左翼韦尼泽洛斯派政治家的和流亡政府首相乔治·帕潘德里欧提出的方案。工人解放阵线也同意将军队置于英国当局管理下。

203

1944 年 10 月,德国军队从希腊撤离。在此之前,帕潘德里欧已经回到希腊并建立了新政府。然而他几乎无从选择,只能依靠战时就表示合作的安全部队和警察。这样,工人解放阵线就被排除在权力之外。同时,工人解放阵线对政府的怀疑也与日俱增,尤其是与轴心国合作者中仅有少数被绳之以法。12 月 4 日,警察对来自工人解放阵线的反对者开枪并造成 16 人死亡后,他们的关系彻底破裂。这件事引发了国内

一系列的暴力事件，统称为"十二月事件"，在此期间，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消灭了抵抗组织，巩固了在农村的政权。然而在英国军队和右翼准军事部队占上风的雅典，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惨遭失败。

1945年2月，所有党派同意放下手中的武器，同时遵守在雅典海滨郊区瓦拉基扎(Varkiza)签署的协议。但是当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放下武器后，司法部门和警察却逮捕了上千名工人解放阵线的领袖和支持者。以前的通敌者向他们战时的敌人复仇，把抵抗的士兵以政治罪行推向法庭。大约2 900名通敌者在战后被投入监狱，只有29人被处死。然而到1945年底，被关押工人解放阵线成员的人数却将近5万。左翼分子的家庭不断受到骚扰，许多人失业或被政府部门拒绝录用。在1945至1946年间，警察和国家安全机构扩大了监视和逮捕已知或疑似的左翼分子的范围。到1946年底，反共政府已经控制了崎岖山区外的所有地区。大量前抵抗人员再一次躲藏起来并重新组织，内战随即开始。

内战及其后果(1946—1952)

1946年10月，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改称为民主军，它作战经验丰富，在与政府军的早期交锋中都占上风。它使用游击战术会更具效果，然而它很少这样做。1947年初，总共1.3万名游击队员，其中不到1万名在品都斯山区。由于当时数千工人解放阵线的支持者不是被捕就是在城市或乡村受到严密监视，而且民主军的基地在偏远或荒无人烟的山区，战争后期的征兵更加困难。另一个不利因素就是民主军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斯拉夫马其顿人，他们是为自己独立的家园而战。共产党人也使用从山村中强制招募来的士兵，这其中包括远离家乡并通过政治教条洗脑的年轻妇女。在轴心国占领区偶尔被工人解放阵线(或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的特工人员使用的红色恐怖战术现在在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内经常被使用。

205

共产党拒绝了苏联的支援，在与对手的交锋中进展颇微。然而民主军却得到刚刚被共产党接管的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所



美国化：同其他欧洲国家的国民一样，希腊人也成了美国产品的狂热消费者，包括来自好莱坞的电影。图为 1947 年时位于雅典的一家电影院（Orpheus Cinema）（Dimitris A. Harissiadis（PLA12_int12） Photographic Archives，Benaki Museum）

提供的武器和其他物资，希腊政府及其国民军也先后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支援，美国在 1947 年使这一地区成为反共堡垒。在马歇尔计划下，希腊政府收到共计 3 亿 5 360 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和价值 123 亿 7 500 万美元的重建资金。另外，到 1949 年，军队服役人员已经上升到 25 万人，而且在此之前，国民军受到更好的训练，并且由有经验的军官如亚历山德罗斯·帕帕戈斯、特洛西维路斯·察卡洛托斯（Thrasyvoulos Tsakalotos）做指导。到 1949 年夏天，国民军就重新夺回了所有山区，到 1950 年初，内战结束。

希腊内战并无重要的军事意义，因为共产党一直都没有夺取权力的可能。而平民总是最大的受害者：6 万人战死，5 万人被迫流亡到东方集团国家。然而 20 世纪 40 年代，持续了数十年的希腊社会的两极分化，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政治暴力的精神创伤。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一个来自靠近奥林波斯山的德卡斯蒂村的年轻人，因为凑巧穿了件红色毛衣就遭到右翼宪兵的毒打而不省人事。许多无政治热情的人都曾因

为上述经历而被“政治化”。私人恩怨也以意识形态划线，个体敌人已经变成国家公敌。就像一名共产党士兵由于杀害 12 人在 1944 年的法庭上供认的一样：

> 我相信个人恩怨在决定是否杀人时可能起到主要作用，因为村长特里米斯讨厌和他在橄榄市场上竞争的措恩古斯家族。[3]

正因为此，内战给人民带来了巨大伤痛，同时也重塑了希腊的政治文化。社区因新兴的社会分化而分裂，那些与左翼相关的人沦为了二等公民。政治归属成为最重要的身份，这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工作机会，以及申请经营许可的成功几率，比如开一家客栈、咖啡馆或是小报亭（报亭的大小不超过电话亭，通常这是留给伤残的退伍老兵的工作）。很多人被迫到国外寻找能够糊口的工作，但在这些移民聚居地，内战的阴影仍不能驱散。比如在澳大利亚，这些移民中的很多人都把自己看成政治难民。他们形成了许多俱乐部，比如悉尼的“阿特拉斯”俱乐部和墨尔本的“德谟克利特”俱乐部，为了争夺更多的社区资源与保守的主教和他们的支持者进行新一轮的斗争。

重建和政治恢复（1950－1961）

马歇尔计划在恢复希腊经济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 1947 至 1957 年间，美国的援助提供了希腊国内经济恢复上的一半开支，这其中的大部分用在了改造国内的基础设施上。在内战结束时，国内的公路比轴心国占领时增加了一倍；由于拖拉机和化肥的使用，农业产量大幅提升。但是希腊对援助的过分依赖使之很容易受到美国的政治干涉。这种干涉体现在构建战后同盟、支持美国跨国公司和对待左翼分子的强硬行为上。美国的援助还伴随着限制性条款，例如自由民主、自由选举和警察不能过度使用暴力等。这种新型的“美国治下的和平”不会受附属国政权公开的独裁主义和法西斯风格的野蛮行为所影响。

在战后的几年里，政治权力中心转移到旧政治阶级手中。保守的

民众主义者再一次与当时韦尼泽洛斯的儿子索福克莱斯(Sophokles Venizelos)所领导的自由党进行较量。民众主义者希望恢复君主制,但它应在其传统的宪法权利范围内恢复,这已是希腊自由民主制的主流。但和其他的欧洲王室不同,希腊的君主认为自己有使用政治特权、包括控制军队的权力。因而,即使保守的首相也会因国王不顾内阁建议独自决定军事任命和晋升的行为而愤恨不已。首相和君主之间的矛盾纠纷导致了1951年、1963年和1965年的三次首相辞职。

从表面上看,希腊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虽然希腊共产党被禁止,但是左翼党派,比如左翼民主统一党被默许并可以参与选举。尽管在工人解放阵线倒台后,再没有一个党派可以组成多数,但是韦尼泽洛斯派的自由党作为最大的政党随时准备上台执政。早期的战后政府通常是不稳定的联合政府,这就促使1951年美国大使要求用可能利于保守党的最高票当选制度替代现有的比例代表制度。这就为保守党的长久统治奠定了基础。在1952年的大选中,帕帕戈斯的"希腊人民联盟"党赢得了绝对多数,1955年领导权交到了一样很有能力的公共工程部部长康斯坦丁·卡拉曼里斯(1955至1963年,1974至1980年在任)手中,保罗国王(1947年—1964年在任)和美国大使一致看好他。卡拉曼里斯和梅塔克萨斯与战争中傀儡政权没有瓜葛,而且相对比较年轻英俊,因此在国际舞台上有着令人尊敬的形象。当他的前辈们都忙于应付国内安全问题时,卡拉曼里斯的精力却主要集中于制定政策议程和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目标上。他还将自己的党更名为希腊激进联盟,并要求在党内享有绝对的权威,而此党在1956年、1958年和1961年连续三次赢得大选。

与此同时,希腊经济在美国的援助下持续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7.3%。最重要的是,战后政府在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成功地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以下。和大部分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一样,希腊政府必须对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敞开大门。在这方面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1953年希腊的货币德拉马克贬值将近一半,这使得希腊在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出口价格大大降低。希

腊的经济奇迹也反映在工业、制造业尤其是建筑业的迅速扩张中，这些都促进了人们从乡村进入大城市，尤其是雅典和塞萨洛尼基。到 1970 年，大部分希腊居民都住在城市中心，将近 3%的人住在雅典。为了满足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和比利时大量的劳动力需求，海外移民也重新开始，大量回流到希腊的外汇对弥补国内赤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到 1960 年，大约有 8 万人移居海外，到 1969 年又有 9.6 万人移民。1963 年在西德的 80 万国际劳工中，有 10.3 万人来自希腊。

然而战后的经济奇迹也是通过压低工人工资、尽量缩减社会福利才取得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战后繁荣的成果并没有得到平均分配，直到 70 年代，希腊社会的民众才开始享受在北欧已极其普遍的以消费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另外，贫困仍然普遍存在，尤其是那些依靠在国外劳动的亲友汇款为生的农村失业家庭。

大规模的海外移民狂潮实际上是对战后政治秩序的一种责难。和德国的国际劳工不同，北美和澳大利亚的移民并不会被强制遣返，因此很少有人回国。多伦多和墨尔本典型的移民家庭都可以享受高质量的学校教育和医疗服务，而且不需要贿赂或利用社会关系就可以享受社会服务。在希腊，工作和受教育的机会都很少。换句话说，国外仍然给希腊人提供了更好的未来。

君主制，军队和帕拉克拉托斯(1961—1974)

许多希腊人，尤其是那些因为过去或多或少、或真或假和左翼分子有牵连而受到影响的人，以及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晚期没有享受到希腊发展好处的人，都认为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当权派手中，这些人包括君主、大企业家、保守派政客、军队和警察，以及美国大使馆。社会生活的不公平，比如低工资和对战时通敌者的保护，都同这些因素密不可分。这些希腊人还注意到，即使是削弱当权派力量的很小企图都会招致警察或安全部队包括“准政府”(帕拉克拉托斯)惩罚性的报复行动：“准政府”是警察和安全部队中的秘密网络，准备采取一切手段维持现状。

209

准政府第一次干涉希腊公共生活发生在 1961 年。那一年，乔治·

帕潘德里欧的中间派联盟党被广泛看好极有可能赢得国家大选，但尽管帕潘德里欧不是社会主义者，仍被极右派看作眼中钉。当卡拉曼里斯连任后，人们发现他的支持者和准政府恐吓了选举人。事实上，由于这次选举舞弊太过骇人听闻，帕潘德里欧聚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公开活动强行举行另一次大选，这也是“十二月事件”后民众对政府的憎恶首次以政治游行和罢工活动的形式公开发泄出来。事情在1963年5月塞萨洛尼基的一次游行上达到顶点。在光天化日和数千名示威者面前，准政府暗杀了左翼政治家乔治·兰布拉基斯。国际著名的作曲家米基斯·塞奥佐拉基斯(Mikis Theodorakis)受到触动对媒体公开讲述了准政府的所作所为，呼吁希腊人联合起来抵制准政府和当权派。

卡拉曼里斯似乎不为帕潘德里欧领导的抗议所动，但是在保罗国王不理会他抵制对英国进行皇家访问的建议后，他于1963年6月辞职。在随后的大选中(11月3日)，帕潘德里欧的中间派联盟党赢得了大选。作为一个公开承诺的改革派政府，中间派联盟不失时机地推进一系列的社会和教育改革，包括免费大学教育和大量工作场所的改革。与此同时，右翼官员正在策划抵制政府的行动。为了防止政变的发生，帕潘德里欧试图改变军事领导层。因此，他试图得到防卫部门的控制权，但这需要得到王室的同意。年轻的康斯坦丁二世(1964—1967年在位)拒绝了他的要求，尤其是帕潘德里欧的儿子安德烈亚斯也涉及自由派及左翼军事阴谋。1965年7月，帕潘德里欧用辞职回应了国王的拒绝，然后再一次组织大选，并且取得了新的组阁权，然而康斯坦丁国王却挑选了自己的首相。

在随后的两年中，虽然未经国会信任，但国家仍然掌控在由国王挑选的过渡政府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整个国家充斥着包括马上要军事政变的谣言，包括由不同的将军、校官，甚至尉官发动军事政变的消息。政府当局意识到危机重重，康斯坦丁本人也告诉当时流亡巴黎的卡拉曼里斯，说他也琢磨着自己发动政变。卡拉曼里斯随后(4月10日)对自己回国的同事说，“我听说你们都疯了”。[4]康斯坦丁国王最终同意在1967年5月举行大选，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帕潘德里欧会赢得大

选，准政府中的一小撮人果断采取了行动。4 月 21 日清晨，希腊老百姓起床时发现，自己已处于军事统治之中了。

密谋者在 4 月 21 日凌晨 2 点开始行动。他们迅速地逮捕和扣留了所有反对派和重要的政治军事人物，包括帕潘德里欧和掌权的保守派政治家帕纳约蒂斯·卡内洛普洛斯。军事政变的领导人都出自特务部门，经验丰富：乔治·帕帕多普洛斯上校，尼科斯·马卡雷佐斯上校和斯泰里亚诺斯·帕塔科斯(Stylianos Pattakos)准将。这些一夜成名的上校们通知了国王并任命了新政府。开始时，密谋者还试图维持立宪政体的伪装，但是对于所有人来说，很明显希腊再一次陷入了独裁统治中。

就如同预见的一样，武装部队、警察、教会和公共机构都受到了一次大清洗。所有被怀疑是左翼分子的人都遭到扣押，甚至遭受了酷刑。所有的媒体和图书都受到国家严格的审查。包括嬉皮士长发、摇滚乐和迷你裙在内的被认为有西方纵欲表现的东西都受到打击。军政府对道德标准的兴趣逐渐显露。这些人大多来自农村，对城市生活、旧式有钱的上层社会和西方的放纵态度都没有好感。他们渴望建立基于农村社会价值观的希腊世界。他们还坚持认为政府、教育以及所有公共交流只能使用地道的希腊语，并反复重申普通的白话是层次不高的俗语。

尽管“上校”仍声称这次政变是把整个国家从左翼统治中解救出来的合法行为，但是军政府实际是在右翼组织内部制造巨大的分歧。保守当权派对于权力流入一群乡巴佬手里的现实以及军政府给世界留下的不好印象表示非常不满。很少有保守派政客与军政府合作，而至少在开始，君主还阳奉阴违地和他们合作。但是到 1967 年后几个月，康斯坦丁国王试图在王室成员的支持下发动反政变运动，但是他的计划被泄露了，被迫流亡。有人继续策划一系列的暗杀行动，但是大多被特务机关发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纷纷谴责独裁统治，而美国是唯一对希腊采取制裁的国家。1970 年欧共体彻底与希腊解除关系。当中东问题爆发时，另一位上校——穆阿迈尔·卡扎菲要求美国从利比亚撤走军事基地，美国因此重新调整政策。尼克松政府成为“上校

211

们"冷漠的支持者。

军政府从来没有受到欢迎,但是它一方面可以在安全部队高压下暂时保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低通货膨胀和高经济增长。然而 1973 年,政权不得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率陡然升至 15.5%,次年更是到了 26.9%。全世界的政府纷纷由于原油危机、史无前例的高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在选举中失利,但是军政府却坚持不举行选举而艰难维持政局。然而 1973 年 11 月,雅典市中心的理工大学学生举行抗议活动,号召民众起义。运动吸引了大批民众,但是政府派出了坦克,几名学生和旁观者被杀害。全世界的谴责声不绝于耳,但是影响有限。帕帕多普洛斯被另一个更加阴暗的军事人物取代,他就是德美特里·约安尼季斯。

塞浦路斯的悲剧

军政府很明显陷入了困境中,所以它一定要分散大家的注意力。约安尼季斯认为,如果能够得到塞浦路斯,那么他的政府就一定会赢得一片赞誉。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这个岛国的命运就一直牵动着希腊政府的神经。希腊裔塞浦路斯人占塞浦路斯总人口的 80%,他们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就一直希望同希腊统一,而土耳其是最大的障碍。因为塞浦路斯距离土耳其南海岸线只有 65 公里,对土耳其国土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也关系到保护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尽管他们只占总人口的 18%。历届土耳其政府都明确表示,任何把塞浦路斯让给希腊的行为都会引起战争。为了回应 1955 年夏天希腊裔塞浦路斯人将统一问题强加于英国政府的行为,土耳其政府并没有制止在伊斯坦布尔发生的针对希腊社区的大屠杀行动:4 000 家商店、70 座教堂被毁。如土耳其著名的小说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回忆的一样,暴徒们就像当年攻陷这座城市的征服者穆罕默德手下洗劫城市的士兵一样残酷无情。[5]

1960 年,塞浦路斯人被迫接受独立而不是统一,以及一部赋予土耳其裔塞浦路斯领导人过多权力的宪法。当塞浦路斯第一任总统米哈

伊尔·莫斯考司，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1913—1977)试图在1963年底尝试推翻这部无法实施的宪法时，国内爆发了暴乱。权力分配则更加复杂，希腊和土耳其内部意见不合，但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来自准政府，因为它热衷于制造矛盾来加速实施激进的解决方案。极端主义者乔治·格里瓦斯和尼科斯·桑普森继续用袭击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村庄的方式考验土耳其政府的耐心。1964年，在2.5万名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被赶到狭小的飞地时，土耳其准备入侵，但被来自美国的压力所遏制。这时，当时还是一名在塞浦路斯工作的希腊情报部门官员的约安尼季斯推荐马卡里奥斯使用一次性屠杀所有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的方法。马卡里奥斯回忆道：

> 我当时惊愕得说不出一句话来。然后我告诉他我不同意；我告诉他我甚至不能想象杀害这么多无辜百姓。他再次亲吻了我的手，然后愤怒地离开了。[6]

1974年，约安尼季斯成为当权者，马卡里奥斯成为了黑名单中首位。到那时，马卡里奥斯已清楚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他也不希望看到塞浦路斯由希腊强权来统治。同时，极端主义者和军事掌权者对于希腊和土耳其的关系大大改善而感到非常不安，因此密谋采取行动分裂塞浦路斯。1974年7月，当马卡里奥斯要求希腊军队撤出塞浦路斯时，约安尼季斯采取报复行动：他下令推翻马卡里奥斯，并要求和土耳其分割塞浦路斯。希腊军官们让塞浦路斯国民卫队认为他们是在维护统一，而事实上他们在推翻政府。7月15日，尼科斯·桑普森(Nicos Sampson)，一个无任何领导经验且在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中被认为是刽子手的人被任命为塞浦路斯新总统。同时，美国国务院和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明知要发生政变却坐视不管，放任希腊和土耳其相互厮杀。7月20日，土耳其军队侵略塞浦路斯。约安尼季斯下令举行对抗土耳其总动员，但是武装部队根本不具备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条件，因此将军们都拒绝执行命令。土耳其占领了40%的岛屿，驱逐了18万希腊裔塞

213

浦路斯人。法玛古斯塔城几乎被夷为平地,而尼科西亚城被一分为二。

塞浦路斯悲剧唯一的积极作用是使希腊政治中的极右势力名誉扫地。军政府倒台,准政府不复存在。拒绝执行约安尼季斯动员令的将军们邀请卡拉曼里斯从巴黎重返希腊,建立临时政府。卡拉曼里斯的飞机在7月24日凌晨2点在雅典机场降落,他随即宣誓就职。

1974年后的自由民主运动

和西班牙和葡萄牙旧的独裁统治的瓦解相似,希腊向民主社会转变的过程也十分顺利。在整个欧洲南部自由民主有很好的民众基础,同时卡拉曼里斯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统治者斯皮诺拉和苏亚雷斯一样,在没有任何反对者的情况下就实现了与过去的脱离。8月11日,他要求帮助他上台执政的将军们不参与政治进程,而当他在9月宣布共产党合法化时,安全部门实际已成多余。卡拉曼里斯的第一届政府包括了中间派联盟的成员,然而他也寻求在11月的自由选举中人们能支持他新命名的新民主党。一个月后,70%的选民投票反对君主制。214 在处理军政府的问题上,大家投票一致决定要将他们绳之以法。针对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内的军政府支持者的大规模清洗运动在国内展开,几乎所有政权内的重要人物,包括上校们和约安尼季斯都被审讯。前者被判无期徒刑,而约安尼季斯因屠杀理工大学学生等罪行被数罪并判。帕帕多普洛斯在1999年死于狱中,临终前仍然不愿悔改。

卡拉曼里斯集中力量重塑政治秩序的努力是意义深远的。尽管他是一个旧时独裁统治的绝对拥护者,但他也是保守派和政治温和派可靠的依赖对象,因此他是推进改革的理想人选。两党政治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希腊新民主党在1977年大选时重新获得执政权,而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建立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帕索克)替代中间派联盟党成为主要的反对党。尽管领导者都是些刚愎自用的人,但是希腊新民主党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都是有本党派政治原则的现代政治党派。只要是赞同党派的政治计划和政治思想的人都被欢迎加入政党。而加入政党的好处,尤其是工作机会

仍然是一个重要动机。

到 1981 年，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势头强劲。卡拉曼里斯在他的后军政府总理任期内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重塑希腊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地位，这包括以正式会员身份加入欧共体。作为认同市场自由主义的党派，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明显表现出对社会政策不感兴趣。很多选民都认为卡拉曼里斯忽视公共福利、医疗和工作环境，而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1981－1989 年，1986－1993 年，1993－1996 年任总理）承诺彻底改革这些方面，并且打出“改变”的口号迎合公众的情绪。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于 1981 年 10 月以席卷之势上台，而早期的改革确实给整个希腊社会带来了巨大改变，比如立法保证妇女平等地位、离婚合法化和立法撤销希腊东正教作为国家官方宗教。政府还推行不在教堂举行婚礼的结婚形式，并且禁止收取嫁妆。而影响最深的举措是引入全面的医疗保险，大规模增加教育支出和改善工人工作环境。而且给予民主军适当的认可，并且给在世的老兵发放养老金。

215

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政策就显得华而不实了，尤其是帕潘德里欧更加激进的外交政策。他的所有关于从希腊撤除美国军事基地、威胁退出北约和欧共体组织的言论都毫无意义。造成更严重政治后果的是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不能兑现重新分配财富和大规模改善福利水平的承诺。希腊经济从 1973 至 1974 年的经济危机后一直不振，而 1980 至 1981 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使他所吹嘘的福利改革难以实施。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希腊的工资水平在欧共体各国中一直处于底部，且工资增长率一直没超过 1.3%，而通货膨胀率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到帕潘德里欧第一届任期结束前，他的私生活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他抛弃妻子玛格丽特，和一位空姐结婚，他同时被牵扯进了一桩银行诈骗案（尽管后来他被宣判无罪）。欧共体基金分配不均一直饱受海外的批评。对于许多希腊人来说，反对帕潘德里欧执政的主要原因是欧洲委员会发出的“除非实行更加严格的财政制度，否则希腊将被排除在欧共体之外”的警告。1989 年，帕

潘德里欧所领导的政府在大选中败给了希腊新民主党与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党组成的选举联盟。

希腊新民主党在科斯塔斯·米佐塔基斯的领导下于次年实现了独立执政。米佐塔基斯向欧共体承诺实行更加严谨的预算政策,但是他的紧缩政策将负担转嫁给了低收入人群。面对前所未有的民怨,包括1992年8月的大规模游行,同时主要由于马其顿事件的影响,米佐塔基斯政府不到一任便下台了。不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希腊人都为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企图被国际社会认可为“马其顿”的行径感到愤怒。希腊官方的抗议表达了他们在安全方面的忧虑:“斯科普里”(希腊人用此来称呼新的共和国)对希腊所辖的马其顿地区有领土企图。但是让希腊民众担心的是斯拉夫马其顿人要夺走古代的马其顿遗产。这件事激起了移民海外的希腊人的一致反对,尤其是在也有大规模斯拉夫马其顿人社区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希腊被指责设置贸易壁垒,米佐塔基斯政府的外交部长安东尼斯·萨马拉斯(Antonis Samaras)则认为政府对此事件表现过于软弱,因而与希腊新民主党决裂并组成了另一个政党,这为1993年10月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执政政坛铺平了道路。

216

到此阶段,两党在国家经济发展路线上基本达成一致。总理帕潘德里欧的新政府声称要积极加入标准苛刻的欧洲货币联盟,但是这样可能会失去低收入者的支持,而不像希腊新民主党那样能够获得工会的合作。连续执政十多年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一直拒绝放松货币紧缩、低支出以及其他的经济紧缩政策。自从米佐塔基斯时期就实行的经济紧缩政策开始显现成效,也对选举结果产生了影响,因而该党选情一直良好。从1993年起,人们工资收入有所增加,希腊的工业变得具有竞争力,国内经济投资大幅增长,企业在新开放的巴尔干市场上发展势头良好。当科斯塔斯·西米蒂斯(Costas Simitis,1996－2004年在位)在1996年1月接替帕潘德里欧成为总理后,他承受了来自党内要求恢复大规模公共支出的压力。不同党派间能够就经济现代化达成共识,这表明希腊经济已同其他欧盟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

今日希腊

在 20 世纪下半叶，希腊社会经历了最剧烈的转型。从战后到 20 世纪 90 年代颇受西方人类学家关注的农民几乎消失了。许多乡村被遗弃，大部分留存下来的开放社区通过日常通讯、电视和因特网与外部的广阔世界紧密联系。方言和习语也随着全国统一的标准白话而逐渐消失，但是当地传说和民间故事被热心的业余爱好者发掘、记录保留下来。除了东正教外，人们还有其他信仰，但超自然的预言完全消失了。政府需要下大工夫才能把像哈尼亚和罗得岛这样的历史古迹保存完整。但人们极可能把遗产保护理解为毁掉一个旧农舍，再建一个在雅典或者塞萨洛尼基随处可见混凝土建筑，因而厌恶遗产保护法规。新希腊事实上应该包括城市和乡村。2008 年，希腊的人口达到 1 120 万，近 500 万住在大雅典地区，100 万住在塞萨洛尼基。希腊家庭也同其他欧洲国家的家庭一样面临着违禁药品泛滥、交通拥堵、能源紧张和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希腊人和其他西方人一样有可能存在离婚、形成非主流文化（如性行为和宗教等方面）和同居的现象。

217

普通的希腊老百姓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诸多困难，比如公共服务效率低下，官僚风气严重，尽管这比 20 世纪 70 年代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土耳其关于塞浦路斯、爱琴海领土主权问题和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问题，解决起来仍是困难重重。北部各州斯拉夫人和穆斯林的福利和境况引起关心人权的非政府组织（例如赫尔辛基观察社）的关注。希腊也面临同英国一样的收入差距大和移民的种族歧视等问题。到目前为止，希腊政府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满足居民在社会福利、教育和基础建设方面的要求。2008 年末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许多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突显出来，例如啃老族：包括大学生在内的 15 至 25 岁的年轻人不愿意工作或领取社会救济，而是要靠他们的父母来养活。2008 年 12 月，欧洲许多国家的首都纷纷举行大规模的学生抗议活动，但源于一个年轻人被警察射杀而导致的希腊学生的抗议活动最引人注目，上了世界各大报头条。雅典立即好像处于停顿状态，

抗议者和工会组织要求当年仅以一票优势当选的总理卡拉曼利斯(2004—2009 年在任)下台，次年 10 月份的选举中他确实落选了。

总之，自 1974 年军政府倒台后开始的希腊政治转型成功地使其成为自由民主国家，此后，国家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就没有再受到严重质疑。同经历过此类转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政治稳定同生活水平的提高紧密相关。根据联合国 2005 年人类发展指数，综合平均寿命、受教育程度和其他小康社会指标，希腊在全球排名第 23，在欧洲名列第 16。多数国家统计指标也显示出希腊是富裕的国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起，移居国外的人越来越少，而移民到希腊的人数却在增加。2008 年，希腊人的平均寿命和受教育程度在全球居于前列，而人口出生率、婴儿死亡率和与贫穷相关的指标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欧洲其他国家相同，希腊妇女在工作中表现优异，在政界、大学和公共服务部门都占据着重要位置。

218

近些年来，塞浦路斯的发展前景很被看好。塞浦路斯的希腊区已成为海外投资者的首选之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像德国和英国这样的欧洲经济体。和希腊一样，塞浦路斯成为移民国家，菲律宾人、南亚人和中东人都来这里找工作。海外的希腊移民的境况从 20 世纪 60、70 年代起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起初充当劳工的希腊裔美国人、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从市中心区搬到了绿树成荫的郊区。希腊侨民大都拥有房产并受过高等教育。在希腊和塞浦路斯，移民们的生活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好。事实上，如果仅从生活水平上来衡量，希腊世界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好。至少，从历史发展眼光来看，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注　释

第一章　史前至公元前 500 年：起源

1. Hesiod, "Works and Days" (98—99), in *Hesiod and Theognis*, tr. Dorothea Wender (Penguin, 1973), p. 68.
2. Theognis (33—38), in *Hesiod and Theognis*, tr. Dorothea Wender (Penguin, 1973), p. 68.
3. Strabo, *Geographica* (10. 1. 10).
4. Plutarch, *Moralia* (760e—761c).
5. Strabo, *Geographica* (8. 6. 20).
6. 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r. EJ. Rhodes (Penguin, 1984), p. 51.

第二章　古典时代的希腊(前 500—前 359)：城邦的黄金时期

1. Herodotus (7. 21. 1), quoted in *The Landmark Herodotus*, tr. Andrea L. Purvis (New York, 2007), p. 505.
2. Herodotus (7. 220. 1—2), quoted in *The Landmark Herodotus*, tr. Andrea L. Purvis (New York, 2007), p. 591.

3. Simon Goldhill, *Love, Sex and Tragedy: Why Classics Matter* (London, 2004), p. 1.
4. Herodotus (8. 144. 2), quoted in Paul Cartledge, *Thermopylae* (New York, 2006), p. 250.
5. Hippocrates, quoted in Paul Cartledge, *The Greeks* (Oxford, 1993), p. 40.
6. Thucydides (1. 80. 3), quoted in Robert B. Strassler (ed.),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New York, 1996), p. 45.
7. Thucydides (1. 141. 3), quoted in ibid., p. 81.
8. Thucydides (6. 1. 1), quoted in Josiah Ober, *Political Dissent in Democratic Athens* (Princeton, 1998), p. 105.
9. Thucydides (2. 65. 9), quoted in ibid., p. 93.
10. Thucydides (3. 81), quoted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 Rex Warner (Penguin, 1954), p. 241.
11. W. G. Runciman, "Doomed to extinction", in O. Murray and S. Price (eds), *The Greek City* (Oxford, 1990), pp. 347—367.
12. Demosthenes (1. 4), quoted in J. K. Davies, *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 (London, 1978), p. 249.

第三章　希腊化时期(前359—前27)：从菲利普二世到奥古斯都

1. Arrian (7. 1—4), quoted in M. M. Aust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Cambridge, 1981), p. 34.
2. Arrian (2. 14), quoted in Nicholas Ostler, *Empires of the Word* (Berkeley, CA, 2005), p. 243.
3. Arrian (3. 23), quoted in Arrian, *The Campaigns of Alexander*, tr. Aubrey De Sdlincourt (London, 1971), p. 187.
4. Arrian (4. 9) quoted in Arrian, *The Campaigns of Alexander*,

tr. Aubrey De Sdlincourt (London, 1971), p. 217.

5. Strabo Geographica (17. 1. 8), quoted in M. M. Aust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Cambridge, 1981), p. 390.
6. Inscription reproduced in M. M. Aust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Cambridge, 1981), p. 196.
7. Polybios (36. 17), quoted in *The Rise of theRoman Empire*, tr. Ian Scott-Kilvert (Penguin, 1979), p. 537.
8. Tacitus, Annals (1. 1—2), quoted in Greg Woolf, "Provincial Perspectives", in Karl Galinsky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Augustus* (Cambridge, 2005), p. 107.

第四章　希腊罗马帝国(一)(前27—527): 从罗马和平时期到古代晚期

1. Plutarch, *Sulla* (102), from Plutarch, *Fall of theRoman Republic*, tr. Rex Warner (Penguin, 1972), p. 73.
2. Aelius Aristides, *To Rome* (102), quoted in David Cherry, *The Roman Worm* (Oxford, 2001), p. 172.
3. Horace, *Epistles* (2. 1. 156).
4. Virgil (Aeneid 6. 847—853), quoted in Christopher Kelly,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2006), pp. 20—21.
5. Quoted in Fergus Millar, *The Emperor in the Roman World* (London, 1977), p. 417.
6. Pliny (Letters x. 23, 24), *The Letters of the Younger Pliny*, tr. Betty Radice (Penguin, 1963), p. 268.
7. Pliny, (Letters x. 93), *The Letters of the Younger Pliny*, tr. Betty Radice (Penguin, 1963), p. 292.
8. Quoted in Fergus Millar, "The Greek City in the Roman Period",

in E Millar (ed.), *The Greek World, the Jews, and the East* (Chapel Hill, NC, 2006), pp. 126—127.

9. Dio Chrysostom, *Orations* (40. 10), quoted in Maude Gleason, "Greek Cities under Roman Rule", in D. S. Potter (ed.), *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2006), p. 231.
10. Dio Chrysostom, *Orations* (34), quoted in Susan Alcock, *Graecia Capta* (Cambridge, 2000), p. 85.
11. Lucian, *The Dream* (9. 11), quoted in Tim Whitmarsh, *Greek Literature and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2001), p. 123.

第五章　希腊罗马帝国(二)(约 500—1200):东正教的胜利

1. Cassiodorus, *Variae* (Ii), quoted in Julia H. Smith, *Europe after Rome* (Oxford, 2005), p. 275.
2. 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London, 1971), p. 200.
3. Quoted in Patricia Karlin-Hayter, "Iconoclasm", in Cyril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Oxford, 2002), p. 155.
4. John of Damascus, *On Holy Images*, quoted in Deno John Geankoplos, *Byzantium* (Chicago, 1984), p. 153.
5. William of Tyre, quoted in Michael Angold, *The Byzantine Empire*, 1025—1204 (London, 1984), p. 206.
6. Fulcher of Chartres, *A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to Jerusalem*, 1095—1127, tr. Frances Rita Ryan (New York, 1973), p. 79.
7. 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in Jean de Joinville and 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tr. M. R. B. Shaw (London, 1963), p. 58—59.

第六章 希腊世界(1200—1700):法兰克人和奥斯曼人统治下的生活

1. Quoted in J. Harris, *Byzantium and the Crusades* (London, 2003), p. 150.
2. Angeliki Laiou and Cdcile Morrisson, *The Byzantine Economy* (Cambridge, 2007), p. 167.
3. Quoted in S. J. Allen and Emilie Amt (eds), *The Crusades* (Peterborough, Ontario, 2003), pp. 234—235.
4. Quoted from S. J. Allen and Emilie Amt (eds), *The Crusades* (Peterborough, Ontario, 2003), pp. 239—240.
5. Quoted in Anthony Kaldellis, *Hellenism in Byzantium* (Cambridge, 2008), p. 375.
6. Quoted in Michael Angold, *Church and Society in Byzantium under the Comneni, 1081—1261* (Cambridge, 2000), p. 563.

第七章 现代希腊的形成(1700—1910):种族渊源与国家建设

1. Theodoros Kolokotrones, *Kolokotrones, the Klepht, and the Warrior* (London, 1892), p. 84.
2. Quoted in John Koliopoulos and Thanos Veremis, *Greece: The Modern Sequel* (London, 2004), p. 159.
3. William Martin Leake, *Researches in Greece* (London, 1814), p. 228.
4. Voltaire, *Oeuvres Completes* (8. 491—492) in David Roessel, *In Byron's Shadow* (Oxford, 2002), p. 14.
5. Stephen George Chaconas, *Adamantios Korais: A Study in Greek Nationalism* (AMS Press, 1968), p. 28.
6. Quoted in Richard Clogg (ed.), *The Movement for Greek*

Independence, 1770—1821 (London, 1976), p. 157.

7. Quoted in David Roessel, *In Byron's Shadow* (Oxford, 2002), p. 61.
8. Quoted in Michael Llewellyn Smith, *Athens* (London, 2004), p. 128.
9. William Miller, *Greek Life in Town and Country* (London, 1905), p. 112.
10. Quoted in ibid., p. 9.
11. Quoted in Philip Carabott (ed.), *Greek Society in the Making, 1863—1913* (London, 1997), p. 90.
12. Quoted in Mark Mazower, *The Balkans* (London, 2002), p. 94.
13. Quoted in Mark Mazower, "The Messiah of the Bourgeoisie",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5 (4) (1992), p. 898.

第八章　20世纪的希腊：极端的时代

1. Mark Mazower,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London, 2004), p. 295.
2. B. K. Kirli, "Forgetting the Smyrna Fire",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60 (2005), p. 38 p. 222 note 4.
3. Stathis N. Kalyvas, "Red Terror", in M. Mazower (ed.), *After The War Was Over* (Princeton, 2000), p. 177.
4. C. M. Woodhous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ek Colonels* (London, 1982), p. 15.
5. Orhan Pamuk, *Istanbul* (London, 2005), p. 158.
6. Quoted in Christopher Hitchens, *Cyprus, Hostage to History* (London, 1997), p. 39.

大事年表

旧石器时代(260 万年前—1.1 万年前/1 万年前)

30 万年前—40 万年前：最早的原始人类开始在爱琴海地区出现

约 2 万年前：末次冰盛期

1.8 万年前—1.2 万年前：在弗兰克西生活的人群食物采集能力大为增强

新石器时代(1.1 万年前/1 万年前—前 3300)

前 7000 年：爱琴海地区出现最早的农耕人群

约前 4500 年：农业开始遍及整个希腊

青铜器时代(前 3300—前 1200/前 1100)

前 2700—前 2000 年：希腊语最早开始在巴尔干/爱琴海地区出现

前 2700—前 2300 年：基克拉迪文化

前 2400—前 2200 年：位于勒纳的“陶瓦大宅”

前 2000—前 1600 年：米诺斯文明

前 1500—前 1200 年：迈锡尼统治时期

早期铁器时代或“黑暗时代”(前 1200—前 500)

前 1000—前 825 年：勒夫坎迪

古风时期(前 800—前 500)
前 800—前 700 年：荷马史诗
前 800—前 600 年："东方化"时期
前 776 年：传统上认为奥运会首次举办的时间
前 733 年：叙拉古建立
约前 728 年：迈加拉希布利亚兴建
前 657 年：库普塞罗斯在科林斯掌权
前 625 年：伯里安得耳接替库普塞罗斯执政
前 594 年：梭伦改革
前 546 年：庇西特拉图掌权
前 545 年：波斯征服了小亚细亚
前 510 年：庇西特拉图家族统治瓦解
前 508 年：克里斯提尼改革
前 507 年：罗马共和国建立
前 499—前 494 年：爱奥尼亚人起义
前 490 年：马拉松战役
前 480—前 479 年：希波战争

古典时代(前 500—前 359)
前 477 年：提洛同盟成立
前 472 年：埃斯库罗斯《波斯人》首演
前 467 年：欧律墨顿战役
前 465 年：塔索斯叛乱
前 462 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关系破裂
前 461 年：雅典实现完全民主化
前 458 年：埃斯库罗斯《欧墨尼德斯》首演
前 457 年：雅典人将势力扩大至玻俄提亚
前 447 年：雅典人被逐出玻俄提亚
前 447 年：帕特农神庙开始兴建

前446/445年:《三十年和平协议》
前438年:帕特农神庙檐壁完工
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
前421年:《尼西亚斯和约》达成
前419年:阿里斯托芬的《云》首演
前416年:米洛斯岛屠杀
前415年:西西里岛远征
前411年:阿里斯托芬《吕西斯忒拉忒》首演
前404年: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
前394—前387年:科林斯战争
前387年:柏拉图创立学园
前387年:《大王和约》
前371年:底比斯在琉克特拉击败斯巴达势力
前362年:底比斯将军厄帕米农达去世
前359年: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即位
前356年:第三次神圣战争
前352年:普列尼重建
前338年:喀罗尼亚战役
前336年:菲利普被刺身亡,亚历山大三世继位
前334年:泛希腊大军进攻亚洲;在格拉尼库斯取得胜利
前333年:伊苏斯战役
前332年:亚历山大夺取埃及
前331年:高加米拉战役
前330年:洗劫波斯波利斯
前327年:亚历山大迎娶罗珊妮,出兵印度河流域
前323年:亚历山大在巴比伦去世

希腊化时期(前359—前27)

前322年:安提帕特在克兰农击败希腊同盟

前 313 年：托勒密定都亚历山大城
前 307 年：亚历山大的继任者正式使用“国王”(巴赛勒斯)头衔
前 304 年：阿伽多克勒斯自封为西西里国王
前 301 年：伊普苏斯战役
前 300 年：塞琉古建立安条克城
前 280 年：凯尔特人进犯希腊
约前 276—前 262 年：克里莫尼迪兹战争
前 275 年：皮洛士被罗马人逐出意大利
前 245 年：西息温的阿拉托斯领导阿卡亚同盟
前 226 年：斯巴达的克琉墨涅斯三世击败阿卡亚同盟
前 222 年：克琉墨涅斯战败，逃往埃及
前 215 年：马其顿的菲利普四世与汉尼拔结盟
前 202 年：汉尼拔在扎马战役中战败
前 200 年：罗马对菲利普五世宣战
前 197 年：罗马率领希腊联盟在库诺斯克法莱获胜
前 196 年：弗拉米尼努斯宣布希腊人获得了“自由”
前 195 年：纳比斯被罗马击败
前 191 年：罗马在温泉关击败安条克三世
前 189 年：罗马在马格尼西亚击败安条克三世
前 187 年：罗马挫败埃托利亚联盟
前 168 年：伯尔修斯在皮德纳被罗马人击败
前 167 年：马其顿被划分成四个共和国；第一次马其顿叛乱
前 146 年：马其顿成为罗马行省；阿卡亚叛乱
前 141 年：帕提亚人从塞琉古王朝夺取巴比伦
前 113 年：本都的米特拉达提五世即位
前 89 年：罗马与米特拉达提交战
前 31 年：亚克兴战役

罗马和平时期(前 31—180)

前 27 年：希腊本土成为罗马行省阿卡亚

前21年：奥古斯都到访斯巴达

48—55年：基督教团体开始在希腊和小亚细亚出现

67年：尼禄巡访希腊

131年：哈德良组织成立泛希腊联盟

143年：埃里乌斯·阿里斯提德斯发布“致罗马的演讲”

167—174年：马科曼尼战争

212年：罗马帝国的所有自由居民均获得罗马公民的身份

267/268年：赫鲁利人侵袭希腊

古代晚期(约80—630)

284年：戴克里先即位

312年：君士坦丁即位

325年：尼西亚公会议

330年：君士坦丁堡兴建

337年：君士坦丁受洗

361—363年：尤利安统治时期

378年：阿德里安堡战役

390年：发生在塞萨洛尼基的屠杀平民事件

395年：罗马帝国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被推翻

529年：查士丁尼关闭雅典学园

532年：君士坦丁堡发生尼卡起义

533年：贝利萨留重新征服北非

535年：拜占庭重新征服意大利

541年：鼠疫爆发

565年：查士丁尼去世

577年：阿瓦尔人大规模进犯巴尔干地区

582年：莫里斯继位

602年：福卡斯政变

603 年：与萨珊波斯开始交战
626 年：阿瓦尔人和波斯人联合围攻君士坦丁堡
629 年：波斯战败求和

拜占庭帝国(634—1453)
634 年：阿拉伯人开始侵袭拜占庭近东地区
636 年：穆斯林在耶尔穆克战役击败拜占庭
641 年：穆斯林征服了埃及；希拉克略去世
668 年：君士坦斯二世遇刺
674—678 年：阿拉伯人围城君士坦丁堡
679 年：保加尔人移居东巴尔干地区
698 年：穆斯林从拜占庭夺走迦太基
717 年：阿拉伯人再次围城君士坦丁堡
730 年：圣像破坏活动：利奥三世下令将圣像移出教堂
750 年：阿拔斯王朝掌管哈里发国家
764 年：圣斯德望殉道
787 年：首次恢复圣像崇拜
800 年：查理曼在罗马加冕
811 年：保加利亚可汗克鲁姆击败尼基弗鲁斯一世
815 年：圣像破坏活动：第二阶段
824 年：阿拉伯人开始征服西西里
838 年：阿拉伯人洗劫了阿莫里昂
843 年：第二次恢复圣像崇拜，“正教节”开始
863 年：穆斯林在拉拉康被击败
902 年：西西里被穆斯林占领
923 年：拜占庭开始新一波在东方的帝国扩张
960 年：尼基弗鲁斯·福卡斯重新夺取克里特
969 年：尼基弗鲁斯夺取叙利亚北部
975 年：约翰一世·齐米西斯进犯巴勒斯坦

989 年：巴西尔二世击败巴尔达斯·福卡斯
1022 年：巴西尔吞并了亚美尼亚大部分领土
1054 年：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分裂
1071 年：曼奇科特战役，塞尔柱人开始占领安纳托利亚
1081 年：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继位
1091 年：挫败佩切涅格人
1096 年：十字军开始抵达君士坦丁堡
1146 年：十字军开始第二次东征
1180 年：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去世
1189 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开始
1204 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君士坦丁堡首次沦陷
1224 年：伊庇鲁斯君主国收复塞萨洛尼基
1261 年：拜占庭帝国恢复
1269 年：反希腊人十字军失败
1274 年：里昂公会议
1282 年：西西里晚祷起义，迈克尔八世·帕里奥洛加斯去世
1299/1300 年：奥斯曼人统治建立
1303 年：安德洛尼卡二世雇佣加泰罗尼亚大军团
1311 年：加泰罗尼亚人控制雅典公国
1331 年：尼西亚被奥斯曼人占领
1341 年：黑死病侵袭君士坦丁堡
1349 年：帕里奥洛加斯王朝统治摩里亚王国
1354 年：奥斯曼人夺取加利波利
1369 年：约翰五世·帕里奥洛加斯在罗马皈依天主教
1389 年：科索沃战役
1390 年：拜占庭军队协助奥斯曼人围攻费拉德尔菲亚
1402 年：蒙古人击败奥斯曼人
1430 年：塞萨洛尼基被奥斯曼人洗劫
1439 年：佛罗伦萨公会议，格弥斯托士·卜列东在佛罗伦萨举办讲座

1444 年：十字军在瓦尔纳战败

1453 年：君士坦丁堡二次沦陷；拜占庭帝国灭亡

近代初期(1454—1800)

1460 年：奥斯曼人占领摩里亚

1461 年：奥斯曼人占领特拉布宗帝国

1473 年：塞浦路斯成为威尼斯的保护国

1476 年：以希腊语印制了第一本书

1499 年：在威尼斯兴办了第一家希腊语印刷机构

1500/1504 年：米开朗基罗的"大卫"

1510 年：拉斐尔的"雅典学院"

1573 年：在威尼斯建造希腊圣乔治教堂

1669 年：干地亚沦陷

1768—1774 年：俄国-土耳其战争

1770 年：克里特和伯罗奔尼撒的起义

1774 年：库楚克-凯纳吉条约

现代(1800 年至今)

1806 年：《希腊的法律制度》发表

1814 年："友谊社"在敖德萨成立

1820 年：奥斯曼政府对抗阿里·帕夏

1821 年：在多瑙河诸省和伯罗奔尼撒地区发生希腊起义

1825 年：埃及军队在希腊开始恢复秩序

1827 年：纳瓦里诺战役

1829 年：阿德里安堡和约

1831 年：卡波迪斯崔阿斯被暗杀

1832 年：伦敦公约

1834 年：雅典被选为国家首都

1844 年：奥托国王被迫颁布宪法

1862 年：奥托被迫退位；让位于乔治一世

1875 年：特里库佩斯首次行使首相职权

1896 年：雅典举办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1897 年：希腊-土耳其战争

1901 年：雅典“福音书”事件

1909 年：军队推翻政府

1910 年：韦尼泽洛斯组建其第一届全国政府

1912—1913 年：巴尔干战争；希腊夺取塞萨洛尼基

1915 年：韦尼泽洛斯辞职，国家分裂开始

1916 年：韦尼泽洛斯在塞萨洛尼基另建政府

1919 年：希腊军队占领士麦那及其周边地区

1922 年：小亚细亚灾难；士麦那被焚

1923 年：《洛桑条约》；土耳其与希腊人口交换

1924 年：希腊选民支持建立共和国

1928 年：韦尼泽洛斯回国建立政府

1935 年：君主制复辟

1936 年：梅塔克萨斯建立独裁统治

1940 年：击退意大利侵略

1941 年：轴心国占领开始；工人解放阵线成为主要抵抗力量

1944 年：德军从希腊撤退；乔治·帕潘德里欧领导临时政府

1945 年：大规模逮捕工人解放阵线成员后，国内战争无可避免

1947 年：民族政府得到美国的支持；多德卡尼斯被割让给希腊

1949 年：民主军战败

1952 年：帕帕戈斯的希腊人民联盟赢得了绝大多数选票；希腊加入北约

1955 年：卡拉曼里斯代替帕帕戈斯；伊斯坦布尔发生对希腊人的攻击

1960 年：塞浦路斯取得独立

1961 年：乔治·帕潘德里欧在大选舞弊事件发生后领导了“不懈

的斗争”

1963 年：卡拉曼里斯辞职，帕潘德里欧成立政府

1965 年：帕潘德里欧辞职，康斯坦丁二世指定新政府

1967 年：军人集团在 4 月夺取权力；康斯坦丁二世被永久性流放

1973 年：雅典理工大学学生起义

1974 年：土耳其侵略塞浦路斯；卡拉曼里斯恢复宪法政体

1980 年：希腊重新加入北约

1981 年：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组建第一届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政府；希腊加入欧共体

1989 年：米特索塔基斯领导的希腊新民主党击败了帕潘德里欧

1991 年：大规模群众集会以及政府拒绝承认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1993 年：帕潘德里欧领导下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掌权

1996 年：科斯塔斯·西米蒂斯接替帕潘德里欧任总理

2002 年：欧元代替德拉克马

2004 年：科斯塔斯·卡拉曼里斯领导下的希腊新民主党赢得大选；希腊国家足球队赢得欧洲杯冠军；雅典奥运会

2008 年：12 月青年暴乱

2009 年：希腊经济衰退：乔治·帕潘德里欧领导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 10 月初重新掌权

历代国王、皇帝、苏丹和总理名录

马其顿王国国王

（希腊化时期君主所列出的是大约年代且具争议性）

阿敏塔斯一世	前 547—前 498 年
亚历山大一世	前 498—前 454 年
阿尔凯塔斯	前 454—前 448 年
佩尔狄卡斯二世	前 448—前 413 年
阿奇拉一世	前 413—前 399 年
奥雷斯特斯	前 399—前 392 年
阿奇拉二世	前 396—前 393 年
阿敏塔斯三世	前 393—前 369 年
亚历山大二世	前 379—前 368 年
佩尔狄卡斯	前 368—前 359 年
阿敏塔斯四世	前 359 年
菲利普二世	前 359—前 336 年
亚历山大三世	前 336—前 323 年
菲利普三世	前 323—前 317 年
亚历山大四世	前 317—前 310 年
安提戈努斯一世	前 306—前 301 年

卡山德	前 304—前 297 年
安提戈努斯二世·贡那塔斯	前 277—前 239 年
德米特里二世	前 239—前 229 年
安提戈努斯三世	前 229—前 221 年
菲利普五世	前 221—前 179 年
珀尔修斯	前 179—前 168 年

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国王

托勒密一世(救星)	前 323—前 282 年
托勒密二世(笃爱兄弟者)	前 282—前 246 年
托勒密三世(施主)	前 246—前 222 年
托勒密四世(笃爱父亲者)	前 222—前 204 年
托勒密五世(神显者)	前 204—前 180 年
托勒密六世	前 180—前 145 年
托勒密八世(施主二世)	前 145—前 116 年
克娄巴特拉三世	前 116—前 107 年,前 107—前 101 年
托勒密十世	前 101—前 88 年
托勒密十二世(吹笛者)	前 80—前 58 年
克娄巴特拉十二世	前 51—前 30 年

塞琉古王朝国王

塞琉古一世(胜利者)	前 312—前 281 年
安条克一世(救星)	前 281—前 261 年
安条克二世(神)	前 261—前 246 年
塞琉古二世(凯旋者)	前 246—前 226/225 年
塞琉古三世(救星)	前 226/225—前 223 年
安条克三世	前 223—前 187 年
塞琉古四世(笃爱父亲者)	前 187—前 175 年
安条克四世(神显者)	前 175—前 164 年
安条克五世(父贵者)	前 164—前 162 年

德美特里一世(救星)	前 162—前 150 年
亚历山大一世(主人)	前 150—前 145 年
德美特里二世(胜利者)	前 145—前 140 年,前 129—前 125 年
安条克六世	前 145—前 140 年
安条克七世	前 138—前 129 年
亚历山大二世(奴隶)	前 129—前 123 年
克娄巴特拉·特阿	前 125—前 121 年
塞琉古五世	前 125 年
安条克八世(鹰钩鼻子)	前 121—前 96 年
安条克九世(敬神者)	前 115—前 95 年
塞琉古六世(神显者)	前 96—前 95 年
德米特里三世	前 95—前 87 年
菲利普一世(笃爱兄弟者)	前 95—前 83 年
安条克十世(笃爱父亲者)	前 95—前 83 年
安条克十二世	前 87—前 84 年
提格兰二世	前 83—前 69 年
安条克十三世	前 69—前 64 年
菲利普二世(亲罗马者)	前 65—前 64 年

帕加马的阿塔尔王朝国王

菲勒忒尔	前 283—前 263 年
欧迈尼斯一世	前 263—前 241 年
阿塔尔一世(救星)	前 241—前 197 年
欧迈尼斯二世(救星)	前 197—前 159 年
阿塔罗斯二世(笃爱兄弟者)	前 159—前 138 年
阿塔罗斯三世(笃爱母亲者)	前 138—前 133 年
欧迈尼斯三世(阿里斯东尼克)	前 133—前 129 年

本都国王

米特拉达提一世	前 302—前 266 年

阿里奥巴尔赞	前 266—前 250 年
米特拉达提二世	前 250—前 220 年
米特拉达提三世	前 220—前 189 年
法尔纳克一世	前 189—前 155 年
米特拉达提四世(笃爱父亲者)	前 154—前 152 年
米特拉达提五世(施主)	前 152—前 120 年
米特拉达提六世(父贵者)	前 120—前 63 年
法尔纳克二世	前 63—前 47 年
大流士(本都的)	前 39—前 37 年
波列蒙一世	前 37—前 8 年
皮托多里斯	前 8—38 年
波列蒙二世	38—64 年

罗马皇帝

奥古斯都	前 31—14 年
提比略	14—37 年
卡里古拉	37—41 年
克劳狄乌斯	41—54 年
尼禄	54—68 年
加尔巴/奥索/维特利乌斯	68—69 年
韦斯帕芗	69—79 年
提图斯	79—81 年
图密善	81—96 年
涅尔瓦	96—98 年
图拉真	98—117 年
哈德良	117—138 年
安东尼努斯·皮马斯	138—161 年
马可·奥勒留	161—180 年
康茂德	180—192 年

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	193—211 年
卡拉卡拉	211—217 年
埃拉伽巴路斯	218—222 年
亚历山大·塞维鲁	222—235 年
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	235—238 年
戈尔迪安三世	238—244 年
菲利普(阿拉伯人)	244—249 年
德基乌斯	249—251 年
瓦莱里安	253—260 年
加里恩努斯	253—268 年
克劳狄乌斯二世	268—270 年
奥勒良	270—275 年
普罗布斯	276—282 年
戴克里先	284—305 年
伽列里乌斯	305—311 年
君士坦丁一世	306—337 年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	337—361 年
君士坦斯一世	337—350 年
尤利安	361—363 年
约维安	363—364 年
瓦伦丁尼安一世	364—375 年
瓦伦斯	364—378 年
格拉提安	367—383 年
瓦伦丁尼安二世	375—392 年
狄奥多西一世	379—395 年

东罗马以及拜占庭帝国皇帝

阿卡狄乌斯	383—408 年
狄奥多西二世	408—450 年

马尔基安	450—457 年
利奥一世	457—474 年
利奥二世	474 年
芝诺	474—491 年
阿纳斯塔修斯一世	491—518 年
查士丁一世	518—527 年
查士丁尼	527—565 年
查士丁二世	565—578 年
提比略二世	578—582 年
莫里斯	582—602 年
福卡斯	602—610 年
希拉克略	610—641 年
君士坦丁三世	641 年
赫拉克洛纳斯	641 年
君士坦斯二世	641—668 年
君士坦丁四世	668—685 年
查士丁尼二世	685—695 年,705—711 年
列昂提	695—698 年
提比略三世	698—705 年
菲里皮科斯	711—713 年
阿纳斯塔修斯二世	713—715 年
狄奥多西三世	715—717 年
利奥三世	717—741 年
君士坦丁五世	741—775 年
利奥四世	775—780 年
君士坦丁六世	780—797 年
伊琳娜	797—802 年
尼基弗鲁斯一世	802—811 年
斯陶拉基奥斯	811 年

迈克尔一世	811—813 年
利奥五世	813—820 年
迈克尔二世	820—829 年
狄奥菲洛	829—842 年
迈克尔三世	842—867 年
巴西尔一世	867—886 年
利奥六世	886—912 年
亚历山大	912—913 年
君士坦丁七世(紫衣贵族)	913—959 年
罗曼努斯一世·拉卡潘努斯	920—944 年
罗曼努斯二世	959—963 年
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	963—969 年
约翰一世·齐米西斯	969—976 年
巴西尔二世	976—1025 年
君士坦丁八世	1025—1028 年
罗曼努斯三世阿吉罗斯	1028—1034 年
迈克尔四世	1034—1041 年
迈克尔五世	1041—1042 年
佐伊和狄奥多拉	1042 年
君士坦丁九世·摩诺马修斯	1042—1055 年
狄奥多拉	1055—1056 年
迈克尔六世	1056—1057 年
伊萨克一世·科穆宁	1057—1059 年
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	1059—1067 年
罗曼努斯四世·狄奥吉尼斯	1067—1071 年
迈克尔七世·杜卡斯	1071—1078 年
尼基弗鲁斯三世	1078—1081 年
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	1081—1118 年
约翰二世·科穆宁	1118—1143 年

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	1143—1180 年
阿莱克修斯二世·科穆宁	1180—1183 年
安德洛尼卡一世·科穆宁	1183—1185 年
伊萨克二世·安格洛斯	1185—1195 年,1203—1204 年
阿莱克修斯三世·安格洛斯	1195—1203 年
阿莱克修斯四世·安格洛斯	1203—1204 年
阿莱克修斯五世·安格洛斯	1204 年
西奥多一世·拉斯卡里斯	1204—1222 年
约翰三世·瓦塔挈斯	1222—1254 年
西奥多二世·拉斯卡里斯	1254—1258 年
约翰四世·拉斯卡里斯	1258—1261 年
迈克尔八世·帕里奥洛加斯	1261—1282 年
安德洛尼卡二世·帕里奥洛加斯	1282—1328 年
安德洛尼卡三世·帕里奥洛加斯	1328—1341 年
约翰五世·帕里奥洛加斯	1341—1391 年
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	1347—1354 年
安德洛尼卡四世	1376—1379 年
约翰七世·帕里奥洛加斯	1390 年
曼努埃尔二世·帕里奥洛加斯	1391—1425 年
约翰八世·帕里奥洛加斯	1425—1448 年
君士坦丁十一世·帕里奥洛加斯	1448—1453 年

奥斯曼帝国苏丹

奥斯曼	1300—1324 年
乌尔汗	1324—1362 年
穆拉德一世	1362—1389 年
巴耶塞特一世	1389—1402 年
穆罕默德一世	1413—1421 年
穆拉德二世	1421—1444 年,1445—1451 年

穆罕默德二世	1444—1445年,1451—1481年
巴耶塞特二世	1481—1512年
赛利姆一世	1512—1520年
苏莱曼一世	1520—1566年
赛利姆二世	1566—1574年
穆拉德三世	1574—1595年
穆罕默德三世	1595—1603年
艾哈迈德一世	1603—1617年
穆斯塔法一世	1617—1623年
穆拉德四世	1623—1640年
易卜拉欣	1640—1648年
穆罕默德四世	1648—1687年
苏莱曼二世	1687—1691年
艾哈迈德二世	1691—1695年
穆斯塔法二世	1695—1703年
艾哈迈德三世	1703—1730年
马赫穆德一世	1730—1754年
奥斯曼三世	1754—1757年
穆斯塔法三世	1757—1774年
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	1774—1789年
赛利姆三世	1789—1807年
马赫穆德二世	1808—1839年
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	1839—1861年
阿卜杜勒阿齐兹	1861—1876年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1876—1909年
穆罕默德五世	1909—1918年
穆罕默德六世	1918—1922年

希腊王国国王

奥托	1833—1862年

乔治一世	1863—1913 年
康斯坦丁一世	1913—1917 年,1920—1922 年
亚历山大	1917—1920 年
乔治二世	1922—1924 年,1935—1947 年
保罗	1947—1964 年
康斯坦丁二世	1964—1967 年

希腊共和国总统

扬尼斯·卡波迪斯崔阿斯	1828—1831 年
奥古斯丁·卡波迪斯崔阿斯	1831—1832 年
保罗·孔杜里奥提斯	1924—1926 年,1926—1929 年
赛德罗斯·潘加洛斯	1926 年
亚历山德罗斯·塞米斯	1929—1935 年
乔治奥斯·佐塔基斯	1967—1972 年
乔治·帕帕多普洛斯	1972—1973 年
费宗·吉齐基斯	1973—1974 年
米海尔·斯塔西诺普洛斯	1974—1975 年
康斯坦丁·察佐斯	1975—1980 年
康斯坦丁·卡拉曼里斯	1980—1985 年
扬尼斯·阿莱夫拉斯	1985 年
赫里斯托斯·萨采塔基斯	1985—1990 年
康斯坦丁·卡拉曼里斯	1990—1995 年
康斯坦丁·斯特凡诺普洛斯	1995—2005 年
卡罗洛斯·帕普利亚斯	2005——

希腊总理(从特里库皮斯开始)

查理拉奥斯·特里库皮斯	1880 年,1882—1885 年, 1886—1890 年,1892—1893 年, 1893—1895 年
赛德罗斯·德利吉安尼斯	1885—1886 年,1890—1892 年,

	1895—1897 年,1902—1903 年,1904—1905 年
亚历山德罗斯·塞米斯	1897—1899 年,1901—1902 年,1915 年,1916 年,1917 年,1928 年
乔治奥斯·特奥托基斯	1899—1901 年,1903—1904 年,1905—1909 年
迪米特里奥斯·拉利斯	1897 年,1903 年,1905 年,1909 年,1920—1921 年
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	1910—1915 年,1917—1920 年,1924 年,1928—1932 年
迪米特里奥斯·贡纳里斯	1915 年,1921—1922 年
斯提利亚诺斯·戈纳塔斯	1922—1924 年
特米斯托克里斯·索福利斯	1924 年,1945—1946 年,1947—1949 年
赛德罗斯·潘加洛斯	1925—1926 年
乔治·康迪利斯	1926 年,1935 年
帕纳吉斯·查达里斯	1932—1933 年,1933—1935 年
康斯坦丁诺斯·德米列切斯	1935—1936 年
扬尼斯·梅塔克萨斯	1936—1941 年
亚历山德罗斯·科里齐斯	1941 年
艾马努伊·佐德诺斯	1941—1944 年
索法克利斯·韦尼泽洛斯	1944 年,1950 年,1951 年
乔治·帕潘德里欧	1944—1945 年,1963 年,1964—1965 年
尼古拉斯·普拉斯提拉斯	1945 年,1950 年,1951—1952 年
大主教扎马斯基诺斯	1945 年
帕纳吉奥提斯·卡纳洛普洛斯	1945 年,1967 年

特米斯托克里斯·索福利斯	1945—1946 年,1947—1949 年
亚历山德罗斯·帕帕戈斯	1952—1955 年
康斯坦丁·卡拉曼里斯	1955—1963 年,1974—1980 年
扬尼斯·帕拉斯克沃普洛斯	1963—1964 年,1966—1967 年
乔治·帕帕多普洛斯	1967—1973 年
阿扎曼蒂奥斯·安兹鲁佐普洛斯	1973—1974 年
乔治·拉利斯	1980—1981 年
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	1981—1989 年,1993—1996 年
康斯坦丁·米佐塔基斯	1990—1993 年
科斯塔斯·西米蒂斯	1996—2004 年
科斯塔斯·卡拉曼里斯	2004—2009 年
乔治·帕潘德里欧	2009—

书目选介

史前至公元前500年：发源

对于历史最初发源阶段的资料，通常建议是查找那些记载最新考古研究的文献。有关青铜时代，参见 Cynthia W. Shelmerdine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egean Bronze Age* (Cambridge, 2008)，和 Donald Preziosi and Louise A. Hitchcock, *Aegean Art and Architecture* (*Oxford History of Art*) (Oxford, 1999)。关于东地中海地区的统一，参见 Marc van der Meiroop,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in the Ages of Ramesses Ⅱ* (Oxford, 2007)。铁器时代和古风时代则处处皆是有争议但具启迪性的主题。其中颇能启发思路的是 Ian Morris 所著 *Archaeology as Cultural History* (Oxford, 2010)，和 Jonathan M. Hall 所著 *A History of Archaic Greek World, ca. 1200—479 BCE* (Oxford, 2006)，但据我看来论证最具说服力的当属 Robin Osborne 所著 *Greek in the Making, 1200—479 BC* (London, 1996)。有关考古和艺术，分别参见 James Whitley,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2001) 以及 Robin Osborne,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k Art* (Oxford, 1998)。相当关键的一部著作来自 Jean-Pierre Vernant, *The Origins of Greek*

Thought (Ithaca, New York, 1982),其中一部分内容编入 H. A. Shapiro (ed) 所著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rchaic Greece* (Cambridge, 2007)。有关希腊民族的形成,参见 Jonathan M. Hall, *Hellenicity: Between Ethnicity and Culture* (Chicago, 2002)。

古典时代的希腊(前 500—前 359):城邦的黄金时期

古典时期的文献异常丰富,在此仅作简略介绍。近期的综述研究包括 Simon Hornblower, *The Greek World, 479—323 BC*, 3rd edn (London, 2002),以及 P. J. Rhodes, *A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Greek world* (Oxford, 2006),更有针对性的材料组织参见 Robin Osborne (ed.), *Classical Greec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urope)* (Oxford, 2000)。为何西方世界如此关注于希腊人?其中缘由在传统史学中未曾明述。Simon Goldhill, *Love, Sex and Tragedy: Why Classics Matter* (London, 2004)向我们阐释了为何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如此特别。J. K. Davies, *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 2nd edn (London, 1993),以及 Robin Osborne, *Greek History* (London, 2004)中有一些复又启发性的演绎观点。希腊人构造希腊世界的方式,参见 Paul Cartledge, *The Greeks* (Oxford, 1993), J.-P. Vernant (ed.), *The Greeks* (Chicago, 1995),以及 J.-P. Vernant, *Myth and Society in Antient Greece* (New York, 1980)。有关雅典政治,参见 Josiah Ober, *The Athenian Revolution* (Princeton, 1996),雅典战争参见 Paul Cartledge, *Thermopylae: The Battl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London, 1989)。有关城邦,参见 Mogens Herman Hansen, *Pol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cient Greek City-state* (Oxford, 2006)以及由 M. H. Hansen 和 Thomas Heine Nielsen 编著的百科全书式著作 *An Inventory of Archaic and Classical Poleis* (Oxford, 2004)。

希腊化时期(前 359—前 27):从菲利普二世到奥古斯都

关于希腊化时期的历史研究,近期著作包括 Graham Shipley, *The*

Greek World after Alexander, 323—30 BC (London, 2000),以及 Malcolm Errington, *A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323—30 BC* (Oxford, 2008)。这一领域的两位资深学者对此阶段历史有过简短而极具价值的介绍:Frank W. Walbank, *The Hellenistic World*, 2nd edn (London, 1993),以及 Peter Green,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Hellenistic Age* (London, 2007)。Glen R. Bugh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Hellenistic World* (Cambridge, 2006),以及 Andrew Erskine (ed.), *A Companion to the Hellenistic World* (Oxford, 2003)为读者提供了有关各个主题综合而全新的探讨。关于亚历山大有诸多传记,其中 A. B. Bosworth, *Conquest and Empire: The Reign of Alexander the Great* (Cambridge, 1988)非常专业且广受赞誉,而 Paul Cartledge, *Alexander the Great* (London, 2004)则是最理想的介绍作品。有关亚历山大和希腊主义,参见 A. B. Bosworth and E. J. Baynham (eds), *Alexander the Great: Fact and Fiction* (Oxford, 2000)一书中 Michael Flower, "Alexander and Panhellenism"。有关其后的希腊主义,参见 Arnaldo Momigliano, *Alien Wisdom* (Cambridge, 1971)以及 Stanley Burnstein, "Greek Identity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 in Katerina Zacharia (ed.), *Hellenisms* (Aldershot, 2008)。有关罗马帝国主义和希腊世界,标准推荐书目是 Erich S. Gruen, *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Coming of Rome* (Berkeley, CA, 1984)以及 W. V. Harris, *War and Imperialism in Republican Rome, 327—70 BC* (Oxford, 1979)。

希腊罗马帝国(一)(前 27—527):从罗马和平时期到古代晚期

罗马人对于希腊人和希腊世界的态度,在大量著作中都曾探讨,包括 Erich Gruen, "Rome and the Greek World", in Harriet I. Flow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Roman Republic* (Cambridge, 2004); Emma Dench, *Romulus' Asylum* (Oxford, 2005); Wallace-Hadrill, "To Be Greek, Go Greek", in M. Austin,

J. Harries and C. Smith (eds), *Modus Operandi* (London, 1998); 以及 Ronald Mellor, "Graecia Capta", in K. Zacharia (ed.), *Hellenisms* (Aldershot, 2008)。有关罗马和平时期罗马人的态度,参见 Karl Galinsky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Augustus* (Cambridge, 2006)。尤其重要的著作是 Greg Woolf, "Becoming Roman, Staying Greek",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40 (1994), pp. 116—143。有关罗马统治下的希腊,重要著作有 Susan Alcock, *Gaecia Capta* (Cambridge, 1993), 另外参见 B. M. Levick, "Greece (including Crete and Cyprus) and Asia Minor from 43 BC to AD 69", in Alan Bowman, Edward Champlin and Andrew Lintott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Ⅹ, 2nd edn (Cambridge, 1996); Maude Gleason, "Greek Cities under Roman Rule", in D. S. Potter (ed.), *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2006); Fergus Millar, "The Greek City in the Roman Period", *The Greek World, the Jews, & the East* (Chapel Hill, NC, 2006); and Millar, "P. Herennius Dexippu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9 (1/2) (1969), pp. 122—129。第二次智者浪潮参见 Simon Swain, *Hellenism and Empire* (Oxford, 1996), Tim Whitmarsh, *Greek Literature and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2001),以及 Simon Goldhill (ed.), *Being Greek under Rome* (Cambridge, 2001)。有关古典时期的过去和希腊意识,进一步的探究可以参见 Christopher Kelly,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2006), ch. 4, 以及 Rowland Sm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 in David S. Potter (ed.), *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2006)。

有关希腊东方,参见 Maurice Sartre, *The Middle East under Rome* (Cambridge, MA, 2005),以及重要著作 Fergus Millar, *A Greek Roman Empire* (Berkeley, CA, 2006)。有关古代晚期,里程碑式的著作是 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AD 150*—

750 (London, 1971), 而篇幅长短不一的近期阐述性著作则有 Stephen Mitchell,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D 284–641* (Oxford, 2007) 以及 Peter Brown, *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 2nd edn (Oxford, 2003)。有关希腊主义,参见 Claudia Rapp, "Hellenic Identity, Romantitas, and Christianity in Byzantium", in K. Zacharia (ed.), *Hellenisms* (Aldershot, 2008)。

希腊罗马帝国(二)(约 500–1200):东正教的胜利

古代晚期研究的重要起步推荐著作包括 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London, 1973),同时亦可参见该书作者另一本书 *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 2nd edn* (Oxford, 2003); Stephen Mitchell,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D 284–641* (Oxford, 2007),以及 Michael Angold, *Byzantium: The Bridge from Antiquity to the Middle Ages* (London, 2001)。更加专注于早期拜占庭研究的著作包括 Michael Mas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Justinian* (Cambridge, 2005); Averil Cameron, Bryan Ward-Perkins, and Michael Whitby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V (Cambridge, 2000); 以及 John Haldon, *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90)。其后时期的研究,相当有价值的著作包括 Mark Whittow, *The Making of Byzantium, 600–1025* (Berkeley, CA, 1996),以及 Michael Angold, *The Byzantium Empire, 1025–1204*, 2nd edn (London, 1997)。关于拜占庭,通史颇多。参见 John Haldon, *Byzantium: A History* (London, 2005); Cyril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Oxford, 2002); Timothy E. Gregory, *A History of Byzantium* (Oxford, 2005); 以及 Warren Treadgold 里程碑式的著作,而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 (Stanford, CA, 1997)。Judith Herrin, *Byzantium: The Surprising Life of a Medieval Empire* (London, 2007) 是一部生动阐释为何拜占庭当之

无愧获得更多公众好评的著作，而 Jonathan Harris (ed.), *Palgrave Advances in Byzantine History* (London, 2005)则极具价值地介绍了相关文献资源和近期的学术进展。

下列重要著作研究重大主题：Robin Cormack, *Byzantine Art* (Oxford, 2000)；Angeliki E. Laiou and Cécile Morrisson, *The Byzantine Economy* (Cambridge, 2007)，以及 John Haldon, *War,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Byzantine World, 565 – 1204* (London, 1999)。有关巴尔干世界，参见 Florin Curta, *Southea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500—1250* (Cambridge, 2006)，而 Chris Wickham, *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Oxford, 2007)则着眼于更广阔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的专业研究。有关马其顿和科穆宁时期，参见 Catherine Holmes, *Basil II and the Governance of Empire (976 – 1025)* (Oxford, 2005)；Paul Magdalino, *The Empire of Manuel I Komnenos, 1143—1180* (Cambridge, 1993)；以及 A. P. Kazdham and Ann Wharton Epstein, *Change in Byzantine Culture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Berkeley, CA, 1985)。无数著作探讨早期十字军东征，其中特别相关的当属 Jonathan Harris, *Byzantium and the Crusades* (London, 2003)。

希腊世界(1200—1700)：法兰克人和奥斯曼人统治下的生活

Jonathan Shepard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Cambridge, 2009)一书的后面部分章节提供了涵盖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阅读资料。相关叙述性历史参见 Donald M. Nicol, *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 1261 – 1453*, 2nd edn (Cambridge, 1993)。有关 1204 年前夕的局势，参见 Michael Angold, *The Byzantine Empire, 1025—1204*, 2nd edn (New York, 1997)。对此事件更加详尽的研究，参见 Angold, *The Fourth Crusade* (New York, 2003)，而从拉丁人的视角出发所做的研究，参见 Jonathan Philips, *The Fourth Crusade and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2005)。有关拜占庭希腊主义,参见 Paul Magdalino, "Hellenism and Nationalism in Byzantium", in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Medieval Byzantium* (Aldershot, 1991),以及 Roderick Beaton, "Antique Nation?", *Byzantine and Modern Greek Studies, 31* (2007), pp 76—95。有关法兰克人希腊时期,参见 Peter Lock, *The Franks in the Aegean* (London, 1995),而有关拜占庭人和早期奥斯曼人,重要研究可见 Elisabeth A. Zachariadou, *Studies in Pre-Ottoman Turkey and the Ottomans* (London, 2007)。Daniel Goffma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2003)对早期以及古典奥斯曼历史作了精妙介绍,而 Karen Barkey, *Empire of Difference* (Cambridge, 2008)则对奥斯曼制度的成长做了深刻剖析。关于1453年,著述颇多,最近的一部是 Roger Crowley, *Constantinople* (London, 2006)。有关威尼斯辖下的克里特,参见 David Holton (ed.),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Crete* (Cambridge, 1991),以及 Sally McKee, *Uncommon Dominion* (Philadelphia, 2000),而有关奥斯曼的更替,参见 Molly Greene, *A Shared World* (Princeton, 2000)。

现代希腊的形成(1700—1910):种族渊源与国家建设

有关奥斯曼帝国后期,参见 Donald Quataert, *The Ottoman Empire, 1700—1922*, 2nd edn (Cambridge, 2004)。有关独立前的希腊人,有价值的著作包括 Paschalis Kitromilides, *The Enlightment as Social Criticism* (Princeton, 1992), Helen Angelomatis-Tsougarakis, *The Eve of the Greek Revival* (London and New York, 1990),以及 Katherine Fleming, *The Muslim Bonaparte* (Princeton, 1999)。有关欧洲的亲希腊精神,参见 Constanze Güthenke, *Placing Modern Greece* (Oxford, 2008), Suzanne L. Marchand, *Down from Olympus* (Princeton, NJ, 1996),以及 David Roessel, *In Byron's Shadow* (Oxford, 2002)。有关希腊独立战争,参见 Douglas Dakin,

The Greek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1821—1833 (London, 1973), 以及 David Brewer, *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2001)。有关 19 世纪的希腊, 参见 Thomas W. Gallant, *Modern Greece* (London, 2001), 以及 Richard Clogg, *A Concise History of Modern Greece*, 2nd edn (Cambridge, 2002)。下列著作涵盖关键主题: John S. Koliopoulos, *Brigands with a Cause* (Oxford, 1987); Robert Shannan Peckham, *National Histories, Natural States* (London, 2001); Michael Herzfeld, *Ours Once More* (Austin, TX, 1986), 以及 Philip Carabott (ed.), *Greek Society in the Making, 1863—1913* (Aldershot, 1997)。有关雅典, 参见 Eleni Bastéa, *The Creation of Modern Athens* (New York, 2000), 以及 Michael Llewellyn Smith, *Athens: A Cultural and Literary History* (London, 2004)。

20 世纪的希腊: 极端的时代

关于现代时期的希腊, 最杰出的资料都是用希腊语出版的著作。近期希腊学术论文质量的典范, 可参见 Christos Hatziiosif (ed.), *Istoria tis Elladas tou 20ou aiona*, 3 vols (Athens, 1999, 2004, 2008)。有关小亚细亚的灾难, Michael Llewellyn Smith, *Ionian Vision* (London, 1973) 作了坚实而公正的阐述。有关大萧条, 参见 Mark Mazower, *Greece and the Inter-war Economic Crisis* (Oxford, 1991), 有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 参见 G. Mavrogordatos, *Stillborn Republic* (Berkeley, CA, 1983),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境况, 参见 Mazower 所著的获奖著作 *Inside Hitler's Greece* (New Haven, CT, 1994)。有关内战的研究吸引了历史学家们的最大关注, 一本非常好的介绍性著作是 David Close,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vil War* (London, 1995)。其他重要的研究成果参见 David Close (ed.), *The Greek Civil War*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以及 Philip Carabott and Thanasis D. Sfikas (eds), *The Greek Civil War*

(Aldershot, 2004), 有关内战所留下的影响,参见 Mark Mazower (ed.), *After the War Was Over* (Princeton, 2000)。有关战后研究,参见 David Close, *Greek Since 1945* (London, 2002),以及 D. Costas and T. Stavrou (eds), *Greece Prepar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1995)。有关专门主题研究,参见如下著作: Richard Clogg (ed.), *The Greek Diaspor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2000); Thanos Veremis, *The Military in Greek Politics* (London, 1997); Richard Clogg (ed.), *Greece under Military Rule* (New York, 1972)。其他相关文章参见 Katerina Zacharia (ed.), *Hellenisms* (Aldershot, 2008)。

索　　引

（本索引中的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B

C

D

E

H

I

L

M

N

O

P

S

U

[General Information 本信息由OnlyDown 1.6秋意版生成]
书名=希腊史=A History of Greece
作者=（英）尼古拉斯·杜马尼斯著；屈闻明，杨林秀译
页码=281
ISBN=
SS号=13100744
dxNumber=000008297665
出版时间=2012.04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定价：
试读地址=http://book.szdnet.org.cn/views/specific/2929/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297665&d=48AB952069C626AD16205A6B4FBADCE0&fenlei=11061005#ctop
全文地址=b725ec2caf9a6cbbedae35fcc19c7fe0/img15/E1CEB6E5C425565811A0F8C7E20AFA8B71A66B4529855B45652B209AF469AFC8979A9034F49A07819C21D8F7D39B72124B36A8A54CED02BCA063883C0F99C9107410E25D2830B92F21A86F7B456944522260A0D618DAD4BC4F6F27403CE31415052FC205EBB38A1E7AD9D073E62CB11DEF77/b13/qw/